

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五卷)

本书编委会 编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五卷)/ 本书编委会 编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8 月
ISBN 7-5609-2505-7

. 中...
. 本...
. 人文科学-中国-高等学校-文集
. C53

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五卷)

本书编委会 编

责任编辑: 钱 坤
责任校对: 陈元玉

封面设计: 刘 卉
责任监印: 张正林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武昌喻家山 邮编: 430074

电话: (027)87545012

录 排: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照排室

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25

插页: 3

字数: 334 000

版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15 001—25 000

ISBN 7-5609-2505-7/ C·54

定价: 17.8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代序 文化素质教育要在“素质”、“思想”上下功夫	周远清()
-----------------------------------	--------

· 哲学与科学 ·

周光召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科协主席 中国科学院院士 历史的启迪与科学发现的条件.....	(1)
丁肇中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 诺贝尔奖获得者 寻找宇宙中的基本粒子	(15)
王太庆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柏拉图和他的《理想国》	(19)
张世英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评析	(29)
何兆武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及其他	(44)
吴国盛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回首百年科技——世纪之交的历史总结与哲学分析	(56)
倪梁康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理念人——一项哲学的考察	(73)

· 大学与教育 ·

- 杨振宁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 诺贝尔奖获得者
科学技术、社会发展与未来教育的改革..... (86)
- 杨叔子 中国科学院院士 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是“育人”,非“制器”——再谈人文教育的基础地位..... (93)
- 田长霖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原校长
知识经济和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与展望..... (103)
- 樊明武 中国工程院院士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人在旅途:探索、创新与失败——兼谈创办世界一流大学
..... (109)
- 刘兆汉 台湾中央大学校长
高等教育在未来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118)
- 王义遒 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 教授
文化素质教育的理念及其未来的发展..... (124)

· 中国与世界 ·

- 何芳川 北京大学副校长 教授
“华夷秩序”论(上)..... (132)
- 何芳川 北京大学副校长 教授
“华夷秩序”论(下)..... (145)
- 许倬云 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
从中国历史看世界未来..... (154)
- 林安梧 台湾清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 宗教与哲学教授
儒道文化与台湾现代化..... (166)
- 李洪山 美国肯特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 博士
美国人的中国观——国民形象与中美关系..... (179)

赵 林 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 博士

张星久 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

中西文化对谈..... (186)

马 敏 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 博士 教授

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流..... (199)

· 文化与人生 ·

龚育之 全国政协常委 著名党史研究专家

何祚庥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五四精神的历史意义..... (211)

金耀基 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 教授

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化..... (222)

张 磊 广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227)

王晓秋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五四运动和中外文化的交融..... (232)

刘献君 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 教授

适应社会,走向成功 (243)

李德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当代人类生存的哲学思考..... (255)

苏叔阳 著名作家

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文化 (263)

· 文学与艺术 ·

陈 洪 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 文学院教授

孙勇进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师 博士

南开论剑:金庸的作品有多伟大?(上) (274)

- 陈 洪 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 文学院教授
孙勇进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师 博士
南开论剑:金庸的作品有多伟大?(下) (286)
- 孙绍振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文学经典的审美价值..... (297)
- 王乾坤 武汉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回到你自己..... (305)
- 丁 宁 北京大学艺术系教授 博士
马斯洛人本主义艺术心理学评介..... (313)
- 李光羲 著名歌唱家
我的演唱生涯和美育情怀..... (323)
- 刘震云 著名作家
永恒的家园与我笔耕的领地
——文学是什么及我所从事的文学..... (335)

· 经济与社会 ·

- 张培刚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 教授
理解中国 需十分谨慎..... (347)
- 曾宪梓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香港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
勤俭与诚信..... (356)
- 朱善利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教授
中国与 WTO (364)
- 余明阳 沱牌曲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
信息传播学院教授 博士
名牌:中国企业的世纪难题 (385)

· 人文访谈 ·

冰心百年追思——访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老舍之子舒乙,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冰心之女吴青 (395)

为了心中永远的敦煌——访敦煌研究院院长
樊锦诗教授..... (409)

关于思想解放的回顾与思考——访首都师范大学
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孙长江教授..... (419)

美·美育·美学家
——访著名美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阎国忠教授 (428)

后记..... (440)

代序

文化素质教育要在“素质”、 “思想”上下功夫

周远清

作为高等教育素质教育的切入点——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开展多年了,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高等教育战线,特别是高等学校已经形成共识。近几年来,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高等学校采取了很多措施,开展教育思想的大讨论,广泛组织人文讲座,编写书系、调整教学计划增加人文课程,组织人文知识竞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活动等等,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建设也在扎扎实实地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研究也不断在深入,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有的地区有的学校还停留在号召和口号上,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或者采取措施的力度不大,甚至认为这是补中学的课。即使是文化素质教育开展得比较好的地区和学校也存在一个如何深入进行文化素质教育,如何把文化素质教育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紧密结合起来的问题。为了把文化素质教育引向深入,我认为,有两个问题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首先是要在“素质”二字上下功夫。文化素质教育是全面促进素质教育的一部分,文化素质是一个大学生带基础性的素质,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业务素质、身体心理素质有重要的影响,这是这些年来我们开展加强文化素质教育过程中形成的基本共识。

为了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当然必须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授,即文史哲等的基本知识、艺术的基本修养、我国和国外优秀的文化成果这几方面的教育。知识的传授都是必不可少的,也是首先要进行的,但是知识不等于素质,素质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文化素质教育不等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简单积累,素质是知识内化为人的品格。在一定意义上说,素质是高于知识和能力的,知识的多与少,能力的强与弱,都不能表明素质的高与低,当然素质与知识和能力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所以文化素质教育要在必要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传授的基础上,使它内化为人的品格,提高人的格调、品位、修养,也就是说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完成和实现了这种转化,才能完成文化素质教育的任务,达到素质教育的目的。简单的知识传授与接收不能称之为素质教育。所以人文学科专业的学生同样有文化素质教育的问题,当然人文学科专业的学生还必须学一些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因此,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必须要在“素质”两个字上下功夫,要注意知识的内化过程,要真正着眼于人的素质的提升。这就决定了文化素质教育的内容和教育的方法。当然,如何真正实现“内化”,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在理论上加强研究。

另外,要在“思想”二字上下功夫。我们一直强调,素质教育是一种教育思想,不是一种简单的教育模式,提倡素质教育是教育思想上的一大突破,正像从传授知识到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并重是教育思想的一大突破一样,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到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同时更加注重提高素质是教育思想的又一大突破。所以加强素质教育也包括文化素质教育,是一个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更新,教育工作者完成这一教育思想的转变本身就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所以在文化素质教育中提高认识,转变教育观念,更新教育思想就显得非常重要。只有教育者、受教育者思想观念转变了,才会以素质教育的思想为指导,实现教育过程的整体优化,才会自觉地把人才培养过程变为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的过程。把素

质教育理解为一种模式,理解为一些活动,或者理解为只在课程、学时上做一些简单的加减法,就可以达到素质教育的目的,等等,这些看法显然是不对的。素质不等于知识,也不能简单说培养学生某些能力就是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核心就在于切实提高人才的素质,提高能使人的知识和能力更好发挥作用的内在的格调、品位、修养。

2000 年 11 月

哲学与科学

周光召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科协主席
中国科学院院士

历史的启迪与科学发现的条件

[1999 年 10 月在浙江大学演讲]

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实行科教兴国的战略,从各方面都加强了科研和教育经费的投入。而且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科技的重要性日益为社会所认同,可以预计,中央、地方和企业对科研经费的投入都将不断增大。但是科研经费只是获得重大科研成果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在目前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应当更多地注重其他一些条件的创造。

首先,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社会面临着哪些重大的科技需求,就是中国在 21 世纪所面临的重大的问题,而由这些问题就产生了对科技的重大的社会需求。

首先是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紧迫的任务。我国的人口现在仍在增长,20 世纪末要接近 13 亿,21 世纪中叶可能达到 16 亿,而超过 60 岁的老龄人口现在已经占到人口总数的 10%,超过 65 岁的已经占到 7%。这表明我国

现在已经开始进入老龄社会。现在第一产业劳动力大量过剩,这些我们在农村都可以看到;第二产业劳动力也过剩,我们很多的国有企业都出现了下岗问题。所以就业问题会长期困扰我们国家。如何解决好中国进入老龄社会和中国就业问题,是 21 世纪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从农业方面来看,这些年来,我国的耕地面积在减少。这里有一个中国东部和沿海省市耕地减少的示意图。比如:河北减少的相当多,广州减少的最多。但是可以告慰的是,我们浙江减少的并不太多。我们国家的面积虽然很大,但是大量的土地都在西北部。光这个地区就占了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西北是干旱区,每年降水量不超过 200 毫米。国土虽大,但真正可利用的土地并不多。而在北方,干旱情况一直延续到华北。大家可以看到,从 1991 年开始,黄河断流的时间在逐步上升,到了 1997 年的时候,已经到了 220 多天,而且断流的长度现在又有一个上升的趋势。所以干旱化使得 90 年代黄河中上游的年天然径流量比 50 年代减少了将近四分之一,约为 24.4%。在自然构成和人类活动的共同作用下,下游的实际经流量减少了 68%,这样造成了黄河的连年断流,而每年的经济损失已超过 100 亿元。

我们耕地面积在减少,那么就需要提高单产。在单产问题上,我们曾经经过了第一次突破,就是改良品种,产量提高了两三成。又经过了第二次突破,在 70 年代,杂交优势使得产量又提高了 25%。但是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还没有出现重大的突破。现在正在酝酿重大的突破。超级水稻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好的苗头,我们必须要在这方面有新的突破。否则,在耕地下降、单产徘徊的情况下,没办法养活 16 亿人口。

再看一看能源。例如石油。在中国工人和科技人员的努力下,中国从过去的无油国达到了自给自足。在 1993 年以前,中国都是石油的出口国,但是从 1993 年以后,又变成了石油的进口国,而且差距越来越大。估计到 2010 年,石油年缺口 1 亿吨,天然气

年缺口 4 000 亿立方米——相当于 4 000 万吨的石油。所以到 2010 年,中国很可能要缺 1.4 亿吨的石油。但是中国的能源水平还是很低的,按照小康水平,人均能源年消耗,预计应该是 1 千瓦,而实际上中国人均才有 0.2 千瓦。

我们国家的信息产业的核心,像亚微米的微电子技术、CPU 芯片和电脑的操作系统现在完全由外国公司提供。重要的电脑和网络部件、外设传感器和应用软件,也很少有中国自己的知识产权。信息资源的进一步传输和处理技术远远落后,电脑和网络的应用也才刚刚起步。我们要在信息社会迎头赶上,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要有充分的自信。中国过去是出口技术的,不像现在是引进技术。根据李约瑟教授的研究成果,从汉朝到明朝,中国传向西方的发明除了火药、造纸、活字印刷、指南针四大发明以外,还包括缫丝纺机、提花机、铸铁技术等等很多。像瓷器,特别是铁索吊桥、深钻技术等等这些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技术。到目前为止,有六位华裔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他们就是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和崔琦。早期的留学生像吴有训对康普顿效应的发现,赵忠尧对正电子的发现,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因为当时一些特殊的原因,他们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也有相当一部分华裔留学生由于科技研究上的突出贡献,得到过世界级的奖。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科学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被封锁的条件下,自主研制成功了“两弹一星”。尽管经过了许多人的努力,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是完全领先、开时代之先河的开创性的科研成果目前还没有在中国土地上产生。有很多中国人在国外科研机构做了一些有极大开创性的科研成果的工作,但是在中国土地上,特别是在基础研究这个领域,现在还没有。中国的复兴需要创造世界第一流的科研成果。什么时候在中国土地上同样能够出现领导世界科研潮流的、开辟全新研究领域的一流的科研成果?为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还缺少什么样的客观和主观条件?要创造什么样

的氛围和环境？这就是下面我要和大家来共同探讨的问题。

我们来考察一下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要看看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启迪。

首先,从世界范围来看,20 世纪最富创新力的科学发现是相对论、量子力学和基因的双螺旋结构,最有社会影响和带动力的科学工程是制造核武器的曼哈顿工程和阿波罗登月计划。

其次,从国内情况来看,中国在被封锁的情况下,成功地制成了“两弹一星”,振了国威,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中国人的自信心。那么我们就应当分析这些成功的经验,从中得到启迪,从而创造出重大的科学发现得以产生的环境和条件。

下面我从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20 世纪重大科学发现的社会和学术环境、重大科学发现产生的条件、青年怎样才能成为科学发现的主力军这三个方面来谈谈这个问题。

英国是最早的世界科学中心。直到 19 世纪末,英国作为世界上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和占有大量殖民地的国家,在科学发展上起带头作用。英国是牛顿力学、电磁场理论和进化论的创始地。他们首先发现电子和原子的结构。所以直到 20 世纪初,英国仍然是当时世界科学中心,这是和英国当时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相称的。同时,别的国家,如欧洲各大国都对科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像 18、19 世纪的英国人焦耳和德国人赫尔姆斯创立了能量守恒的热力学第一定理,法国卡洛发现了热力学第二定理,英国人道尔顿提出了原子论,俄罗斯人门捷列夫发现了元素周期表,德国人开创了有机化学。他们对科学的发展都是有功劳的。在牛顿力学后发展的是分析动力学,这个分析动力学是法国人拉格朗日,爱尔兰人哈密顿,德国人雅各比共同发展起来的。同时欧洲大陆一直注重数学的发展,早在 17 世纪,和牛顿同时代的就有莱布尼茨,他独立发现了微积分;到 19 世纪,欧洲大陆的数学已经超过了英国,出现了像高斯、黎曼、拉普拉斯等著名数学家。

在 19 世纪末,由于法国人发现了放射性,德国人研究了黑体

辐射的频率分布,美国人发现了光速不随地球相对于太空运动而改变等等现象,这些现象都不能用已有的理论来解释。当时出现了所谓的物理学危机。这一危机导致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在 20 世纪初期的 30 年里,最重要的科学发现就是量子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同时对物质结构的认识深入到原子的层次。

1905 年,德国人爱因斯坦在研究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的时候提出了相对论和光速不变的原理,确定了质量能量的等价和时间空间变化的关系,完全改变了牛顿力学的世界观和时空观。1915 年,爱因斯坦提出了关于重力的广义相对论。在 20 世纪的重大发现中,相对论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它基本上是由爱因斯坦一个人完成的。无疑爱因斯坦的个人天才在这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和其他的发现的环境条件是不一样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中国,现在我们也希望出现一个爱因斯坦。我想,最重要的是要创造一个有利于更多的科学家出现的这种环境。但是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爱因斯坦发明狭义相对论的时候,1905 年他成功解释了光电效应,那时他只是一个专利局的职员,当时他想在大学或研究机构里申请一个职位都没有得到,是在不得志的情况下发现的。这一点,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

那么量子力学是怎么发现的?1900 年,德国人普朗克首先提出光的量子论。1905 年,爱因斯坦用光量子论解释了光电现象;1913 年,丹麦人玻尔提出了电子轨道的量子化,用它解释了原子结构和原子光谱;1916 年,德国人索末菲尔德改进了玻尔的这个模型,计算了电子的椭圆轨道,这个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计算;1923 年,法国人德布洛克提出电子也是一个波动;到了 1925 年,德国人海森堡引进了矩阵作为力学量,德国人玻恩、海森堡建立量子矩阵的力学体系;1926 年,奥地利人薛定谔提出了量子波力学,证明波动力学和矩阵力学是等价的;同年,德国人玻恩提出了波函数的统计解释;1927 年,德国人约丹和英国人狄拉克证明了普遍的变换关系的定理,海森堡提出了测不准的关系,从而量子

力学的理论的构件就基本上完成。而量子力学迅速成功地运用到原子、分子和固体结构研究中去,得到了很多的结果。量子力学 20 年代以后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是是在激烈的学术争论中展开的。像薛定谔和爱因斯坦一直不同意海森堡的理论和玻恩的统计解释,爱因斯坦甚至终身都不认为量子力学是一个完备的理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从上面列举的情况来看,欧洲许多国家的科学家都参与了,但是主要部分是德国人完成的。这就说明了世界科学中心在 20 世纪初由英国转移到了欧洲大陆,主要是转移到了德国。

那么德国为什么能够在 20 世纪初成为世界的科学中心?德国在当时并不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在量子力学被发现的 1925 年左右,德国人正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以后经济特别困难的时期,当时德国科学家的生活、工作条件都是很差的,可见在条件不够好的地方也可以产生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发现。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在物质条件不够好的地方也可以产生最重要的科学发现。

当时德国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有学术传统和优势,因为德国长期尊重知识、尊重科学的传统。德国的洪堡大学最早设立专门从事研究的实验室,以后成为其他国家大学仿效的样板;同时德国率先成立了马科斯普朗克研究所和若干大学的研究中心,像柏林大学、哥廷根大学、慕尼黑大学、莱布尼茨大学等,集中了人才和资金,同时也形成了很好的学术传统。在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国的大学是采取开放流动的政策,特别是吸引了大批犹太裔的科学家到德国去定居和学习,像爱因斯坦、玻恩,这些发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大师,都是犹太裔人。同时德国鼓励国际学术交流,人员的流动,吸引了大批外国留学生,像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氢弹之父泰勒、著名的匈牙利科学家冯·诺依曼(计算机之父)、著名的俄罗斯科学家朗道等等,当年都是在德国留学过的。前不久我到德国去,曾问了德国科学家一个问题:既然德国在非常

困难的时期(20 世纪初)能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为什么现在还没有成为世界科学的最主要的中心?为什么这个中心在美国?他们的答复很简单:因为现在在吸引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到德国来这一点上,他们没有办法和美国相比,现在最好的科学家大量的犹太人和东方人,他们很少到德国去工作。同时德国当时积极培养和选拔青年,我们拿海森堡作为例子。海森堡 1920 年进入慕尼黑大学——顺便说一句,他本来还可以早一点进,但是因为经济非常困难,他先要服兵役,来获得他的基本生活的条件,所以他晚了两年进大学,但他还是很早,大约 19 岁左右——当时他跟俄国人索末菲尔德学习,就是刚才讲的在原子结构中很有贡献的一位教授,在 1923 年就得了博士学位。只花了四年的时间,就从学士、硕士跳过去了,得到博士学位。其间,他有两年(1922、1923 年),由索末菲尔德推荐转到了哥廷根大学,跟玻恩教授作学生,玻恩教授也是在量子力学发现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一位。他在哥廷根大学毕业以后就获得了资助,到丹麦哥本哈根,在原子结构、量子论的创始人玻尔那里工作了一年,到了 1924 年回到德国。海森堡自己讲,他从慕尼黑大学索末菲尔德那儿学到了乐观主义,索末菲尔德对任何困难问题都不怕,非常复杂的计算也不怕;他在哥廷根大学玻恩那儿学到了数学,因为当时数学最主要的大师就在哥廷根;他从哥本哈根玻尔那里学到了物理,玻尔是原子结构的创始人,有很强的物理直觉。这就为他在 1925 年研究、发现量子力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发现量子力学时年仅 24 岁。

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突破的过程中,哲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德国从康德开始一直到后来的黑格尔,在哲学上率先脱离机械论和绝对论。牛顿力学出来以后,机械论和绝对论在科学界成为一种绝对统治的思想。德国在哲学上率先脱离了这个束缚,发展了辩证法和唯物论。德国的科学家都有很高的哲学素养,在发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过程中,从他们的讨论中就可以看到他们对认识论有过很多的讨论。

刚才讲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都是理论上的发现,但是德国理论物理学家非常重视和实验的结合。对当时物理实验的前沿原子光谱作了详尽的分析。像海森堡在发明量子矩阵力学以前从事了大量的光谱分析工作,也正是在分析光谱强度、怎么来寻求解释光谱强度时,找到了物理量不对称这一量子矩阵力学的关键。德国在19世纪末在数学上已成为领先的国家,产生了世界超一流的数学家高斯和黎曼等,20世纪初最著名的数学家是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希尔伯特教授,他提出数学要解决的难题到今天还在困扰一些数学家。当时定居德国的理论物理学家,有一批人像索末菲尔德一样在数学和物理两方面都有非常高的修养。

所以哲学思想的指导和数学研究的领先,理论与实验的紧密结合,学术思想的活跃和创新,研究机构的开放流动、频繁的学术交流和争论,对年轻人才的吸引、积聚和破格提拔,这些是德国当时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重要原因。它不仅造就了海森堡一个人,而且为未来发展世界科学造就了一大批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中心转移到了美国。美国利用未受战争破坏的强大的经济实力,从战争年代开始就大量吸引欧洲和世界的人才,开展军事科研,战后扩大研究规模,建立了很多国家实验室和国家科学基金会,以军事的研究来带动尖端的技术,形成了世界最强大的研究开发力量。在战争年代,美国吸引了大量的欧洲人才,特别是犹太人,实施了曼哈顿计划,就是制造原子弹。曼哈顿计划开创了科学大工程的先河。美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经费也非常充裕,但是曼哈顿计划是要在高山和荒漠地区来进行的,因为原子放射性和军事保密的要求,都必须远离城市,当时的洛斯阿拉摩斯是一个高山荒漠地区,科学家在那里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同样在中国,“两弹一星”也是可以和曼哈顿计划媲美的。中国的第一个重大的科学大工程,更是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完成的。很多同志都知道,在青海的高原、在新疆的沙漠中间,而且是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期,完成了主要工作。

这些大工程计划成功的条件是什么？

促使这些计划成功的基本条件,第一位的是科学家的爱国心、使命感和因此而来的献身精神和高度责任心。这点中国科学家完全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即使是美国在实行曼哈顿计划的时候,那些科学家也是为了不要让德国法西斯先研制出原子弹,而情愿抛弃自己原来的研究方向,投身到这项工作里来。第二是实行了大力协同,有着强大有力的组织协调。凡是大工程,都是非常复杂的,需要多方面工作的协同,才能把它做好。导弹上一个最小的部件发生问题,整个导弹就要出事。所以必须每一项工作都能有条不紊、完全按计划做好,每一项的研究工作都要按质按时完成,所以需要强有力的组织协调工作。第三是人力、物力、财力的高度集中和统一指挥。中国当时调集了各个学校和研究所的有关专家集中去搞“两弹一星”,才使得这项工作能够完全实现,而且国家在尽可能的条件下,集中了物力和财力,实行了统一的指挥,主要是在周总理、聂帅统一指挥下,才得以协调了全国 10 万人以上的队伍,各个工业部门、科研院所和解放军共同来完成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基因双螺旋结构的发现。美国虽然经济和科研实力非常雄厚,在战后也是世界的科学中心,这都是其他国家无法与之相比的,但是战后最伟大的科学发现,就是基因的双螺旋结构不是在美国出现的,而是在遭受战争严重破坏的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出现的。这个实验室在战后开创了分子生物学和射电天文学两个新的领域,都取得了震惊世界的科研成果。这再次说明单靠物质条件好并不一定能够最快产生最好的科研成果。

早在 19 世纪中叶,英国的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了生物进化的学说,奥地利生物学家门德尔提出了遗传基因的假说,而在 20 世纪初美国生物学家摩根发展了基因的假说,明确指出基因存在于染色体上,基因的双螺旋结构是在欧洲还在医治战争创伤的 1953 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的物理学家克里克·沃森发现的。当时沃森只有 25 岁。为什么基因的双螺旋结构是由物理学

家而不是由生物学家发现的？为什么它不在当时最强盛的、条件最好的、有深厚基因研究传统的美国产生？英国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实验室为什么能在战后经济困难的时期连续做出优异的科研成果？我们来看看卡文迪什实验室。

卡文迪什实验室是一个物理学的实验室，它有长期科研的传统。它曾经由发现电子的汤姆生和原子结构的约瑟夫担任实验室主任，战前长期从事原子结构和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在这两方面都做出过非常重要的贡献。这个实验室在那个时期也有多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战后出现了新的情况。大战期间，多数科学家都放弃了原来从事的研究工作，加入到为国防服务的行列，特别是研制核武器和雷达的工作。战后原子能和核武器的发展，由于规模很大，保密也要求很高，所以不能继续在大学的实验室进行，各个国家都决定成立新的独立的研究机构。英国也是这样。所以核物理的研究工作就要由卡文迪什实验室分离出去，卡文迪什实验室的经费就减少了，而且也面临科研方向的重新选择和确定。战后，新任卡文迪什实验室的主任是布拉格，他从实验室和英国的国情出发，果断地决定将实验室原有的科研积累加以发展，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一个是利用他们用 X 光衍射来分析矿物晶体结构的技术，就是布拉格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个技术，转来进行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分析。过去进行的是对矿物晶体的分析，这时他决定用这个技术来研究生物大分子，力图从分子的角度来了解生物的遗传和生命现象的本质。第二个是利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发展起来的雷达技术，来进行天文学的观测和研究。由一个以物理学前沿为主要研究方向的世界知名实验室，改为利用物理学发展出的仪器和物理学家的思维方法，重点从事天文和生物的研究。这样一个决定，后来被证明是非常正确和极有远见的。经过几年的努力，卡文迪什实验室在两个新的方向上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果，开辟了射电天文学和分子生物学崭新的研究领域。在天文学上，他们发现了类星体和脉冲星，因而获得了 1974 年的诺贝尔物理奖；

在分子生物学上发现了 DNA 的双螺旋结构的克里克·沃森获得了 1962 年的生物和医学诺贝尔奖。在卡文迪什实验室分子学研究方向工作过的科学家中,有好几位获得诺贝尔奖。这就使得在战后困难的条件下,卡文迪什实验室重新成为世界科学最重要的中心之一。这说明科学领导核心所起的关键作用。因为卡文迪什实验室的主任布拉格,从学科交叉中间发现了新的学科生长点,充分调动了实验室原有的科技力量,以很少的经费,在困难条件下开创了崭新的局面。英国开创了分子生物学和射电天文学,在这两个领域又长期领先于世界,布拉格有很大的功劳。这说明科学领导核心的学术水平和战略部署对中心的科学发现起关键作用。从 1946 年开始到 1953 年发现 DNA 的双螺旋结构,一共经历了 7 年的时间,对一个没人进入过的崭新领域,只有信心坚定、而不是急于求成的领导人才能够始终不渝地给予支持,不断创造条件,开展学术研讨,寻找突破点,这样才有可能在不断进行科学积累、不断吸引和发现人才的基础上,做出突破性的科学发现。急于求成,也是我们国家的通病,希望要吸取教训。

上面的例子充分说明,产生重大科学发现的物质条件在重大科学发现和重大科学工程的实现上都只是必要条件,而决非充分条件。

20 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发现并不是在条件最好的国家和实验室中产生的,所以,在有了基本的工作条件以后,提出明确的目标和战略,在科学家群体中形成使命感和凝聚力,创造促使创新思维产生的学术环境,吸引优秀人才和选择学术带头人,将起到更为关键的作用。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经济实力不仅现在不及发达国家,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也不可能赶上,因此不能期望科学研究经费能够和发达国家一样多。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们科研经费低于发达国家,就不能做出世界一流的科研贡献。在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以后,能不能有重大创新,就完全取决于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我们必须从 20 世纪科学研究历史中那些以弱胜强的

范例中吸取经验,建立信心,充分调动中国人的智慧,组织力量,发扬协作的精神,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产生重大科学发现当然有困难,因为重大科学发现一般是在学科交叉的生长点上出现的,它不是按照常规计划在可预见结果的情况下进行实验和逻辑推理能够得到的。计划只能在原有的科学原理框架内制定,而科学家个人又受到知识面狭窄和学科传统观念的限制,多数人很难有观念上的突破。通常在探索过程中要出现多次失败,在失败中可能发生偶然出现的现象,其中包含启发新思想的萌芽。只有不怕失败、观察敏锐的人,才能在单调重复的试探中,注意到新的现象,获得思想的萌芽,并且将之发展下去。科学发现的时机一旦成熟,发现是会成为必然的,但是由世界上哪一位科学家发现就是偶然的。只有那些及时抓住机遇的科学家,才能成为最初的发现人。大家知道,科学发现必须成为最初的发现人才有价值,成为第二位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了。在科学上,只有第一,没有第二。

有创新力的科学家必须具备的素质,首先包袱要少,失败了要不怕人笑话,不受原有思维方式和原有理论的束缚,敢想敢干,对新事物要非常敏感,有强烈的好奇心,身体要相对健康,精力要充沛,工作要非常努力。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一些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每天的工作时间都超过 16 个小时以上,不受各种社会和家庭因素的干扰,脑子高度集中,日夜处于创新的临界状态,从而做出重要的成果。

自信、善于学习和作好战略选择是有所发现的基本条件。我们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掌握先进的科学方法,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充分的自信。满足于跟踪模仿是当前巨大的思想障碍。我觉得在我们科技界,现在仍然缺乏自信,很多课题基本上是国外先提出来了。只是比较少的人有充分的自信,敢于提出国外没有提出来的问题。要善于学习,要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进,不因为无知去重复人家已经做过的工作,也不盲从权威的意见。比如最近,大家都

了解的克隆动物,过去权威人士一直认为成年动物的体细胞是不可能克隆的,当时很多人就相信这个,不去试探这个,直到英国人做出来以后,克隆才成为世界生物学界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要从自身实际条件出发,做好科技方向的战略性选择,要扬长避短。我们的经费没有国外的多,就要像布拉格那样,找经费比较少、又有巨大前景的科研方向,着力发现学科的新生长点和突破点。集中力量,坚持不懈,在这一方面,有经验的学科带头人会起到关键的作用。

最后,我们要有一个创新的学术集体,要在开放流动的环境下建立能不断创新的学术集体。这个集体要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崇尚道德的精神。科研人员的来往要频繁,学术争论气氛要热烈,要通过各种学术观点的激烈竞争,单个学科的深入开拓,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才能够形成良好的科学生态环境,实现科学系统的协同计划,科学家个人也才能在这个环境中激发出创造力和创新思维。大家仔细看看历史的话,就可以看到学术集体在量子力学的发明中所起的非常关键的作用。

哲学和科学方法论也是非常重要的。当前科学前沿研究对象多半是复杂的系统,很多对象是具有无穷多的自由度。过去我们常用的科学方法和思维方式,都是针对简单的对象,现在很可能是不够用了,必须要进一步的发展,才能去处理复杂的系统。因此要加强对哲学特别是认识论的研讨,要加强科学方法论的研究。观测的仪器是发明新现象的先导,要重视新的仪器和实验手段的研制。

很多人在没有获得建树的时候,很渴望得到社会的承认,得到社会稳定的职业和社会地位,这时他还有一股拼劲。但一旦拿到永久职位和职称的时候就不再努力了,缺少内在的动力去攀登科学的顶峰。处于逆境的人,常常能奋发图强,而条件过于优越,反而只能使人懈怠。因此出现重大创新的部分科学家是那些身在内地、没有得到国家重点资助的科学家。在我国已经有这样的例子

了。1998 年全国十大科技新闻第一条是湖南医学院发现神经性耳聋的基因。我去看了一下,就知道他们过去完全没有得到国家重点资助。他们确实有一股拼劲,有一股干劲,做出了中国最杰出的科研成果之一。这里我也希望那些得到国家重点资助的科学家要特别地努力,不然就对不起社会,对不起国家。

青年要成为科研的主力军。因为青年最具备上面所说的素质和条件,包袱很少,敢想敢干,最有创新的活力。但是青年要想有所发现,就必须刻苦学习和锻炼。科学研究没有捷径可走,要不断地尝试,失败;再尝试,再失败,经过千锤百炼,直到最后取得成功。所以只有心理、身体、知识和能力都准备好的青年,才能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去抓住机遇,实现理想,做出重大科学发现的成果。同时我们要搞好老中青三结合,因为有好多种科研集体中,老中青各有各的作用,他们互相支持,互相协作,才能形成思想活跃、干劲十足、经验得到继承、技术不断发展、科研方向始终处于前沿的集体。当前在着力培养和选拔年轻科技干部的同时,要充分发挥中年科技工作者的骨干作用和老年科技工作者的指导作用。有造诣的中年科学家已得到社会的承认,现在承担很多重要科研项目的领导任务,是多数科研项目的负责人。像量子力学完整理论就是在海森堡的老师玻恩的带领下完成的。年轻人的才华,常常要有有经验的科学家来识别,加以培养和鼓励,才能得到发挥的机会。而一个成功的年轻科学家的身后,都有一批值得称道的老师。很多科学大师,像玻尔、玻恩、布拉格、伯恩、费米,在他们生命的后期都带出了一大批杰出的青年科学家。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在科学发现的过程中,以弱胜强,后来居上是可能的。关键是充分发挥科研单位和科学家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要主动自觉地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寻求突破的新途径。

讲完了,谢谢!(掌声)

中国教育电视台供稿 录音整理:魏平洲 未经本人审阅

丁肇中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 诺贝尔奖获得者

寻找宇宙中的基本粒子

[2000 年 10 月在东南大学演讲]

寻找宇宙中的基本粒子——这个演讲报告是专为纪念吴健雄教授而举行的。如何寻找宇宙中最基本的粒子呢？我用四个故事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故事是我在过去的 30 年里所亲身经历的。

第一个故事是测量电子的半径。现代电磁学的理论认为电子的半径为零。1964 年，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制造了一个当时最大的加速器，这个加速器周长为 1 000 英尺（1 英尺为 0.304 8m）。当电子在加速器中旋转时就产生光子，光子具有 60 亿的光子能量，因为光子能量很高，所以可打入电子。当时来自哈佛大学和康乃尔大学的世界上很有名的专家，在这个加速器里做一个很重要的实验，实验结果同时证明量子电动力学是错误的，电子是有半径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1966 年，我在德国用不同的方法重新做了这个实验，结果发现电子的半径确实小到不可测量，电子是没有半径的。实验的结果和理论的预测等于 1，等于 1 即是说电子的半径等于零，也就是说以前许多专家所做的实验结果是错误的。所以我的第一个体会是不要盲从专家的结论。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新粒子的发现。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所有已经知道的基本粒子都可归结为由三种夸克组成，所有的现象都可以用三种夸克来解释。我就问为什么宇宙中只有三种夸克？为了寻找新粒子，我决定建造一个高灵敏度的探测器。当时我决

定将新夸克和旧夸克的灵敏度提高到 100 亿分之一。何谓 100 亿分之一的灵敏度呢？南京下雨的时候,大概每秒钟有 100 亿个雨滴,其中有一个是蓝的,要把它找到。但这个实验不受物理界的欢迎。第一,当时的所有物理现象都可以用三种夸克来解释,所以人们不需要第四种夸克。第二,没有人相信这样困难的实验可以做成,因此这个实验几乎被天下所有的加速器拒绝了。后来,终于在美国的布尔凯文国家实验室用 AJS 做了这个实验。我们发现了一种很新的粒子,完全想像不到的一种粒子。这种粒子在正电子负电子质量到达 3×10^{-18} 的时候,突然就产生一个很高的峰。根据以前所有的理论,这个峰是不应该存在的。说明找到了一种新粒子,这就是 J 粒子,J 粒子有一个加速,这个加速和正负电子加速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完成了布尔凯文国家实验室的实验以后,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夸克。这种夸克有很特别的性质:第一,它们的质量比其他所有夸克重三倍;第二,它的寿命比其他所有夸克长 1 000 倍。这意味着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如果所有的人在世界上活到 100 岁左右,但你突然发现一个村子里的人能活到 10 000 岁,这就表示这些人可能有很特别的性质,这种长的寿命可能由新的夸克组成。所以,以前的人认为只有三种夸克的想法是错误的。当然,有了这第四种夸克,你就可以问有没有第五种、第六种——至今为止,已发现了六种。因此我的第二个体会是永远要对自己有信心,做你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别人反对是别人的事。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 1979 年胶子的发现。大家都知道在原子核里有电子和原子核,电子和原子核之间的力由光子传送。在质子里有不同的夸克,夸克之间的力在理论上来说是由胶子传送。那时我们正在德国用正电子负电子对撞接力做一个量子电动力学的实验,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突然想到假设正电子负电子对撞这种理论是对的话,则可以产生夸克、反夸克和胶子,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三个喷柱的现象。果然,当正负电子对撞的时候,当胶子能量很小的时候,只有两个峰;当胶子的能量增大的时候,就会出现三

个喷柱现象。三个喷柱现象的存在就表示胶子是存在的。当年，美国物理学会对这个事例作了详细介绍。虽然最初这套实验仪器并非为这个实验而设计的，但却获得了意外的结果。所以第三个体会就是对意料之外的事情要有充分的准备。

第四个故事就是寻找反物质的宇宙。这在国际空间站上叫做 AMS。反物质的存在，是由玻尔·迪莱克在理论上推导出的，他因此在 1933 年 12 月 12 日获得了诺贝尔奖。他注意到，相对论的公式和量子电动力学的公式中，质量都是乘平方的，也就是说等于 $m \times m$ ，也等于 $(-m) \times (-m)$ 。迪莱克问 $-m$ 是什么意思？从这儿就推导出反物质的理论，这也表示拿诺贝尔奖是很容易的。因为现在我们从实验上知道，所有的粒子有反粒子，我所要问的是另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宇宙是大爆炸形成的，在大爆炸的理论中，宇宙起源时的温度高，因为大爆炸以前什么都没有，所以有一个电子则应该有一个反电子，有一个夸克也应该有一个反夸克，所以在刚爆炸的时候，物质和反物质应该是一样多。问题是经过 150 亿年之后，由反物质组成的宇宙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宇宙在有氢、有锂的太空中飘行，有没有反物质所组成的宇宙也产生反氢和反锂？所以，我们从实验上需要知道的是由反物质组成的宇宙在何处。假设它存在的话，我们应该在太空中找到反氢、反锂原子。反氢、反锂原子不能在地面上找到，因为在穿过大气的时候，它们会被湮灭掉。因为原子和反原子有相反的电荷，所以寻找反原子必须用磁铁来测量在磁场上的轨道，正的向一个方向旋，负的向另一个方向旋，这就是我现在所做的实验的目标，即 AMS，它是空间站上唯一的物理实验。过去 40 年内，许多的实验用哈博望远镜、用人造卫星测量光子，但在宇宙中除了光子以外，还有带电的粒子。带电粒子因为有质量，所以在经过大气的时候很快就被消灭掉了，故不能在地面上找到。因为带电，所以需要用磁铁分出正负，这是人类第一次测量这些东西，所以觉得现在的结果很奇怪，可能过了三五年，对这种现象了解以后，就会觉得很自然了，这是

我最简单的解释。美国宇航局决定在 2003 年 5 月将 AMS 实验作为在空间站上的第一个科学实验。原结构中用的中国制造的永久磁铁改为超导磁铁,大幅度提高 AMS 控制力,从太空中长期产生更多的数据。超导磁铁用于太空中是高技术发展的一个体现,不多久前还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我们所制造的超导磁铁,在英国和瑞士制造的;这是磁铁的线圈,带上 2 500L 的液体的氦,在空间站上做三年;这是整个探测器,这儿有超导磁铁,这个仪器用于分辨电子和质子,这个仪器测量不同的粒子,这个用于测量电子和光子。假使不出错误,到 2003 年的晚上,天晴的话,可以看到这个空间站,因为它非常大,可以看到它像星星一样转,到那时你会记住上面有一个 AMS 的实验。它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宇宙如果起源于大爆炸,一半的宇宙是正物质组成,另一半的宇宙是反物质组成,那么反物质所组成的宇宙在什么地方?第二个问题是 90% 的宇宙是观察不到的,它是由暗物质组成的,暗物质是什么?这些都是理论,到底会发现什么呢?

现在向大家介绍一下在过去 50 年内加速器的发展。最早的加速器是袁家骝教授所用的布尔凯文国家实验室的加速器,至今快 50 年了,原定的目标是做 质子相互作用实验,袁先生作了非常重要的贡献。除了这以外,更重要的是发现两种中微子。费米美国国家实验室在芝加哥,原来是做中微子物理实验,发现了第五种、第六种夸克。斯坦福直线加速器原来是做电子质子弹性散射和量子电动力学实验,结果发现的是部分 Si-partical 和第三种氢子。日内瓦的质子对撞机,原目标是找 z 和 W , 结果发现是质子总切面的增加。所以要做加速器,先找理论物理学家帮你写一个目标。根据过去 50 年的经验,原来的目标和实验发现完全是两回事情。因为这是最先进的科学,是没有办法预见的。所以最后一个个体会就是,要实现一个目标。最重要的是要有好奇心。对自己做的事情感兴趣,要勤奋地工作!

东南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供稿 录音整理:陶盼

王太庆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柏拉图和他的《理想国》

[1999 年 11 月在清华大学演讲]

今天我讲的内容是柏拉图和他的《理想国》。先讲点题外话，我们为什么要了解柏拉图？大约在两个星期前吧，在北大哲学系，看见一份教育部的文件，说是规定大学生要读点外国的名著，其中第一本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我想，这也是你们请我来讲讲柏拉图《理想国》的原因吧。一个大学生，如果连柏拉图都不知道，那就有点不够格了。因为柏拉图这个人在历史上影响非常大，有很大的历史作用。你如果不了解他势必要碰壁，所以我们还是要读一点他的书，使我们的脑子不是随便跟着别人走，而是能够自己下判断。念世界名著的主要目的在这。不光是哲学系的人要念，其他的人也应该念念。

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任务，就是要处理好自己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我们有自己的传统文化，这当然要继承，但我们不能把过去的东西简单地照搬到今天——实际上我们也没有这样做。应该说，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有短处的，历史上的一次次革命，就是对这些东西的否定。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入侵面前，我们节节败退，老是打败仗。清华就是打败仗的产物，是用庚子赔款退回的部分办起来的。打了败仗怎么办呢？一方面认识到我们的传统要打折扣，因此要“打倒孔家店”；另一方面，就要向西方学习，拿别人的长处补自己的不足。向西方学习，也与清华有关系。当年

清华许多人到美国去学习,这些人回来后就成为我们的老师。如果不是向西方学习,恐怕我们还会更落后。对于柏拉图,也要这样对待,好的东西,我们要拿过来,要学习。我的老师,也是清华的毕业生,贺麟先生,提出了一个想法,要把外国好的东西吸收过来。他一辈子都在干这事。学习柏拉图,并不是要跪倒在西方人面前,而是要把他的好的东西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学习柏拉图,还要经过我们自己的大脑,弄清楚他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好东西,而不是人云亦云。希望大家以后读书,要多想一想,多研究研究,而不是听别人怎么说。今天,我想把柏拉图的著作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帮助大家去了解、研究。

关于念书,我还想多说两句。念书首先一定要自己念, *Republic*, 打开书,老老实实地念。如果你只是前面翻两页后面翻两页,再听听别人怎么说,编起来就可以对这本书说三道四,这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还是要像我们中国古人说的,真心诚意,一句一句地念。至于怎么念,则可以借助别人的帮助。今天,我可以把我的经验告诉大家,大家在念的时候就会少费点劲,或者说,费了劲,收获会更大一点。所以,我今天就不重复书里头可以念到的东西,主要讲讲书里面没有的内容。下面就回到正题。

柏拉图在西方是非常重要的哲学家。一直到今天,西方哲学家,有的是直接从他出发,用我们中国话说,就是师傅带徒弟,一代一代往下传;有的与他站的角度不一样,受到他的学说的刺激产生了新的学说,甚至还有有的想否定柏拉图的学说。一正一反,都是在发展柏拉图的学说。所以说,柏拉图在西方哲学史上,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和作用。

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西方哲学家著作中,柏拉图的著作保存最多。这与当时的社会有点关系。没有人说要禁止柏拉图,要烧他的书。同时,柏拉图组织了一个学术团体,叫“学园”(Academy),形成了学派。他的学生把他的著作当作传家宝,一代一代往下传,先是手工抄在羊皮纸上,后来变成了印刷品。那么,是不是这些著

作都是柏拉图写的呢？有人表示怀疑。怀疑也是对的。我想有些部分,可能不是柏拉图亲笔写的,而是他的学生的东西,放到里面了,后人就误以为是他的。总之,有一个时期,专门进行了辨伪,看看那些是赝品。19 世纪,人们对柏拉图的著作一篇一篇地进行研究,并对怀疑的理由一条一条地考察。怀疑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有人认定有一个柏拉图风格,柏拉图的学说是一整套的完整的封闭体系。拿这些作为标准进行比较,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就怀疑了。还有,念得懂的,就是真的;那些念不懂的,就怀疑是假的。比如说,Republic,大家都念得懂,拿它作为标准来看《巴门尼斯》,念不懂,就怀疑它是假的。20 世纪,经过仔细研究,发现了新情况。柏拉图从二十七八岁时,也就是苏格拉底死后开始哲学写作,一直写到八十多岁,前后几十年,你想,他的风格能完全一样吗？思想内容也可能有变化。当然,一般的人会变化不大,可有的人就变化很大。如罗素(Bernard Russell),他自己就承认,他的思想就转了几个弯,换了一套又一套。你总不能因为有变化就认为它是假的吧？因此,经过研究,20 世纪就认为,这些著作基本上都是真的,也有个别的可能是学生写的。举例来说吧,刚才提到的《巴门尼斯》跟《理想国》中间有不同,但今天我们已看得很清楚了,两本书前后还是可以连接起来的。《理想国》中有一个重要概念:Idea,中文一般都译作“理念”,后来他发现这个理念有些地方说不通了,于是就要修改,修改就加深了他的命题的深度。修改以后就不是原来的那个“理念”了,就不是一个个理念,而是一个一个范畴了。再以后,他运用这个基本理论研究别的论题时,比如说政治学,他的观点也跟着改变了。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能够说得出理由来。这样我们对柏拉图的认识就比较全面了。

我们现在再回到 Republic 这本书。Republic 在柏拉图的著作中篇幅是第二大的,仅次于《法律篇》,写得也比较早,但它还不是柏拉图最初的写作。前面我们说过,柏拉图是在公元前 399 年苏格拉底死后才开始写他的哲学著作的,而在这以前他写了很多诗,

也就是文学作品,所以他的文笔很漂亮,很有才气。后来,在跟苏格拉底学哲学之后,他发现诗不是根本的东西,认识要更深一步,就要抓根源,就要研究哲学,要“爱智慧”——这就是“爱智慧”的来源。于是,据说,他就将他的文学作品全烧了。柏拉图的理念论是在跟苏格拉底学习以后才慢慢形成的。在最初的一些小的对话——我们称之为苏格拉底对话(Socratic dialogues)里头(柏拉图的著作是对话体,其中苏格拉底就是对话的一方。苏格拉底的话中当然会有苏格拉底的思想,但更主要的是柏拉图的代言人),就有了这些思想。到了《斐多篇》时,这个理念论就基本形成了。接着在 Republic 中,继续发挥他的理念论。讲理念论,为什么就不直接讲本体的理念论呢?古人讲比较高的理论,不像现在分门别类,弄成这一门那一门、这一科那一科,他只是讲自己对它的真正认识,也就是理性认识,把许多问题都搁在一块,都讲。所以同样一本书当中,用今天的眼光看起来,里面有许多方面,当然哲学是最根本的理论,哲学理论用来指导其他的研究。Republic 这本书包括哪些内容呢?它有政治学,因此把它翻成“共和国”也不是完全错了;有伦理学;有教育学;还有与教育学相关的心理学;最后还有美学。你不能说它是某一方面的著作,这五方面的内容都有。

这本书分为十卷,十个 Books。这十个部分并不是十章,不像我们今天写书,一章一章地道来,分得清清楚楚。刚才说的这五方面的内容也是串在一起的,这一卷有,其他卷也可能有。所以,我们在念这本书的时候,就不要想我是在读政治学的、或教育学的、或其他方面的书。当然,我也不反对政治学系把它当作政治思想史的开山之作,同样,师范大学也可以把它看作是教育思想史的第一部专著,但有一个总的东西在里头统率一切,这就是他的哲学理论。如果我们没有体会到这一点,那就坏了,把根子丢了。你不能因为枝枝丫丫的东西多了,就看不到主干。我觉得中国老子的《道德经》与它很类似。《道德经》有人说它是讲政治学的——里面的确是讲了政治学;也有人大张旗鼓地说它是一部兵书——的确老

子讲了不少军事策略的问题,但它主要的还是一部哲学书。读《道德经》,读 Republic,都要抓住它的哲学核心,然后用到其他方面——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等等,就可以顺藤摸瓜,就能理解得比较正确。如果离开这个根本,完全顺着自己的思路去想,就可能越想离本意越远。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教训的。过去我们觉得这个根本的东西理解起来比较费劲,看不清,而对枝枝丫丫的东西感兴趣,也可能是这些枝丫的内容比较符合我们的需要吧,就把它拉过来为我所用,再顺着它往外推,结果是越推越远,甚至跟原来的出发点相反。有人就据此以为哲学就是“玄想”,还有人认为哲学是“遐想”。它跟哲学的本意完全相反。我说这一段,主要是强调读 Republic,要抓住哲学这个核心。

有人说,《理想国》,书名不就表明它是讲政治学吗?这本书翻译到中国经历了几个阶段,书名也不一样。我是在读初中的时候听说过这本书,书名是《共和国》,没见过翻译本。心想:这“共和国”不就是与清朝专制制度相对立的吗?这书大概是讲“五族共和”吧。因为英文 Republic 就是“共和国”的意思。后来一读这本书,发现里面的确讲了不少政治学。但柏拉图的政治理想是什么呢?他的理想是哲学家——也就是“爱智者”,成为国王。这不是刚好给“共和国”打了一棍子吗?后来有人读法文本,发现书名是 Republicque,也是“共和国”的意思。再后来,有人读德文本,书名是 Staat,就不是这个意思啦。Staat 翻译成英文,就是 State,“国家”的意思。人家只讲“国”,没有讲“共和国”呀。这才发现分寸不一样。其实,英文 Republic 是照抄拉丁文翻译的。在拉丁文中,它是两个字,第一个是 res,是“东西”的意思;第二个是 publicus,是“公共”的意思。respublic 就是“公共的东西”。那“公共的东西”不就是国家吗?后来再去读希腊文,读希腊哲学,就明白了。原来希腊文是“布利斯 polis”,是“国家、城邦”的意思。“布利斯”把它再变一变,就是“布利德亚 politeia”,即“国家的事情,管理国家的事情”的意思。是不是只有柏拉图一个人采用了这个书名呢?

那也不是。在希腊时代,很多人写书都用这个名字。如亚里斯多德也写了本“布利德亚”,中文译为《政治学》。所以你把它翻成《理想国》,还是不行。这本书说的也有点像是理想国,但柏拉图的着重点不在这。他只是说,国家应该如何管理。一个国家里,有各种人,按思想品质划分为几等,有的是金子打的,有的是银子打的,还有的是铁打的,理想的治国者应该是金子打的人。所以它还谈了怎么治国的事。严平先生就据此把这本书翻为《造邦论》,还是治国的意思。虽然这本书谈了很多治国的事,有很大的篇幅是谈政治理论,但根本上它还是一本哲学书。我们心里有了这个数,就不会把这本书念歪了。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柏拉图要提出理念论这个哲学核心问题,理念论是这么回事。世界上有各种现象,怎样才能抓住它并说明它?你一个一个个地抓,肯定抓不住。比如说,一群人毫无组织,要抓住就很困难。如果你把它编成一个班,有个组织,就好抓了。也就是说,对各种各样的现象要抓他的共同点,抓共性。这个思想,在巴门尼斯就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巴门尼斯是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一个始祖。巴门尼斯认为,要抓住真理,有两条路。第一条路是“是”,这个意思相当于英文的 Is, It is, 直接翻译就是“它是”,“那个东西它是”,“那个是的东西”——这有点绕了,而且他还加了一句,“不能不是的东西”。顺着那个“是”的东西,那个“不能不是”的东西,你就能得到真理。第二条路是与此相反,另外,它还有个“不”:“不是”,前面加一个否定词,相当于英文的 that it is not, 意为:毕竟不是的东西。那个东西你要是抓住他,跟他走,那就一定会陷于荒谬,得不到真理。我们这一听,就知道他是讲认识论的。我们这样才能认识东西,你不能胡来,一定要找那个“是”的东西,而且还要加上一个“不能不是”的东西。反过来,不能找那个“不是”的东西、“肯定不是”的东西——这条路不能走。所以这样一来,它就把最根本的东西,给我们带来真理的东西,认定是个“是”。我们古汉语中没有这个“是”。这个“是”也就是逻辑

里说的那个主语跟宾语加在一起的那个系词,“S 是 P”的“是”。比如说,“苏格拉底是人”,这是现代汉语,古汉语怎么说呢?“苏格拉底,人也”。这是公元前的古汉语。到公元后,有了点突破,就是在“苏格拉底”与“人”之间要加点东西肯定一下,“苏格拉底是人也”,这里的“是”是“这”的意思,如“是可忍,孰不可忍”。不仅古代汉语中没有这个“是”,严格地讲,一直到现在,基本上还是没有。我们天天说汉语,当然里面有“是”,可是我们不知道有多少该说“是”的地方没有说“是”。如果要翻译成英文的话,势必要增加许多“是”的意思进去。所以我们中国没有弄出亚里斯多德逻辑学那些东西。比如苏格拉底说“凡人都是会死的”,翻译成中文就成了“凡人皆有死”;“苏格拉底是人”,我们说,“苏格拉底,人也”,都没有“是”字。没有“是”字,对我们中国人的思想的形成影响很大。可西方人就抓住了这一点,巴门尼斯就抓住了这一点,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抓住这个“是”字。在底下呢,我们说它是 , 尽管它用的是分词 , 是“是()”的现在分词,把它变成一个名词用呢,要加一个 。翻译成英文呢,就是 Being。认真地说,这个 Being 是个什么字,你给我翻译翻译,翻成中文?应该说,还是说不出来。西方哲学从巴门尼斯开始,它就很注意从它的语言中总结出一些范畴来。“是的”,就是“是的东西”——这话很难说啊,可以用“是者”来表示,当然这不是标准的中文了,而是两个中文字加在一起。“是者”,就是“本体”,就是最根本的东西。西方人说的这 Being,他的性质主要就是靠“是”,所以我就这样用了。现在,开始有少数人有点同意了。我现在还在宣传这个用法。因为这个字,我们一般书中都是翻作“存在”。你说“存在”,没有人不知道,可他的本来意思是说它是“是”,并不是说它是“存在”,跟“存在”的意思大不一样。因为汉语中没有这个意思的词,所以硬是把一个“存在”冒充进去。到了柏拉图那里,它就加以发展。其实在苏格拉底那里,就已经开始接触了。苏格拉底他跑到大街上跟人辩论,叫人分析种种问题,从一个现象出发对它进行分析,找出它们的共同

的、普遍的地方。比方说,我们看见一个馒头,我们对它进行分析,馒头是什么东西?它是面粉做的。然后再进一步分析面粉是什么东西,面粉是粮食。这样,面粉比馒头要普遍,粮食比面粉要普遍。这就自然抓住了它的总根。然后两个人说起话来,有共同点了,就可以辩论了。苏格拉底的这个方法,有的书上叫做“归纳法”,即找出个共同点来,找出个“共相”来。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共相”。苏格拉底的这个办法影响了柏拉图,因此柏拉图跟着他这样说,并把这个普遍的东西起名叫 Idea。希腊文 Idea 本来的意思是“看得见的东西”。“看得见”当然是眼睛看得见,但柏拉图是说我们要用“心”才看得见。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是者”,用眼睛就很困难,要用“心”才能看见,要在心里分析。本来这个 Idea 是“看见东西”的意思,可翻译成拉丁文就不好翻了,干脆就照抄过去,一个一个字母地照抄。在拉丁文中, Idea 还有“模样”的意思。“模样”开始还只是指外表的模样,后来就发展成指“内心的模样”。于是, Idea 就有了“观念”的意思。英文中, Idea 就是“观念”的意思,比如, good idea。柏拉图本来的意思并不是强调“观念”,而是强调“模样”。所以,这个字我们一开始翻译成“观念”。观念是个最普遍的东西,我们中国人脑子里怎么也想不清楚呀,最后想,这实在太唯心了,是心里的东西。柏拉图认为这个观念是个客观的东西,就是一个“共相”。比方说桌子,有作为个体的这个那个桌子,也有一个所有的桌子都具有的、被称之为 Idea 的桌子。个体的桌子都是分沾了那个 Idea 的桌子,才成为桌子。这有点像我们吃粽子,沾点白糖,粽子就变甜了。所谓分沾,那当然不是全部了。因此个体是指相对的一面,而不是绝对的。所有的 Idea 都是积极性的,消极的东西不具有 Idea。比方说,“大”是积极的,“美”是积极的,有 Idea,而“小”、“丑”则是消极的,没有 Idea。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跟事物同名的理想的 Idea,这是一个大结构,一个体系。另一方面,具体的事物、事物的世界是另一个体系,这个世界的体系是因为分沾了 Idea 才能成立。简单地说起来,理念论就是这个意思。

显然,用“理念”来翻译 Idea 不合适。首先,具体事物不是分沾了“观念”,它是分沾了客观的东西,所以你不能说它是“念”。你说它是“理”,好像对,也不全对,因为我们是借用了朱熹理学的说法。理学认为,万物有理有气,是理和气的结合。他的这个“理”是“道理”的“理”,而 Idea 不是“道理”。所以,“理念”这个译法不合适。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对此非常习惯了,你要说它不合适,有人还会不高兴。陈康先生指出这个译法不合适,他用“相”来代替。柏拉图前半生主要是建立“相”论,“相”论的最后完成也就是在 Republic 中。念了这个 Republic,还会知道很多柏拉图的学说。比方说,我就听一位研究语言学的老朋友这样说:柏拉图别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点, platonic love(精神恋爱法)。大家知道,柏拉图的恋爱观是纯粹理性的,这是很有名的。他没有管这个“相论”,他只管这一点,他的话也对。我们念这个 Republic,如果只知道这些,当然太少了,如果只念到哲学王,也太少了。你要知道之所以有 platonic love、有哲学王,是因为后面有个“相论”作基础。

最后,我们要注意的,这本书是柏拉图公元前 300 多年写的,与我们今天的情况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如果一切都用今天的眼光去理解他,这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不同的地方去找到相同的地方,可以沟通。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哲学家成为王,或者王成为哲学家,这个王你就不能当主席想,但它们都是指政治领袖,这是相同的。可柏拉图时代的政治领袖与我们今天的政治领袖意义不一样,那时是国王执政,是专制时代,当然不是哲学家可以当王。柏拉图能提出哲学家当王,是向前进了一步。另外,一个政治领袖,是胡里胡涂的还是讲理的,肯定后者要进步。读柏拉图,很多地方都要这样去分析。当然,我们还是要强调,首先要弄清楚他的本意,这样才可能做参考。否则,无论是吸取经验,还是当作教训,都办不到。还要注意的,西方的思想的确有它的特殊之点,不能用我们熟悉的比较接近的东西去代替它。刚才说的相论就是这样。他的这个想法,我们中国人相

当地不习惯,因为不习惯,就产生了很多似是而非的想法。比如说,Idea,相论,西方人在后面加上“主义”,就成为 Idealism,伊底亚主义,我们把它翻译成“唯心主义”。大家想想,这个距离有多大?因此,Republic 这本书念懂的话,应该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的思想,而不仅仅是柏拉图的思想。

我想,大家可能念的是这几本 Republic。一本是希腊文的,没有一个汉字,我介绍大家念的不是这个。一本是康福德的英译本,还有其他更老一点的英文翻译本。一般的是念中文翻译本。中文译本现在至少有三个本子。第一个本子是吴献书先生译的,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出版,是用文言翻译的,大家可能有点不习惯。另外,这个本子可能是从英文本转译的,我没有仔细研究,他也没说是按哪个本子译的。第二个本子,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的,放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有两位译者,一位是郭斌和先生,一位是张竹明先生,都是南京大学希腊文教授。由于他们是外文系的,遇到哲学问题就会困难多一点。但它的好处是从希腊文翻的,比较准确。第三个本子,是最新的,由华龄出版社出版的,是由英译本转译的。我们念中文译本,要批判地念,要做分辨、对比。比如说,相论,他们都译作“理念”,这些地方就要分辨。有的地方,如果我们觉得别扭,就要想办法从别的书里去查,或者问别人。我就讲到这里。

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推荐
录音整理:方也 未经本人审阅

【编者絮语】这是一篇“最后的演讲”。此后不久,王先生就与世长辞了。王先生的学术研究,不是我辈所能妄加评说的,但本篇演讲所体现出的深厚学养,确实令人敬佩。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老一辈学者严谨扎实的学风。想想时下,有些人连最基本的经典都没有读过,却对经典说三道四,甚至进行“理直气壮”的“批判”或“继承”。这样的学风对我们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为害甚烈。

张世英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评析

[2000年4月在清华大学演讲]

大家可能对黑格尔都有所了解。他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的大哲学家,也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各位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其中有一个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而德国古典哲学中最有代表性的哲学家便是黑格尔。在西方哲学史上,他不仅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西方古典哲学的最杰出的代表。或者也可以说他是西方传统哲学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这意味着他是整个西方哲学的分水岭,他之前的西方哲学都属于西方传统哲学,从他之后,一直到现在,就属于西方现当代哲学。

哲学是讲什么的?恩格斯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哲学就是讲思维 and 存在关系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讲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比如,人是思维者,是一个主体,所有外界的事物都是客体,都是对象,都是存在。哲学就是讲主体怎么去认识客体的规律,把握客体总的概念,最后去征服客体。打个比方说,我去认识自然,我对自然的某个东西得到一个总的概念,得到一个必然性、规律性的认识,这时我就可以利用自然,征服自然,使自然(客体)为我(主体)所用。简单地说,就是通过人的主体认识过程去征服客体,使客体为我所用,达到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上面的这套思维方式,就是西方古典哲学的思维方式。但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不是

这样的,特别是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公元前5世纪)以前的古希腊。早期哲学还没有把人和自然分成为主体和客体,那时二者是混为一谈的。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后,整个西方哲学思想就有了一个转变,即转变成为主、客体分离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后,经过1000多年的酝酿和发展,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就演变成为西方近代哲学。文艺复兴后,以笛卡尔的哲学为标志,形成了“主体-客体,思维-存在”这种思维方式。

把人作为主体,把外界作为客体的思维方式,在欧洲是经过中世纪觉醒,宗教神学思想统治结束以后才确立起来的。从笛卡尔开始,经过康德、谢林,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发展到黑格尔,他就把以上提到的思维方式系统化、完备化了。在黑格尔去世后的一段时间,西方哲学的发展,一方面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有马克思哲学以外的西方现当代哲学。而西方当代哲学对“主体和客体”的思维方式都是采取批判的态度。我所要介绍的《精神现象学》这本书也主要是讲古典哲学传统的思维方式。我们只有明白黑格尔的哲学,才有可能明白西方现当代哲学的进展,否则你就很难了解西方当代人们的思维方式。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主体和客体”思维方式的最主要代表作。黑格尔哲学体系是非常庞大的,其《精神现象学》是他早期的第一部系统的大部头著作。它虽不是黑格尔的最后成熟的著作,但是他整个思想的诞生地。马克思说,《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秘密和诞生地。这也就是说黑格尔哲学思想的源泉就在这本书里。这本书以后的黑格尔哲学著作分为三大部分:一个叫做《逻辑学》;一个叫做《自然哲学》;一个叫做《精神哲学》。这三大部分就是黑格尔完全成熟了的哲学体系的代表作。

《精神现象学》这本书所讲的内容是什么呢?按黑格尔的讲法,按照主体客体来考虑问题,人对客体的认识往往都是先认识个别的东西,然后再慢慢从个别的东西中抽取一个普遍的东西来形成一个概念。譬如说,我一开始看到桌子、椅子,这些都是有不同

的颜色和形状。人具有这种认识,并且这种认识(我们常说的感性认识)是非常零碎的。你如没有认识到什么叫桌子,什么叫椅子,这是因为桌子、椅子的规律性和概念你没有把握住。当认识再进一步,我们认识到桌子或椅子一定有很多共同的特性。不管颜色是怎样的,形状是怎样的,我们都叫它桌子。这也就是说,我们抓住了桌子的普遍规律和概念。我们平常的认识都是这样,从零碎的感性认识开始,一步一步发展,最后抓住规律性和普遍性。对于科学,不管你是自然科学家、生物学家,还是物理学家,你所抓的普遍规律总是某个范围里的普遍规律。生物学家研究的就是生物现象,抓的是生物学范围内的普遍规律;物理学家所研究的物理现象也是在有限范围内的。然而黑格尔认为,哲学家要抓的不仅是物理现象、自然现象等某一个领域内的普遍规律和本质概念,而是要抓世界万物的普遍性。所以对于哲学家,他们所要抓的便是一个最大概念。社会这个最大概念也就是无所不包的宇宙整体的一个概念。按照黑格尔的观点,人(主体)去认识万物(客体),就是要认识客体最大概念,这也是哲学最高目的。这个“最大概念”有一个专门名字叫“绝对概念”,正式的名字叫“绝对理念”。有关“绝对理念”的知识叫做“绝对知识”或“哲学知识”,它和一般的自然科学知识是有区别的。可是,黑格尔有时把他的哲学称为“科学”,而这个“科学”不同于我们平常所讲的自然科学,他认为哲学是真正意义上唯一的“科学”(这个“科学”是以把握“绝对概念”或“绝对理念”为主要目的的)。

但是,我们人(主体)并不是能够一下子就抓住“绝对知识”的,是要从小范围、零碎的事物开始认识,再逐渐扩大,逐渐深入到事物的内部。所以要把握“绝对知识”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光是一个个人思想发展的过程,还是整个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我们要达到绝对概念,就得通过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可以说“绝对概念”是高高在上的东西,我们人的认识要从最低的认识开始,就像爬梯子一样,一步一步地

向上爬,经过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最后才达到那个最高点(“绝对概念”的境界)。

今天我讲的《精神现象学》就是这样的一个梯子,就是经过漫长的梯子,从最低级的认识发展到最高级的认识,抓住了“绝对概念”。“梯子”这个词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面使用的一个词。他说:“我的《精神现象学》就是人们从最低级的认识抓住绝对概念的梯子。”现在把这个“梯子”拿出来,就是指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因此,我所要介绍的便是这样一个“梯子”。下面就来看看这个梯子。

黑格尔把《精神现象学》分为六大部分,这六大部分是一个从低级认识向高级认识,最后到“绝对概念”认识的逐步上升的过程。这六部分分别是:第一部分叫做意识;第二部分叫做自我意识;第三部分叫做理性;第四部分叫做精神;第五部分叫做宗教;第六部分叫做绝对知识。

现在,我先来介绍一下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序言。这本书的序言在西方哲学界里一直被认为是经典名篇。它把黑格尔以后几十年整个思想发展的内容都包括在其中,所以,这个序言不仅仅是《精神现象学》这本书的序言,还是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的一个导论。我在这里就说说这个序言的基本思想,只要掌握了序言里的基本思想,也就能大概地了解到黑格尔哲学思想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第一点,序言的基本思想是讲真理,即所谓哲学,如果更具体点,便是他所用的“科学”这个词。“真理”、“科学”是一个系统、一个过程,而不是我们平常对于一个简单事实的判断。恩格斯也说过,把一个正确判断叫作真理,等于是对一个很小的简单事实用了很大的名词。真理是讲事物的本质、事物的规律性,是大范围的大概念。这个意义上的真理一定是通过一个漫长过程得来的,是有过程的。

有时候,我们听到很美妙、很深刻的格言,便说是真理,这话其

实不错。但按黑格尔的讲法,如果真理只归于一句话,哪怕是有非常深刻的道理,然而你却不了解这句话的得来过程,那么你就没有抓住真理。你所听到的格言,无非是一句普普通通的话。所以黑格尔在讲什么东西,讲什么道理时,都要讲它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这便是它的一个核心思想。举一个黑格尔讲过的有名例子,他说:“真理就好像是出自一位老人口中的一句格言。”就拿我们常用的“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来说吧,这句话就是一个真理。但是这句话出自一个小孩子之口和出自一位老人之口意义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出自一个小孩之口,小孩没有真正经历“失败是成功之母”得来的过程,因而这句话对小孩来讲是很抽象的、很空洞的。但是如果出自一位老人之口,那才是真正的真理。因为这位老人经过了人生无数次的浪涛,而得出“失败是成功之母”的结论,它是有内容的,他是经过一个过程而得来的。为此,黑格尔在哲学中总是强调:不要只讲一些抽象的、空洞的结论,而要注重这个结论得来的过程。另一方面,真理也不只是一个开端(如上面提到的小孩说的“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一个抽象的、空洞的开端),而“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真理的内容是在小孩慢慢长大,经历过浪涛后才得到的。黑格尔在这个序言中讲了很多,真理既不在结论也不在开端,而在于过程。开端总是不完备的,这是他的一个有名的思想。他说:一个伟大的事业在开端的时候,总是会遇到各种困难,各种曲折,各种毛病,人们完全有理由谴责开端、责备开端,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地去挑刺。但他又进一步指出,开端会在以后发展的过程中间逐步完善。他又举了一个例子,要盖一栋房子,工程师画了一幅图,他的脑海中对全部的概念很清楚,已经是胸有成竹了。但是这并不等于是建筑的完成,这只是一个开端。开端不等于整个过程。我觉得黑格尔的这个例子很充分地说明了真理必须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得来的。这就不能凭灵感去抓住概念,因为这样抓住的概念是抽象的、空洞的,给人的感觉是无中生有。我们的目的很显然,即抓住绝对概念。但要达到这个目的,不是一

下子的事,必须经过一步一步地爬,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举例会说得具体一点,也就是我们要得到那位老人的那句格言,但是这位老人是经过从小孩成长为大人,经过多次失败或成功的经历,才最后得出“失败是成功之母”的真理的。

另外黑格尔强调真理的获得不能靠一点简单的聪明,不能靠一点简单的直观,他反对凭灵感抓住真理。他的这个思想是针对当时浪漫主义思潮而言的。当时浪漫主义思潮就是主张凭灵感一下子抓住真理。因此他的老同学谢林就成为了他的靶子。后来这一对好朋友就因为哲学思想的分歧,很少见面了。

这里,我还要强调一句话,刚才说真理是系统的、完整的,它不仅是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系统的、科学的。黑格尔所谓的“科学”就是要用概念来表达,而不是用一些形象的东西来表达。他说真理是科学的系统,实际上就意味着真理必须用概念表达出来,它是一个概念的全体。从这第一点,大家就可以看出黑格尔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他的思想,大家也能了解一点。

第二点,真理或绝对是对立面的统一,是一个圆圈式的发展过程。这个对立面的统一,归结起来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对立统一。黑格尔认为真理不是单纯的东西,它总是一分为二的。统一的东西总要分裂为正面和反面,正面和反面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但正面必须克服反面的外在地性。真理就是要克服与我作对的东西,使得与我作对的东西最终归属于我。这便是正、反、对立面的统一。如果用主体和客体的对立统一去说明,那就是真理必须是克服否定的那一面,克服对立的那一面,使得它服从于我,统一于我,也就是使它统一在以我为主体里面。他反对把真理看成是纯之又纯,一片光明,只有正面而没有反面的东西。他强调真理是一个过程,具体来讲就是克服对立面,使这个对立面服从于我最后达到对立面统一的过程。这个对立统一用一个形象的圆圈表示,即从正面开始,经过反面,最后克服这个对立的反面,回到“我”这个主体。谢林强调“绝对”是一个无差别的东西,黑格尔在批判谢林

时说：“这种认为真理或认为绝对就是一个单纯的 $A = A$ 的思想，看上去是一片光明，实际上则是一片黑暗，就像是黑夜观牛一切皆黑一样。”所以黑格尔反对这种把什么事情都看成是一个唯一的、单纯的東西的思想。在这个序言中，他还强调了真正要达到最真实的东西，就必须忍受对立面对主体所产生的苦难。他还指出一个真正的强者是要忍受否定物，忍受这个否定物对我起的否定作用，然后去克服它，最后回到自我。这样的人才真正是一个强人。中国有一句老话“荷出淤泥而不染”，我们看到的池塘里生长着很好的荷花，有哪一个池塘里面没有淤泥？如果池里没有淤泥，只是非常清的水，荷花能够长得出来吗？荷花虽然是从淤泥中长出来的，但是它很漂亮。所以真正高洁的东西是经过了苦难以后并且忍受了苦难、克服了苦难而得来的。同理，一个人要高洁也必须忍受痛苦，说一个从没挨过钱财的人是廉洁的，这是不现实的，也是毫无意义的；而必须是大量的金钱经过他的手，但他经受住了金钱的强大的诱惑而带来的痛苦，最后他没贪污浪费，这时我们就说这个人才真正是廉洁的。

黑格尔的圆圈式思想在认识上给了我们很深刻的启发。人们的任何认识实际上都是圆圈式的，是从开端开始，经过远处的一个间接的东西（有正面，也有反面），又再回过头来认识，这样就会对原来的正面的东西了解得深刻了。还是举个例子，我们读一本书，这本书是第一次接触，开始时读导论，懂了一些，但是书里的深刻内容还没有体会出来，这只是开端。然后不妨先“间接”一下，走到它的另一面去，即把书后面的内容一页页地读；整个书读完后，再又回过头去读导论，这就经过了一个圆圈，最后就容易把这本书读懂了。所以，黑格尔认为深刻的认识都是由直接到间接，然后再回到直接，这样得到的东西当然是深刻的了。

第三点，他强调“实体就是主体”，这就是有名的主客统一的思想。“实体”还是没有精神性的东西，因为黑格尔认为这个认识的正面是主体，在没有认识客体的时候，主体是空洞的。比如说，一

个人不读书,不看报,不与他人接触,那么这个人脑袋里是空洞的。这个时候,主体性或精神性是很贫乏的,是没有经过发展的,这个主体实际上是个实体,这个实体的精神性还没有发挥出来。真正要把精神性发挥出来,就要走到对立面。对立统一的过程归根结蒂就是主体克服客体,和客体接触,用客体充实实体的精神性。充实后,原来的实体才真正变成了主体。所谓“实体就是主体”就是这个意思。所有精神性的东西都是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同外界、同对立面接触,发挥,忍受,然后再回过头来的圆圈式的过程,最终得到精神性的富有。只有这样,主体才越来越具有精神性。最高的“绝对”(爬梯子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最高的主体。黑格尔认为这个梯子 is 盘旋式的:第一步从主体到客体;第二步,小范围的主体和客体的统一;第三步是大范围的主客再统一。这样经过不断地主体和客体的对立统一,不断地盘旋上升,形成了一个大的螺旋式的圈,最终达到目的——“绝对”。

第四点,黑格尔不是把真理和错误简单隔绝,而是认为真理和错误是统一的。他有一句名言,“人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不要害怕错误,顾虑犯错误,畏惧犯错误,这本身就是错误”,就是强调人们不要把真理同错误截然分开,而是要将二者统一起来。这就好比中国的太极图,阳中附阴,阴中抱阳,二者结合、统一起来便构成了美观的太极图。

上面的四点就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序言里的基本思想。现在我们再探讨一下这本书的大致内容。

第一大阶段,叫做意识阶段。黑格尔又把意识这个阶段再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叫感性确定性阶段;第二阶段叫知觉阶段;第三阶段叫知性阶段。

感性确定性是人的意识最基本的一步。在这一步,人的意识几乎跟禽兽差不多,即人们还只具动物水平的那种意识。这个时候,人只能意识到某个东西“是”或者“存在”,但至于是什么东西,却不能说出来。这个很容易体会到,人在婴儿时,有东西在他眼前

晃一下,他眨了眨眼,表明他意识到一个东西的存在,不然的话,他是不会眨眼的。如果把这个意识再降低些,降低到“它是”,用一个公式表达为“X是……”。“是”就是“有”的意思,即有这么一个“X”存在,至于“X”是什么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黑格尔所说的“最低阶段”也就指的是这个阶段。“X”是唯一的,我意识到的“X”和你意识到的“X”是不一样的。我意识到的“X”就是看到的这个“X”,你意识到的则是那一个“X”,这时“X”的意味对我和你是不同的。

到了第二个阶段,人们便能说出“X”是什么了。这就叫知觉阶段。特点是:人们可以把上面的那个公式中的省略号所要表达的内容填充出来。比如,“X”是冷的,“X”是白的,“X”是软的,等等。这里面的“冷”、“白”、“软”这一些词便是“X”所具有的性质。到了这一步,人的意识已经达到了普遍性了。开始时,光是说“X是……”但不知道“X”到底是什么,这个“X”就是唯一的个体。到后来,我们说“X”是白的,这个“白”便具有普遍性了。也就是说,凡是“X是……”中用来表达“……”的词都是有普遍性的,所以下这么一个判断:个体东西后面的谓词都是具有普遍性的。这样人的意识就将个体性和普遍性结合起来了。人的意识就是由个体的东西一步一步地上升到普遍的,知觉阶段便是人能够抓住事物的普遍性。我们能够说出上面公式中的省略号所代表的意义,也就是我们抓住了“X”的普遍性。这个“普遍性”中文往往翻译成为“共相”。“共相”就是“普遍性”。但是知觉阶段的“普遍性”还是非常有限的东西的普遍性,如果要认识科学的规律性,则要进一步扩大了,认识则又进了一步,这便是意识的第三阶段。

意识的第三阶段是知性阶段。这个阶段人们能掌握到事物的规律。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把事物的本质看做在人的意识以外。换句话说,事物的规律性都在主体以外。黑格尔认为外在的东西(客体)的本质实际上是和人(主体)的思想一致的。他强调主客统一就是要人们从外在的东西(客体),一直分析到这个东西的本质、

规律性即所谓的“共相”。

人的意识要更进一步,就必须认识到自我,这便是《精神现象学》这本书中的第二大阶段。

第二大阶段叫做自我意识。这时人的意识由“我与物的关系”进到“我与人的关系”了。这个大阶段又可分为五个小的阶段。第一个小阶段叫欲望,这时人们只知道以自己为主体,否定对方(客体)。原始社会便是这样,只是知道自己所在的部落,把其他的部落看成是敌人,不承认别人的存在,经常去杀死别人。到了奴隶社会,一些奴隶主发现,如果把奴隶全都杀死,便没有为他服务的对象,这时奴隶主本人就觉得空洞了,于是便不再杀死奴隶。这就是第二个小阶段,叫不完全否定对方。奴隶主不肯劳动,但又想要物质享受,这样奴隶主和物之间的关系只有通过奴隶联系起来。奴隶在劳动过程中制造了工具,便成为物的主人。奴隶主就非得依赖奴隶了。在这里,黑格尔看到了人只有在劳动中,才能意识到自己是真正的主人,离开了劳动,人就不能实现自己,不能真正成为主人。黑格尔的主奴思想是很有名的。第三个小阶段叫斯多葛主义。不管外物怎样,只要思想上认为是自由的,便是自由的,这和“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这句诗表达的意思相近。第四个小阶段叫怀疑主义。这个阶段人对现实生活、现实世界是完全否定的,认为人过着这种否定现实的生活是自由的。第五个小阶段叫苦恼的意识。这相当于中世纪宗教思想中的默祷、祈祷。上文的后面的三种意识是第二种“主奴思想”的具体表现。

但是如果把这个第二个阶段按精神哲学的阶段划分,则可分为欲望、主奴关系、普遍的自我意识。前面两个阶段已大概地讲了,这里,我着重讲一下普遍的自我意识。普遍的自我意识的特点是:主客相互承认,互为主体。黑格尔这个阶段的思想已经包含了现当代哲学思想的萌芽。现当代哲学思想强调的是相互承认。这个思想有一个翻译的专门名词,叫“主体间性”或“互主体性”或“主体际性”。古典式的哲学思想强调主体(subject)和客体(object)的

统一,当代哲学强调“互为主体”(intersubject)。“Inter”就是“internet”一词中的前缀。

到了第三个大阶段,叫理性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肯定自己就是对方,对方就是自己。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讲,就是“实在即自我,自我即实在”。在这个阶段,人们通过实践活动去认识自然的规律,使得主体和客体、自己和实在结合为一体。“理性”就是前面讲到的意识和自我意识这两个大阶段的对抗和统一。这时,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则又进一步了。理性又分为三个小阶段:第一个叫观察的理性;第二个叫实践的理性;第三个叫自在自为的世界的个体性。

观察的理性主要是讲人对科学的考察,对自然的认识。这是一种人对自然的静观,即人只是静观世界,只做科学的考察,但没有去实践,因而人还是得不到自由的。人要想获得自由,必须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实践理性阶段。实践就是要使得对方为我所用。人要深入到世界里面去,改造世界。黑格尔在这里讲的是人类的一些社会性的活动,在社会性的活动里面,个人和集体初步地融为一体。这个时候,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每个人是为了别人,别人也是为了我。用他原话讲就是“人在社会活动里,在实践中,达到了一种‘我做事是为了他人,他人做事是为了我’的认识”。别人对我而言是客,我对别人而言是主,这也是一种主客统一。这种统一是以人从事社会活动为前提的。理性的第三个阶段就是自在自为的世界的个体性。“自在自为”,说得通俗点就是最真实的。“自在自为的实在的”就是最真实实在的,就是最真实的个体性。意思是通过观察自然、社会活动的实践,人就和自然社会融合为一体。上面提到的“个体性”就是指个人和集体融合为一体的意识。到了这一步,人的意识,便超出了前面的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的前两个阶段)了。前面的这三个阶段都是讲个人意识发展过程,还没有进入到真正的人类社会历史。尽管前面也讲了一些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中世纪,似乎是在讲社会历史,但黑格尔在讲这三个

阶段的时候,都是把历史的事实作为个人意识发展的历史来讲的。前面的这三个阶段所讲的相当于后来的《精神哲学》这本书的第一大部分——主观精神。所谓“主观精神”就是讲个人的意识的发展过程。个人的意识发展到最高点那便是“自在自为的实在的个体性”,到了这个最高点,人和社会便融为一体。

第四个大阶段叫精神。这相当于《精神哲学》里的第二大部分——客观精神。“客观精神”指的不是个人意识,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历史。这个大阶段又分为三个小阶段:第一阶段叫伦理;第二阶段叫教养;第三阶段叫道德。伦理这一阶段相当于古希腊这个历史阶段,教养相当于资产阶级社会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道德相当于康德的思想。

第一个小阶段即伦理阶段。黑格尔认为人类在开始的时候,个人和集体是融合在一起的,是打成一片的。黑格尔是很欣赏古希腊共和国的,他把希腊社会看成是人类社会的家园,也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他提出的“伦理”就是讲伦理社会,个人和集体融成一片,没有分化,用他自己的专门名词讲,就是“一个没有异化的、和谐的、无纷争的社会”。这并不是说个人和集体间绝对没有矛盾。谢林认为最高的真理就是无差别的统一,黑格尔则认为同异中间总是包含有矛盾的。也就是说在社会历史的早期,这个和谐的社会里面总是包含矛盾的。这个矛盾主要是家庭和国家之间的矛盾,就好像是我们的一句老话,“忠孝不能两全”。这个矛盾越向后是越发展的,并且最后导致了伦理社会的解体。

第二个小阶段就是教养阶段。在罗马社会,人和人之间是靠一种伦理的精神来维持的。随着伦理社会的解体,每个人从家里独立出来,成为原子式的个人。黑格尔在《精神哲学》的法哲学的那一段讲,人最早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发展的过程,首先是婚姻,婚姻使两个人变成一个人。婚后,有了孩子,有了家庭,个人就扩大了。然后便是教育子女,其最终目标是让孩子离开伦理的家庭,进入社会中去,变成了个人。伦理实体解体后,人类社会进入到法

制状况。由于进入社会后,每个人变成了原子式的个人,这样彼此间自然会出现矛盾了,因而就需要用法律来维持。法制状况是伦理社会的后期,包含在伦理社会里面,是伦理社会中的矛盾的必然结果。法制状况再往下发展,就发展到人精神的异化。“异化”实际上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黑格尔把这个阶段叫做“教养”。他认为,人总是把自己异化成为制度,异化成为社会,这个时候,人才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如果一个人非常孤立,是原子式的,那么这个人则是没有开化的。一个开化的、有教养的人必须把他自己融合到社会里去,或者把他的精神异化、外化到社会里面去。“外化”就是我们所说的“表现”的意思,人类社会实际上就是人的精神的表现。在这里,黑格尔的一个很有名的很深刻的思想闪烁出来了,那就是“一个人要有教养,就必须把自己融合到社会中去,离开了社会,这个人便是一个没有教养的人”。这个阶段,黑格尔把人的思想意识分成两个方面,一个叫“高贵的意识”,一个叫“卑贱的意识”。“高贵的意识”,在封建社会里,是对王侯、官人阿谀奉承的意识。“卑贱的意识”则是和“高贵的意识”相反的,也就是反对封建统治的意识。这两种意识互相斗争,并且相互转化,其结果就变成分裂的意识。这种分裂的意识的进一步发展,就兴起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就是反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运动,它的最根本的精神就是“功利主义”思想。“功利主义”思想的发展结果就到第三个小阶段了。

第三个小阶段就是道德。黑格尔看到了功利主义的毛病,到了第三个小阶段,他指出了道德的重要性。这个时候康德的哲学也就出现了。道德是康德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然而黑格尔却批评了康德的哲学思想,原因是康德的道德观念强调的只是“为义务而尽义务”,轻视世俗的功利。黑格尔提出人必须使道德和人的功利相结合,他反对空谈道德。功利主义不能够使主客达到真正的统一,人还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为义务而尽义务”、“轻视功利”,这是空洞地谈道德,是没有现实意义的。人要想达到真正自

由,人类社会的精神意识的梯子必须再往前迈一步。

第五大阶段叫宗教阶段。这个时候,人就要超出整个人类社会(精神阶段所讲的就是人类社会)。人们一步步地超脱,从有限到无限,从个人意识发展到和人类社会达到一片。但是光和人类社会打成一片,人仍然不能得到完全自由。人必须以无限的整体(人,个人,人类社会)为目标,然后超出人类社会。宗教的对象就是“绝对”,这也是宗教的最高目标。

第六大阶段叫绝对知识。“绝对知识”就是用概念的形式去把握绝对,这是人类意识的最高阶段。前面的五大阶段都还没有把握到全体的概念。到了这个阶段,人类精神主体就和最高的全体(无所不包的整体)合而为一。这个阶段的人才是最完美、最完善的人。人通过哲学的概念去把握绝对,才会达到最完全的自由。这也是黑格尔哲学的最终目标。美国有一个新黑格尔主义者叫罗伊,他讲《精神现象学》讲到最后,到了绝对知识阶段,便认为人就是最完善的人了。他说,人在历史的各个阶段都是和一些各种不同的对立面作斗争,到最后,到达绝对时,这个人就像一个经过无数次战场的厮杀被弄得遍体鳞伤的战将,成为一个真正的英雄。

黑格尔眼中的最完美的人实际上是整个人类社会,是个人意识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全部总结。所以要成为一个真正完美的人,就必须投入到对立面,投入到社会,投入到整个宇宙中去。前面讲过,黑格尔整个思想是讲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和统一,于是,西方几千年的主客统一思维方式系统化了,完善化了。

最后,简单地讲一讲西方现当代哲学对主体、客体思想的批判。现当代哲学强调把人从抽象的概念的世界拉回到人世间来。人是现实的人,人有七情六欲,人要和现实的感情相结合。现当代哲学批判主体和客体思想,是因为现当代哲学认为主客思想有两大弊病。第一弊病是把人引向抽象的概念的王国,离开了人生。现当代哲学就是要把哲学和人生结合起来。人生是有诗意的,是充满趣味的,只有将哲学和人生相结合,人生才会更加完美。第

二个弊病,传统的主客思想引发人们拼命发挥主体性,去克服客体(这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另外也带来了人类中心论)。西方现当代哲学强调不要总是盯住眼前的东西,要能够看到事物背后的问题,把眼光放远一些(不是放到抽象的世界里,而是放到现实的没有隐藏的东西上),把在场的和不在场的、显现的和隐藏的东西结合起来。通过在场的、显现的东西把不在场的、隐藏的东西表现出来。这样,人看的是一个广阔而又现实的世界,这样人的心胸才是真正的开阔。

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推荐
录音整理 戴辉 朱俊君 胡强 未经本人审阅

【编者絮语】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而其中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又尤为重要。辩证思想和历史观点是黑格尔哲学中的重要合理内核,可以说,不了解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就很难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倡导阅读经典,是文化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措施。涂又光先生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武汉长江大桥的地下浇注深达岩石层,教育的基础也要打在“岩石”层上。编者以为,阅读经典的意义也在此。

何兆武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及其他

[2000年3月在清华大学演讲]

今天我来向大家介绍一本薄书,是18世纪中叶法国著名作家卢梭写的,题目叫《论科学与艺术》。这其实是一篇文章。我想,这个讲座的目的是使大家不仅要了解卢梭和他的这本书,同时还要了解他的时代的精神面貌。这本书其实在这里也只是一个引子。

现在我先讲讲卢梭所处的时代。

卢梭生于1712年,到1778年去世。他所生活的18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世纪。重要性在什么地方呢?下面谈一些我自己的理解。

人类在地球表面上出现至少有几百万年了,但人类的文明史,也就是人类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仅仅只有5000年左右。这5000年的文明史我想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可以叫做传统的文明史,就是从5000年以前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到500年前,也就是公元1500年左右。这段历史的特点是,它是一个农业文明。我们知道,有了农业才可以定居,有了定居才可能有文明。农业社会是简单的再生产,所以可以设想古代的农民生活大概几百年也不会有显著的变化,即使是天下太平的话。

最近500年的历史从根本上有了不同,最显著的不同表现在物质上。这500年的文明可以说是一个近代化的过程。近代化过程也是现代化的过程。近代化和现代化,在英文里都是一个词

modernization。

它跟古代传统文明最大的不同就是在物质上,它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文明社会。科学技术是不断进步的,所以我们的生活年年不同,甚至于天天不同。这种变化速度是以前的文明无法比拟的,因为它的生产是扩大再生产。随着物质生活的扩大再生产,人类的思想、文化、精神面貌,相应地也要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不能用古代几千年的那一套文化或者思想、或者社会生活、或者风俗习惯来适应今天的社会。按照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一个上层建筑总要适合于经济基础。我们的物质基础已经改变了,当然我们的社会生活、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文化也要不断随之改变。

人类有很多的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它的文明,但不是所有文明的发展都是同步的。我们可以说每个民族的文明都是从没有文字到有文字的时候才开始的,可是一旦开始以后,众多文明的进步都不相同,其中第一个迈入近代化的是西方社会。至于这个原因是什么就不谈了,因为谈起来很复杂。

有几件大事可以作为近代化开始的标志。第一件大事,就是地理大发现。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8年达·伽马发现了印度洋航路;1519—1521年,麦哲伦第一次环球航行,从此形成了真正的全球历史。过去各民族的历史基本上都是独立的,每个民族都在发展它自己的文明。比如说,我们中国的文明和西方的文明,不能说绝对没有接触,但是这个接触非常少,相互间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影响。可是我们知道,今天世界上无论某一个地点发生个什么事,都会马上影响到另外一个地点的。所以今天的世界越来越一体化。这个应该是说从地理大发现开始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1517年的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它标志着人类的精神从中世纪走向了近代。传统社会是一个守旧的社会,它的生活基本上是年年重复的,所以它的思想必然倾向于守旧,也是年年重复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信仰主义者。但是近代的社会是日新月异的,近代的思想也是不断地翻新,不断地创

新。近代化的另一个标志,就是在思想上要突破传统主义。西方旧的传统是什么?就是基督教的信仰。马丁·路德的改革虽然不可能彻底——他并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并不否定耶稣基督的存在,但是他否定了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代表,他否定宗教的权威,否定信仰的权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思想上的大解放。

第三件大事,是1500年左右出现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开始时本来是学术思想的运动,但是后来它就变成了不仅仅是个学术思想的运动,还是一个文化思想上的运动。用梁启超老先生的话来说,是以复古求解放。复古运动是指恢复希腊古代的文明。古希腊文明跟中世纪基督教的文明有显著的不同。第一,古希腊文明重视自然科学,而中世纪是信仰的时代,鄙薄自然科学;第二,古希腊文明是非常重视现实生活的,而宗教社会鄙薄现实生活,认为现实生活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价值的。第三,我以为最重要的一点是近代科学的出现。每一个民族都有它传统的科学,但是那个科学和我们严格意义上的近代的科学是不同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近代科学和古代科学有所不同,古代的科学是猜测的,是偶发的,是天才的直觉。而近代科学则是有系统、有步骤、有方法、有目的地去追求一个真理。古代的科学结果和近代的科学结果也不一样,近代的科学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地进步,可是古代的科学偶尔有了发现以后,又中断了。我举个最鲜明的例子,比如说古代希腊有一个哲学家也是科学家——我们知道,古代哲学就是科学,科学就是哲学——叫做阿瑞斯塔科斯,就提出来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不是的,那是很早很早的时候。后来中世纪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是地心说,认为地球是世界的中心,就把那个学说给否定了。一直到了哥白尼,才又重新提出来日心说。近代的科学开始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不过当时并没有很严谨的科学的证明。一直到后来,我们知道过了一个世纪,比哥白尼晚了100年出现了两位科学家。第一位就是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动的定

律;第二个稍微晚一点就是伽利略,伽利略毕生从事实验科学,为实验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这个基础上,一直到牛顿,到17世纪,最后总结了一套被称之为经典或古典的科学体系。17世纪以后,在牛顿学说的基础上,出现了近代的工业。近代工业,最简单地讲,就是牛顿原理的应用。18世纪开始工业革命,从而改变了人类生产的整个面貌。

工业革命跟传统农业最大的不同是扩大再生产,是日新月异的。工业社会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而人类的思想、社会秩序、风俗习惯都会随之改变。近代社会的转型到19世纪完成了。19世纪以后,也就是近代化的过程完成后,西方就开始了现代化。今天又有人说现代化的过程已经完成了,于是又出现了后现代主义。

我们大体上可以说,西方的近代化始于15世纪,完成于19世纪。这时,所有其余的文明的近代化都还没有开始,包括中国。中国知道牛顿原理是什么时候?是19世纪的60年代,离我们现在不过100多年。那个时候,在北京有个同文馆,同文馆有个算学课,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数学系。算学课的总教习是浙江人李善兰,当时中国最杰出的数学家。李善兰第一个把牛顿体系介绍给中国。所以就科学的角度来说,中国真正迈入近代化的第一步是在19世纪的60年代,这时西方近代化已经完成。这是我介绍的一般的历史背景。

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我特别要介绍一下西方的历史背景。在古代,西方有希腊文明和随后的罗马文明,辉煌了大约有1000年左右。但是到了公元5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灭亡了。当时的日尔曼人——也是今天很多欧洲民族的祖先,那时他们还是野蛮人,侵入了罗马帝国。他们入侵以后,历史就进入了中世纪。到了15世纪以后经过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西方社会的眼界大大地扩大了。从文化领域来说,它首先表现在意大利,随后传播到北欧、德国、法国。随着地理的大发现,同时也由于地中

海被土耳其人截断了,经济和商业的中心从地中海转到大西洋上,因此意大利的一些城邦就衰落了,代之而起的是西欧的一些国家,特别是英国、法国、荷兰。这几个国家开始大规模地发展工商业、海外殖民,其中英国、法国是最先进的。用中国话说,这就叫“地气”转移了。17、18世纪以后,有两个因素使得西欧的国家变得特别重要了。一个因素是我们说的经济的因素。因为地理发现以后,开辟了一个世界市场,谁占据这个最优越的地理位置谁的经济就发达,那么英国和法国恰好就掌握了大西洋的航线,所以它的经济就最发达。随着经济的发达,必然地出现文化的发达。这是经济上的原因。另外还有一个政治上的原因。马克思讲过,一切神权的斗争归根到底都是世俗利益的斗争。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欧洲出现了各宗各派的宗教改革。这些宗教改革归根到底都是代表不同的利益。不同的阶级、阶层、集团,他们有什么样的利益,反映在思想上,就有个什么样的教派。过去,西欧各国信仰天主教,即服从罗马教皇,其中心在罗马,在梵蒂冈。宗教改革以后,各国的国王成为宗教领袖,实际上教权被王权控制了。这种宗教的独立或半独立有利于它的王权的统一。本来这些国家都是封建的落后国家,有点像我国的春秋战国,有好几十个国家,形成了很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有传统的贵族,但是另外一方面,有新型的、在法国叫做第三等级(第一个等级是宗教贵族,第二个等级是世俗贵族)的工商业者的市民阶层,因为生产的需要,他们掌握了知识和财富。这些不同的等级在政治上是不平等的,其中以第三等级的实力最大、人数最多,他们必然要求政治上的权利。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也是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原因)。1789年法国大革命推翻了王权,建立了共和制度。这是欧洲大陆上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它开辟了人类近代文明史的新面貌。过去的王权专制的政治形态不适合近代化的需要,所以制度一定要改,改成符合近代化需要的政治形态,或者说政治机器,而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就完成了这个任务。我上面说的就是近代化进程主要的

一个线索。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卢梭的生平、活动和思想。

卢梭全名是让·雅科·卢梭，瑞士日内瓦人，是法国人的后裔，父亲是钟表匠，属市民阶层。后来他生活在法国，所以他又是法国人，有双重国籍。卢梭既是文学家又是思想家，一生写了好几本书。晚年他写了一本《忏悔录》。这本书有几方面的价值。首先，它的文学价值很高，因为卢梭是文学家。第二，它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因为卢梭接触了很多当时的文化界名人，书中对这些文化名人有很多的记载。第三，这本书还记录了他自己内心深处的生活，这是别人不肯写的。忏悔录与自传是不同的，自传主要是讲你经历的事，而忏悔录要探讨你的内心深处。顺便提到的是，卢梭没有什么正当职业，实际上他是一个流浪汉，有的时候做家庭教师；有时候给人做管家，实际上是仆人；有时给人抄乐谱；他是音乐家，他写过几个歌剧。有一次，他偷了女主人的丝袋子，而且嫁祸于另一个女仆。类似这些，一般人就不提了，但他写了，还做了深刻的忏悔。这样的一些隐私的写作，使他出名。这本书不仅写了他个人，还写了当时的法国。卢梭流浪了几十年，到了中年，仍然默默无闻，属于社会下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代表的是民间下层文化。

在他不到 40 岁时的一天，在从巴黎近郊到市区的途中休息的时候，他发现一张旧报纸，上面刊有第戎学院的有奖征文，题目是：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不是有助于人类风俗的纯洁化？科学与艺术的复兴就是指文艺复兴。自从文艺复兴以后，人类的科学和艺术有了很大的进步，可以说是大放异彩。这个征文的题目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物质文明的进步是否有助于精神文明的进步？卢梭看到这个题目后，思如泉涌，下定决心要写篇文章来答复这个问题。有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说，卢梭曾就这个问题去请教他的好朋友、法国百科全书派领袖狄德罗。狄德罗就问他准备怎么写，卢梭回答准备从肯定的角度去写。狄德罗就告诉他，不能做正面文章，大家都会去做正面文章，你一定要做反面文章。后来，卢梭就采纳

了狄德罗的意见,做了一篇反面文章,即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人类没有好处。我觉得,他这个著作的思想与他的其他著作的思想是一致的。我们说考据,有两种证据,一种叫外证,一种叫内证。我们可以从内证上说,这篇文章是他自己的思想。他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人类的道德并没有好处,并不是说科学技术进步了,人类的道德就更高尚更纯洁了。

这篇文章有以下几个重要性。第一,从卢梭本人来说,这篇文章使他一炮走红,是他发迹的开始。第二,这篇文章从正面提出了一个自古以来就有的问题,对近代化、现代化国家来说,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确实,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造成社会生活的很大变化,但这种变化是不是就意味着人类的精神就更美好更纯洁了呢?这个问题是非常难回答的。我们可以说今天的人确实比过去的人在精神上更高尚了;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至少也可以说并不见得就比过去更高尚更伟大。比如说,今天小偷很多,外出要锁门,而在 50 年代,是不用锁门的,是不是我们进步了几十年,我们的道德风尚也随之进步了?第三,也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就是人类所追求的幸福是什么东西?是物质享受呢还是某种精神状态的满足?假如你追求的是物质享受,那么我们说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有助于人类的进步;但是如果我们说幸福是一种精神状态的满足,那么我们就很难说他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或者是没有进步也没有退步。我们很难找出一个肯定的答复了。而这个问题困扰了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哲学家,就是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追求什么样的状态。我引两位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大师的话:孔夫子赞美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室,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尽管物质生活贫困,但他精神是快乐的,他始终享受追求精神、追求道、追求思想的生活快乐。我再举一个庄子最有名的故事。别人用机器来吸水,他反对,他还是自己去打水。为什么呢?操机械者必有“机心”。老子也主张归真返璞,回复到自然状态,不要那些虚假文明。卢梭的这篇文章就主要谈这一点,说人类文明的进步,特

别是科学与技术的进步,都是出于一种要不得的动机,即怎样能够满足自己的物欲或利益,而这种东西并不是人类所应该追求的东西。所以他最后否定了一切科学和技术的进步。

我想,否定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大概是不可能的事情。近代化这个东西是很奇怪的一个东西,在近代化以前,大概世界上的人都没有想到有近代化的一幕,中国人,包括孔孟老庄也没有想到过社会要近代化。但近代化的特点是,一旦有一个国家或民族近代化了,那么别的民族就必然也要近代化,只能走这条道路。香格里拉也好,桃花源也好,那都是诗人的幻想,都是不可能的。一个国家进入了近代化,别的国家也会进入近代化,就像一个国家有了飞机,别的国家也要有飞机一样。

近代化趋势是不可抗拒的,这是从物质层面来说。就精神层面上来讲,是不是这样?我想是比较复杂的。就精神层面来说,我想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说,大体上也要近代化。例如戊戌变法,它的目的就是要立宪,不能再搞君主专制,君主专制不符合近代化的要求。走近代化道路,不仅仅是要有近代科学技术,还要有配套的近代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因此首先要废除君主专制,第一步要立宪,用宪法约束皇权,立宪就要设议院,开国会,选出人民代表来。政治民主化,大概这个方向也是人类共同的方向。还有精神、思想、道德、哲学层次。比如说,各个民族有各自的宗教,这些宗教大概不必统一为一个宗教。但宗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要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变化。例如,中世纪时伽利略是被判了刑的,但前几年罗马天主教会给他平反了。所以上层建筑如宗教、思想、理论体系都要不断进步,不断发展。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科学、宗教是完全不变的,总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改变。

我想他这篇文章主要是从这三个方面涉及到近代化一个根本的问题。他的结论大概是不对的,但是他提出的一些问题非常有价值,就是近代科学的进步怎么样才能够配合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比如说,我们现在面临的生态破坏、环

境污染问题,像这样继续发展的话,子孙后代都无法生活。你把整个地球的自然平衡都破坏了,连你自己都活不下去了。那么怎样能够做到不仅考虑到自己的生活,而且考虑到子孙后代也能在一个健康的环境里成长,那这个环保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因为近代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太厉害了。卢梭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过去几千年所不曾面临的问题。因为传统社会几千年来形成了一套与传统社会生活相配套的思想、理论、社会风俗、习惯。现代生活日新月异,传统的那一套就不可能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配套了,我们就需要有一套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是什么?卢梭没有提出答案,但是提出问题。我觉得提出问题的贡献不亚于给出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讲,卢梭的这篇文章很有价值。

过了几年以后,第戎学院又提出了第二篇征文题目:什么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卢梭又去应征,但没有得奖。不过这次应征是他的第二篇论文,题目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这篇论文里也有一些创见。最大的创见是,他认为自从有了私有财产后,就有了人类的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总是非常赞美卢梭,说他充满辩证法。在这两篇论文后,卢梭就开始设计一个理想的社会。每一个思想家、哲学家都有他自己的理想国。卢梭考虑了很久以后写了一本书,这就是经典的《社会契约论》。这部书在中国最早叫《民约论》。

国家是什么?卢梭认为国家是人民之间订的契约。中世纪认为君权神授,中国认为天子受命于天,西方认为王权神授;到了近代社会,则发展出主权在民的学说,或者说是人民主权论。这个思想在近代最早是英国霍布斯提出的。他比卢梭早一个半世纪,是个大哲学家,还是一个机械唯物论者。他提出的理论就是契约论。这个契约论简单地说,是人类在文明社会之前,处于一种动物世界的自然状态。但这种状态是不能长久的,于是大家同意,找一个人作为领袖,把权力交给他,由他来支配、统治,这样大家可以过一个平安日子。这个霍布斯最早的社会契约论。霍布斯之后,过了

半个多世纪,英国出了一个有名的哲学家洛克,他写了两部《政府论》。洛克和霍布斯看法有些不同。他也认为在没有国家之前是处于一个自然状态,但这个自然状态是非常美好的。可惜美好的自然状态不能老维护下去,因为总有些不太美好的因素冒出来,比如总有人想损人利己,想发点财、侵害别人利益。在这种状态下,便同意建立一种契约,建立一个国家。洛克的契约论和霍布斯的有所不同,用中国话来说,一个是性恶论,一个是性善论。卢梭的思想又与前两位有所不同。研究近代政治思想史,主要就是看这三个人的著作。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1761—1762年写成的,这个时候距法国大革命只有不到30年的时间。这部书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法国大革命的“圣经”,也可以说是近代民主革命的“圣经”。法国大革命是近代民主革命的样板,就好像十月革命是现代社会的革命的样板一样。在这个意义上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就是给近代的民主奠定了一个理论的基础。卢梭也同意过去人的说法:人类在建立国家之前是处于自然状态,但是后来人类觉得这种自然状态不能够存在了。这一点他没有交待明白,只是说人类不能够维持了,于是就立一个契约。他的主要思想是:人类本来是自由的,是平等的,人类订立契约的前提也是要保障人民作为主人的自由和平等。假如一个政权违反了这一点的话,人民有权废黜这个政权,推翻政府。这一点奠定了法国大革命的基础。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现在联合国的《人权宣言》基本精神是继承了这两个宣言的),就是建立在卢梭的人民主权的理论基础上的。

这个理论到19世纪,受到实证主义的批判。实证主义的根据是什么?是历史。你说有契约,你把契约拿出来,大家什么时候订立过这个契约?当然没有这个契约,这只是个理论的假设。所以这个实证派,也叫历史学派,非常振振有词地说这些都是空想,根本没那么回事,人类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个契约。

这个问题,我认为可以两方面同时存在,并不一定一个排斥另

一个。我们说 18 世纪是理性主义时代,是从法理上推论,按照理性来说,应该是这样。至于事实上有没有这个契约,那是另外一回事。卢梭好像预见有人会反驳他,他在书里一开始就说,他论证的是法理,而不是事实。这就有点像婚姻法与婚姻事实之间的不同一样。

卢梭不仅是近代的启蒙大师,同时他还开辟了近代思想的另外一个主要潮流,这就是浪漫主义。18 世纪是理性主义的时代,但忽略了理性以外的东西,比如说感情。卢梭第一个开辟了近代浪漫主义。本来他的第一篇论文里面就透露了这种思想:野蛮人也可以是高贵的,并不一定文明人才是高贵的;自然状态是美好的,并不一定只有文明的生活才是美好的,文明社会也充满了许多虚伪和狡诈,但是野蛮人的生活里没有这个东西,它是自然的,是淳朴的。所以卢梭提出一个口号,返于自然。一直到今天,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思潮。

卢梭写了本小说,名字叫做《裘利亚》,又叫《新爱洛绮思》。讲述的是一个爱情故事。卢梭在这里注重的是真诚的感情,这也是对当时上流社会虚伪的抗议。因为当时法国的上流社会里面,恋爱是非常流行的,而这个恋爱有许多虚伪的成分,都是不真实的。卢梭提出人性应该回到自然去,所以他反对这种势利的恋爱。这本书里面歌颂的是真挚的感情,这种真诚的感情后来就变成了浪漫主义的先锋。我们知道,18 世纪末,欧洲文艺界掀起了一个浪漫主义的潮流,当时很多了不起的作家都是浪漫主义者,比如说德国的歌德,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最后,我讲一讲卢梭对中国的影响。在清朝末年民主革命高潮的时候,中国人从日本人那里“贩运”了卢梭。当时的邹容和陈天华的著作,都把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和卢梭的《民约论》作为法宝,视为至高无上的东西来歌颂,虽然那个时候还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卢梭。我所见到的真正第一个从正面介绍卢梭的是梁启超老先生,他的《近代的民约论的巨子卢梭》是中国第

一篇介绍卢梭思想的文章。

近代的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进近代化和现代化,这是不可逆转的。可是究竟具体怎么走法,则要看具体情况。中世纪的中国文明领先于世界,但是近代化的步子迈得晚了。在中国近代化开始的时候,中国人认为自己不如人家,不如人家船坚炮利,那夷人之长技不过是船坚炮利。所以我们就得学西方的长技,就是魏源的话,“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认识到,光是船坚炮利不行。你得有科学知识,没有科学知识,你没法造这坚船利炮,所以我们就建立了江南制造局,还有同文馆,以发展工业和培养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第三步,我们又认识到,你光是有了这些科学知识不行,因为你一个国家近代化,你的社会政治体制要配套,所以我们要“变法”,要“维新”,要“改良”,甚至要“革命”,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后来又发现,我们前面做的这些,就像王国维先生在清末提出来的,我们学西方都是学他的皮毛,没有学习它的真正内涵。所以后来到“五四”时,又进了一步,认为根本还是在文化,所以提出“德先生”、“赛先生”。我们要科学要民主,大概这个东西是近代化必不可少的条件。所以在那个时候,卢梭也流行了一阵子。今后,我想主要方向还是要走科学和民主的道路。这里也引用毛泽东的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因为时间太晚,今天讲到这里。

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推荐

未经本人审阅

【编者絮语】中国古代一向有“知人论世”之说。也就是说,要做到真正把握一个人的思想就必须对他所处的时代和个人经历有所了解。这篇演讲,可以说是“知人论世”的典范。第一,有助于我们把握人类五千年的文明史,尤其是西方近代化的过程;第二,有助于我们理解作为思想家、文学家的卢梭在18世纪这一重要历史时期所做出的贡献,以及他的思想在今天的意义。

吴国盛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回首百年科技

——世纪之交的历史总结与哲学分析

[2000 年 12 月在华中科技大学演讲]

马上我们就要面临一个世纪之交,所以这个讲座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荣誉——能够在真正的世纪之交,回顾一个世纪的科技发展。我们常说,今天是科学的时代,那么什么是科学的时代?这一个世纪即将过去了,这个科学的世纪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有什么值得我们反省的地方?今天我提出一些问题,与大家一起讨论。

我想讲两个方面:理论科学方面与应用科学方面。

就理论科学而言,整个 20 世纪是一个科学革命的世纪。这个科学革命,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它是对古典科学的一场革命。所谓的古典科学也就是现在常说的近代科学,是由哥白尼、伽利略到牛顿带来的这样一场革命奠定了基础的。这场革命在牛顿那里形成了一个完善的形式,19 世纪牛顿力学开始向各个领域扩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力学:电动力学、波动力学,等等,种种力学的出现使人们觉得科学的模式已经进入了一个完善的地步。所以 19 世纪末曾经有过科学的终结说,认为一些大的科学问题已经完成,剩下的只是寻找小数点后面的更多的数字而已,也就是说,剩下的只是量的扩充而不会有质的变化。但就在“终结说”的余音未了之时,爆发了两场物理学革命,导致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

现。这两个基础科学的出现对牛顿力学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也使得 20 世纪的科学完全被刷新了。

但是革命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先得说说“革命”一词的来历。“革命”的本来意义是什么?“革命”,是“revolution”的意译。Revolution,就是“旋转”的意思。旋转怎么会成为革命呢?这就要说到哥白尼。哥白尼有一本书叫《天体运行论》,这本书的书名的中文翻译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准确地说,应该是《论天球的旋转》。因为直到哥白尼,欧洲人都认为转动的不是天体而是天体附着于其上的天球。哥白尼论“旋转”的著作认为,不是太阳围绕地球转,而是地球围绕太阳旋转,这造成了一个重大的观念变革,于是“旋转”也就有了“革命”的意思。

我说的科学革命,在第一层意义上是指古典科学内部的一些变化,比方说,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被爱因斯坦的相对时空观所取代;而另一层意义上的革命,则指的是由哥白尼所开始的那场革命今天有被再次革命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哥白尼所推动的那场革命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对世界的看法、人的存在方式、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种种问题可能会经历一场新的变化。这个变化在 20 世纪后半叶已现端倪。今天我着重谈谈这两大革命,第一场是古典科学内部的革命,第二场是即将来临的、可以与哥白尼革命相媲美的革命。第一个算是历史的回顾,第二个算是哲学的前瞻。

我们知道,今天所说的科学就是西方科学,也就是西方近代科学。为什么独独西方占了科学这个位置呢?我们知道,经常有人谈论“李约瑟难题”,说中国古代科学多么发达,只是到了近代为什么就不行了呢?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科学是不是人类的一个普遍的现象?按照我们今天严格的定义来讲,科学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科学是独独属于西方人的。因为科学所要求的是一种追求理性的态度,是一种追问的态度,是要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态度。我记得有个故事,说是著名哲学家罗素做过一次关于天文学的公众演讲,讲宇宙如何演化呀等等。

当时有一位老太太问道：年轻人啊，你讲得倒是不错，挺动听的，可我就觉得像是胡说。我觉得宇宙是爬在一个乌龟的背上的。罗素反问道：那乌龟又是爬在哪儿呀？老太太说：我告诉你呀，那是一个乌龟爬在一个乌龟、一个乌龟爬在一个乌龟……身上。（笑）这当然是个笑话，但它说明西方的科学有一种追问到底的态度。我们知道，所有的科学都是起源于宇宙问题，你对宇宙什么态度，就表明你有一种什么样的科学态度。希腊人一开始就把宇宙模型与天象材料相对照。埃及人也有它的宇宙观，也有它的天象材料，但这两者是没有关系的，他们认为宇宙就是一头大牛，星星就是牛身上的毛。但人们要问，为什么太阳会时出时没呢？为什么会周而复始地运转呢？希腊人首创了一种方法，把天象观测和宇宙模型进行比较，而且还要不断地问为什么。我们知道行星在希腊语中是“漫游者”的意思，它有不确定的轨迹。这些不规则的天象吸引希腊人要把它归整起来，所以柏拉图后来提出“拯救现象学说”，就是说这些不规则的天象后面一定有个规则的依据，这个依据是可以发现的。希腊人这种追求理性的精神是构成科学精神的一个最基本的内核。其他的民族都不具有这样的特质。中国人讲“杞人忧天”，今天看来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像什么小行星稍微偏一下，一下子撞到地球也是有可能的。但中国人安慰自己说，行星什么的都是气体，气是砸不死人的。（笑）这种“气”的自然观就把追求、追问这条路给堵死了。中国古代有“浑天说”：浑天就像一个鸡蛋，地球就像蛋黄，天就像蛋白包着蛋黄一样包着地球。浑天说也与天象有关系，但这个关系是非常稀松的。所以中国的天文学与宇宙论之间的关系也不太大。支配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的更多的还是“盖天说”，“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认为天是一个盖子。以至于到了晚清时期，人们听说地球是个球状的，那些士大夫就纳闷：地是球状的，那球那边的人终日倒悬，怎么办？（笑）觉得很奇怪。但地球是球状说在古希腊时期就开始有了，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甚至更早在泰勒斯时代就有了，并提出了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模型。

刚才我们提到科学要有追问的态度,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由哥白尼体系所发起的这样一场宇宙观念的全新的变化,其实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哥白尼革命一个最重大的突破是把地球看作一个天体。我们知道,在全部的古老民族中,天地之间的区别是最基本的区别,人是顶天立地的,人出自泥土回归泥土,所以人和自然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人是大地儿子,大地是母亲。到了哥白尼以后,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地球不再是一个大地,而是一个星球,在太阳系中它是行星三号。所以从哥白尼开始,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场革命的本质意义不在于宇宙中心的转换,而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因为我们知道,从天文学意义上讲,哥白尼革命并不具有特别巨大的革命性意义。希腊的天文学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球状科学,正圆科学,所有的天体都有正圆的轨道。第二个是所谓的天球模型,所有的星体都是嵌在天球上,并随之运转的。天体自己是没法转的,天体如果是在虚空中它怎么走啊?当时不知道引力定理,不知道惯性定律,所以认为天球在虚空中间是不能动的,亚里斯多德还借此不承认有虚空。有人说,没有虚空怎么运动啊?亚里斯多德说,错了,有虚空才没法运动呢!因为在虚空中,一切都绝对的平均、均衡,无差别,往哪边动都不合适,都没有理由,因此,虚空不是运动的根据,天体必然要嵌在天球上。天球是希腊天文学的第二个要素。第三个要素才是地心还是日心。哥白尼在他的《论天球的旋转》里只把重心做了转移,天球没有打破,他仍然维持天球的概念,因此他的宇宙还是个有限宇宙。为了满足说明各种各样的行星的奇怪运动,他还要借助托勒密的均轮和本轮。他虽然把托勒密的80多个轮子大大减化了,减少到了二三十个吧,但是本质上没有变化,还是使用本轮加均轮。所以说,哥白尼的革命从天文学上讲它并不具有特别的革命意义。相反,人们往往相信哥白尼的工作实际上是更好地回到了正宗的希腊精神。为什么呢?哥白尼觉得,像托勒密这样本轮套均轮地搞下去,没完

没了。这是第一。第二,他觉得,在行星运动中间,内行星与外行星的运动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可是托勒密的体系说明不了这些区别。把太阳放在中间之后,一切都很自然了。所以他说,一切要更加和谐。希腊人的宇宙一词本来就是和谐的意思。希腊人一开始就认定了这个世界是可理解的,而且是整体上可理解的,我们中国人在古代是没有这个概念的,认为宇宙整体上是无法把握的。

所以,哥白尼之后,就出现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哥白尼虽然没有打破天球,但他给出了打破天球的方向。为什么呢?在亚里斯多德时代,已经有人提出宇宙是无限的。但被亚里斯多德给驳回去了,他的理由是:“无限”是此外永有,而宇宙是此外全无,所以宇宙不是无限的。这是第一点推理。第二个是天球每天绕地球转一圈。如果说宇宙是无限的话,那天球的线速度就无限大了,这就没法理解。所以外天球绝对不能是无限大的。到了哥白尼的时代,地球可以不在中心了,它每天自转一周。太阳的转动,外层天球的转动,其实都可以不动了,因为它们都是地球转动造成的。这样一来,外层空间可以是不动的,那前面说到的亚里斯多德的第二个理由也不成立了。所以哥白尼之后,人们就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可是一个无限的宇宙怎么把握呢?无限的宇宙如何结成一体?牛顿提出了引力说。引力又重新把整个宇宙结成一体。

我讲了半天,古典科学究竟是怎么来的?古典科学首先来自希腊精神,希腊人那样一种科学的理性的精神。但是,在哥白尼时代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一场革命,革命的结果是泯平了天地的界限,把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一下子变得极为特殊。从前我们说人出生于泥土,归终于泥土,他对大地是有依赖的,地球成了行星三号之后,关于地球的种种神话都化为乌有了,人和大地的亲缘关系开始打破。人开始觉得自己是宇宙的中心了,可以为所欲为了。就像里根对宇航员所说的:“因为有了你们,我们才会觉得像巨人一般。”原因就是人能够上天了。哥白尼革命从观念上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即认为人是可以上天的。因为天与地之间没有明显的

界限,而我们的地球甚至不再成为人类永久的居住地。也就是说哥白尼革命之后,人类关于太空漫游的幻想才成为可能,没有这场革命,我们连想也不要想。这样一场革命诞生了牛顿力学,直到19世纪——这个世纪被称为科学的世纪,就是因为古典科学全面发展,数、理、化、天、地、生各个学科都有长足的发展,并且影响人类的社会生活——人们开始以科学的态度、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事物,看待生活。所以在19世纪末期的时候,已经有些广告在打“科学”这个词了。“科学配方”就是科学时代一个好的修辞方式。以前夸东西好是说祖传秘方,现在则要加上“科学配制”。(笑)19世纪构成的这样一座古典科学的大厦,当时已经基本完善了。但20世纪初爱因斯坦发起的相对论这样一场科学革命大大打破了人们心目中的许多概念,我们可以说相对论的出现是在更加纯正的意义上恢复了对希腊精神的弘扬。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最重要的一点,是把时间、空间与物质能量结为一体了,它们都不再是独立的。由于这样一些基本的东西被重新结为一体,对宇宙的整体研究又成为可能了,现代宇宙学才真正兴盛起来了。所以说,爱因斯坦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希腊精神的回归。大家记住,每一次革命既是一次颠覆活动又是一次复兴,是对传统的一种颠覆,也是对传统更深一层的复兴。哥白尼打破了托勒密的许多轮子,但是回到了托勒密以前更纯正的正圆学说。爱因斯坦打破了牛顿体系,但他比牛顿更加希腊化。我们可以看出在西方科学发展中,一以贯之的是理性的和宇宙和谐的精神。

相对论从什么意义上重新构造了20世纪科学的基础呢?相对论的革命是一场刷新世界观的过程,刷新世界图景的过程。与相对论同时,还有一大理论就是量子力学。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类似,也是在更新的意义上强调了自然的数学化。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海森堡,对希腊情有独钟,反复强调量子力学所导致的结果是在更大意义上恢复了柏拉图的数学原子主义。量子力学除了诉诸实验之外,在计算中起作用的是那些波函数,而且这些观察数据

必须通过波函数运算得出。运算在量子力学中是很重要的。

在这两大革命之后,整个 20 世纪的科学成就,我们可以归纳为四个,用四大模型表示:第一是宇宙大爆炸模型;第二是基本粒子物理学中的夸克模型,它与相对论有直接的关系;第三个就是分子生物学中的 DNA 双螺旋模型;第四个是地质学中的大陆板块模型。这四大模型基本上可以概括 20 世纪最核心的理论成果。这四大模型和两大物理学革命构成了 20 世纪对古典科学最大的贡献。

这四大模型的出现改变了我们对宇宙的看法,今天我们关于宇宙、生命、物质、地球的观念基本上是由这四大模型来提供的。我们刚刚回顾了一下从希腊时代到哥白尼革命,到牛顿、爱因斯坦,我们也讲了一下 20 世纪四大模型。四大模型之所以成为古典科学的一个最新典范,是因为它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希腊人对数学化的追求,对理性化的追求。模型化是一个典型的力学工作。模型一旦确立,在它上面就可以开展很多工作。这就是古典科学的理想。

20 世纪之所以被称为科学的世纪,除理论科学方面的重大突破外,还因为它把人类改造自然的伟大力量发挥到了极至。我主要想讲一讲两大超级能量。

第一个就是核能。核能是人类至今掌握的最厉害的能量,太阳就是被核能点燃的。第二个就是登月、上天。从哥白尼开始的人类空间时代这样一个理念在 20 世纪第一次得到了实现。阿波罗登月计划和曼哈顿计划分别代表了 20 世纪人类所创造的最强大的力量。到今天为止,你无法想象比它更大的能量,只能从量上超越,难以从质上来想象怎么超越。对于这两大能量的出现如何评估?当然,从政治的角度来讲,这两大能量支撑了冷战时代。出现原子弹后,人们一开始担心会不会出现核大战。但出人意料,特别是在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后,各国都不愿意两败俱伤,反倒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出现,创造了一个漫长的冷战时代。这也许

是核弹创造的一个积极的后果。当然它的消极后果也不是一两句话可以概括的。

登月计划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冷战的产物。登月没有很明显、很直接的经济意义或科学意义,它树立的是一个力量的形象。冷战时期,美苏两国竞争很厉害,太空计划就成为两国之间竞争的一个象征,是人类在 20 世纪创造的一个新的力量的标志。谁能登上太空,谁就有 Power。我们知道,Power 一词既有权力的意义,同时也有力量的意思。冷战时代所开辟的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世界格局,促使人类把近代科学所能达到的力量的极至全释放出来了,太空计划就是把这种力量合法地释放出来,登月计划更主要地具有政治意义。

下面,我说一说 20 世纪后半叶出现的一些新的情况。为什么我刚才花了很多篇幅来探讨希腊问题,探讨哥白尼问题?就是因为在这个世纪之交,要重新探讨科学的力量、科学的意义,要重新探讨科学对人类的意义,探讨人与世界的关系,因为每一次革命都是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一场革命。刚才我们说,哥白尼革命本质上改变了人对大地的依赖,大地不再是维系我们人类生命的根系,它是一个偶然的東西,也就是说,人与大地的不可割断的纽带被近代科学所割断。在 20 世纪下半叶产生了哪些新的征兆,以至于我们要重新反省这些东西呢?我们刚才提到,在 19 世纪末,已经有人提到科学的终结说,到了 20 世纪末的时候,也有人提出了科学终结说。美国有一个叫霍根的科学记者写了一本书,叫《科学的终结》,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很多人自然想到 19 世纪末那一次关于科学终结的预言。那么,霍根的书是否仍然是在 20 世纪末上演的另一场闹剧呢?对于我而言,今天的情况也许有一些新的变化,在这些种种变化之中,我愿意提出“一个基础理论,两大技术成就”作为代表。

这个基础理论的出现,就是所谓非线性科学的出现。非线性科学、复杂科学、耗散结构理论、混沌理论、生态科学等等理论,这

样一些科学和我们以前谈的古典科学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古典科学讲的是简单性,牛顿力学基本上是简单的、线性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叶而知秋,窥一斑而知全豹,由局部可知全貌。因为它假定整体等于部分之和。但是,今天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东西是复杂的,而且,人们从前基本上认为世界根本上是简单的,复杂性是特例,比如人就是一个特例。人是复杂的,思想是复杂的,因为它不能为科学所把握。但是今天的非线性科学家们正在培养一个新的概念,那就是复杂性是基本的,简单性反而是特例。而且这种说法不是在科学之外,而是在科学之内说的。所以,今天的非线性科学把这个过去数学上无法解决的复杂性问题提了出来,而且已经构成了我们对世界观的根本冲击。其要害就是,这个世界本质上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这个世界本质上是可预测的还是不可预测的。

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都知道,牛顿力学出来以后,经过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在人们的心目中树立了一个科学至上的理性观念,其中,法国的拉普拉斯确立了一个精灵,这个精灵只要知道了全部的初始条件,再加上牛顿力学之后,他就什么都知道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个精灵史称“拉普拉斯妖”。(笑)他由于精通牛顿力学,能把宇宙的过去和未来从头到尾都能计算出来,整个宇宙世界对他而言都是透明的,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这就是高度的可预测性。在这个世界本质上是可预测的前提下,人类做了一系列自以为是的事。比如说,我认为湖填得越多越好,填完以后,可以做这样那样。结果发现填完以后呢,结果超出了我的预测。再比如说,我把这个树砍了,这个树难看。结果发现,那些好看的树也死了。麻雀,有害,打死,结果害虫反而多起来了。这说明什么呢?大家知道,这是一种生态的观念、整体论的观念、反决定论的观念。非线性科学在一个更基本的层面上证实了这一点。这个世界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是不确定的。这个世界因为是不确定的,人类将会增加对它的敬畏感;当世界是完全确定的时候,你会觉得世界全

部在我手中握着。

非线性科学的出现,还对传统的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局面构成巨大的挑战。我们知道人文学科本质上都是历史性学科。历史学强调过去的价值,还强调过去和未来的不对称性。也就是说,它承认时间是我们生活中一个基本的因素。但是我们知道,牛顿力学并不承认时间的不对称性,牛顿第二定律的时间 T 是以平方方式出现的,你用负 T 代进去是一样的。古典科学家们通常对时间是不以为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完全属于古典科学的范围。爱因斯坦曾经说,对于我们物理学家而言,时间完全是一个顽固的幻觉而已。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博大的胸怀,但这也是他的科学观念的一个自然体现。古典科学里,时间是不重要的,不对称也是不重要的,因此,著名的数学家哥德尔曾经做了一个纯逻辑的论证:从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可以推论出人能够到过去去旅游。

我们知道历史和时间是意义的来源,也是价值的来源。每一个人面临的世界不是由一个空旷的架子构成的,是由经验构成的,由他所属的历史传统构成的,有了传统才有了我们的价值观念。但是由于我们的近代科学提供的完全是一个必然性的、完全确定的世界,种种意义的世界和价值的世界就没有余地,科学与人文之间于是存在着巨大的分裂。比如自由的问题,科学是不承认的,想不通的。自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未来是开放的,永远是不确定的。我们的科学——拉普拉斯妖是一个象征——告诉我们,过去未来全都清楚,全都是透明的,自由如何可能?自由问题没有了,又怎么会有伦理问题呢?任何伦理都是建立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之上的。比如说,我在公共汽车上坐车,上来一位老太太,我让座给她,这是我的自由意志的体现。我可以起来让,也可以不让,至少有两种选择。我让,这是我道德高尚的表现;如果我起不来,我腿没了,那你不能指责我不让座。再比如,坐的是一个死人,你不能指责他不让座,因为他没有自由。再比如说,我打你一拳,这是不

行的,或是犯法,或是不讲道德,但如果说,我这一拳打过去,是一堆原子按物理规律支配的结果,它到时候,就该要过去,(笑)甚至是从宇宙大爆炸时就定好了,那我还要负什么责任呀,你为什么还要谴责我呀!我们今天是生活在一个科学的时代,科学世界观被我们认为是最可靠的,最实在的世界观,可是,这个世界观既然不能允诺我们对自由的维护,反而还允诺我们对自由的侵犯,告诉我们自由是虚幻的,那么,这个时代就很成问题了。所以说,今天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也可以说是西方没落的一个象征。在整个 20 世纪,在人文学界,不断掀起对分裂的忧虑的呼声。我们知道,德国哲学家胡塞尔不断地在追求科学的统一性,提高到欧洲的人性的高度来考虑。由于科学与人文的严重分裂,导致我们只懂得去造武器,不懂得去约束使用武器:只懂得去发展人类的力量,不懂得去控制人类的力量。今天我们人类发展的能量还小吗?但我们人类对这些能量的控制是极为弱小的。今天的社会还没有建立一个健全的体制来规范科学力量的运用,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在二战结束以后,由于科学的极度发展,全部暴露出来。俗话说得好:物极必反。就是说科学走到一定程度之后,它把它一切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以至于使我们在这个世纪末有可能阐释科学对我们人类的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

在这个世纪末还有两样重大的技术成就,这就是信息互联网技术和生物技术。我们知道,生物技术的出现将会极大地改变人类的自然属性,而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将会极大地改变人类的社会属性,改变人类的交往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我们可以试想,人类通过数百万年的进化获得的基因资源、生态的稳定性、获得在地球上安居乐业的机会等,如果能被人类自身轻而易举地改变的话,当然会引起人类巨大的恐慌。这也就是为什么新技术一方面在高歌猛进,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思考,科学对我们人类意味着什么?在古典时代,科学是照亮黑暗的光明,是火炬,它使得我们从蒙昧之中清醒过来。生命处在一片昏暗之中,无法理

清的昏暗之中,科学像一股清明之流,使我们看清世界是怎么回事。18世纪的启蒙运动,利用牛顿力学,利用近代的科学,清楚地勾勒出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而且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可是,把世界完全看清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如果我们的世界是这样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冷冰冰的世界,那我为什么要待在这里呢?人生的意义何在呢?当科学把一个冷冰冰的世界呈现出来的时候,它同时又引起巨大的疑问,那就是人生的意义问题,存在的意义问题,这个世界为什么老是有这些东西呢?为什么不是什么都没有呢?什么都没有完全可以想象嘛,为什么有“我”呢?没有“我”也是可以想象的嘛,比如说,计划生育搞得早一点,“我”也许就没有了;假如我的父母没有见面,就没我。但是,在这所有的一切说法中,有一个重大的前提,就是关于“我是什么”的隐含着的假定。

但是,生命究竟是什么,宇宙究竟是怎么回事,从前这些问题被认为是玄学的问题,科学家敬而远之。可是,不回答这样的问题,不等于对这些问题没有事先隐含着看法。科学在获取生命的奥秘同时,回避了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这些问题随着今天科学以及它的伟大的技术力量的发挥而被重新勾引了出来。前几天,比较保守的英国国会通过了可以克隆人类的干细胞计划,可以看出克隆技术发展的不可阻挡的趋势。也许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一个孩子会哭着跑回家,跟家长说,我的同学他的基因版本都是3.0了,而我的还是2.0。(笑)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活着?活着有什么意思?当形形色色的人工生命体满世界奔走的时候,当这个世界关于生命的常识被推翻,而生命本身越来越不可思议的时候,那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在今天的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追问这样的问题。难道我吃得更好一点就更幸福?我们的西红柿越来越大,像南瓜一样大,可以随便吃,那是不是就比以前西红柿很稀少的时代,我们因为能吃到一个西红柿而欢欣高兴更幸福呢?今天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蔬菜,还会有当年丰收季节

那样的喜悦心情？自然的节奏是春耕夏种秋收冬藏，现在我们是四季都在收获，也就是说，人们生活在一个远离自然节奏的时代，可是我们唯一不能改变的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节奏，你并不能重新创造一种生命节奏。我们倒是试图这样做，但我们今天已无法忍受人工自然界带给我们的生活节奏。钟表——它是工业时代真正的秘密之所在，曾经有人问，工业时代最伟大的机器是什么呀？最基本的机器是什么呀？是蒸汽机、动力机。有了动力，什么都有了。不！真正的动力机其实就是钟表，钟表的发动才驱使着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同一个指挥棒的指挥下以同一节奏运作。今天我们要吃饭了，不是因为我们饿了，而是因为时间到了，（笑）今天我们很多事情都是由钟表来控制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局面已不再维持了，因为今天的生活节奏是由我们人类自己控制的。当然这有一个度的问题，超过这个度以后，人类就要出问题了。谁能永远不睡觉？人类为什么要睡觉呢？这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生命节奏，光作不息不行。今天我们对人的自然节奏的改变已经很厉害了！我们能够引进某些美国培育出来的草，冬天永远保持绿色，这样的草不见得是有生命力的，不见得是真正的草。可以设想一下，草老是不枯萎还是草吗？（笑）我们说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死亡，不死的东西当然也就无所谓生命了。所以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非常严峻的，尤其是生物工程带来的问题。它的问题不单是一个未来伦理规范问题、法律秩序问题，而是唤起我们对生命本身看法的问题。

再说互联网技术。互联网技术是在一个新的意义上创造一个虚拟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仅在人工的意义上和我们从前的科学世界一样，而且比以前的世界更进一步，它造就的是一个虚拟、虚幻的世界。在现实中我们每个人作为一个个体而存在，他首先意识到是我自己在说话，说话是要负责任的，但是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条狗”，（笑）也就是说你在互联网上可以不以你的名义说话，你可以完全人格分离。你在网上所面临的新的规范不再是现

实生活中所面临的规范。这种规范淡化了你的责任心,使你的行为更加虚无化。比如说杀人这个事,古代是直接用刀劈,一刀下去,血就喷涌而出。这种杀人的方式与生命之间有活生生的接触,要么代表着勇敢(我们常说要有血性)、复仇的快感,要么代表着犯罪、恐惧。但在枪炮出现以后,杀人不再直接带有血腥味了,于是人就开始远离“血性”了。今天更好了,改在游戏机上了。它不但没有血腥味了,连那个被打死的究竟是不是人我都不清楚。大家都玩过打仗的游戏,但是你们要注意,今天这个游戏和现实之间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美国轰炸南斯拉夫,轰炸的士兵做的那个动作与我们做游戏玩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新的技术使得我们把人与人之间的血脉相连的关系开始淡化了,我们和他人之间的关系正处在一个原子意义上的关系。我们知道,在牛顿那里,物质之间的关系也是原子的关系,但它们之间有引力。当时提出万有引力的时候,很多科学家不同意,说你这个引力太神秘了吧。但我们发现,没有引力,牛顿的科学就不可能,也就是说,科学之所以可能,就在于要把握住最后的统一性。统一性就是人性。为什么人有宇宙的概念,动物就没有呢?宇宙是什么呢?宇宙不是个东西,你说宇宙是个东西,它在那儿呀?它有多大呀?有限还是无限呀?人为什么会有那么些不是东西的东西呢?(笑)这个cosmos就是统一性。我们说一个人魂飞魄散之后就死掉了,因为散掉了。人作为人首先是一种作为精神的存在,精神就是把原本是散的东西连接为一体。

什么是科学的人文性呢?科学的人文性就是科学的统一性,凡是促进科学的统一性的就是在弘扬科学的人文性。大凡伟大的科学家们,总是在不断地把分裂的科学集成在一起,重新把它们结成一体。我们今天的科学一方面是在无穷地分裂,但是伟大的科学家总是在一定的时候站出来把它们捏在一起。因为有了相对论,有了量子力学,古典科学重新在新的基础上结为一体。那么是不是在未来若干年,还有新的机会有新的科学家来完成这一任务?

我们不敢猜测。但是非线性科学的出现,在我看来,是在科学史上,可以导致一场与哥白尼革命相媲美的科学革命。这场革命的关键不在于爱因斯坦意义上的科学内部的概念的变革,它真正的贡献在于要开创一种人与自然新的关系,一种新的科学概念,一种科学与人文维系着高度统一的概念。没有这样的概念,人类的整个文明是无法持续的。要回到对人的重新思考。翻开 20 世纪的科学史,在它的后半叶,正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非线性科学的出现。当然了,今天的非线性科学是不是能够担当我所说的这样一个任务,也很难说,毕竟一场伟大的革命不是几十年的任务,也许需要几百年。就算近代科学吧,从培根时代开始到牛顿时代为止,也近三百年。一种新的人类生活方式的出现,必将改变我们旧的知识体系。我们知道,哥白尼革命、牛顿力学的出现,使得从前的自然知识体系基本上都变得无效。但是,爱因斯坦革命并没有使牛顿力学无效。说到量子力学,曾经有一个笑话:量子力学靠的是实验,那实验靠的是什么呢?实验靠牛顿力学来描述,因为实验结果总是一个宏观现象。那么牛顿力学是怎么回事?牛顿力学被量子力学否定了。(笑)这是一个怪圈,一个矛盾。这个故事是说,在物理学意义上,量子力学、相对论都没有逃脱古典科学的框架。今天的非线性科学应该说也没有逃脱,特别是在今天的科学家笔下是没有逃脱。

但是,我愿意对它做一个引申:非线性科学必定要引向一个新的科学传统,一个新的科学范式。是什么范式呢?这个范式是不是完全新的呢?也不一定。我把这个范式称之为“博物学传统”。我们知道,自希腊以来,科学上有两大传统,一个是所谓的数理科学传统,一个就是博物学传统。今天我们讲的都是数理科学传统,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谈到博物学传统。但是,在古老的文明中间,在前哥白尼的西方文明中间,博物学传统一向是人类自然知识的主体。博物学,英文就是 natural history,就是自然史。在中国、印度、埃及等等,都有非常丰富的博物学知识。比如我们中国讲的物

候学知识、气象学知识,都是博物学传统。我们小时候学的“看云识天气”,这就是非常宝贵的博物学知识。但是,在近代数理科学一统天下的时代,博物学被认为是不怎么科学的,到今天为止,博物学传统仍是受到歧视的。但是我们知道,博物学传统也诞生了伟大的人物,如中国的李时珍,在西方近代也出现了像达尔文这样的伟大的博物学家。达尔文的进化论完全属于博物学传统的。可是博物学传统今天是受到歧视的,诺贝尔奖中没有生物学奖而只有医学与生理学奖。为什么强调生理学呢?因为生理学从属于数理传统,数理传统是近代科学的主流传统。从哥白尼、牛顿到爱因斯坦,都是如此,光凭自己的脑袋就可以指点江山。博物学家并不这样,它必须奔走于田野山川之中,必须去倾听自然的声音,亲近自然。我们知道,有一个叫麦克林托克的女生物学家,198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她的研究方法就是博物学的方法。她发现了基因转座现象,30年代就发现了,但由于她的方法不为主流的科学家所认同——她是通过玉米实验得出来的,对玉米的观察非常细致,她经常说,她能听见玉米的悄悄的话语声,她能理解玉米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但她不是一个实验室型的科学家,所以一直没有人理她。直到基因转座现象被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重新发现了,人们才意识到她原来早就发现了。(笑)所以到80年代才授予她奖金。可见博物学方法一直是被忽视的。

与不同的方法论相关联的是对生命的看法。生命科学本质上研究的是什么?是生命的尸体还是活体?是研究生命的碎片还是研究生命的整体?实验室里搞出来的东西究竟是不是生命?什么是生命?现在通常的回答会说,生命是细胞呀、发育呀,实际上都可以归结到数理传统上的东西,是方程,是方程所规定的东西。这里使我想起芝诺悖论中关于快跑者追不上乌龟的论证。柏格森说得好:你芝诺之所以能够得出运动是不可能的结论,是因为你总是通过对一个静止东西的分析来证明运动,这怎么可能呢?你不能用对运动的轨迹的分析代替对运动本身的分析。举这个例子,是

要说明生命问题,生命是什么。你以对生命切片的分析代替对生命整体的分析,你以对死尸的分析代替对活人的分析——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就在这里。我们首先是把人看作是躺在手术台上的东西,当然这个东西你可以随便割呀、切呀,反正他也没意见。可是,人终究并不是一个死东西,因此,今天医学中出现了大量的伦理学问题。前不久,有一位年轻的姑娘把医院给告了。她去医院体检,医生说让你躺下,就招了一批学生来看,(笑)现场上课。这里表现的就是伦理问题。生命本来是有尊严的,它的意义在哪里?从前为科学而献身被认为非常高尚的行为,牺牲我一个,拯救全人类。可是,这样的献身行为在伦理学上该怎么辩护呢?作为一个个体,他的身体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为什么要为了全人类把他牺牲掉呢?康德说过:什么是伦理呀?伦理就是绝对律令呀!没有任何理由地把人作为目的。比如说,一个死刑犯,明天要枪毙了,可是今天掉到水里了,爱因斯坦正好路过这里,再比如说,他明天就要发现相对论了(笑),那么现在他应该不应该跳下去救这位死囚犯人?我们还可以说得极端一些,他如果下去救的话,他一定会死,他应该不应该救?按照康德的意思,如果遵从伦理的绝对命令的话,那是应该下去救的,这才会现出人性的光辉来呢。由于伦理要求一种绝对性,所以是不能讲价钱的,不是计算出来的,科学缺乏这个维度。所以爱因斯坦本人一再说,真正对人类做出最大贡献的,不是那些科学家,而是道德的创立者们,比如释迦牟尼、耶稣和穆罕默德。他总是告诫学自然科学的青年人,不要忘记,为人类造福才是第一要义,永远不要为了炫耀自己的聪明才智而忘记这一点。

时间到了,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推荐 本人审阅

倪梁康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理念人 ——一项哲学的考察

[2001 年 4 月在华中科技大学演讲]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理念人”，它与当代人文学者的处境与出路的问题有关。如果我说这是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大家也许就会更清楚一些。我在这里提出的“理念人”概念，是参考最近翻译出版的一本书。它是美国学者科塞(L. Coser)写的，书名叫《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而我在这里实际上想对“理念人”这个概念做“一项哲学的考察”。

什么叫“理念人”？英文应该是 Man of ideas，这个概念其实和“理论人”差不多，无论是在它的褒义方面，还是在它的贬义方面。歌德在《浮士德》里把这种人称作“在绿色的原野上吃枯草的动物”。

科塞的这项研究实际上说出了很多我想说的话，常常是一边看一边拍案叫绝，一边看一边掩卷长叹。但我仍然觉得不够，仍然在这里想“狗尾续貂”，做一个同类型的哲学考察。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科塞主要是集中于对西方现当代“理念人”的社会学研究。在我的定义里，近代是从笛卡尔、培根开始，一直到黑格尔（这是一个哲学的时代定义，此外还有法律学的、宗教学的时代划分）。在德文中，近代叫“新代”(Neuzeit)，指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从而有别于古代、旧代。现代则是从黑格尔、尼采开始的。科塞认为，“知识

分子”这个概念起源于 17 世纪,相当于笛卡尔这个时代,也就是近代。17 世纪以前的“理念人”或“知识分子”没有进入科塞的视域。他的理由是:“只有近代社会提供了制度化的条件,使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得以产生……他们是一种近代现象,他们是随近代史的开端而产生的。”我在这里并不想修正科塞的这个看法,而且我基本上也同意他把中世纪的结束看作是近代的开端,至少在知识和思想界是这样。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他说的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自我意识是指意识到自己),那么,难道没有自己意识到自己的知识分子就不是知识分子了吗?这个问题可以做一个类比,一个小孩出生了,他还没有自我意识。但你说他不是人吗?他当然是人。因此,具有“自我意识”和没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自觉的和不自觉的知识分子,都是知识分子。直截了当地说,即使我们承认具有自身意识的理念人是产生于近代以降,我们也不应该否认一般意义上的理念人(或者说,没有自身意识的理念人)要年迈得多,例如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就已经可以发现他们的身影。当然,说了半天,这实际上只是一个名称的问题,如果把科塞的这本书改作《自觉的理念人》,那我和他没有什么分歧。我与他的根本分歧在于这样一个问题:智者是否是知识分子的鼻祖。

什么是智者?智者是一些与希腊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人同时代、甚至早于他们的思想家,如普罗塔哥拉便是智者学派的代表。罗素说,智者大致就是我们现在的“教授”。但后来很多人把他们称为“诡辩论者”。

真正需要修正的是科塞的这样一个观点,即智者是知识分子的远祖。科塞并没有(也无法)对“知识分子”做出严格的定义,但“知识分子”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有知识的人”,这在科塞那里是可以确定的。此外,“知识分子”与“理念人”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在他那里得到明确的表达:“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总的说来,这个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或理念人的基本特

征应当在于:从肯定的方面说,他们是为理念而生活,或者说,为理想(Ideas)而生活;从否定的方面说,他们是不切实际的、不问实在的。理念人的长处和短处都在此。科塞在这本书的首页引了朱利安·本达的一段话,可以算是经典:“学者全是这样一种人,他们的活动本质上并不追求实用目标,他们是在艺术、科学、形而上学思考中,简言之,是在获取非物资的优势中寻求乐趣的人。也就是以某种方式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

而从理念人的最基本特征上来看,理念人的源头与其说是智者,不如说是哲人(哲学家)。智者和哲学家,在希腊人那里只有一字之差,希腊人把哲学家叫做“爱智者”。两者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他们的禀性却大相径庭,而且他们的根本差异恰恰在于他们对于理想和现实的理解。

我们今天对智者的了解大多是通过哲学家,如柏拉图的《智者篇》,也就是通过他们的永恒对手来了解他们的,所以对智者的批评和介绍肯定带有主观的色彩,肯定是不够客观公允的。智者中有许多人是有哲学思想的,但智者总体上被公认为是“教人以各种实用技术的人”,当时主要是教人以辩论术,“以及有助于这种技术的其他一切知识”,这大概是无须质疑的。哲学家就不是这样,他不教技术。古希腊是一个民主国家,它有一个相当于陪审员式的、多达 500 人的团体。如果有人犯罪或犯了错误,其他人来告状,他就要在这 500 人面前申诉,500 人来听,然后表决。我说你偷了我的东西,我要证明;你说你没有偷,你要反驳。这 500 人最后表决,251 个人认为你偷了,你就会受到惩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苏格拉底就是以 360 票对 140 票而被判处死刑。这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为自己辩护,否则你的命就不保。智者说,我来教你辩论的方法,可以让你做了坏事而不受惩罚。因此智者学派通常也被称为“诡辩论学派”。柏拉图《智者篇》的最后结论就是:智者的特征在于,“一种暧昧的玩弄语词——老实说,可以指出为真正智者血脉渊源的,就是如此”。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还提示说:真正的

智者精神体现在：他们认为，一种意见可能比另一种意见更好一些，但不一定就因此更真一些。以后的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席勒便把自己视为智者的弟子。智者们追求的不是真理，而是实用。因此，现代的哲学家罗素以及迪尔凯姆都认为实用主义是智者的现代形式。实用主义企图破坏的是对真理的膜拜，所以它和智者派比较接近。智者派并不否定一切真理，只是说如果有真理，那它必须是有用的。举例说，在辩论的时候，你说你没有杀人，但别人充分地证明你杀了人，哪怕你自己知道你没有杀人——这是真理，但它没有用，你还得被斩首。如此等等。由此我们可以确定，智者和实用主义者都是一些关注现实、有现实意识的人，只是前者的名称更具有隐蔽性。

哲人的精神恰恰相反，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念人”。科塞在讨论知识分子的特征时，也特别提到他们的好奇心。理念人是好奇的。他说，知识分子的好奇心也许不比别的人多，但他们的好奇心被凡勃仑确切地称之为“闲情逸致”。这个好奇心不是指街头巷尾的张家长李家短，打听别人的隐私，它是另外一种好奇心。

科塞对学者“好奇”的定义所依据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的一个说法。其实对这种好奇心，哲学家早就有过解释。除上面提到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外，希腊哲学的另一个代表人物亚里斯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一书中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从早期的这段历史来看，也可以明白，这类学术不是一门制造学，不是一种工具。古往今来的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该起源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哲学产生于惊异。他还强调，哲学被称为真理的知识，理论的目的在于真理，实用知识的目的在于功用（所以大家要问我，哲学有什么用？我会说：没用。古人曾说，无用之大用。海德格尔也说，最没用的东西很可能是最有用的东西。——这或许有点自嘲）。显然，亚里斯多德把哲学看作是追求真理本身的理论，而不是有用的技术。这个传统也被看作是希腊的基本精神，日后世人“言必称希腊”的做法便植根于此。这里暂且不去考虑这种做法应当被褒扬

还是应当被鄙弃。季羨林先生曾考察过“希腊人一只眼”的说法，它便是指希腊人的理论精神。至于希腊人是否没有第二只眼以及中国人是否一向就具有两只眼？这是须待详考的观点。这里不再妄谈。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明白了，科塞所说的近代知识分子，即有了自身意识的理念人，他们的祖先不是智者，而是哲人，即一味地追求理念、不问实际的思想者。这个观点在我所研究的现象学中也得到了继承。比如在胡塞尔眼中，理论是处在希腊传统中的西方哲学的特殊标记，理论的观点在希腊人那里有历史的起源。人类从原先自然观点向后来理论观点的过渡，意味着人类思想的进步。也许在人类 2500 年的历史中，这是特别值得肯定的进步，即由自然的观点向哲学观点（理论观点）的转变。当时哲学和科学还没有分开，在亚里斯多德这里，两者是融合的。一直到近代，科学才有了分工，这也是导致现代理念人和知识分子困境的原因。在当时的其他文化中，像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都出现了一种对世界的普遍性的探索，都想问世界究竟是什么。

但只有在希腊人那里，我们才发现一种本质上的新型纯粹理论观点中的人的生活习性和生活兴趣。所以胡塞尔说，理论观点构成了希腊哲学和所有其他各种东方哲学的一个特征。需要说明的是，胡塞尔在这里并没有贬低东方智慧，因为他同时强调，这些智慧应当“受到同样的关注”（而且在我看来，希腊文化在当时更多地属于东方文化圈，只是在文艺复兴之后才更多地打上西方的烙印）——实际上我始终认为，文化之间的差异是不应当用“高”、“低”来比较的。每当有人这样做时，他往往是把“文化”概念与“文明”概念作了混淆。

胡塞尔将这种新型的理论观点的出现看作是对原初人类生活于其中的自然观点的根本改变（Umstellung）。原来我们是处于原始状态，现在我们的观点改变了。他认为这种观点的改变和人具有的惊异、好奇本能有关。在术语上，胡塞尔说的惊异就是好奇，

或者说好奇导致了惊异,导致了哲学的产生。

这是对人类的基本情绪的研究。最古老的西方人和中国古代人的基本情绪是否有所不同?如果是不同的,那么是不是这种不同导致了我们的两种文化或几种文化的不同发展,这是很大的哲学问题。胡塞尔认为在希腊人那里,一个基本情绪就是他们的惊异感,他们会把别人认为平淡无奇的东西看作是非常令人吃惊的东西,感到莫名其妙的震撼。正是这种惊异、一种超乎生活兴趣之上的惊异,使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兴趣坠落下去,成为较低的一个层次。

这种观点初看起来跟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讲的不一样。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专门用一章谈“惊异”与“好奇”的区别。他把“好奇”定义为一种“贪新鹜奇”,不是为了把捉,不是为了有所知地在真理中存在,而只是为了自己能放纵于世界,因此他明确地强调:“好奇(Neugier)同惊异地观察存在不是一回事,同惊异(Verwunderung)不是一回事。”

我说“初看起来”两个人好像是有矛盾的,因为实际上这只是表面上的差异。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术语上的限定:“好奇”属于自然的观点,“惊异”则属于哲学的观点。这样,一方面是自然观点中的“好奇”,一方面是哲学观点中的“惊异”,它们成为划分这两个境界的根本标志。在这个划分上,胡塞尔与海德格尔没有根本的区别。区别仅仅在于,胡塞尔相信好奇可以转变为惊异,海德格尔则没有这么说。实际上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都或多或少地属于拒绝“好奇”的传统,在西方哲学史上有很多否定“好奇”的例子。这种传统不仅从一开始就表现在古希腊文化中,例如在希腊神话中,潘多拉出于好奇而不顾禁令打开宙斯所赠的盒子,放出了里面装着的人间一切祸害、灾难和疾病,人类从此开始遭灾受难,只是在盒底留下了一个“希望”;而且也存在于希伯来文化中,例如夏娃出于好奇和受蛇的引诱,与亚当一起偷食了禁果,从而有了辨别善恶的知识,受到上帝的惩罚而被逐出伊甸园。

无论如何,在哲学史文献中,把纯粹的理论兴趣和惊异联系在一起的做法不是一个偶然的奇想,不是把两个东西随便地拿在一起,就随便解释说你们两个有联系,然后解释说,哲学就是这样产生的。这里的确有其内在的联系。大家所知道的陈景润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并不考虑所学的东西有什么用,他纯粹是出于好奇,出于惊异。

虽然说同样是出于一种惊异,理念人与理念人之间还是有区别的。下面我们谈谈理念人的划分。科塞也清楚地看到这点,他把理念人或知识分子大致划分为两类,或者说,具有两种倾向的人。他说,一种人可能更多地是从事游戏、戏谑(playfulness),另一种人则是最真诚的先知。(维特根斯坦说,我们现在谈的什么思维什么哲学,无非就是游戏。)就像下围棋,下围棋有什么用啊?没有用,就是好玩儿——当然职业棋手例外。还有网上游戏,这也是好玩。这是第一种人,是游戏者。这种人很像艺术家,他们沉醉在纯粹的知识活动中,感受思维的娱乐。不知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种娱乐,我有这样的体会。有时看一篇在别人看来是枯燥的文章,而我从中感到了思维的乐趣:看到他的思路、他的想法,看到他在哪里欲言又止,再看到他在哪里举足不前——这都是思维游戏的乐趣。这时我会觉得很幸福、很惬意。

这些人是一群康德式的人物。康德在他生前没有发表的《心理学讲座》一书里,把生活和与之相关的乐趣分为三种:一是动物性本能的生活,如吃喝拉撒、生儿育女;第二是比动物稍微高雅一点的生活,人的生活;最后一层是精神生活,与此相关的是精神乐趣。他是通过反思而从理念中得来的,并且是从纯粹理性概念中得来的。因此,“理念人”也是“反思人”。康德认为,它和最高程度的行为与生活相结合,也就是精神自由的境界——在你自己的精神王国里任意驰骋。

康德的一生,可以看作是典型的德国人的一生:呆板,准时,不合时宜,甚至还有点怪癖。康德每天下午散步,邻居可以按他固定

的散步时间来对表。他一辈子没有离开他的出生地哥尼斯堡一步,但是他讲的世界地理课,却可以非常详细地介绍世界各国的生活,甚至一个城市哪条街上可以吃到什么样的牛排,他都知道。在普通人看来,他这一辈子够惨的了:50岁还没有得到教授的位置;也没有结婚,没有子女。但这些并不妨碍他80岁临终时说:“好!”他自己觉得这辈子过得很好。也正是在这个并不显眼的一生中,康德改变了人类思想史的内涵。在康德以后,人类看世界、看自己就要用一种不同的眼光。这就是康德的伟大!理念人的伟大!

类似康德这样的哲人在哲学史上还有很多。康德只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位而已,甚至都很难说是最著名的,因为另一位大哲学家笛卡尔也是这样的一种性格。笛卡尔甚至认为世界和生活就是一个理念。他是那么的理性和平静,甚至认为他所掌握的医学知识可以让他愿意活多久就活多久。他的确是非常地理想化,是一个活在理念中的人,可惜现实只让他活了53岁10个月又11天。康德也很难说是最极端的,例如希腊化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就要比他更理念化:按照他最重要的学生和传记作者波尔菲里斯的记述,普罗提诺甚至为自己“在身体中”而感到羞耻。理念人对现实的贬低在这里表现为一种对不得与现实相接触的身体和感官的蔑视和鄙弃,因为它阻碍了他达到理想。这是第一种“理念人”。

现在来看第二种“理念人”。他们更多地是以责任意识为主,极为严肃地看待责任、理念,认为终极的理念远远比他们的实用价值更重要。在这个类型中,“理念人”的另一个特征即“批判精神”无可遏制地展现出来。为什么理念人必须要有批判精神?因为他没有办法,他看到的是理念,现实永远不能等同于理念,所以他永远对现实不满意。科塞说,“理念人是一些另有想法的人,是精神生活态度中的捣乱分子,是特定意义上的异化分子,是社会生活中的另类。由于永远不能和别人一样,因此一般公民对他们感到迷惑不解,而且还觉得他们精神怪异。”科塞还说,“知识分子会严厉

地批评他们的社会,因为他们献身于他们的职责,他们会根据这个社会的理想批判社会现实,他们可能会根据从社会所宣称要奉行的价值的应然出发去批判、攻击实然。”我从这里看到科塞所指明的一个事实:理念人的批判性不是一种为批判的批判,不是一种在反对的意义上的批判,就像今天的“社会批判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所体现的那样。理念人的批判应当是本然所使,是对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或实在与理念的差距的不满。这和我们在马克思本人那里所看到的状况相似。

如果康德、笛卡尔、胡塞尔是前一种类型理念人的代表,斯宾诺莎、马克思就是后一种理念人的象征。因此可以说,“批判精神”就包含在理念人的概念本身之中,但并不一定包含在如今人们通常理解的“知识分子”概念之中,除非我们把“知识”概念局限在观念知识的定义上。一切在上述意义上的社会启蒙家,比如尼采、叔本华、海涅、鲁迅、萨特、罗素等,都带有某种程度上的理想主义,或者说理念。

我把这两种理念人分别称为“思想激情型的”和“责任焦虑型的”。我不想回避这两种类型的理念人连同其理念主义或理想主义的短处,而且它们常常是对哲学和哲学家来说是致命的短处。“致命的”例子之一,苏格拉底便是为理想而死。他很能干,谈起来滔滔不绝,但他并不是诡辩型的那种,他是启发型的,是助产士。他顺着你的思路,挖掘你思想的致命点,挖掘你思想深处的矛盾。雅典判他死刑,他的学生安排好了让他逃走,他偏不走,以死来坚持他的理念。还有更多的例子。阿基米德在罗马士兵冲进他家里的时候,他还在画他的圆呢。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别碰我的圆。”几何的图形理念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还有不算太“致命的”缺陷。以当代的现象学家为例,胡塞尔的思维在总体上是“非政治的”、“非社会的”,或者一言以蔽之,是“非现实的”(胡塞尔是犹太人,第三帝国的时候,有很多犹太人被关进集中营,他也非常危险。但他当时很有名,所以纳粹迟迟没有动他,只是禁止他出入大学图

书馆和教学楼,对他实行禁锢。但他丝毫不为所动,把收到的学校禁令反过来,在上面继续写他的手稿)。海德格尔和萨特在政治眼光方面则已经有令人吃惊的缺陷,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许多人都知道所谓“海德格尔事件”。“事件”(der Fall)这个词在德文中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发生的事情,一个是堕落。因为他在第三帝国时期做了半年的校长,并与当时一百多名德国教授联名写信效忠希特勒。在校长就职演讲中说,你们要听从元首,只有元首的话才是真正的真理。而萨特实际上也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无能的人,他一会儿跟苏联好,一会儿跟中国好,他去造资本主义的反,后来又觉得这样不行,反反复复。大家觉得这也是哲学家吗?怎么一点眼光都没有?一点政治远见都没有?

我的导师黑尔德以此为例指出,“这些缺陷的起因最终还要在哲学的成见中寻找,是这些成见挡住了他们对政治现象的目光”。理念人总有一个理想,他的理想常常会挡住他对现实的目光。所以海德格尔最终承认,哲学将不能引起世界现状的任何直接变化,哲学是无用的。伽德默尔曾写文章论述“哲学在政治上的无能”;恩斯特·图根特哈特也写过一篇文章论“哲学在今日道德困境面前的无助”。海德格尔自己最后说,只有一个上帝能够救我们。他对人类的未来非常悲观,我们人类自己救赎不了自己,救赎不了世界。这些批评和反应都体现了理念人在政治方面的短处。所以说,很难想象,如果让马克思去当德国首相的话,情况会怎样。但是列宁可以,列宁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人,他不是理念人。如果叫胡塞尔去当德国总统,也是个大难题。再往前追,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例子,柏拉图。他认为哲学家应该当王,哲学王嘛。他的那个“理想国”就是由哲学家组成的,一切都在理性的安排之中。他要实施的第一项措施就是把所有人的财产没收。结果他去实施了,他尝试了两次,在西西里岛上,都没成功。最后柏拉图是在人口市场上被人找到的,被当作奴隶在那里拍卖,后来被他的学生凑钱赎了回来。

前面我曾说,理念人在政治上常常是被看作没有用的,现在,我要进一步说,理念人在政治上的确就是没有用。大家如果愿意做理念人的话,似乎先要把从政的想法放弃掉。

陈寅恪先生在论述中国学术非理论特征时说,中国学术自古以来就是非理论的,没有希腊人那种理论化的特征。这种观点在学术界是占主导地位的。但季羨林先生并不十分认同,当然季先生有他自己的生活经历。他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认为西方人张狂了这么长时间,该轮到我們了。这种“河东河西说”,可能带有一定的民族感情在里面。比较客观地看,在中国整个学术发展史上,有理论的因素,只是理论的特征没有成为在中国学术中占主导的东西。所以,陈寅恪先生的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精彩:“中国古人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于此。”长处在于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这也是中国封建统治维持那么长时间的一个原因;短处则在于对时事之利害的观察过明,而缺乏博大精深之思。王元化先生曾要求,“为学不做媚时语”,做学问不要讨好时代;胡塞尔也说,人不可为了时代而放弃永恒,都是这个意思。陈寅恪先生说过,在他那个时代,就有很多学子千里迢迢到西方去学习,但恰恰没有去学西方认为最精深的东西。回国以后,他们有时候会有用,但是实用的东西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一旦实用的东西不再有用,他们便落后了。而一些博大精深的理论则具有长期效应。在这里,大家要思考一下,什么是真正有用?什么是短期有用?什么是没有用的?

现在我可以这样说,我前面所说的两种理念人,他们的永恒对手是以修改了的智者派形态出现的各种形式的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实用主义者并不否认思想的思辨价值。这一点,迪尔凯姆已经在他的《实用主义与社会学》中进行了证明。他指出,在实用主义那里,知识本质上是行动计划,因此设定了能够达到的实践目的。实用主义并不拒绝知识,只是把知识看作行动的附属;知识只为行动而存在。即使如此,实用主义仍然处在理念主义的对立面。

在这个理念人与实用人的对峙中,我不得不遗憾地说,理念人的命运至少在短期内注定是失败的。这也是 20 世纪的一个基本现实。我在《20 世纪:一个过渡的时代》的文章中曾感叹说:20 世纪的社会心理和时代精神就在于,哲学的功用乃至文化的功用受到了讨论,成为问题。这基本上是一个事实。但我在这篇文章中没有解释上述事实产生的原因,实际上我当时也没有弄清楚为什么社会心理和时代精神在 20 世纪的变化会如此偏向实用。前代哲人文德尔班讲过,“知识的金果只有在不被寻求的情况下才能成熟。”知识的金果你要把它长成的话,你要有耐心,但现在大家都急功近利,金果尚未成熟就把它摘下来。20 世纪为什么会这样急功近利呢?为什么会这样实用呢?而且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性的问题。

直到通过科塞的社会学考察,我才得以了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代社会被高度分化所导致的,知识分子或理念人处在纷繁多样的制度背景和大量制度化秩序的夹缝里。如今的理念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是学院派知识分子。像萨特那样的自由撰稿人纯属凤毛麟角。而学院制度在本世纪的变化为知识分子带来的主要是职业的压力和知识的门类化。科塞列举了许多不利于理念活动的潜在因素:时间的分配、学术专业化、学术产品的“用户”对专业技术而不是“全面修养”的需求。此外,还有学术官僚化的压力。我在这里还可以补充说,学术市场化的压力。所有这些,都已成为全球化的趋势。

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詹姆斯曾为“哈佛精神”自豪,他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高呼:“不可约束性是我们最骄傲的成果。”但实际上,实用主义的主张恰恰可以导致对理念人活动的最大约束。它如今已经体现在今天的学院制度中。不知道詹姆斯本人是否会对这个结果感到匪夷所思。

在上世纪初,我们还可以看到“形而上学教授”这样的头衔,西班牙的思想家加塞特便在马德里大学担任这样的教职。在世纪之

交的今天,这个称号听起来已经有些耳生了。如果我们今天在学校设立一个形而上学教授的位子,大家肯定会笑掉大牙。但是100年以后或50年以后,哲学教授说不定也会让人笑掉大牙呢!哲学?哲学这东西有什么用啊?还要当教授?!所以科塞说,“理念人屡遭拒绝和蔑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认为这是人类文化的一个悲剧。就像雅典社会的一匹马——苏格拉底把雅典比喻成一匹马,他说他是不受欢迎的,他是马背上的马虻,他不断地刺打这匹马,结果被马踢死。但是,缺少了苏格拉底式的马虻,是苏格拉底的不幸,也是雅典的不幸。

科塞说,“缺了知识分子,现代文化几乎是不可想像的。如果让他们的远亲、脑力技术人员和专家抢占了知识分子现有的职位,现代文化很可能会因僵化而消亡。没有知识分子对永恒的往昔形成的陈规陋习和传统发起挑战——甚至当他们维护标准和表达新的要求时——我们的文化不久就会成为一种死文化。”

我深信他是有道理的。

谢谢大家!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推荐

录音整理:张彦武 周虎城 本人审阅

【编者絮语】诗人海涅曾说过,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领袖罗伯斯庇尔只不过是康德的一只手而已。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对“理念人”在历史上的巨大贡献的一个补充说明。众多的“理念人”在世的时候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不为社会所接受,是显而易见的。但当今天的人们以一种急功近利的方式、以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知识及其生产者时,恐怕连产生“理念人”的土壤也受到了破坏。这或许既是“理念人”的不幸,也是当今世界的遗憾。

大学与教育

杨振宁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 诺贝尔奖获得者

科学技术、社会发展与未来教育的改革

[2000 年 8 月在西安交通大学演讲]

这是我几十年来所参加的最盛大的科学工作者会议。不过最有意义的是,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现在全国上下已经掀起了西部大开发的热潮。我在美国住了 50 多年,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政策的规划、方法以及运作程序有一些了解。参加这个会议,使我对中国在重大的科技战略政策上的规划、方法和运作程序有了更深的体会。我太太杜致礼是陕北人,她深深知道历史上陕北的困苦情形。我自己也在 1972 年到过延安,亲眼见到过当地贫困的情形。今天,中国提出开发西部的口号是非常及时的。我谨希望全国,尤其是陕西省,能够在这个战略思想指导下取得巨大的成就。

200 年以前,富兰克林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人类的知识将会大大地增长,今天我们想不到的新发明将会如雨后春笋出现。我有时几乎后悔,我出生过早,不能知道将要发生的新事物。”我认为这句话讲得非常得体。因为大家想一想,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包括火车、轮船、飞机、高楼、升降机、自来水、电灯、电视、手

提电话、无线电、计算机、光缆、激光、胰岛素、器官移植、放射性元素、原子弹、卫星,等等,等等,这些都是 200 年以前所没有的。200 年来,工业的发展大大地增强了人类生产力。仅举一例,200 年以前世界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 80% 以上,今天美国农业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 1% 到 2%。这 1% 到 2% 的农业人口不但能养活美国的几亿人口,而且还可以大量地出口粮食。最近 30 年,这个发展的速度又大大地加快了。一年以前美国的《财富》杂志讲了这样一句话:“这 30 年以来新成立的科技公司的总资产已经接近了 1 万亿美元。”这个财富的累积速度不但是 200 年以前所不能想象到的,我想 20 世纪初的人也无法想象。

总体上来考察这些发展,我们就会发现,20 世纪后半世纪全世界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是科学、工业、经济这三个方面连锁互动的结果,而且这种发展的趋势到 21 世纪还会有增无减。在 20 世纪的最后的 50 年,为什么发展的速度会大大地加快呢? 这个原因当然很复杂,这么大的问题也不可能只有一个简单的回答,不过,我觉得还是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科技的发展,尤其是雷达的发明和原子弹的研制成功,对二战的结果有着重要的作用。由此,罗斯福总统深刻地认识到科技的发展对于战争的影响,以及战后科技将会对生产力、工业、医药等发展产生巨大的作用。于是,在 1944 年他就邀请有关专家写一个报告,专门讨论战后应当怎样发展美国的科技、教育。这个报告后来就成了一份非常著名的科技报告。美国在战后创建国家实验室、自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后来各国政府都借鉴美国的做法,也设立了类似的科研机构和基金会。这一系列的措施与今天全世界科技发展速度的大大加快有直接的关系。

第二,科技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变得更加明显。这使得各个大的工厂、公司都增加科研的经费,这在美国是非常显然的。美国的 IBM 等大公司在战后的 50 年来,都大大地增加了科研经费。

除了这些以外,学术本身的发展也直接加速了工业的发展。这就是我下面要讲到的另外两个原因。

第三,物理学在 20 世纪上半叶产生出来的量子力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量子力学的发展,使得人类了解而且能够控制能源、电子、原子和分子。这个了解、控制和利用导致了半导体工业和计算机工业的产生和发展,近年来又导致了信息工业(information industry)的发展。凡此种种,使得很多人认为,20 世纪是物理学世纪。我觉得这一说法是对的。

第四,生物学也有了长足的进展,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进展是 1953 年沃森、克里克发现双螺旋结构。我们看他的那篇文章的末尾,有一句很简单的话,“这个双螺旋结构也许能解释遗传为什么能够继续下去”。这句话影响到此后 50 年的生物工程的发展。因为生物学对人类健康有着重大的影响,所以很多人认为——而我也完全同意,21 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

科技的发展除了加速工业的发展以外,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这就是从基本的科学原理到转变成为工业产品的速度大大加快了。1820 年,奥斯特发现,原来电和磁互相有关联,电可以产生磁。这可以说是开始涉及电机原理。1886 年才制造出了电机。这中间所花掉的时间是 60 多年。真空管的发现是 1882 年,到了 1915 年才有了第一次的应用,这中间花了 33 年。赫兹在 1887 年根据麦克斯韦方程式发现了无线电,第一次无线电的应用是在 1922 年,这其中花了 35 年。X 光是在 1895 年由伦琴最初发现的,第一次的应用是 1913 年,这其中花了 18 年。雷达,1935 年发现其原理,1940 年有成品,这中间只有 5 年。原子核的链式反应是 1939 年由哈恩和斯特拉斯曼发现的,1942 年 12 月第一个原子堆制造出来了,这期间只花了 3 年。而半导体在 1948 到 1951 年这 3 年实现了由原理到产品的转化。这很清楚地显示,科技发展从原理转化为产品,也是在加速发展。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全世界对于科技的发展与可能形成的产品的效益之间的关系有了深入

的认识。30 多年以前,摩尔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变成了后来的“摩尔定律”,是说芯片的容量 18 个月就增加一倍。比如说,1971 年一个芯片上面刻有 3 000 个晶体管,到了 1998 年就可以有 10 的七次方个,也就是有 1 000 万个晶体管。这说明整个工业的前沿发展得非常快。这当然也引导出来一个问题,为什么芯片的容量能够如此长期地持续地成倍增加?实际上,这 30 多年来,许许多多的文章都在预言,认为摩尔定律已经不可能再持续下去了,因为有种种的困难。实际上也的确有很多困难。可是后来总还是能够克服这些困难,使得摩尔定律到今天为止基本上还保持着正确性。其原因就是因为有不断出现的多种新方法、新技术,也就是有不断的创新。这种创新的精神是摩尔定律能够到今天还保持正确性的主要原因。而我们相信,创新的精神也是今后几十年人类的知识发展和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这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就是新的事物将要层出不穷。这层出不穷的事物比过去 100 年还要来得快,人类的生产力将更加提高,而且速度更快,自然科学将更加蓬勃地发展,科学、工业、经济的连锁发展将持续下去。我想这在今后的 20 年、30 年是一定要发生的事情。

我们能不能对于以后的 20 年、30 年全世界的发展作一些预测呢?根据上面讲的高速发展,我想这是很难预测的,而 60 年、70 年以后整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更是无法想象。假如你问 20 世纪初的人能不能想到 20 世纪全球的发展,我想很难。但是对今后 30 年的发展轮廓作个描述,我相信是可以做到大致不错。

第一点,是全球化将继续下去。全球化是最近 20 年来的一个大的趋势,虽然曾经有人反对。我想,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方向。

第二点,全世界的经济的发展将以以下几个工业为龙头。一个是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它的应用能够深入到一切领域。我觉得它还没有发展到尽头,还会有更多的新的广泛应用在以后 30 年发展出来,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大的趋势。另一个是通信工业,

这是一个很年轻的工业,它所创造出来的财富在过去的 5 年中是有目共睹的,我想这还只是刚开始。第三个是生物工程。这是以后 30 年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动力,我想这个我不会太错。

另外一点也许不是那么显著,可是你想象一下,你就会觉得是很明显的,这就是学术本身大概会有显著的改变。因为专业将越来越多。为什么专业将越来越多呢?第一,新的知识方向将越来越多。计算机技术、生物技术、信息工程都会发展出许许多多的新的方向,这些新的发展方向是我们现在根本不可能想象的。第二,人类累积的财富在高速地增长,它所带来的多种投资的可能,同时全球化带来多种新活动,而这些新活动都需要新知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开发”这个观念过去曾经是个梦,但在今天它在全世界占有重要位置。从这个观念中会产生出很多的学问,而很多的学问就会产生很多新的专业。第三,因为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增长,所以人们消费的资源大大增加,同时全球人口数量也在持续增长。由于这两个前提条件,能源、环保、资源都将成为大问题,这些大问题也将会引导出新学问、新专业。另外,生物工程的发展将会引导出许多道德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而这些问题也会引导出许多新的专业。我举一个例子。一年多以前,有些生物学家说,我们相信到 2060 年,人类的平均寿命将增加到 150 岁。你可以想象到,人活到 150 岁,对于全球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有多么巨大!150 岁,这个讲法也许太乐观了一点,不过根据生物工程方面的进步,人的生命肯定会比现在延长许多。这肯定会引导出生物工程以外的许多新学问、新专业。

因为这个缘故,我想以后 30 年将会出现一个重要的新的现象,就是教育体制必须及时改变以适应新的需求。这又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否有人对于这个问题采取保守的思想,我想是不可避免的。新的学问和旧的学问之间有一个区别。我给大家讲一个事例。1921 年 4 月,爱因斯坦第一次到美国,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很有名了,因为在两年多以前,他的广义的相对论被实验观测所

证实,这使得他一跃成为世界最知名的科学家。所以他在美国的每一个地方都受到了盛大的欢迎。大家知道世界各个地方新闻记者都很厉害。他到波士顿的时候,记者便给他一张纸,那纸上面有大发明家爱迪生所写的一系列的实际问题,包括了如谁发明了对数、哪一个美国城市制造了最多的洗衣机等问题。新闻记者倒不是特别地要难倒爱因斯坦,而是因为这些题目是爱迪生在招募员工的时候所用的题目,新闻记者要求爱因斯坦来回答。结果呢,爱因斯坦不及格。(笑)他的知识应该是很广的,但与爱迪生所希望他的工作人员所熟知的知识是不一样的。我举的这个事例就说明这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而今后 30 年,整个世界的知识产生得更快,而且是从爱因斯坦的传统知识渐渐地向爱迪生所要求的知识转移。这个事情你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但是我想它是不可逆转的事情。将来会有更多更多的知识产生,与传统的知识好像是没有关系,可是这些新的方向是社会必须提醒青年人加以注意的。

讲到这点,当然就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改变教育体制才能适应新世纪的新事物?这是一个大的题目,而且也没有一个唯一的答案。每一个社会因为它的历史背景和传统不一样,对于怎样处理这件事情也会有不同的回答。我想,尤其近几年来,大家都知道,就是美国在如何处理新的事物方面,好像特别成功。在 80 年代,有一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好像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美国要被日本打倒,可是到了 90 年代完全改变了。因为日本至今还没有从经济发展的困境中走出来。而美国,尤其是在发展信息工程后,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使全世界为之瞩目。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美国还有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美国的中学教育所教育出来的学生在国际的比赛中,不管是语文还是数学,常常是倒数第一或倒数第二。这个事情并非只是近一两年的事,已经有了好多年了。可是最近两年,出了一个新的说法,认为也许美国经济之所以这么成功,正是因为他们培养出来的中学生考试不及格。(笑,掌

声)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呢?我想是有些歪理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当然也不是完全有道理的。这值得大家仔细研究。美国整个社会结构、整个教育政策比较笼统,所以它比较容易向事物的新的方向发展。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如果想去了解一个方向的发展,要得出什么结论,首先要看你讨论的问题是在哪一个领域。对这个问题我曾经思考过。我觉得美国的教育哲学和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包括整个亚洲地区的教育哲学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有很多方面,我只想举出其中的几个方面。美国的教育哲学鼓励学生具有广泛的兴趣,亚洲的教育哲学比较注重狭窄的专业;美国的教育哲学比较注重不规则的训练,亚洲的教育哲学着重扎实的操练;美国的教育哲学要学生东找西凑,亚洲的教育哲学要求学生按部就班;美国的教育哲学希望训练出来的学生充满活力,亚洲的教育哲学希望训练出来的学生安安静静,能吃苦耐劳;美国的教育哲学注重培养勇敢精神,亚洲的教育哲学训练出来的学生比较胆怯;美国的教育哲学训练出来的学生充满自信心,亚洲的教育哲学训练出来的人常常缺乏自信心。傲慢和谦逊、自大和谦虚,等等,这些总体讲起来都是美国的教育哲学和亚洲的教育哲学对于教育方向着重点不同的结果。我认为美国教育哲学和亚洲教育哲学都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我觉得尤其是面临以后 30 年整个世界新事物和新的国际形势的继续发展,亚洲的教育哲学里所缺少的东西应该从美国的教育哲学中去吸取,使得中国的下一代人能够更多一些进取心,能够更活跃地面对 21 世纪所带来的挑战。

谢谢!(掌声)

中国教育电视台供稿 录音整理:戴辉

【编者絮语】本篇演讲对《我的治学经历和体会》(见本书第 1 卷)中关于中国教育哲学和美国教育哲学的比较,作了进一步的深入论述。杨先生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课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本篇为杨先生在中国科协 2000 年年会上的演讲。题目为编者所加。

杨叔子 中国科学院院士 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是“育人”，非“制器” ——再谈人文教育的基础地位

[2000 年 12 月在华中科技大学演讲]

(一)

有件事我永难忘怀,这件事深深影响着我去进一步认识大学该怎么办。

1995 年,作为校长,我参加了我校某次“人文讲座”,听一位音乐家讲“严肃音乐”。他讲,交响乐、歌剧、协奏曲等等是“严肃音乐”。“严肃音乐”有两大特征:一是有主旋律,二是主旋律极富于特色。当时,我深为感动,如潮的往事,面临的现实,未来的发展,凝聚成为:大学有无主旋律?主旋律有何特色?

大学的主旋律是“育人”,而非“制器”,是培养高级人材,而非制造高档器材。是人,是活生生的人,人是有思想、有感情、有个性、有精神世界的,或者说,人是有“灵魂”的,何况是高级人材;而非器,器是物,物是死呆呆的,再高级的器材,即使是高档的智能机器人,也不过只能具有人所赋予的最复杂、最精巧的功能或高级程序,其一切都不可能越过人所赋予的可能界限这一雷池半步。我们的教育失去了人,忘记人有思想、有感情、有个性、有精神世界,

或者说,忘记了人有“灵魂”,就失去了一切。其实,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如此,都是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归宿点,以人贯串于各方面及其始终;何况是直接培养人的教育!是直接塑造人的思想、感情、精神世界的教育!是“灵魂”的工程!

大学主旋律的特色就是培养中国的大学生。这里,一是“中国的”,一是“大学生”。所谓“中国的”,我们大学所培养的学生应服务于中国,至少不应不关心中国,更不应损害中国;否则,就是在培养“六亲不认,唯利是图,有奶便是娘”的人,办这样的大学又为了什么?!所谓“大学生”,不是中小学生,而是“人材”,“人”就是不器的君子,“材”就是不器的大道,这种人材就是能不拘一格去创新的人材。大学、大学生不仅肩负继承、传播与应用知识与文化的历史重任,还应肩负发展与创造知识与文化的历史重任;否则,大学就办成中小学了,也就是说,可以不办了。概括地讲,大学培养的人材,一要能爱国,二要会创新。

归根结底,我们教育面对的是“人”,我们中国大学教育面对的是中国的高级的人材。忘了人,就忘了一切;忘了人文教育,就忘了人的思想、感情、个性、精神世界,从而也就忘了一切。教育就是人的灵魂工程,大学教育就是人的高级的灵魂工程。忘了人的灵魂,教育也丢失了自己的灵魂,后果如何,不言而喻。

(二)

人是世间第一个可宝贵的因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一点也没有过时;不但不过时,在今天,在科学技术如此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今天,更不过时,尤为紧要。人文教育具有基础的地位,亦即,在国家的发展与人材的成长中具有基础的作用,因为人文教育关系到——

1.民族的存亡:民族的概念主要是人文文化的概念,而非遗传基因的概念。基因只能决定是什么种族,不能决定是什么民族;没

有自己的人文文化,就没有这个民族。古代消灭一个民族,是从肉体上整体地加以消灭;近现代以来,消灭一个民族,完全可以从人文文化上加以消灭。“西化”的图谋者与鼓吹者,就是妄图将其他民族用西方文化予以融化,加以消灭,达到世界一统;这比用“分化”、比用“战争”等手段,更为阴险毒辣。中国、中华民族作为经历人类五千年文明史的风雨不仅没有消亡、而且历史从未中断的唯一的古老国家与民族,极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文文化的强大、稳固与绵延。季羨林先生分析与归纳得十分深刻,中国的优秀民族传统就是人文精神,就是:一是爱国,二是有骨气。现代京剧《红灯记》中男主角共产党员李玉和痛斥汉奸王连举:你这一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这就是从反面的讲法同季羨林先生的正面讲法相呼应;狗,走狗,就是不爱国;癞了皮,就是无耻;断了脊梁骨,就是没骨气。爱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有骨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2.国家的兴衰:民族兴,国家兴;民族衰,国家衰;民族灭,国家灭。什么是国力?江泽民同志指出,这包含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民族凝聚力。这三力中,关键是民族凝聚力,“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而民族凝聚力主要取决于对人文文化的认同。我国有句古语,叫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就是人文文化。这充分表达我国人民强烈的爱国有骨气的传统,兴国强国的志气。我国是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国家,历史表明,我国各民族彼此相互学习,相互交融,相互认同,逐步形成中华民族,组成屹立于东方的中国,经历坎坷险阻,坚不可摧。

3.社会的进退:社会的发展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两者不可缺一。没有科学技术,没有物质文明,就愚昧,就无知,就落后,就贫困,就挨打;忘却人文文化,丢掉精神文明,就异化,就空虚,就卑鄙,就无耻;而没有精神文明的物质文明,丢失人文精神的科学技术,就比愚昧、比无知更为愚昧,更为无知,更为可怕,就会大倒退。这正是《老子》所警告的:“福兮,祸之所伏。”事物走向了

反面。美国约翰·赖斯比特近期名著《高科技·高思维——科技与人性意义的追寻》(High Tech·High Touch: Technology and Our Search for Meaning, 1999 年英文版, 2000 年中文版)深刻指出, 正由于科技如此发展, 信息科技、生命科技如此发展, 人类更必须理智地追求人性。Touch 者, Meaning 者, 交往也, 接触也, 意义也, 人性也。是的, 丢失人文精神, 忘却人性, 忘却人之所以为人, 科技的发展必将导致人类社会一场浩劫, 乃至毁灭, 此决非言过其实。

4. 人格的高低: 人格如何, 是高尚、尊严, 还是低下、卑鄙, 这是人文教育的内核、人文素质的基础、人文精神的本质。“人而无耻, 胡不遄死?”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我国自古以来, 就将羞耻、将诚信、将人格作为人的精神尺度与标志, 作为对人的教育的关键。应该说, 对人的思想教育、感情陶冶、精神塑造有三个层次: 最基层, 人格; 中层, 法纪观念; 最顶层, 政治方向。毫无疑问, 政治方向是根本, 是灵魂, 一错全错。法纪, 是言行的标准, 是养成的规范, 是现代的“礼”, 无“礼”则乱,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然而, 最基础的是人格。没有人格, 政治思想无处生根, 无以为本; 没有人性的党性是不存在的。没有人格的政治思想, 没有人格的法纪观念, 只能是伪装自己欺骗他人的, 只能是假、冒、伪、劣, 只能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指鹿为马、指善为恶, 专用以整人、害人, 从不用以律己、省己。这种伪君子、这类反面人物, 古今中外, 莫不有之。“文化大革命”的最大损失与危害是什么? 是摧毁人格, 是摧毁我国优秀传统的人文精神, 是大搞民族虚无主义! 这一严重后果要用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消除。现在, 一切有远见的人都在呼吁: 要加强人格教育, 特别是加强对儿童与青少年的人格教育! 以优秀的人文文化去教育未冠者!

5. 思维的智愚: 现代科学研究证明, 人脑是一整体, 但又有左、右两个半脑之分, 它们的功能有差异, 与左半脑密切相联的逻辑思维同与右半脑密切相联的形象思维有差异, 与逻辑思维密切相联的科技活动同与形象思维密切相联的人文活动也有差异。然而,

这种差异,正需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相互渗透,相互协调,不同而和,浑成一体,这正是大脑各部分在自然进化中科学的分工而又科学的合作。而我们的教育决不能将这科学的分工变成反科学的分割,人为地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分割,文理分离,还进一步理理分离,文文分离,急功近利,越学越窄,越学越“愚”,这势必严重妨碍、制约、损害,乃至扼杀、摧残人的本性、个性、灵性、潜力及其思维的发展与创造性的发展。近年来,有的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左半脑储存个人毕生经验,是“个人脑”;右半脑储存人类 500 万年来所创造与积累的智慧与经验,是“祖先脑”。自古以来,人类都是依赖右半脑作为主导来生活的,这给予人类灵感、智慧、创意,右半脑的信息量是左半脑的十万、百万乃至千万倍以上。因此,右半脑的开发,人文教育的作用,其意义难以估量。当然,这决不是说,左半脑不重要,左半脑的充分运作才为右半脑的精彩表演提供了大舞台。一个大脑、岂容分割?!

6.言行的文野:动于衷,形于外。言语、行为举止,是文明还是野蛮,是高雅还是下流,这是人的人文文化底蕴如何的生动体现,也是人文教育结果如何的直接检验。一个文明的社会,讲话,应有文化内涵,是文明用语,还应该是发乎内心的文明用语;行为举止,应合道德规范,是文明行为,还应该是出乎感情的文明行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如果将“质”理解为内容、为素质,将文理解为形式、为表现、为言行;显然,只有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只有言行与素质的彬彬相配,才能是真正接受了良好教育的人,人文教育才达到了目的。那皮笑肉不笑的假笑,无动于衷的文明表现,是不能彻底的、不能持久的。

7.事业的成败:不少调查研究表明,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与家庭的幸福,其原因 80% 取决于非智力因素,取决于情商;而只有 20% 取决于智力因素,取决于智商。而非智力因素中,情商中,其首要内涵就是人格,就是人文精神。当然这决不是讲智力因素不重要,要攀登科技高峰、攀登学术高峰、攀登创新高峰,最终还得依靠由

占 80% 的非智力因素所支持的只占 20% 的智力因素来完成。显然,一个成功的企业必然得益于成功的企业人文文化,没有企业的良好的人文文化,就没有企业的成功。同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事业的成败,主要取决于人心背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科技,科技不如人和;得人心者昌,逆人心者亡,古今中外,莫不皆然。“人心齐,泰山移”,确系名言。

(三)

科学教育应该与人文教育相通相融,相通相融则利,相割相离则弊。两者相通相融,就可能使受教育者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上相通相融,科学素质与人文素质浑成一体,培养出“全人”、全面发展的主动发展的人,而非梁思成先生 1948 年所指出的“半个人”。相通相融则“育人”,相割相离则“制器”。这大致可归纳为 4 个方面:

1 相通相融,共同构成正确的追求目的:科学要回答的问题是:“是什么?”“为什么?”是求真,越符合客观世界及其规律就越真,越科学;但是科学活动本身并不能保证其应用与发展是否有利于人类进步、国家富强、民族繁荣、人民幸福。人文要回答的问题是:“应该是什么?”“应该如何做?”是求善,越符合人民的利益就越善,越人文;但是,人文活动本身并不能保证其能否建筑在客观世界规律的基础之上,从而是否真正有利于社会,造福于人民。显然,善为真导向,真为善奠基,两者相融,才能构成正确的追求目的,这就体现着求真务善同时实现的完美,体现着推动社会进步的创新。是的,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工程创造,文艺创作、社会变革,如此等等,莫不是美,莫不是新,莫不是为了人类社会有一个更美好的新一天。求真,务善,完美,创新。老子讲:“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爱因斯坦深信,人类精神的永恒目标是真、善、美。

2 相通相融,共同奠定正确的追求基础:科学求真,敢于面对现实,承认客观,尊重规律;而人文求善,勇挑重担,高度负责。何况,尊重客观及其规律,会有高度负责相伴;高度负责也会有尊重客观相随。两者结合,必然导致以高度责任心来承认客观,来认识客观,来尊重规律,以之作为其活动的基础。科学如此,人文亦如此。“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千万件事。”就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要源于实践,源于生活,而又要高于实践,高于生活。“学而时习之”,学主要讲向实际学习,习是讲将学习所得的加以实践,向实际学习并将学习所得的经常加以实践。学习所得的,要高于实践,高于生活,就是认识客观本质,认识客观规律。这表现在文艺领域中伟大的文艺专家具有求真的人文精神,这也就是科学精神。例如,在作品中,表现为追求“神似”,而非追求“形似”,“神似”就是科学中事物或现象的“特征不变量”。我一再举过的典型例子,“春风又绿江南岸”与“红杏枝头春意闹”两名句中的“绿”与“闹”之所以绝妙,无他字可代,就是因为“绿”字是在定义于一个无限空间中的春到江南的“特征不变量”,而“闹”字却是在定义于一个微小空间的春满枝头的“特征不变量”。至于辛弃疾在《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中,竟然隐约揣测到神州明月西沉时将有另一世界明月东升,高空中有“高空风”(“长风”),月亮受一股无形力量支持而浮在空间,甚至月亮可能绕地球旋转,等等。为什么能如此?他们基于实践,“求思之深,无所不在。”是的,“文以载道”,道就是道理,就是理念,而且也就是客观,就是规律。在科学领域中,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伟大科技专家,深信“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中,尽量满足所有人的欲望与需要,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美满的关系”。显然,他们工作的基础与内容,也充满着对别人高度负责的人文精神。

3 相通相融,共同构成“我·人·物·自然”的正确关系:科学承认客观,尊重客观,人文关心他人,关心外界,一个是能面对现实,一个是能终极关怀,两者结合,势必是正确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

待集体、对待客观、对待自然,形成“天人合一”这种融洽的正确的与人为善、与物为善、民胞物与的关系,是一个人事业成功的决不可缺的外部条件。现在所谓的“情商”、“非智力因素”,其关键就是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创造成功的外部条件。为什么“文人相轻”?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分析得对,“人善于自见”,“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何况,有的己长并非长,有的人短也并非短。我所在的教学科研单位,一直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第一,公开承认别人劳动及其成果;第二,真心尊重别人劳动及其成果;第三,时时刻刻为别人着想。第一条是科学,承认客观实际;第三条是人文,做到终极关怀;第二条既有人文,又有科学。这三条就是科学与人文的紧密结合,所以我所在单位一直发展很好。“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这是一条规律。

4.相通相融,共同形成正确的创造性的整体思维:这种整体的思维才是完备的思维。逻辑思维是这一整体思维的正确性的基础,形象思维是这一整体思维的创造性的主要源泉。逻辑思维主要同科学活动紧密联系,是极为严密的,这保证了思维的前后一致,保证了思维的正确。没有逻辑思维,思维一定是混乱的,漏洞百出的,前后矛盾的,乃至是荒谬无稽的。正因为亚里士多德第一个提出了形式逻辑,为正确思维奠定了基础,所以美国的的迈克尔·哈特在其名著《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中,将他列为第14位;也正因为欧几里德在《几何原本》中给出了公理系统的范式,深深影响了牛顿,影响了现代科学体系,从而被列为第22位。读一读王安石写的《读孟尝君传》,90个字,4句:第1句是讲情况,第2、3、4句就是逻辑学中的正、反、合三大命题。但是,也正由于逻辑思维有着自己的严密体系,从而继起的循道者就超脱不了这一体系的框架,欧氏几何本身产生不了非欧氏几何,电动力学本身产生不了相对论。要有原始性创新,就要突破现有思维模式与框架,就要有开放的形象思维。所以,爱因斯坦从他切身的经历得出结论:物理给我知识,艺术给我想象力,知识是有限的,而艺术开拓的想

象力是无限的。他又讲,科学研究真正可贵的因素是直觉。而彭加勒讲得更直接:逻辑是证明的工具,直觉是发现的工具。想象力、直觉,都属于形象思维,都属于右脑活动。我国古代伟大的改革家商鞅深刻地指出:“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故习,所闻,就是指已有的思维模式。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讲得何等深刻:“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神思,就是发散的象思维,无拘无束,超脱奔放,不落旧套,立异标新,目无现有的规矩,心无既存的偶像。就是敢于向传统的观念与思维挑战,这样,方可能达到原始性创新。毫无疑问,凭借象思维所达的新的思维,应是另一个逻辑思维;否则,将是荒谬的思维,走入歧途。一切有卓越成就的科技大家或文艺大家,莫不是两种思维兼备,莫不是思维完备,只不过可能一显一隐,一主一次,一自觉一不自觉而已。这是历史事实,也是培养创新能力的人材的明鉴。

我们可以讲,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残缺的人文,人文中应有宝贵的科学基础与珍璞;而没有人文的科学,也是残缺的科学,科学中应有丰富的人文精神与内涵。

(四)

当前形势,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成果毕出;科技成果作用巨大,影响深远。尤其是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正在以极大的深度与广度改变着世界;生命科技的飞速发展,还可能以骇人听闻的发现改变人类的本身。福兮?祸兮?这不取决于科技本身,而取决于研究、开发、应用、发展科技的人,取决于人的精神世界与物质手段的如何结合,取决于人的思想、感情、精神世界。

科技成果能否正确应用?科技成果能否迅速掌握?科技成果能否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能力超前研发,以压倒对方?能否以“高屋建瓴,洞察全局”的能力,异军突起,开拓完全崭新的科技领域,夺取主导科技潮流的科技成果?这决不仅仅取决于科技本

身,而取决于科学与人文的如何结合,取决于研究科技的人及相关者的思想、感情、精神世界,取决于人的灵魂是否纯洁及思维是否完备。李岚清同志在北大百年校庆的讲话中告诫我们,不能只精于科学而荒于人文。是的,没有科技,一打就垮;而没有人文,就不打自垮。

我们的教育不能不思考这一严峻的发展,我们的大学不能不思考应培育什么样的人材,我们中国的大学不能不思考我们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与民族跨入 21 世纪后我国大学的历史重任。我们要更加把握与突出大学的主旋律,更加使主旋律富有特色。我们要“育人为本”,“以人为本”。既要崇尚科学,更要弘扬人文。训练思维,使之完备;发展个性,使之优秀;陶冶感情,使之高尚;提升精神世界,使之圣洁。从而使我们培养的人材,更能爱国,更会创新,确能肩负起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神圣使命。现代科技的发展极其突出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这一关键所在。我们不能不再次强调人文教育的基础地位。《四书·中庸》讲得好:“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载舟覆舟,慎之慎之!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推荐

本人审阅

【编者絮语】根据美国教育哲学家布鲁贝克的归纳,在高等教育哲学中,一直存在着理性主义和工具主义之争。这种分别实际上是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长期分离的一种表现。杨叔子先生几年来一直在积极倡导加强人文教育,并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述。这种倡导不应简单地视为是对传统的人文教育的复归,而是对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相融合的呼唤。“是育人,非制器”,就是要在强调育人的基础上,实现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融合。

田长霖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原校长

知识经济和高等教育发展的 趋势与展望

[2000 年 4 月在东南大学演讲]

我首先谈谈对知识经济的看法。80 年代中期,好多人认为美国在走下坡路,日本已取代美国,如汽车业、电子、电视、钢铁工业,几乎每样都是日本领先。那时美国产生了一个新的学派,是从伯克利加州大学开始的,就是说我们已进入了一个新的知识经济时代,由创新科技主导地区经济,由大学带动科技企业,这是一个新经济行动。我那时是伯克利加州大学校长,正统学派的经济学家群起而攻之,都不相信,说这些是反叛的。但是,有些人尤其是硅谷的许多人都朝这方面走,几乎使整个美国改观。几十年来硅谷的发展创造了美国的奇迹,特别是近十年来,美国经济不断增长。旧经济学家好多人的学说几乎崩溃,甚至今天有人还说股市要崩盘,旧经济要超越新经济,我认为这些看法都是不清醒的。

知识经济的来临,是我们大中国地区发展的一个绝佳的机会,一定要把握时机。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从大历史看,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说明,生产方式基本上有三个最重要的要素:最初的农业社会,基本上以土地为主;到了第二阶段,初期的工业时代,劳动力十分重要,知识、技术也比较重要;最近一百年,又有变化,知识、技术开始重要,知识经济成为主导。21 世纪的竞争主要就是看知识在

这些方面的带动。另一方面,从文明的发展来看,几千年来,文明中心开始向西移,波斯文化、希腊文化、罗马文化、西班牙、法国、德国、欧陆文化,都是一个个往西移。到了 18 世纪末期,欧陆文化,西班牙大帝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都非常强大,但到了 19 世纪中叶时,经济文明又向西移,以英国为主。19 世纪,英国很骄傲地说它的国旗永远不会落,因为全世界都有它的殖民地。20 世纪初期,世界的经济文明中心向美国移,美国东岸的华尔街、华盛顿这些城市,已成为政治中心。到了 20 世纪末叶,华尔街还是很重要。但是大家现在看得很清楚,美国最重要的地方是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

现在中国计划开发西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建议,这与过去美国的情况很相似。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很有卓见的指导教授,他就跟我讲:“你要到加利福尼亚去。现在看起来还是东部的比如说哈佛大学等大学比较有名,但将来最有发展前途的还是在加利福尼亚,而且加州大学就是马上会有很大进展的大学。这个时候可以说是西部开发期,你去是最最好的。”所以,我那时也就去了加州大学。

21 世纪会怎么样,文明中心一定会横跨太平洋。21 世纪是亚太世纪,从这三千年的变化我们看得很清楚,它一定要西移。因为这个地区有未开拓的市场,有很多未开发的地区,有很大的土地资源,有很大的市场,而且有自由开放的观念,没有受传统的束缚,所以 21 世纪的文明中心一定会横跨太平洋到亚太地区的。这是大中华地区、海峡两岸三地极好的机会,我们如果把握得好,它就会早日来临。

从小历史来看,20 世纪有最重要的三个趋势,第一个是“德先生”,就是民主化;第二个是“赛先生”,就是科学化;第三个是国际化。现在民主化有了很大的变化,到了 20 世纪末期,民主已经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不但要政治民主化,还要经济民主化。民主化已经扩展到经济领域。

第二个趋势是科学化。在 20 世纪初叶有相对论,到了 1920 年有量子论,到了 1930 年有原子分裂,1950 年之后,科学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是计算机,是微电子,是信息科学(互联网等),这些已经把科技与经济结合到一起。

再看国际化。它有两个很重要的分支,一是发达国家,一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非常喜欢用“全球化”,把你扩张进来,他来主导。发展中国家则不这样认为,这方面中国是个代表。邓小平先生讲得很清楚,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但必须面对国际化。所以现在有两个很冲突的看法,一个是全球化,一个是现代化。其实,全球化是个空间观念,现代化是个时间观念。但是时间和空间不能完全脱离,这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美国现在下岗或被辞退的员工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个时期,但是同时也是美国失业人数最少的时期。这是新经济的一个最重要的现象。新经济时代的第二个现象也很重要,现在很多经济学家都没办法解释,现在失业人数这么少怎么不发生通货膨胀。因为失业人数越少,你就要加薪呀,要抢人呀,一加薪就会通货膨胀呀。但新经济时代与老的不同,现在美国是生产率增长最快的时候,但也是通货膨胀最低的时候。知识经济已经到来了,一定要大力推动知识经济,扶植创新机制,这样说起来,也就是要倡导科教兴国。

我很坦率地说一句,中国的科教经费少得可怜。以国民生产总值来比,中国投入教育的经费比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还少,不用说第一世界、第二世界了。当然,最近因为倡导科教兴国,经费提高很多,我想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是差得还很远。我们再看科研的经费。中国科学院的经费最近刚涨了一倍,高兴得不得了;教育部科研经费也大增,国家计委经费也大增。但是你要再看一看国外的,就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投入而言,中国还少很多。随便你怎么计算出不同的统计数字,还是差很远很远。我跟江主席、朱总理谈过,这方面绝对要加,科技是根本,没有它中国就永远没有办法去

竞争。中国一直受到一句很著名的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毒害。既然一百年才培养一个人才，那么稍微等两年没关系，国防、交通、环保、能源更重要，教育晚一点没什么大不了，反正一百年嘛。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有创见、强有力、很有魄力的领导人，提倡科技、科研。

下面再谈高等教育。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是主宰，美国的硅谷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样板。硅谷无他，就是有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等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两所大学只有 70 公里的距离，但拥有成千上万的世界级的科学家。伯克利加州大学光美国的院士就有三四百，是全世界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最多的大学，还有很多的诺贝尔奖金得主。这个地方永远不会衰落。我希望南京地区的高等院校不要各自为政，应规划整合，互补发展，这样南京就会有很大的潜力，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才汇集的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知识经济时代的高等教育将会怎样呢？我想它与民主化、科学化以及国际化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民主化之后，学校的经费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增加财源是今后任何一所大学都必须面对的情况。哈佛大学始终不衰，就是因为它的钱实在是太多了，浪费一点也没有关系。我想东南大学所在的江苏省是非常有财力的省，一定也可支持起来。

高校内还必须要有竞争。现在，国内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看我，我看你，你薪水不能比我高，你高一点我就不满意。大学要竞争嘛！谁有能力谁就多拿，重要的是要留住人才。伯克利加州大学为什么会变成一流的大学，最主要的是有劳伦斯。他要制造分裂原子的分裂器，耶鲁大学不想要他，我们赶快收下来，这一下我们拿了十几个诺贝尔奖。所以学校项目不在多而在精，要有人才，真正大师级的人才只要一个就够了。

最后我讲几个办大学的经验，给东南大学一点借鉴。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你们一定要有很好的战略规划，搞清楚到底要发展什

么,学校的特色是什么。现在已经不可能每个院系都得平等处理。一定要有重点,哪几个学科是要发展的,不行的慢慢地把它淘汰掉。当然要取消科系是很难的,我发明了很多新的方法,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半饥饿法。如果哪个院系排名在全美前五名以外的,并且是无可救药的,我们也不说马上取消该学科,那是要革命、流血的。我们采取的办法是每年给它缩减 10% 经费,让它处于半饥饿状态。渐渐地,许多教授就到别的学校去了,学生也不来了,慢慢就没有了。这样就能把你的资金集中在最重要的科系上面。任何一所大学一定要有一两个世界第一流的科系。不是看论文的多寡,不是看论文被引用多少,而是看论文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多大,是不是产生一个工业革命或者是在某个领域产生较大影响,这才是最重要的。有人一年只写一篇论文,但影响大得不得了;有人一年写几十篇论文,可是没人看,自己天天在家“拜读”自己的论文。我想东南大学应该采取这种方式,要有一两个特别优异的科系,形成品牌效应,就有人来了。

跨院系的学科也特别重要,科系不要密封,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我们经常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当时重新整合生物科技,现在它又回到很高的地位。另一个很重要的是信息科技。现在大家谈的电子商务,就是信息系统的管理,我那时要成立一个信息系统管理学院,结果第一来反对的是管理学院院长,第二来反对的是工学院院长,但我硬是成立了信息系统管理学院,现在这个学院是最出名的时候,全美第一家。我在美国是白宫的科技委员会委员,我们最近向克林顿总统建议美国今后科研三个大方向:一是信息科技,二是生物科技,三是纳米科技,即微小化,微小到纳米的尺度。纳米科技的运用范围很广,可以用到生物科技方面、信息科技方面、机械科技方面。为此,伯克利加州大学已经非常紧急地开过几次会,讨论成立纳米科技工程研究中心,把物理、化学、材料、电子、机械,全部跨系地放在一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要有准备,然后聚集经费。你说没有经费呀,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做校长时,先是每个

系减少 1% 经费预算,如果你们叫穷的话,就来竞争那全部汇集在一起的 1% 的经费,由外面最权威的教授来决定这个钱怎么分。因为钱是最重要的,与其分配得像撒胡椒粉一样看不见,不如集中起来推动整个大学中最重要的规划的实现。从这一个方面来讲,这个学校就会有他的特色,就会有重点,然后可以制造品牌。我想南京地区有很多优势,甚至可以说上海的缺点是南京的优点,当然南京的缺点也可以是上海的优点,可以竞争,而且如果有很好的前瞻性的规划,南京地区马上可以上来,这种情况在美国是很常见的。国内也是一样,有的在过去我们认为很好的学校在下滑。为什么,就是领导的能力有限。现在是一个自由市场,充满了竞争,到处都有机会,但是要你去把握。

东南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供稿

未经本人审阅

【编者絮语】高等教育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高度重视高等教育时,一定要遵循教育的规律,遵循人才培养和人才成长的规律。任何急功近利的做法,其结果只能是欲速则不达。

樊明武 中国工程院院士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人在旅途：探索、创新与失败 ——兼谈创办世界一流大学

[2001 年 5 月在华中科技大学演讲]

今天是我第一次登上人文讲坛,说实话,还是非常担心的,因为我的人文知识还不够充分。坦率地说,我上小学、中学时,成绩最差的就是语文,因此当年一考进华中工学院(原华中理工大学前身——编者注),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总算不学语文了!(笑)但是,后来我发现,语文,以及人文素质对人一生的成长非常重要,即便对于学理工的,也是如此。今天,我想就创新等问题给大家谈一谈自己的体会。

人一生下来,就登上了社会这条大船,一直到离开人世之前,都要呆在这条船上。而这条船究竟开向什么地方,个人是无法左右的。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就发出过疑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人生的道路,往哪里走?怎样走?需要不断地探索。

实际上,人自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探索、拼搏。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不仅表明他来到这个世界,而且表示他要吃奶。我们国家有句俗语,“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笑)婴儿就是以哭这种方式为他的生存而拼搏。

要生存,为此进行探索,是非常艰难的事,就像小孩学走路,要付出很多代价,会不断地摔跤、跌倒;然后爬起来,再走,再摔跤;再爬起来,如此反复,最终学会走路,并没有因为摔了跤,失败了,就

再也不走了。这说明了什么道理呢？第一，成功与失败如影随形，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第二，在遭遇失败的时候，一定要坚定信心，要锲而不舍。

在我们的生活中，每一时每一处，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创新就更加需要百折不回的意志。如果老是跟在别人的后面，走在别人开创的路上，亦步亦趋，这样的一生很可能就是平庸的一生。当然，我并不是说不能做平平常常的工作，但如果没有创新，人类社会就不可能进步和发展。社会要求每一位成员做出更多的贡献，只有当成员对社会的贡献大于索取时，社会才可能前进得更快。而对社会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在某一方面有所创新，只有创新，才可能有质的飞跃。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非常悠久、非常优秀的文化传统，但也有些不那么好的东西。比如说，用刚才谈到的观点来审视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显得守旧有余而创新不够。许多人往往对什么“祖传秘方”、“百年老字号”奉若神明，几代甚至几十代人就依靠一个“祖传秘方”过日子而不思创新，在这样的情况下，哪里谈得上社会的进步呢？

中国的教育方法是“推演法”，也就是在一个总体原则下，在一个大前提的条件下，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即大前提、小前提、结论，把知识推演出来。实际上，这种推演法就其原始创新性来说，并没有产生更多的新的知识，只不过是已经肯定为正确的大前提补充一个又一个的证明材料而已。从知识传授的角度来说，这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方式，但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因为这实际上会使学生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即凡事都从一个大前提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形成了唯书、唯上的思维惯性。这种情况在科研上也有表现，我们有不少研究人员只重视国外的文章的结论，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追求相接近的结论，缺乏创新思想。结论的完全一致也只能证明国外工作的正确性，特别是在基础研究领域。第一个是创新，跟在人家后面，只会痛失“创新”机遇。

国外教育强调的是“归纳法”，其出发点不是已有的结论性的大前提，而是从现实出发，从大量的现象中去总结、归纳。显然，这种方法与推演法相比较，更容易激发创新思维。同时，这种方法也可能会导致很多错误，甚至是荒谬。但是要创新，就不能不犯错误，正如前面讲到的，成功总是与失败相随，同样，创新也总是与错误相伴。人不是神，总会出错，但我们不能怕出错，只有不怕出错，才有可能不盲从，才有可能不匍匐在权威面前，才有可能不断产生新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创新就是不断地“试错”，有时甚至是在向传统、现成习惯挑战，在不断的否定中寻找出正确的结论。

今天我所讲的观点，也可能有很多错误。就我自己而言，是把想法如实地说出来，与大家共同讨论，真正做到“知无不言”；就同学们而言，不要因为我是校长，就认为我的话没有错误。我大胆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不怕说错话，同学们也应该大胆地找出我讲话中的错误，与我辩论。同学们如果能指出我说得不对的地方，就可以使我避免犯错误。因此，无论是做研究，还是做工作，我都主张直言不讳，不要拐弯抹角，更不能从庸俗的关系学出发，希望自己的观点被所有的人接受。我想，等到一件东西被所有的人都接受时，那这件东西已经肯定没有什么创新性了。因此，要创新，就要有承受失败的勇气。

我是研究粒子加速器的，也就是把电子、质子或其他的重粒子加速到很高的能量去撞击另外的粒子，然后打碎其他的粒子。我们知道，分子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是由原子核和电子组成的。原子核是由什么组成呢？这就要把原子核打碎了才能看得见，但你不能用手榴弹去炸，（笑）这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事物，只能用非常小的粒子以非常高的能量去撞击。要给这些非常小的粒子以很高的能量，就要用到粒子加速器。制作加速器的技术要求是很高的。一般加速器是用磁场来约束被加速粒子的轨道，用电磁场加速粒子，提高能量。在可变能量回旋加速器中，磁场的径向变化要求维持粒子旋转周期与外加高频电场周期同步，要求形状非常严格，一

般用同轴线圈和谐波线圈调整解决。

1976年,我们(当时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接受了做线圈的任务。那时,我们与国外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交往,这就迫使我们自己要创新。通过查阅国外的期刊,得知国外是把氧化镁电缆焊在铜板上,而我们没有这种电缆。于是我们就用环氧树脂进行浇铸,普通电缆加上玻璃丝带,然后浇铸在铜板上。但这种线圈的性能要求非常高,要抗辐射,要有高强度与粘结性能,还要在高真空下工作,不放气。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每天起早贪黑做试验,先后做了近百次,最后认为有一种方案很好,可以行得通,决定正式采用。在加速器调试中,结果是真空上不去。如果真如此,粒子在加速时会丢失。为了这个方案,我们摸索了好几年,花了不少钱,却落了个失败的结果,我们心里非常难受。当时“文革”结束不久,大批判的习惯还在,有的人说“外国人做不到,你们就可以做到?外国人都不研究这个,你们就能研究出结果?”我们没有反驳,但仍然坚信自己的试验结果。1979年,我们去英国留学,书记送行的时候对我们说,“我们相信你们,也相信试验一定会成功。你们就放心走吧!”我们到英国后两个星期,他们就告诉我,真空上去了,试验成功了!

这个事例说明,要取得成功,必然要经过许多的失败。尤其是研究粒子加速器,许多东西很难借鉴,只有靠自己去摸索。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失败是不可避免的。1994年,我们做新一代回旋加速器时,指标定得很高,最后超过了国外。这时,成功带来的喜悦心情是难以体会的。在经过无数次失败带来的痛苦之后,终于获得成功,成功带来的不是笑,而是哭。通过自己的探索,经过许多次的失败后,突然灵感涌现,获得成功的时候,真是会激动不已、喜极而泣——深深地感受到这个工作的意义及其为人类做出的贡献。“高山仰止疑无路,曲径通幽别有天。”所以在失败面前,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刻!

科学研究如此,同学们的学习也是如此,华中科技大学要创建

世界一流大学同样如此,都需要开拓、进取、创新的精神。我们华中科技大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几代人的艰苦奋斗下,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四个转变,即从以工科为主的单科性大学向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转变;从以教学为主到科研、教学并重,产学研协调发展的转变;从以本科培养为主到本科生、研究生培养相结合,高度重视继续教育和成人教育的转变;从以科学教育为主到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相融合的转变。这四个转变的完成,标志着华中科技大学已经由一所普通的工科大学发展成为国内著名的研究型综合大学。这个过程满载着创新的欲望和意志。华中科技大学的今天,就是创新精神的充分体现。

1965年,我从华中工学院毕业;今年的2月,我又回到阔别35年的母校任校长。最近,我们适时地提出了“国际化”的办学目标,也就是说,要在2020年把我们学校办成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到2050年把我们学校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如果从华中工学院成立时算起,前五十年,我们已发展成为国内一流大学,那么,后五十年,我们将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我们要在国际大舞台上,与哈佛、麻省理工、牛津、剑桥等世界著名大学对话。从现在开始,我们的科研、学科结构、人才培养等方面都要向国际化转变,在国际大舞台上参与竞争。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要赢得胜利,更加需要我们有创新的精神。

从科研的情况来看,去年,我校科研经费总数达到了2.57个亿,但在争取到的项目中,真正在国家、世界上能够算得上大的具有引导性意义的却罕见。所以,我们今后必须在争取国家级科研项目上狠下功夫。同时,我们也要有思想准备,可能会失败,国家级项目就那么些,国内同行间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因此,要有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但我们有决心、有信心,一定要跨出这一步。我已下定决心,一定要使我们学校在争取国家重大科研、工程项目上有新的突破。同时,我也希望武汉地区的高校能联合起来,使武汉地区高校在承担国家重大科研、工程项目上实现零的突破。

去年,新的华中科技大学组建完成,我们学校学科结构更趋向综合化。目前我校共有理、工、医、文、管等九大学科门类,初步形成了良好的学科结构。可以说,文、理是学校的大脑——思想库,工科、医科是主体,学研产是三条腿。学校为什么要向综合性发展呢?除了要促进良好学术生态环境的形成和完善等原因外,关键还要促进良好育人环境的形成和完善。我们学校过去是以工科为主体的学校,科技教育很突出。但科技本身是把“双刃剑”,科技能否正确发挥作用,取决于掌握科学技术的人。

大家都知道,1903年居里夫人发现了镭,随之世界上开始了对原子弹的研究。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人们意识到原子具有巨大的能量可以利用,很快建立了原子反应堆。到这个时候,原子能科学还是朝着和平利用的方向在发展。但到了1938年,纳粹德国开始研制原子弹以用于战争目的,在这种情形下,因受纳粹迫害而迁居美国的爱因斯坦就向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进言研究核武器。1940年,美国开始实施著名的“曼哈顿计划”。1945年7月,美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8月6日,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9日,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加速了日本的溃败,随后日本宣告投降。但是,原子弹的使用造成了无数平民的死伤,后遗症也非常严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投掷原子弹的轰炸机使用的代号是一名机组人员母亲的名字,两颗原子弹的代号也分别是“小男孩”和“胖子”。由于原子弹的使用,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投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但也给无辜平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参加研制的科学家们虽感到十分内疚,同时也庆幸不已:美国先于德国法西斯成功研制了核武器,否则后果难以设想。

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是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也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时,学校要始终坚持育人为本,一切以培养高素质创造性人才为根本,借鉴和汲取世界一流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好的经验。如实行真正的“学分

制”，允许学生自由选择专业等，这一点很重要。如果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没有兴趣和爱好，就很难真正地去钻研，也就很难有大的成就。从今年秋季开始，学校还将招收6个全英语教学班，全部用英语进行专业教学。同时，今年暑期，学校会继续在一年级学生和研究生新生中举行英语强化训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具备到国际大舞台上去竞争的能力。

我们要鼓励学生超过老师，在本科阶段就敢于和老师辩论，敢于和老师讨论新思想。记得我们读大学时，有一次，一位女老师到西三楼答疑，我们几位同学围着她不停地提问，最后问得老师答不上来了，我们大家反而感到很高兴。为什么要鼓励学生这样做呢？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大家的思考能力，使大家具有一种创新的意思，超越前人的意识。只有这样，我们才敢于到国际大舞台上去同外国人竞争，我们才敢于向权威挑战，敢于坚持真理。

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提高科研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就不能不提到诺贝尔奖。世界著名大学中，获诺贝尔奖人次最多的是美国哈佛大学，德国的马-普学会次之，第三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第四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然后是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英国伦敦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如果这所学校、这所学校的毕业生中没有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就很难被别人承认。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国大陆还没有出过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们华中科技大学在国内综合实力较强，但在国际上可能还排不上号，因此，我们绝对不能满足于现状，要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前进。我们要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就要争取国家级的大课题；同学们从现在起，就要树立远大目标。希望在座的同学中，将来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掌声）

有一点，我想向同学们强调一下：诺贝尔奖获得者出成果时的平均年龄都很年轻，大约在35—40岁之间。拿诺贝尔奖，我们这一代希望不大，希望你们年轻一代的身上。我建议大家把这个远大的目标分解为具体的一个个小目标，脚踏实地，从现在做起，

一步一步去做,一定能获得成功。

既然跟大家谈到诺贝尔奖,我就以宣读诺贝尔的遗言作为我演讲的结束:“我,签名人爱尔弗雷德·伯哈德·诺贝尔,经过郑重的考虑后特此宣布,下文是关于处理我死后所留下的财产的遗嘱:在此,我要求遗嘱执行人以如下方式处置我可以兑换的剩余财产:将上述财产兑换成现金,然后进行安全可靠的投资。以这份资金成立一个基金会,将基金所产生的利益每年奖给在前一年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将此利息划分为五等份,分配如下:一份奖给在物理学上有最重大发现和发明的人;一份奖给在化学上有最重大发现和改进的人;一份奖给在医学和生理学上有最重大发现的人;一份奖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最后一份奖给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和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做出最大贡献的人。物理奖和化学奖由斯德哥尔摩瑞典科学院颁发;医学和生理学奖由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医学院颁发;文学奖由斯德哥尔摩文学院颁发;和平奖由挪威议会选举产生的五人委员会颁发。对于获奖候选人的国籍不予任何考虑,也就是说,不管他或她是不是斯堪的那维亚人。谁最符合条件,谁就应该获得奖金。我在此申明,这样授予奖金是我的迫切的愿望,这是我唯一有效的遗嘱。在我死后,若发现以前任何有关遗产处置的遗嘱,一概作废。”

这就是诺贝尔奖的由来。诺贝尔做出的这个决定,实际上是他的忏悔——他发明了炸药,目的是为了造福人类,但却被人类用于战争,对此他深深地感到不安。他设立这个奖,目的就是为了推动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的文明进步。我认为,这是在座的每一位立志于科学研究的同学必须具有的胸怀。

谢谢大家!(热烈鼓掌)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推荐

【编者絮语】演讲者在毕业离校35年后回到母校出任校长,

此前曾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所所长。演讲者到任后不久,就提出“国际化”的办学思想,提出要培养具有“世界水平的中国大学生”,并且初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这也是新校长到任后第一次登上人文讲座(他准备每年至少作一次人文讲座,借此机会与同学们进行交流),因此,这一期人文讲座听众之踊跃、气氛之热烈,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踏实”、“平易近人”、“有魄力,有思路”,这些都是同学们评论新校长时用得最多的词汇。

刘兆汉 台湾中央大学校长

高等教育在未来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2000 年 11 月在东南大学演讲]

今天,我就高等教育与大家现在提得很多的“知识经济”之间的关系,来谈一下自己的理解。

现在在很多领域都在提知识经济,其实大家对知识经济的确切含义并不是很理解。大家很可能有这种感觉,近几年越来越多地提到知识经济。其实它是和资讯时代的到来,和 Internet 互联网的普及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谈知识经济,就不得不归缘于资讯时代的到来——这倒不是说知识经济就是资讯时代,而是因为有了它们的架构,整个产业才发生了质的改变。我们知道整个人类的发展历程有所谓的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而现在大家可能已经看出来了,我们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重要的不是生产某些特殊的产品,而是提供一些服务,更重要的是这些服务业的产值要远远超过一些传统产品的产值。

在开始谈知识经济前,先谈一些有趣的预言,大家也可能听过:当 Internet、当信息技术 (Information Technology) 行业起步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定律——摩尔定律,说资讯工业最基本的集成电路,它的处理能力,每 18 个月就会翻一番。在 Internet 开始的时候,有一位叫麦可卡尔的著名学者,也提出了他的定律:网络的智慧与联网者的数目的平方成正比。另外,还有一个叫 Galbor 定律:从最近网络的发展来看,可以预测将来网络的频宽和速度每

3 年会增加一个数量级。这几个预言预测都代表着资讯时代的来临,而且是以不可阻挡的高速前进。所以我们提到 21 世纪的经济形态,提到 21 世纪的产业,资讯、信息、Internet 是它非常重要的内涵。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我们两岸的中国人,对于我们,这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时代。为什么这么说呢?差不多半年以前,我在台湾听了一位信息行业的教授的演讲,他是有关单位高价请来的。在他演讲的开场白中,他说未来的产业中,资讯产业、网络 Internet 是非常重要的。而国际网络的应用会变成不仅是产业,而且也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越来越重要的一环。他提到在国际网络的发明中,最重要的是个人;国际网络的最快最有影响的发明基本上都是出自个人之手。他提到这一类产业对于有些国家的人民的性格并不大适合。他特别举了日本为例。据他了解,日本人的性格不太可能在网络方面有太大发展,因为日本人太守规矩。他们管理一个超市,在一小块地方会管理得井井有条,可是他们在 Internet 上却很少建树,有民族的“先天不足”。他没有说中国人“不守规矩”,不过中国人倒是很适合这方面。(笑声)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是否同意他的观点,不过我觉得他的话还是别有新意的。国际网络的发明对我们华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能在很短的时间利用网络把我们国家许多方面提升到和西方发达国家同样的水平。我们在这方面有潜力。所以今天我特地把国际网络作为一个话题和大家一起讨论。

刚刚提到知识经济、信息产业,将来的产业,很可能是以服务为导向的,不再以制造产品为目的,而是利用很多产品以及它们之间的整合来作为产品。我们看出来,美国已经在走这条路,而且做得很成功。在他们国土上的制造业越来越少了。在这种情形下,我们预测,未来一个人的生涯中,工作会换很多次,因为服务对象、工作的性质常常变换。有人预测,在 21 世纪中,在一个人三四十年工作生涯中会换七次工作,他这个“七次”是怎么来的——他是

用一个模式计算的。

知识经济的特性,除了刚刚讲的,还有一个就是它“善变”。在这个情形之下,我们回到高等教育里,这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启示。现在的高等教育训练和培养我们同学们的应变(manage change)成了很重要的工作。因为因特网的盛行,在网上有很多的资料库,任何一个会网络操作的老师和同学都可以在网上获得无数的信息。所以我们在高等教育中就要应对这个局势。我们教书总是告诉他这些这些你要知道,那些那些你要知道,灌输很多知识,而这在当今不适用了。因为学生对某一个课题在网上可以找到他所需要的信息,很可能对这方面知道的比老师知道的还要多,还要新。老师传播信息的功能相当一部分已经被 Internet 上的 database 所取代。是不是老师就没有用了呢?在高等教育中,教师和教授的工作不是单纯的提供资讯,而是教会学生整合这些资讯,变成自己的知识的一种能力。这些资讯学生通过网络可以得到,而教授要教会他们去利用这些知识为自己服务,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老实说,在座的很多教授都有这个经验,包括我自己,在教书的时候告诉学生很多很多的 information。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以后的高等教育将注意培养学生寻找和利用信息的能力。然后针对某个课题,可以随时随地整合信息,发表自己的见解。

在知识经济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终生学习。它的用意就在于,我们在学校里传授给学生的知识不可能在他今后的生涯中应付所有的生活和工作的问题。我们要训练的就是自己能制造知识的创造性人才。这非常重要。在座的老师都知道,现在全世界的大学,包括两岸的大学,都提到大学的任务是教学、研究和服务,所以,创造新知——即是研究,是很重要的一个目标。而且创造新知和我们培养人才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在以前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大学的创造新知和社会的需求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常常有人批评我们学者总自闭于象牙塔内,这还是有一定真实性的。在未来知识经济中,这种现象会有相当大的改变。因为知识经济中

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利用最近创造出来的知识,作为新的产业,所以大学扮演的角色就更为重要。在这个架构之下,一个知识从被创造到被社会利用,转化为生产力,这个过程缩短了很多。很多例子都显示,未来大学如何创造新知、利用新知,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大学比其他的机构做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更具优势。

为什么我说大学适合推动知识经济产业的发展呢?因为大学的成员有兴趣的,有专长的,不仅仅是“know how”。而今后的知识经济需要的不仅仅是有专长的“know how”专家,还需要“know why”、“know who”。大学的成员做这些要比一个公司一个产业的研究机构要做得更好一些。这是大学在知识经济中的重要角色和要走的路。这一点我很佩服东南大学,迈出了相当大的一步。你们学校与产业间的合作实际上就是未来大学要走的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学里面有一个实验室,一批教授带着一群学生,通常是作信息一类的研究。而这些方面的研究出了成果之后,在知识经济架构之下,很快就被应用到社会生产之中去了。

我举一个我们台湾“中央大学”的例子。“中央大学”有一批自控系的教授,在80年代末,他们就很注重用网络来辅助教学。经过开发之后,我们这些教授在台湾办了一个网络虚拟城市“educ-toy”——网上大学。他们中的陈德林教授今天也在东大参加会议。他是广东人,他把这个城市用广东话称为“雅卓士”。这个educ-toy今年1月正式开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雅卓士”里的市民已经超过了30万,每天的访问量都超过百万。它主要的成员是中小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它的作用是,让市民自己组织发展自己的空间。比如最近它有一个“全民开课”的节目——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电视节目叫“全民开奖”——有600多参与者,在网上开一个学期的课,任何人开任何课都可以,开课最小的是12岁,最大的是70多岁的老人;有很多项目,而且彼此之间进行竞争,诸如此类。它使许多研究教育心理、研究教育科学的学者利用这个区域来作相关的研究。如有关电脑辅导教学的软件,有5位孩子,其中有一

位扮演教师,其余的扮演学生。作教师的孩子通过软件比“学生”要早一步得到资讯,“学生”在解题的过程中遇到困难就可以去问“老师”,“老师”自己弄明白之后再告诉学生怎么做。整个过程中,“老师”学得最快、最多、最彻底。再者,每个“学生”学习过程也不一样,有的快,有的慢,有的悟性很高。以上统统会在软件中记录下来。研究认知科学的学者可以此为据进行研究,建构学生学习的剖面。学生如果学的学科不同,其学习的剖面就不一样。学者就研究这些不同。

诸如此类,很快就在“雅卓士”中发现了商机,这里有30多万“市民”,买书、上补习班等等。这是很明显的学术上的研究和产业的结合。特别提一下,陈德林,陈教授今天在我们这儿,他在三年前的一部分工作是余先生支持的,余先生是非常有潜力和远见的。台湾一所大学里最近打出了一个“追求卓越”计划,可以在四年中得到五亿台币的资金,也有很多厂家愿意和它合作。这些都是非常实际的例子。我想东大的在座的各位有很多也一定有同样的经历。

最后,我想花几分钟阐明一下,我们刚才所说都是知识经济中光明的一面,大学扮演的角色、可以做的贡献、发展的空间和潜力,但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几个问题:

在拥有大量的信息情况之下,常常会迷失所往,学生如此,老师也难免。我们的学校的学生晚上不去图书馆,都留在宿舍里上网,网上的信息多且杂,常常使人沉迷其中而失去创造的机会和时间。这个危险是:大学生们只去看信息,而不是去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能力。学校在此要去引导我们的学生——这就是“information”和“knowledge”的不同。

另外一个更深远的影响,就是我们在因特网上留连的同时,不知不觉受了网络的影响——我们常常听到中国人发展软件不如印度、新加坡等等,因为我们的英文不够好。但更深一层来说,为什么英文不好,软件就不如人呢?因为在互联网上有一个霸权主义,

以英文为主的文化透过网络弥散在每一个文化之中。这是好是坏,我们留给哲学家们考虑。但从大学教育中,我们不得不重视,有文化霸权的可能性存在。除了电视音乐对我们的影响,还有一个更直接的网络在进行着文化入侵。这是值得深思的。

另外一件事,可能同样重要:网络太方便。我们在网上同网友发信、聊天,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是相关的事我们不能不重视:我们的学生在网上交谈的只是自己的同代人,他们会忽略历史的存在,谁有功夫去看《史记》、《世界史》?这个结果就是出现时代的断层,新一代的人不记得自己的传统。

作为一个高等学府,作为一个训练人才、领导人才的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在未来的发展,在资讯领域有很多的空间和潜力,这也是我们乐意去推动的。但是同时,我想我们两个学校都有同样的隐忧,我们在人文方面、艺术方面需要加强,只有这样才能挡住我刚才所说的那种局势。最后,我就以这个方面与东大的老师、同学们共勉!谢谢大家!

东南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推荐
未经本人审阅

王义遒 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 教授

文化素质教育的理念及其未来的发展

[2000 年 11 月在东南大学演讲]

1995 年首先从高等理工科大学开始的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工作,在前国家教委和教育部的大力推动下,在全国各类高校中迅速开展起来。作为全面素质教育的切入点,文化素质教育对促进高等教育思想观念的转变起了重要的作用。1999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后,素质教育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全面展开,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从试点工作转向普及和深入,走上了新的正轨,进入了新的高度。这项工作会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占有重要一页,将对中国教育产生深远影响。这也许要在几十年以后才能看得出来。

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从起初提倡大学生阅读中外文化经典著作(“应知应会”),到广泛开展课余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在教学计划中增加文化素质教育的必修、选修课模块(现在通常包含在所谓“通识教育”模块中),提倡在专业课程中渗透人文精神,直到教育部领导提出的“三提高”,即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提高大学教师的文化素养和提高大学校园的文化品格和格调。这个深入过程,既是文化素质教育本身的深化,也是学校参与教育人员面的扩大——从教务、学生工作干部和思想政治及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教师到专业课教师和学校教职工全员参与,这正是素质教育成功的有力保证。

在推进全面素质教育过程中还要不要继续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如何进一步深化文化素质教育?这是一个需要讨论和明确的问题。这里谈谈个人的一点认识,以供讨论。

推行素质教育是教育观念的深刻变革

推行素质教育(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到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高等教育思想观念的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场变革的核心既不在与“应试教育”的对立,更不在与“知识和能力”的对立,而在于教育的根本目的。长期以来,人们把教育看成是生产合格劳动力的手段,为国家的经济计划直接服务。这里,把作为劳动力的人和生产工具一起都看成是生产力,人与工具实质上是等同的,人只是活的工具而已。20世纪60年代以前盛行的“驯服工具论”也好,“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等豪言壮语也好,都是这类教育目的论的反映。那时候,教育方针所强调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只是对一个合格工具的基本要求。德的起码要求是听从组织分配,其最高境界是“忘我”而服从组织,即服从计划的需要。而智、体的要求则是使人的知识、能力和体质能满足社会生产的长期需要,起到“永不生锈”的作用,仅此而已。其一个例子是只提“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提“提出问题的能力”;体育的口号是“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都是要人成为长期适用的“工具”。这些,虽然反映了当时人们心中只有祖国和人民的崇高思想境界,却带有一些片面性。既是“工具”,就要强调它的适用性和一致性。用在同一“部位”上的“螺丝钉”,就要一个模子里铸出来,不允许有半点差异,自然谈不上个性与创造。后来的“应试教育”则反映了尚未充分发育的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要求。“应试”的目的是取得某种文凭。在市场尚未学会真正识别人才、不能明辨人的智慧与能力时,文凭或资质证书就是唯一能表明人才的高低优劣的标志了。于是人们对文凭趋之若鹜,“应试教育”应运而生,这不全是学校的过错,老师的过

错。显而易见,这是一种短见,经不起时间和市场发育的考验。

因此,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育观念强调的是教育的社会功利,把人看成是一种工具。“应试教育”强调了个人功利,追求的实际上是一张能转化为钱币的“证书”。它们都完全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市场对科技和管理人才真本事的要求。这种把人看成是机器或工具(包括证书)的狭隘的工具教育观,曾被马克思严厉地斥责为资产阶级的教育(见《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的教育则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把人培养成“自由”的人。这种“自由”的人就是掌握了社会存在与发展的规律、克服了盲目性的人。素质教育所注重的正是人本身的全面发展,是使人成为高度自觉的完善的人。所以,这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教育观。这种教育观要求通过教育使人的个性及其天生的优势和潜能得到充分的、全面的发展。当然,培养这样的人必然要有利于未来社会,这是一种更高级的社会需要,因而也可说这种教育观也具有功利性。但这和以追求直接的、实用的、狭隘的、短期的社会功利为教育目标是两种境界。

这样的教育不仅使人全面发展,还要帮助人实现自己的价值。因此,教育要发展人们天生的智力与体力,给人以多方面的知识和能力(生存、学习、交流、共处、做事和创造等)的武装,促进人的个性潜能的发挥,而且,还要培育人健康的感情,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样的人不仅能得到个人体面的高质量的生活水准、健全的体魄、丰富的感情,而且以其发挥自己特长的、创造性的工作而造福于集体和社会,从而赢得集体和社会的尊重。这样,人就能和社会、自然协调发展。这种教育既符合知识经济时代对人才的需要,也高度体现了教育的人文精神,并符合进步的国际教育思潮。国际 21 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写道:“教育不是把人作为经济工具,是作为发展的目的加以对待的。它使每个人的潜在的才能得到充分发展。这既符合教育从根本上说是人道主义的使命,又符合应成

为任何教育政策指导原则的公正的需要,也符合既尊重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又尊重传统和文化多样性的内源发展的真正需要。”

文化素质教育要帮助学生学会怎样做人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过程中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应当继续深入和加强,不过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探讨一下文化素质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尽管1998年教育部颁发的“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阐述,但在实践中还会发生一些问题。比如,现在在教学计划中一般都把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列入“通识教育”模块,这里既包括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课程,又包括像数学、物理、生物等自然科学课程,还包括一些必要的语言、计算机等工具课。通识“通”到什么程度为好,似乎没有边际。有人甚至说,信息时代要培养“百科全书式”的人才(我个人认为,在信息时代,“百科全书式”的人是无用的人,因为谁都可以不费力气地从网上得到“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而且是今天的最新知识),好像学生学得越多越好,而一些教师埋怨这些课程挤占了专业课的时间,一些教学管理人员则无所适从。因此,开通识课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不能漫无边际。通识课决不只是为了培养那种知识渊博、谈吐高雅的人。当然,为了提高人的社会形象和生活质量,这也是需要的。但这只是次要的。

我认为人文素质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学生学会怎样做人。为此,要通过这种教育使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学生正确对待自己,对待他人、集体、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和自然与环境。树立这样的观念与态度是不可能用说教、讲理的办法来达到的,而需要靠启发、感染和熏陶。文学课上通过读小说,从人间的悲欢离合可以使学生感染高尚感情、恻隐之心、同情弱者、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通过诵读诗歌,体会到人情之美、自然之美;读历史,从朝代的兴衰更迭理解人类社会的变化规律、个人的

地位和作用、人民群众的力量；通过艺术教育，激发对美的欣赏、享受和追求。而学习作为“通识课程”的自然科学，则不在于要使学生学会用科学知识来改造世界，而是了解以追求真理为核心的科学精神，懂得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从而更深地理解现代社会，理解科技的“双刃剑”效应，使人们以负责的精神慎用科学。用这样的想法作指导，通识课程安排起来就会思路明确，不仅可根据实际条件开设课程，而且可根据教学目标确定教学内容和方法。由此还可见，为达到通识的目的不见得非开课不行，一些教育内容完全可采取课外阅读、讲座、社会实践等形式来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绝没有固定的教育模式，各校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和情况采取“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方式。

有人会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不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任务么？”是的。这些确是它们的任务。当然，它们还要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政治信念。但是，现在许多政治理论课的效果不理想，其中重要原因恰恰就在于往往只做到“晓之以理”，而缺乏“动之以情”。人作为一种富有感情的动物，只靠讲规律、说道理是难以建立深刻信念的。以事实、情景和感染为主要教育内容和方法的人文教育以及整个文化素质教育，在这方面恰好起到了基础的补充作用。事实上，一个不懂得爱人，不会做人，不对社会负责的人是决不可能建立起共产主义的政治信念的。因此，文化素质教育与政治理论教育是相辅相成的，是互相补充的。相比起来，文化素质教育更基础，而政治理论教育属于更高层次。这就是两者的关系。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

文化素质教育的目标、内涵、途径与方式虽然大体是确定的，但其侧重点则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不同。当前国家正在逐步走

向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科技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起决定性的作用。国民的科学技术水准将对国家的兴旺发达产生重要影响,创新被认为是关系民族兴衰存亡的重要因素。“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江泽民主席语)。在这种情况下,提倡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激励创新精神应当成为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一环。

从广义上说,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的组成部分。因为科学精神是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产生的,是讲人对自然和自然规律的态度。这里的人当然是社会的人。因此科学精神不仅涉及人与自然,还涉及人与人的关系。我曾经说过,在人的科学活动的动机中,对科学认识的方法,对科学规律的态度,以及对科学结果的利用上,都存在着因人而异的态度,留下人文因素的烙印。因此,科学教育应当渗透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科学教育的应有之义,是进行科学教育的教师要努力做到的(见《在专业课程教学中渗透人文精神》,载《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三卷,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另一方面,当今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不管是研究古代的还是当代的,都必须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和手段,同样需要科学的态度、方法和精神。所以,“文理融会”已经是时代对一切从事科学技术、经济政治和文化艺术的人的共同要求,而这也是创新的一个源泉。

创新是科学的真谛。创新精神自然属于科学精神,因而也是人文精神的一部分。但创新教育有别于文化素质教育或一般的素质教育。“创新(创造)教育”可以理解为激励创新(创造)精神和培养创新能力的教育。现在在这方面有许多研究,也出版了不少关于“创造学”和创新教育的著作。可惜他们把注意力大多放在“实”的方面,即在开发脑功能,培养创新思维和观察、想象、实验、推理、分析综合等各种具体技能上下工夫,这当然是必要的,有意义的;而对“虚”的一面,对创新的人文因素、环境的作用讨论较少。在我看来,创新的原动力恰恰是在“虚”的一面,在人文,在人际环境。

创新是在一定的知识、能力的培养、训练基础上,依靠环境的酝酿、启迪、激励而爆发出来的。正像 DNA 双螺旋结构发现者,诺贝尔奖得主克里克所说,科学发现来源于“狂热的追求”。或如一般所说,“创新源于激情下思想火花的爆发”。这“狂热”、这“激情”,都需要在适宜的人际氛围中激励起来。因此,我们强调创新,必须注意人文因素,加强人文素质教育。

大力在实践上下工夫

加强文化素质教育不能停留在上课、读书、听报告这个层面上,还必须依靠学生自己的实践。实践不仅是认知之本、发展能力的必由之路,实践也是获得体验、熏染感情的扎实途径。因此,实践是使人全面发展的重要环节。这里所谓实践,不仅指生产劳动、职业培训、工作实习,还包括社会调查、社会服务、科学考察、科研活动等。学生通过实践,不仅熟悉自然的、人为的或社会的工作对象,学会如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学会如何做事,而且还可广泛接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化习俗的人群,学会进行跨文化交流与合作,学会与人共处。从这样的实践活动中,学生通过交流、比较、思索、磨练,就会逐步建立起健康的思想感情和合理的价值观念,使自己成熟起来。而且,还可能从这里发现和提出新问题来,成为创新之源。

所以,在开展文化素质教育中,要着意地、恰当地运用好实践环节这项强大的武器。比如,让学生去参与某种社会历史调查(例如,南京的学生调查日军侵华暴行),考察某位作家体验生活从事写作的经历,等等。对部分学习优秀的理工科学生,可让他们早期参与科学研究或科技开发活动,使他们早日接触国家或企业的课题,激励他们创造的意愿与热情。通过实践,把文化素质教育活动引向深入这件事各学校都已积累了一些经验,需要不断交流讨论,使这项工作进行得更自觉,更有效。

* * * * *

以上是我对深化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点滴思考,不尽恰当,提供讨论。最后,我还想指出,上面所提不是要否定过去已经做过的有效的工作,只是在过去基础上作点新的补充。文化素质教育的途径与方式是不断扩充和深入的,我们在工作过程中不要注意了后面的,而忽视甚至放弃了前面的,相反,要把前面的做得更好。每一种方式,每一条途径都有其独特的功能和效果,只有把每一件工作都扎扎实实地做下去,多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取得长期的真正的成效,而文化素质教育这件事恰恰是需要长期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见效的。

本人供稿

【编者絮语】这篇演讲是演讲者在“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 2000 年年会”上作的专题报告。六年来,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积极成果,有目共睹。但它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是目前大家极为关注的焦点。演讲者是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倡导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这篇演讲所表明观点值得关注。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学者、高校师生参与到讨论中来,并积极探索,共同推进文化素质教育事业的深入发展。

中国与世界

何芳川 北京大学副校长 教授

“华夷秩序”论(上)

[1998年2月在北京大学演讲]

自从国家产生以来,就有了国与国的关系问题。国与国的关系,自然也就从双边关系扩大到三角、四方以至多边关系。这样,就会不断形成某种国际关系的格局或体系。

近代以前,古代世界中也曾在不少地区产生过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格局。出现于东亚地区、自汉代直至晚清的“华夷秩序”,就是古代世界大小国际关系格局中发展得最为完整的一个。下面,我们就对这一以昔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进行一番剖析。

一、“华夷”秩序的形成与发展

“华夷”秩序的形成、发展、兴盛与衰亡,乃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正本清源,所谓华夷之说,缘起于我国上古华夏族体的形成时期。它所界定的,主要是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族体同今日中国境内的其他族体之间的差异,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一切问题。

上古时期“华夷”分野的观念,主要还是为了维持我国中原地区正在形成中的华夏族体血统纯净的需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华夏对夷狄,自然难免有一些由于文明比较先进而带来的优越感与偏见,却绝未发展到近代资本主义那种系统的种族歧视。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空前规模的秦帝国。然而,不旋踵间,二世而亡,秦帝国仅仅为日后的“华夷”秩序建立了一个前提框架。

汉承秦制,建立了前后延续四百年的两汉帝国。在汉帝国的北方,是广袤无垠的草原地区。这一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受到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的制约与驱动,不断周期性地南下压迫,入侵中原,造成中国历代汉族王朝所谓“外侮”的永恒主题。从汉初开始,除卫青、霍去病、窦宪、窦固等极少数情况外,大汉帝国对北方匈奴基本上处于被动的守势,根本无法建立什么秩序。

故而汉代中国的对外关系,只能向东、西、南三个方向发展。这也是自汉唐以至明清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先天性取向。

向东,中国人面对着浩瀚无际的太平洋。太平洋东西的超长跨度以及气象、洋流等风险条件,加之美洲印第安文明的迟晚发展,使古代中国在这个方向上的对外交往,仅限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琉球群岛。

向西,经河西走廊、天山与昆仑两山之间越过葱岭,数条古老的商路蜿蜒西去,与中亚、西亚、地中海世界相连。在这一方向上,有与汉帝国并驾齐驱、处于同一古典文明梯次的罗马帝国,它同汉代中华文明,各踞东西,交相辉映。两者互相吸引,造成古代丝绸之路的繁荣。但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两千年丝绸古道常因变乱而被遮断,故而在这一方向上,中华帝国的对外交往也难以有

什么营建国际关系体系方面的作为。

南方,成了自汉代以来中华帝国在对外关系方面可以畅行其志的地方。东南亚广大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利于人类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将东南亚、南亚广大地区星罗棋布的邦国织在一起,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海上贸易网。所以在这个方向上,中华帝国的对外活动有着较大的主动性和制约性。不过,中华帝国对南方的交往活动,在汉代尚属初级阶段。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发轫于上古时代的“华夷”观念,在汉帝国时期开始引入中华帝国的对外关系中去,并逐步发展起一种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即所谓“华夷”秩序。

两汉时期,“华夷”秩序作为一种古代国家关系体系,尚处于形成阶段。其表现为:第一,纳入这一秩序的国家还很少,只有东方的日本、朝鲜,以及南方的都元国、邑卢没国、堪离国、夫甘都卢和黄支国等。第二,这一秩序尚未成形,格局尚不稳定。第三,双边交往还处在较低层次,不过是你来“献见”,我赐印绶,再做点生意而已。

从国祚短长的角度看,隋唐帝国颇有些秦汉帝国翻版的意味。大唐帝国,雄强一世,气宇恢宏,贞观大治,开元全盛,高度发达的文明,对周边以及远方的国家和民族,有着强大的影响和吸引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华夷”秩序正是在这一时期,在比较正规意义上形成了。

唐帝国建都长安,国势强大时,仍首重对西方的关系。此时,昔日的罗马帝国、波斯帝国早已烟云过眼。葱岭以西的中亚乃至南亚诸国欣羨大唐文明,纷纷向“华夷”秩序靠拢。首先是在汉代“数剽杀汉使”的罽宾国,在贞观年间两度遣使来朝;此外,还有位于今克什米尔地区的勃律国。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在盛唐之时也曾进入“华夷”秩序圈。

正当大唐帝国将“华夷”秩序圈向中亚以至南亚地区推进之时,继罗马、波斯帝国之后,西方崛起了一个新的大帝国和一种新

的文明——阿拉伯帝国与穆斯林文明。阿拉伯人在圣战的大旗下东征西讨,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也经营着自己的穆斯林国际关系体系。伴随着穆斯林秩序的东扩,它与西向推进的“华夷”秩序之间,不可避免地会有一场碰撞与摩擦。

阿拉伯帝国势力的东扩,一路征战,顺之者犹可,逆之者亡。据记载,当时大食(即阿拉伯帝国)的势力已伸张到吐火罗、波斯、安国、曹国、石骡国、米国、康国、胡密等处。另据研究,677年,阿拉伯人到达了喀布尔,并首次攻入次大陆。于是,次大陆的非穆斯林地区的统治者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宗主国地位。这一时期,了解到西方这一国际情势的唐帝国也加强了在这一方向上的外交乃至军事活动。

阿拉伯帝国势力向东向北方向推进的行动,压迫着大批中亚地区大小王公贵族纷纷向唐帝国寻求支援与庇护,连印度王公也“乞师讨大食”。一时间,中亚的诸国也不断上表长安求援。这就导致唐与阿拉伯关系的紧张。

751年,阿拔斯王朝的呼罗珊总督阿卡·穆斯林和唐朝的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分别应中亚地方王公的请求而出兵,双方在稍逻私开战,唐军被阿拉伯军击溃。稍逻私之役后确立了阿拉伯人在中亚乃至南亚地区的优势。大唐帝国向这一地区推行“华夷”秩序终因穆斯林秩序的东扩而受阻。此后中华帝国的历代王朝(除元朝外)基本上对西方采取守势或攻势防御战。“华夷”秩序之经营重心则进一步转向海路,转向东方。

660年和668年,唐与新罗先后灭百济和高句丽,强盛的新罗王国基本上统一了朝鲜半岛,并与唐帝国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可以说,从唐代比较正规意义上营建“华夷”秩序时开始,朝鲜就是“华夷”秩序中的基本成员。

同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在汉代曾最早进入雏形时期的“华夷”秩序。南北朝时代,“倭国”、“倭人”“万里修贡”,“遣使献方物”、“恭修贡职”的活动,有增无减。中国方面亦一贯待之以怀柔

笼络之道。然而,日本天皇很早就怀有一种强烈的、与中国对等的意识。公元 608 年,日本“遣使朝拜”,国书中出现了“日出处天子(即日本天皇自称)致日没处天子(即隋炀帝)”的字句,隋炀帝“览之不悦”,斥之“蛮夷书有无礼者”,次年即遣使赴日责难。在会见隋使时,日本天皇自承“我夷人避在海隅,不闻礼义……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维新之化”,又派人随中国使臣来华“请贡万物”,事情才算平息。唐代中国成为亚洲文明的中心。此时处在以氏族制与部民制为基本形态的奴隶制社会末期的日本,急于寻求国家出路,因而,不断派遣使团访华,密切两国关系,全方位吸收中华文明的先进成果。遣唐使的派遣,对日本大化改新的成功,起了突出的作用。大化改新的过程,也就是日本介入“华夷”秩序圈的过程。

大唐帝国的强盛与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在中亚地区虽然由于极为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原因双方发生了武装冲突,但穆斯林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的互相吸引毕竟是历史的主流。据说先知穆罕默德有一条圣训,称“学问即便远在中国,亦当求得之”。正是在隋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获得了空前的巨大发展。中国造船业有了长足进步,不仅可以建造能载 600—700 人的海船,还早于欧洲人 900 多年掌握了密隔舱的技术,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汉代“蛮夷贾舱,转送致之”的状况。海上丝路的开辟,使东南亚地区诸多国家与民族和中国关系大大密切,也使中华帝国营造的“华夷”秩序不断向南方推进。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陆上失去的对南亚的影响,从海上却又收了回来。

宋代,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时期。一方面,它一直积弱,在北方辽、金、西夏政权压迫、封锁下始终处于守势。另一方面,它的社会经济发展得异常繁荣,对外关系尤其活跃,中华古代四大发明多在此时外传。唐代比较完备地建立起来的华夷秩序,只是到了宋朝方得到认真的充实。

有宋一代,伴随着北方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的不断南

侵,疆土日蹙。尤其是南渡以后,“一切倚办海舶”,促进了海上丝路的繁荣。海上商路的发展与繁荣,刺激了沿海许多港口的兴旺以及此前名不见经传的邦国的涌现与崛起。“华夷”秩序因而也就在这个方向上大大扩展了。

同朝鲜一样,越南民族经过长期的发展、奋斗,终于在公元968年由丁部领统一,建立“大瞿越南国”。975年,宋朝封丁部领为“安南都护检校太师交趾郡王”,1174年,宋朝正式册封李英宗(天佐)为“安南国王”。自此,越南作为一个国家,加入了“华夷”秩序。

宋代,中国与马来半岛诸国关系相当密切。1001年丹眉流国王多须机遣使打吉马等九人来华朝贡,双方互赐珍贵礼品,就是一例。

公元977年和1082年,位于文莱的渤泥国,也曾两次遣使来北宋修贡。

菲律宾群岛原在海上丝路主航道之外,但群岛人民早已跨越南中国海同中国有所交往。不过,直到宋代,我国正史上才出现关于中菲关系的明确记载。从此,菲律宾也进入“华夷”秩序圈。

“华夷”秩序圈随海上丝路推进,一直到达南亚地区。公元9世纪至13世纪兴起的南印度科罗曼德海岸的注辇国,就曾主动介入这个古代国际关系体系。

甚至远在非洲东岸的层檀国,也在宋代遣使入贡,成为“华夷”秩序大潮澎湃中得自印度洋绝远西岸的回声。

位于东北亚的朝鲜,在宋代更加巩固了它在“华夷”秩序中基本成员的地位。公元993年至1019年,高丽王朝同我国北方的契丹进行了三次战争。高丽与契丹人的敌对,自然加深了高丽王朝与宋王朝的盟友关系。由于有牵制北方强敌之作用,高丽在大宋王朝经略的“华夷”秩序中的地位,更为突出。

唯一例外的是日本。

公元894年,日本决定停止派遣遣唐使,结束了唐代两百年间

中日官方使节往返的局面。此后,直到明初,中日之间一直没有官方往来。就日本而言,遣唐使之停罢,外部原因是唐帝国已跌入衰颓阶段,而内部原因则是财力窘迫,平安时代的统治者们思想消极、自我闭锁。故而北宋立国后,虽主动要求恢复官方往来,希望将日本重新拉回“华夷”秩序之中,但并无结果。直至南宋时期,日本镰仓幕府兴起,才有兴趣同中国交往。可惜进入13世纪中叶以后,南宋王朝时刻面临亡国之危,哪里还有心思和精力去营造什么“华夷”秩序呢?

蒙古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了元朝。元帝国幅员辽阔,亦曾盛极一时,海陆交通,畅达无阻。元帝国统治者虽继承了“华夷”秩序的框架,但从忽必烈起,就没有真正吸纳这一秩序的内在真谛。他们所要建立的,实际上还是一种“蒙古式的和平”。这种“蒙元”秩序之运作与“华夷”秩序相较,就大异其趣了。

明清两代,迎来了“华夷”秩序的全盛与顶峰时期。在这一时期,这一古代东方国际关系体系终于具备了自己清晰的外缘与日臻完善的内涵。

大明帝国,以郑和远航事业为代表,终于在前代的基础上织成了一张古代世界空前规模的“华夷”秩序的国际关系网络。

郑和七次下南海、入印度洋的远航壮举,将几乎全部海上丝路商道上的邦国,即亚非大陆西太平洋至印度洋滨海而居的民族和国家,一齐吸纳到“华夷”秩序中来,令这一国际关系网络具有空前之规模。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前来中国修好朝贡的,不仅国家数目多、使团规模大、次数更加频繁,而且档次高,常有一国之君亲自率团来朝,明确、自觉地吸纳中华文明。

在东北亚方面,明代所建“华夷”秩序曾一度达到其最高点。在朝鲜半岛,李成桂于1392年夺取了高丽王朝的天下,建立了李朝。李朝时期的朝鲜和明朝时期的中国之间,建立了“华夷”秩序中从观念到体制上都堪称楷模的关系。从大明帝国方面看,是“东国年年修职贡”的局面;而从李王朝方面想,则是“礼仪成邦慕圣

朝”的境界。

同时,琉球(今日冲绳)同中国的关系,在明代有了飞跃。据记载,这个长期以来“不通中华”、“未尝朝贡”的琉球王国,却后来居上,在明朝时期不仅进入“华夷”秩序圈,而且与中国交往频繁,体制详备,几乎同朝鲜、越南并驾齐驱。计有明一代 267 年(1368—1644 年)里,琉球对中国修贡凡 182 次。

最值得重视的是,日本在明初曾一度、恐怕也是日本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主动、明确地加盟“华夷”秩序。我们知道,自唐朝末年停罢遣唐使以来,数百年间,日本一直游离于“华夷”秩序圈之外。如果说日本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也对“华夷”秩序采取一种游离的态度,那不是由于它距中华“绝远”,而恰恰是它与中国仅仅“一衣带水”的接近;不是由于它的社会诸系统同中国差异极大,而恰恰是它相当饱和地吸纳了中华文明,创造出一种几与中华文明同步的高水平的大和文明。由于地处岛国,它成功地抵御了元帝国两次粗暴的征伐;由于主动、创造性地吸纳了中华文明,日本在吸纳“华夷”秩序时也将自己放在主动的地位上,不是被动地接受它、承认自己“夷”的地位,而是主动地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将自己置换为“华”的地位。直到明洪武年间,对于朱元璋要日本称臣入贡的要求,日本怀良亲王仍进行了尖锐的抨击,指出:“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日本的上述态度,到了明成祖时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1403 年,朱棣篡位成功,改元永乐,日本幕府足利义满即以“日本国王源道义”的名义,遣使来贺,称臣入贡,以属国自居,还接受“大统历”,表示愿意奉明“正朔”。自此,日本重入“华夷”秩序圈。嘉靖年间,倭患大起,日本才又一次游离于“华夷”秩序之外,直到近代“华夷”秩序崩塌。

二、“华夷秩序”的理念与原则

“华夷”秩序是在古代世界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一个有理念、有原则和有着自身一套比较完备体制的国家关系体系。中国在其中自然起了某种主导作用。

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民族及其前身——华夏族体，本身就是许许多多部落、部落联盟汇聚的结果。至于汉民族，千百年间吸纳、汇聚的远近各方的族体则更为众多。不过，无论是自愿汇聚也好，冲突融合也好，华夏族体到汉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古代文明的辉煌进步，其所赖以生存的基础，仍是中国中原地区，即黄河乃至长江流域的农业。

中华帝国始终是一个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国家。因此，古代农业文明自然给它打上深深的印记。从总体讲，农业文明缺乏游牧民族那种迁播流动、尚勇好武的基因，也缺乏海洋民族那种搏击风浪、冒险交易的风格。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后，特别是建立了扩疆万里的大帝国之后，农业社会所需求的稳定、安定，就立刻在中华帝国的立国理念、原则、体制中凸现出来。中华帝国的生存、发展需要儒学，而儒学也要为适应中华帝国发展的需求不断演进。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帝国向儒学所索，儒学供帝国所需，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如何保持、深化帝国社会的稳定。于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框架，修、齐、治、平的框架，孝悌力田的框架，等等，将古代中华帝国、古代中国社会框架在稳定、直至超级稳定之中。皇帝、大臣以至各级官吏，自社会顶端以降，用这一套套框架治理国家、约束民众，得其所哉。至于阶级社会所固有的剥削、压迫乃至“吃人”的本质，则是这些忠、孝、仁、义、礼框架的阴暗面。一旦帝国晚期社会下层民众不堪其苦，挺而暴起，突破了这些框架，那么中华帝国就会周期性地发生“礼崩乐坏”的状况而有待一个新的王朝来重新收拾局面了。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一理念原则下，古代中华帝国各王朝的统治者开疆拓土的努力，可以说达到了极致。到了大清帝国，其疆土本已大于今日我国。汉、唐、明、清帝国的规模，可以讲是古代社会生产力条件下中华帝国规模可达的极致。而这个极致以外的地区、民族与国家同中华帝国之间，自然就有一个古代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

于是，农业文明对稳定、和平的基本需求的特征，以及为了这种稳定、和平需求应运而生的儒学思想，也自然延伸到帝国对外关系的基本理念与原则之中。质而言之，就是要求帝国周边及远近各国，在“君臣父子”等儒学学说框架原则下，同中华帝国建立和平、稳定的关系。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属内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这就是历代中国封建帝王的世界观、宇宙观，也是中国封建主义皇权所追求的国际关系体系——“华夷”秩序的根本理念与原则。这一秩序的基本内涵就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在中国封建皇权的约束和保护下，建立国际和平局面；在中华封建文明的影响与制约下，促进各国的进步与繁荣。

我们今天已无法读到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时让其带往各国的“国书”，但其中那些“儒术”之内容，应该是不难想见的。况且，我们从后代君王、特别是大明皇帝的言论中，无疑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千百年间一以贯之的理念与原则。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之初，遣使赴各国“宣谕”，就讲得很明确：“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自古为天下主者，视天地所覆载，日月所昭临，若远若近，生人之类，无尔欲其安土而乐迁；然必以中国治安而后四方外国来附”；“夷狄奉中国，礼之常经，以小事大，古今一体”。

明成祖朱棣讲得更清楚：“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推古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远邦异域，咸

使各得其所；闻风向化者，争先恐后也！”

“华夷”秩序所倡导的，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辐射关系，也是以中华帝国君临天下的垂直型国际关系体系。在这一秩序中，所有所谓“夷狄”国家对中国的关系，应是一种以臣事君和以小事大的关系，一种对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怀有“向化”之心、“慕圣德而率来”，以至终于被“导以礼义、变其夷习”的关系；中华帝国对各国则是抚驭万邦，一视同仁，导以礼义、变其“夷”习。无疑，这是儒家学说在处理中华帝国对外关系所能构建的理念原则和理想框架。

这个框架所要达到的境界是：域外诸“藩国”，如群星参斗、葵花向阳一般，围绕着中华帝国运转、进步。在这一向心、垂直体系之下，“庶几共享太平之福”，维持一种“中华和平”模式的国际和平局面。这种“中华和平”式的局面，显然是一种古代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和平局面。

至于“华夷”秩序下的各国之间，则应在中华帝国的监督和保护、保证下，彼此相安无事，即所谓“天地之间，帝王酋长，因地立国，不可悉数，雄山大川，天造地设，各不相犯”以及共享“中华和平”的“太平之福”。尤其不能允许那种无视中华帝国的威德，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情况发生。

为了落实“华夷”秩序上的上述理念和原则，中华帝国的历代统治者，不遗余力地构建、丰富并逐渐完备了一整套体制。以保证那些理念、原则的具体实施。当然，这一整套体制的发展与完备，也程度不同地得到了“华夷”秩序中各国的支持与配合。

“华夷”秩序在体制上最根本的保证，是中华帝国与诸邦国之间，形成并建立了一套“朝贡”制度。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各国与中华帝国关系之日益密切，朝贡制度渐渐有了其体制方面的内容。

首先各国贡使的规模、人数、级别日益扩大与提高。许多使臣在本国地位很高，如早在南朝时期，位于尼泊尔境内之天竺伽毗黎国国王月爱在其国书中就郑重其事地推荐其使臣，说“使主父名天

摩悉达,使主名尼陀达,此人由来良善忠信”云云。看来,使臣尼陀达出身名门,以至国王还要介绍他的父亲。到了明代,索性国君们亲自率团访华朝贡,足见海外诸邦将同中华交往看作一件大事。由于来使太多,令中国应接不暇,遂定有制度,如明太祖朱元璋就于1375年对中书省和礼部下了一道圣谕,对各国来朝的周期、人数,乃至船数均作了明确规定。

制度如此,但能否遵守实行,则是另一回事。在各种因素的辐凑之下,贡使十分密集,令中华帝国统治者又欢喜,又烦恼;有时,贡使们又久不至,令中华天子颇为失落。

在朝贡制度下,又有一套严格的礼仪。

诸“蕃”贡使来朝一般须备国书,即所谓“奉表”。“表”中要求明确称颂中华帝王为“明月所照、天地所交”之地的最高圣明君主,表示自己奉大以诚和一心向化——向往中华文明的追求。

朝见中华天子本身,又是一番极为烦琐的礼仪过程。洪武时期,各国来朝的君王,朝见前先要“于天界寺习仪三日,择日朝见”。朝见时:

“设蕃王及从官次于午门外,蕃王拜位于丹墀中道,稍西,从官在其后。设方物案于丹墀道东西……鼓三严,百官入侍。执事举方物案,蕃王随案由西门入,至殿前丹墀西,伫立。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御殿。蕃王及从官各就拜位,以方物案置位前。赞四拜讫,引班导方物升殿。宣方物官以方物状由西陛升,入殿西门,内赞引至神前,贺拜,蕃王再拜,跪,称贺致词。宣方物官宣状、承训官宣训讫,蕃王俯伏,兴,再拜,出殿西门,复位。赞拜,蕃王及其从官皆四拜,礼毕,皇帝兴,蕃王以下出。乐作乐止皆如常。”

蕃王朝见,繁文缛节尚且如此,一般朝贡使“礼仪”则更是一路叩拜,拜得天昏地黑。不过,这一套烦琐礼仪,绝对不能将其仅仅看作是贡使们对中华帝国的一番敬服的表示,从根本上讲,这一套礼仪是中华封建文明的结晶,透过对它的学习,各国贡使能了解到中华帝国不仅是一个国土辽阔、雄强一世的大国,而且具有高深的

文明。礼仪的烦琐要表现的正是中华文明内涵之深邃。

朝贡制度的另一面,是天朝大国遣使赴各国之册封。册封天使到各国,首先也须备有国书,即“敕书”。书中除了重申中华天朝大国的自我定位之外,对诸“藩”国的朝贡、向化之心与实际行动表示嘉奖;同时对诸“蕃”王提出要求,要他们“常奉正朔”,“宁人保国”。所谓“常奉正朔”,就是中华帝王向各朝贡国“颁正朔”。“正朔”,即中国历法。“正朔”内涵极为丰富,集中了中国人民千百年实践对季节、气候的规律性认识,历书内容还涉及许多伦理道德、礼仪习俗,是中华农业文明的集中体现。古代中华帝国就是企图透过颁正朔的活动,将中华文明流播四方。

册封天使到达各邦国,也逐渐形成一套礼仪制度。

朝鲜就有一套与来华朝贡同样烦琐的接待天使的礼仪。当执行册封世子任务的明使到达时,“上(朝鲜李朝世宗国王)以便服,朝臣以朝服出迎于慕华楼。使臣将至,上于帐殿之西率群臣躬身迎……至景福宫,上王(退位之太宗国王)迎命于宫门之外,使臣奉节诰,至勤政殿。上王先拜节诰于上殿庭。入幄次,上率群臣四拜,讫,开殿。使臣亲授诰命于上,上受讫,下庭与群臣四拜。毕,入幄次,服冕服,出,与群臣谢,四拜,焚香,又四拜。山呼舞蹈,四拜,入幄次,释服。”这一套迎接中国使臣的礼仪,其他各国皆有,礼数也颇隆重。

所有这些国家,在礼仪上都会多多少少受到中华文明的影响。以马来半岛为例,马来半岛各王国对中国大明朝廷赠送的蟒服、伞盖等礼品极为重视、妥为保存,并世代沿用。18世纪初,华汉(Vaughan)等四名英国人遇海难被救,到达柔佛王国首府,看到柔佛国王甚至拥有由600名华人组成的王家卫队。

正因为如此,当明朝官员初次接触到东来的葡萄牙人时,比较之下,“以其人不知礼,令于光孝寺习仪三日,而后引见”。由此可见,中华帝国对于朝贡体制中的礼仪部分,是高度重视、绝不马虎的。

何芳川 北京大学副校长 教授

“华夷秩序”论(下)

[1998年2月在北京大学演讲]

三、“华夷”秩序的实质

和平、友好、积极,是“华夷”秩序的主流。

古代中华帝国各王朝,除却它们处于末世、十分衰败,或遇北方游牧民族大军压境、朝不保夕,都在努力经略“华夷”秩序。它们经略“华夷”秩序的理念与原则,是千年一以贯之的,即产生于东亚大陆中原地区的中华农业文明的最高代表——儒学的有关理念。

“一”与“和”,是所有“华夷”秩序有关理念与原则最本质的东西。这个“一”,就是“天生圣人”——中华帝国皇帝。在他之下,“万国来朝进贡,仰贺圣明主,一统华夷”;“四夷率土归王命”,“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万方仰圣君,大一统,抚万民”。总之,要“大一统”,“一统华夷”,中心只有一个,就是中华帝国和它的皇帝。

只要承认这个“一”,那么在“一”之下,什么事都好办。因为这个“一”,即被承认为“大一统”、“一统华夷”的中华帝国及其“圣明主”——皇帝所追求的,是给万国千邦带来“和”。

“风调雨顺遍乾坤,齐庆承平时节;玉烛调和甘露降,远近桑麻相接。偃武修文,报功崇德,率土皆臣妾。”你看,“风调雨顺”、“承平”、“调和”、“偃武修文”、“桑麻相接”和“率土皆臣妾”,多么鲜明

的一幅大中华农业文明所追求的理想图画啊！

又有一首《太情歌》，更是这种理念的典型，词曰：“万国来朝贡，仰贺圣明主，一统华夷。普天下八方四海，南北东西。托圣德，胜尧王，保护家国太平，天下都归一。将兵器销为农器，旌旗不动酒旗招，仰荷天地。”

只要“天下都归一”，“万国来朝贡”，就一定可以在胜似尧舜那么英明的中华圣明主庇护下，“保护家国太平”。中国帝王对诸“蕃”的敕谕中不是经常描绘一幅“庶几共享太平之福”么，那太平，具体讲还是农业文明的太平，“将兵器销为农器，旌旗不动酒旗招”是也。

历史证明，在中华帝国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确实做到了有“一”就有“和”。在历史上凡是承认并进入“华夷”秩序圈的国家，中华帝国均以“和为贵”的态度对待之。给予很高的封赠赏赐，并与它们保持和平、亲善的关系。早在汉代，对于来贡之日本，汉朝皇帝即册封其为“汉倭奴国王”，并赐印绶，直到南北朝时代，偏安一隅的宋、梁君主，仍册封其为“东安将军”、“征东大将军”。此后，凡来贡之国，一般均有册封，无论地之远近。如唐全盛时，自太宗以至玄宗，均被尊为“天可汗”。唐代之册封，远至中亚、南亚、东南亚各地。封赠不限于国君，也泽及贡使。即使是那些亡国之君，只要承认中国“一统华夷”地位的，逃到中国，仍有封赠。这一点，充分体现了中华帝国绝不势利、一视同仁、始终待之以礼的态度。

在“华夷”秩序中，只有在否认“一”的情况下，才有不“和”。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是郑和远航时（永乐14年）与锡兰（今斯里兰卡）发生的武装冲突。郑和出使锡兰，最初完全是一次和平、亲善之访问。只因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尔负固不恭，谋害舟师”，直至“潜发兵五万”，有所不轨，对“一”的理念大有不敬，郑和才下决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生擒其王”，将其带回中国，“归献阙下”。即使是这样，明帝国对他宽大为怀，将他释放回国，达到“四海悉钦”的良好国际影响。最终结果仍是“共享太平之福”。

就中华帝国于“华夷”秩序下各邦国之间的关系而言,“和”的内容有三,即:中国不干预各国内部事务;中国对各国交往实施“厚往薄来”原则;中国负责维护各国的国家安全。

在一般情况下,各国统治者处理其内政问题,中国是从不予以干涉的。即使是如朝鲜、琉球这样关系密切的国家,在王位的承袭这样的大问题上,也历来是自己作主,从不需看中华帝国的眼色行事。中华帝国对各邦国新君的“册封”,仅仅是一种对既成事实的承认,毫不意味着中国对该国王位继承有什么决定权。

作为“华夷”秩序中的盟主,中华帝国在与各“藩邦”的具体交往之中,总不忘应有的泱泱大国风度。这种泱泱大国风度的体现,就是厚往薄来的原则。这个原则,在明成祖那里发挥到了极致。永乐年间,礼部就明廷对前来朝贡各国的国王、妃、世子、陪臣的赏赐的标准,拟了一单子,进呈明成祖。对于这个已经十分优厚的赏赐标准,朱棣仍意犹未尽,批示曰:“且加厚不为过也!”

“共享太平之福”,其终极目标是建立“华夷”秩序下国家间的持久和平。首先,是中国同各邦国之间的持久和平。1369年,明太祖制定了《皇明祖训》,明确指出:“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而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朱元璋开列了朝鲜、日本等“不征诸夷国”的名单,将除了西北方向以外的几乎所有周边国家与地区都包含在内,表明了中国对外关系中坚持和平国策的重大决心。洪武四年,太祖又谕群臣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轻自兴兵……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这一训谕,勾勒出中国对外和平国策大框架下自卫反击的原则。

除了自己坚持和平国策外,中华帝国还要求“华夷”秩序内所有国家,都要在处理彼此关系上实行和平的政策。这一点,在朱棣

派遣郑和出使的敕谕中表示得非常明白：“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只顺天道，恪守朕言语，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这“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就是诸国“勿得违越”的原则，只有共同坚持这一原则，才能“共享太平之福”。如果有谁违越了这一原则，威胁到“华夷”秩序的和平局面，那么，中华帝国则自认为有权力、也有义务通外交途径、直至采用军事手段进行干预，以维护“华夷”秩序的稳定与和平。

在和平、友好的“华夷”秩序下，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南亚地区，最远至非洲东岸，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得以积极、活跃的开展。这种经济、文化交流有力地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关系与文化的进步。这是“华夷”秩序在历史上的一大积极贡献。

然而，“华夷”秩序并非完美无缺。我们在看到它的和平、友好的积极方面的同时，不应忽视它同时存在的负面，即这个秩序同样有着它的历史的与社会的局限性。归根结底，作为古代阶级社会的对外关系产物，它深深打着古代中华封建帝国对外职能中不平等的阶级烙印。

诚然，“华夷”秩序是和平的，但它的“和”，是有先决条件的。这就是所谓“一”，即由中华帝国及其统治者——皇帝来“大一统”，“一统华夷”。因此，从出发点上讲，中华帝国就将自己摆在与其他一切邦国不平等的基础上，即“自古中国居内以治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彼此之间，是“治”与“奉”的关系，是“抚驭”与“事大”的关系。中华帝国及其统治者，始终居于“华夷”秩序中居高临下、凌驾一切的地位。因此，在处理自己的对外关系时，一有机会，中华帝国那种傲然自大的大国主义的意识，就会在它的各种运作上打下深深的烙印。

当“华夷”秩序内的邦国有了违反上述“一”的原则，哪怕只是中华帝国主观上认为它们违反了这个“一”的原则时，也会将“共享太平之福”的许诺丢到一边，露出狰狞的面目来。这一点，在它处理同自己近邻如朝鲜和越南的关系时，尤为如此。

四、“华夷”秩序的解体及其意义

“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

近代资本主义以西欧为中心而崛起。以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为先导,资本主义的历史大潮,汹涌澎湃,奔流向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同以往古代不同,负有建立世界市场更大任务的近代资本主义所要建立的国际秩序、国际关系体系,不再是地区的,而是世界的、全球的。因此,它势必将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取代世界上任何地区前资本主义的国际秩序。“华夷”秩序自然也不例外。

然而,由于“华夷”秩序是古代世界历史最悠久、水平最高、内在生命力最强的国际秩序,特别是由于这一秩序的核心——中华帝国在明清两代曾发展到十分强盛的地步,而它的腐败、衰颓乃至落后,尚需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因而资本主义对这一秩序的破坏与取代,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这一破坏与取代本身,也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波浪式发展历程。大致而言,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东来的历程相吻合。“华夷”秩序的崩溃,大致经历了四百年,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前产业革命阶段,时间是16世纪到18世纪。这一阶段中,先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到来,后为荷兰人占有上风。1511年,葡萄牙人武力侵占马六甲,从此中国丢失了地扼西去印度洋通道的一个最忠实的友好“藩”邦。据记载,葡萄牙人占据马六甲之前,每年到达马六甲的中国商船有8—10艘;而到了1513年,即葡人占据马六甲的第三个年头,到达该地区中国商船仅有4艘。再据荷兰人17世纪初的报道,从西亚到亚齐已见不到中国的船踪帆影。葡萄牙人在将中国商船挤出印度洋的同时,也把“华夷”秩序的影响挤出了印度洋。1517年,葡人到达广州,自称佛郎机。本想将这个新来的佛郎机纳入万邦来朝队列的中国人很快地就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因为“佛郎机夷最凶狡,兵械较诸

藩独特”。他们“炮声殷地”，“留驿者违制交通，入都者桀骜争长”，这样下去，“南方之祸，殆无纪极”。

西班牙人也不甘落后，1565 年入侵菲律宾群岛，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殖民统治。这样，就将菲律宾群岛也划出“华夷”秩序。16 世纪以后，尽管每年仍有 30—40 艘中国商船南下马尼拉，将船货转上西班牙殖民者经营的马尼拉大商帆，运往美洲，然而从实际上看，马尼拉大商帆贸易已不再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量的延伸，而是在这一量的延伸的表面现象之下，发生了质的变化。作为经济手段，马尼拉大商帆已不再由中华帝国所控制，而是由西方殖民者所控制；它也不再为中华帝国的政治利益服务，而是为西班牙殖民帝国服务。而且，即使从纯经济意义上讲，它也不再起集结西太平洋半环贸易网的作用和古代印度洋贸易网的后援作用，而是被纳入了近代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经济体系，纳入了正在准备和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体系。

17 世纪是荷兰人活跃的时期。荷兰殖民者全面排挤葡人势力，取而代之。1629 年，荷兰人击败了爪哇岛上马塔兰王国的大军，巩固了自己在巴达维亚的殖民统治。此后，荷兰人经过不断蚕食，建立了自己在整个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殖民统治。“华夷”秩序在印度尼西亚群岛逐次崩塌。

18 世纪下半叶到 19 世纪中叶，产业革命的洪流掀起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第二次大潮。1757 年进行的普拉赛战役，标志着英国在南亚次大陆实施统治的开始。东印度公司统治下的印度次大陆不仅再也找不到“华夷”秩序的一丝痕迹，反而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摧毁这一秩序的前进基地。以英国法国为代表的新兴殖民主义者，在这一时期将自己的殖民势力更加迫近中华帝国。英国于 1819 年发动战争，侵占了马来半岛与新加坡；1824 年和 1852 年又先后挑起两次英缅战争，用武力占领了整个下缅甸地区。与此同时，法国也开始将其触角伸入印度支那半岛。1862 年，法国用武力入侵迫使越南阮朝签订了《西贡条约》，占领了南圻

地区。不仅如此,西方殖民主义者还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直接打击了“华夷”秩序的核心——大清帝国。通过《南京条约》与《北京条约》这两大条约体系,使中央王国开始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华夷”秩序开始从根本上瓦解。

19 世纪下半叶,第三次殖民统治大潮伴随着资本主义向早期帝国主义的过渡而展开。这个大潮的一个特征,就是帝国主义要将世界瓜分完毕,让世界上所有前资本主义民族都沦为它的附庸。中华帝国在 19 世纪末,亦受此浪潮冲击,被列强视为瓜分势力范围。此时,“华夷”秩序早就只剩下少许外壳残存,列强连这个残存也不放过,必欲彻底摧毁而后快。1883—1885 年,中法战争的结果,法国正式吞并了整个印度支那半岛;1885 年英国发动第三次英缅战争,将缅甸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对外扩张之路。1871 年吞并琉球;1874 年入侵我国台湾;经过长期准备,在 1894 年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次年在《马关条约》中迫使清廷承认朝鲜“独立”,中朝藩属关系告终。“华夷”秩序中最后一名成员被划出。不久,随着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与《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华帝国完全沦为列强半殖民地。历经近两千年的“华夷”秩序终于寿终正寝。

今天,人类在即将跨入 21 世纪的时候,建立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成了生活在这座星球上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共同要求。但是,我们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秩序”,却人言言殊,其内涵大相径庭。今天的人类社会,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因此,当我们致力于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即新的国际关系体系时,不能不回顾历史,总结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那些“世界秩序”、那些国际关系体系。

自从人类迈入文明社会以来,出现过大大小小的许多个“世界秩序”。当然,除却近代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之外,其余的那些“世界秩序”,其“世界”只是古代意义上的世界,如古代地中海世界、古代穆斯林世界,等等,其实,只是某种地区性秩序而已。

在往昔一切国际秩序或国际关系体系之中,诞生于东亚农业

文明土壤中的“华夷”秩序，确是给人以鹤立鸡群的感觉。它的卓然独立、它的不同凡响，归结到一点，就是它的“和”字：

“和为贵”；

“八方四海庆太平”；

“共享太平之福”；

“旌旗不动酒旗招”；

“天地之间，帝王酋长，田地立国，不可悉数。雄山大川，天造地设，各不相犯”。

政治上和平亲善，经济上、文化上和平往来、友好交流，这种理想、理念和体制运作，无论是“罗马式和平”、“阿拉伯帝国式和平”，还是“大英帝国式和平”、“天定命运式和平”，都不能望其项背。至于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与之相比，“华夷”秩序就“可上九天揽月”了！要言之，我们今天要建立的世界秩序也好，亚太地区的新秩序也好，吸取古代“华夷”秩序中的“和”的精髓与真谛，承袭其“和”的基因，是十分值得重视的。

不过，如前所说，“华夷”秩序也绝非尽善尽美，相反，它打着古代阶级社会深深的印记，带有中华帝国与生俱来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这个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归结到一点，就是它的“一”：

“万国来朝进贡仰贺圣明主，一统华夷”；

“千邦万国敬依从”；

“四夷率土归王命”。

政治上君君臣臣，经济上“厚往薄来”，文化上赐予，这种理想、理念、礼仪、体制运作，浸透着古代封建帝国居高临下、凌驾一切的大国主义精神。这当然是不可取的。其实，放眼观去，自古至今，这种以一元论为宗旨的世界秩序的国际关系体系，又何止“华夷”秩序。罗马式和平、阿拉伯帝国式和平、大英帝国式和平、天定命运式和平和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却又哪一个不是浸透着“一”？！哪一个不是以一个古代帝国或近现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居于凌驾一切的统治地位呢？！就在今天，一些国家在制定自

己的对外经济、政治战略时,我们不是仍然依稀可见“一”的影子么?!

诚然,近代以来,在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之间,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有一种“均势”理论。这种“均势”理论所追求的,似乎是有别于“一”与“和”,即以几个西方列强之间的均势来维持和平,即“均势和平”。其实,这种均势和平,不过是几个企图主宰一切的列强之间打来打去,打得彼此都精疲力竭而想出的一种权宜之计。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均”而不能久,因而“和”亦不能久。为何均而不能久,说到底,还是“一”字作怪。那些列强,个个口念圣经,心怀拳经,一旦时机成熟,就要打破均势,企图战而胜之,再建由它主宰的“一统”秩序。

我们今天要建立的“新秩序”,应该是彻底抛弃这个“一”的理想、理念,由全世界所有国家、民族共同组建的多元的国际秩序。它应超越人类历史上包括“华夷”秩序在内的一切国际秩序,性质是和平的、平等的,构架是多元的,即真正和平、平等的秩序。

作为世界和亚太地区的主要国家之一,我们中国曾建立过古代最先进、最高水平的“华夷”秩序,今天也理应在建设这种全新的和平、平等、多元的新国际秩序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北京大学教务处推荐

【编者絮语】本篇演讲为我们理解中华古代文明提供了一个新的独特的视角。它或许使我们为自己民族的历史感到骄傲,也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前人的种种复杂心态,但它更激发起我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就是在新的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许倬云 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

从中国历史看世界未来

[2000 年 10 月在东南大学演讲]

刚刚顾校长提到东南大学的前身是中央大学。我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我的恩师——文学院长沈刚博先生就是当年中大的一位名教授。另几位我得益甚多的教授也是中大的;我遇到过的工科教授有五六位都是中大到台湾去的。我也算是中大的门外的门徒了。今天我这个门外的门徒到门内来,别有一番感受:我很感激沈刚博先生,他启示我很多关于西洋史观察的角度,教导我做人的方法,他影响了我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今天到他的学校来,饮水思源,想起了沈先生,心里就有一番特殊的感受。

顾先生给了我这么一份荣幸,我相信我有机会还会回来,我欢迎各位通过 E-mail 继续讨论学问——我很乐意。(掌声)

下面开始我的演讲。

人们常常以为历史就是讲故事:什么雍正王朝啦,康熙大帝啦——历史并不完全是这样。我做的历史工作都牵涉到分析:把历史材料从观察的角度组织起来,划分类型,再拿类型作比较,观察不同类型之间有什么特点,以及这些特点意义安在。历史是一种阐释——解释过去对我们的意义。

我眼里的历史,不但有个人,更有那个时期所有的人。在我看来,个别的人物没有全体的人作用那么重要。历史不等于人物传记,也不等于考证,从大历史的角度观察,它是一种解释工作。观

察历史的变化,有两个不同的角度。一个是时间,历史从古到今按时间的演变。通常是分期观察。中国传统的做法,是按朝代划分——二十四史,一朝一朝发展过来,这是中国独特的一种断代方式。西方也有朝代,不过他们远不如我们看重朝代,因为他们是多国体制。像非洲的一些国家根本就没有朝代可言。印度的王朝也不是很清楚。日本的王朝号称从古至今只一代。因而中国的朝代划分在世界的历史学中也是独树一帜,中国学者对朝代也很看重。

我这里介绍三种从时间的角度观察历史发展的观点。第一个直线变化就是马克思的社会变化演化论。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人类历史的发展被分为五个阶段。第二,历史中有生命的循环,有如人的生老病死。一个文化的诞生、繁荣、衰落、终结像春夏秋冬一样的轮回。一个文化周期完了,另一个文化周期开始了。第三,中国有“三世”之说:最古老时候的“大同世界”到“小康之世”再到“巨乱之世”。这三种方法,都是以时间为顺序划分的,是历史界最常见的划分法。

另一种区划法是以空间划分,以不同的地区上的人物和事件以及它们的变化组织成历史。一位地理学家说过:不同的地理条件,就有不同的变化形态出现,每一种变化形态都是跟它的自然资源相配合的。汤因比则说得更为明白,他说世界上共有 21 种文化,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每种文化都有它的特点。汤因此特别强调历史变化中的刺激与反映:一个类型存在,既有内在的无产阶级与当权派的冲击,也有外在的无产阶级与内部的冲击,这些都导致类型之间的转换。这些变化和冲击不是在演化中出现的,而是以外来或内部变化的力量为动力的,这就不是单项的进化,也不是以时间为轴产生的变化,而是平行的,同时的,若干不同的族群彼此来往冲击而产生的变化。

这两种类型我仅举几个例子而已。实际上许多历史学家归纳时都不知不觉使用这两种类型。比如梁启超先生在汤因比之先也提到过演化和冲击两种类型。历史学家把时间和空间综合起来讨

论是常有的事。我下面举的三种例子,它们的素材都是史前的历史。中国有一位重要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他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一直到两年前离开人世,用区系类型把中国各地区的历史划分成各种类型。这些类型之间有碰撞,也有渗透。相邻近的小区域的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之后,形成了六大块或七大块文化区域。他特别强调,一方面小类型自身有演化的动力,另一方面也有类型与类型之间碰撞产生变化的动力。苏先生的工作在中国的考古学上有重大影响:因为以往的单线演化论已经难以应付越来越丰富的历史材料,苏先生的理论又使以往无法归划的材料理出了次序。

傅孟真,也就是傅斯年先生,是我以前所在的单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始人。他在中国历史的朝代史之外建立了一套新的历史解释方法。他说,中国的历史在最早的传说时代,不外乎东边的“夷”和西边的“夏”。它们彼此对立冲突,“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而后,中原终于融合为一体,历史冲击的力量转为南方和北方的对立,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对立。有北方往南的政治力量,也有南方往北的文化力量和经济力量,形成了复杂的对立、冲突、融合。傅先生这一组织历史的方法,也是以时间为纵、空间为横,立体的历史方法。

梁任公先生则是以中国文化圈逐步扩大为线索来解释中国历史的。他说,传说时代(那是梁先生的时代还不存在考古学,只能用“传说”来替代)的中国正要聚合成一个完整的中原(中原,今之河南也)。到了夏商周时代,中原逐步扩大,包容了今天山东省、山西省和陕西省的一部分。“中原”的中国逐步扩大,到了秦汉时代,就变成了“中国”的中国。在“中国”的中国,中原及中原周边的文化互相激荡,互相融合,构成了秦汉的秩序。之后,“中国”的中国继续扩大,把周边其他部族及文化也吸收进来,到了南北朝时期,成为“东亚”的中国。随着成吉思汗的狂飚和东南亚海上贸易的开展,中国对外移民,文化对外扩张,策封制度使中国的文化力量延

伸到了日本、朝鲜,中国的政治制度被周边模仿。这时的中国,变成了“亚洲”的中国。中国文化圈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扩大,包含着中心文化与周边文化的融合和冲突,文化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伸和缩、进与退。这同样是一个有时间、有空间、立体的历史。梁先生据此预言将来会出现一个“世界”的中国。

所以,历史不单单是讲历史故事、历史人物,而是一种视角,一种方法,考察我们的过去,“以史为鉴”,预测我们的未来。所以对待历史,要有开阔的视角,不要局限于谁打败了谁、推翻谁,或者某个漂亮女子终结了某个王朝——我常常替那些漂亮女子感到冤枉!她们没有一个有这个能力可以终结一个王朝,都是那些饭桶男子搞不好,怪罪那女子。(笑声)

下面我讲的是“中国文化史发展的模式”。我特别挑了一段来讲,目的是对事情发展的后半段,未来的格局作一个对照。

中国在西周时代的体制,是封建体制。周朝的王子们,带着夹有商贾的军队开到疆外,建立兵城;和当地的土著合作,封土著首领为贵族,吸收土著的军队整编成同盟,变兵城为都城,这样驻守在各地的军队就成了封国的基础,形成了周人的封建体制。大家注意:这个封建体制只是一个一个的“点”,尚未连成“面”。“点”是有限的,“点”与中心的纽带是通婚、策封、分配土地,由此构成一个面。这个面是不稳定的。周朝的封建秩序是靠最高层策封诸侯,再由各地的诸侯控制各地人民来维持的,像宝塔一样的社会结构。仅在上层人物中有统一的文字、统一的礼仪和法制。统一的文化仅限于上层,中下层的文化非常土著化,上下绝少交流,尚未实现真正的同化。

到了春秋时期,周朝衰亡,各地诸侯群雄并起,不再受中心的控制,建立起各自的国家。这时候,各地的统治者开始关心自己的臣民,当地的文化开始向上层封建文化交流。这时每个国家都开始具有自己的地方特色:方言、起居方式、饮食等等。

这种地方性的政治局面就是从统一制度崩解下来而形成的列

国制度。列国制度维持了很久。在这个礼坏乐崩的时代里,每个国家都要重新找回自己的价值,重组自己的秩序。它们彼此之间也是你仇我敌,争战不休,在战争中完善列国体制,上层文化不断向下渗透,在内部构成一个新的认同,构成各国的本土文化。

18 世纪到 20 世纪的世界格局也是如此。最近 200 年来的历史变化,也是各地逐渐建立起民族国家,使原先共有的文化地方化。比如欧洲曾经有共同的语言——拉丁语,由教会带到各地,后来逐渐演化成今天的英语、法语、德语等等。这种趋势自 18 世纪开始从欧洲一步步蔓延到了世界各地。从合而分,构建出一个地方的民族,之后又对外扩张、渗透,又构成一个新的“合”的局面。例如英国对外殖民扩张,形成了大英帝国,之后各地又抗争,摆脱殖民者的控制,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国家。这个过程和春秋战国时期非常相似。

这些古代列国的体制之间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

第一,它们有一群新兴的知识分子,如孔子、孟子、墨子、荀子等等。他们所处的地域不同,却讨论着同样的问题:如何治理国家,如何用不同的理智来治理共同的人性,什么叫“人”,什么叫“社会”,什么叫“政治”。知识上共同的需要导致了各国共同的知识阶层出现,他们之间通过旅行、著书、书信等手段接触。

另外,各地通过贸易互相学习,文化上地方色彩和共同色彩同时出现,艺术上如此,文学上如此,文字上也如此,经济也相当统一。这是将来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先决条件。天下文化统一意识已经存在,各国对“天下定一”没有争执,只是“定于谁”的问题。

第二,东亚文化圈。西屿先生是一名日本学者。他说东亚有一个共同处:从学习中国而得来的制度。中国的策封制度,使中国的律令、政府的组织、政府法律,传播到东亚各处——比如日本、朝鲜、越南,它们都有汉字,都有儒家思想,都有华化的佛家思想。这些反映出,从一个文化国,由于文化的传播,可以构成一个内部大同小异的大文化圈。大文化圈和中心文化圈之间也有很大的差

异,但是几个基本的假设是一致的,可以存留很久。觉敏义,日本学者,他说东亚的汉字文化圈还加上冲突的对象——北方有与草原文化的冲突,南方有和海洋文化的冲突,这个圈子就更大了。太平洋地区有三层圈:中国文化为内圈,东亚文化为中圈,北方草原和南方海洋文化是外圈。西屿、觉敏义和任公先生解释的圈都是共同一种方法。他们强调“外来”的文化冲击力量之强大,可以在其移植的地方成长出新的非常有活力的文明。

“天下国家”和“东亚文化圈”,我举出中国文化两个发展模式,以此来看我们当今的世界格局。现代的世界,不可否认,最大的文化冲击不是出自中国——不然我们不会穿西装打领带。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中心。欧洲这个中心也是逐渐扩大的:由爱琴海的希腊渐渐扩大为东地中海的希腊,由城邦扩大成希腊文化圈,再扩大成地中海罗马文化圈;一直扩大到欧洲大陆的罗马文化圈,后来又分崩离析,形成西欧和东欧,构成了欧洲的欧洲文化圈;然后跨过大西洋,形成了大西洋两岸的欧美文化圈。现在每个地方都感受到了这种文化的压力。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除了今后未知的以外,以前的发展模式,不是和梁启超先生所讲的“中国文化圈”一样一步一步扩大吗?

欧洲的列国体制比较靠后,而中国的列国体制比较靠前。中国构成了天下国家——秦始皇以后,中国就是天下,天下国家笼罩着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时间长久且没有中断。欧洲则不同。中国人脑子里天生有一种“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观念,“天下”是一直存在的。而欧洲在教皇时代,有一个“神的世界”:天上的神是上帝之神,地上的神就是罗马——有两层,一层在上面,一层在下面。希腊是由“城”一步步扩大成一种文化势力的,中国则是“国”,两种观念不一样。文化起跑的时候,中国是以“国”为起跑点,欧洲则以“城”为起跑点,所以我们是“天下之国”,他们是“上帝之城”。

从一个小单元逐渐扩大到跨洲跨洋的大单元,不仅是中国一

个特例。欧洲一样也有,只是他们的列国体制分裂之后,一直未等到第二步的重合。而中国正式合成了“天下国家”,并从秦始皇一直维持到今天。

下面是我们的问题。

未来。未来世界是什么样的,如果全球性的秩序正在来临,有没有征兆?有。非常清楚。前20年还没有这么清楚过,今天非常清楚:世界性的天下国家正在形成,上帝之城没有了,有的是人类文化的共同城——“网”——网络,这是顾校长的专业吧——正在把全世界都抓进来。30年前、20年前都不太清楚,现在看到了端倪。

第一个端倪是经济的全球化。20年出现了两个新事物:跨国公司和多国公司。跨国公司,一个商业公司的生产分布在世界各地。福特、三菱等,在不同地方生产、组装,然后送到各地销售。多国公司,由许多国家共同投资。我们在美国住旅馆,不同的旅馆往往在同一个大公司麾下。我们打电话,Bell电话公司是一张大网,这个大网已经延伸到日本、欧洲和香港特区,这张网是多国共同投资的。现在我们海峡两岸虽然还没有直通,可是台湾的华航和大陆的东航已经共同投资,准备成立新的航空公司。商业的“网”出现在20年前,迅速地扩大,过去很清楚谁赚谁的钱,现在好像每个人都在赚别人的钱。

第二个端倪其实源头很早——原子弹。原子弹1944年发明,1945年丢到日本头上去。后来一步步升级,从原子弹升级到热核弹。核灾难的“网”,核的阴影,罩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谁也不敢打仗。核的阴影最终是“以战止战”。二战以来,没有全球性的冲突,只有小战争。这个阴影是全球性的,使人们感觉到命运与共。

第三个,人类命运与共的东西是环境。哪里火山爆发,火山灰是没有国界的;中国的酸雨可以飘到华盛顿,美国的酸雨可以飘到欧洲。自从核弹的阴影扩散开来之后,环保意识才被重视起来,大

家意识到许多东西是人类命运与共的。资源上的共享,资源上的流转,迫使大家不能再你疆我界。

但最终的统一等待着一个东西来完成。直到网络的出现。Net!Dot com!现在Dot com是无处不见的,Dot com造成了一个新世界,新时代。各位都是Dot com时代的人,我是原始人。(笑声)我有朋友见了电子计算机就躲得远远的——他怕触电。(笑声)你们和我们已经是两种人了,你们是新时代的文明人,我们是旧时代的原始人。

这个新的文明时代,靠Net world构成,它是全球一体化最后一道工序。文字上就是WWW!把大家连在一起。World Wide Web!相应的政治制度是联合国。

今天的联合国可以谴责某个国家,说它某件事做得不对。参加世界性的组织,比如WTO,你必须放弃你的一部分主权,如关税;参加什么国际协定,你就要放弃一部分主权。这时国家的主权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了。假如没有“天下国家”世界秩序的意识,是不可能有这样的组织出现的。新的政治秩序的出现也是有一定条件的。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非常类似春秋战国后期的“天下呜呼定?定于一”的格局。列国时代已经渐渐过去,共同意识、共同秩序正逐渐出现。春秋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阶层,今天有没有呢?有,就是现代科技知识的拥有者。

我们看看世界上有没有第二套物理学?没有。有没有第二套化学?没有。有没有第二套WWW?没有。拥有这一套现代科技语言的知识分子就是新的知识分子。在战国时代,共同需要的知识是“怎样组织一个国家”,需要政治学、法律学、伦理学。现在要掌握的是“怎样解释自然现象,怎样使自然资源为人所用,怎样把知识系统化,怎样用知识扭转各处”。这是以科技知识为核心的新的知识分子。我们叫它知识的权力,Power of Knowledge!

Power of Knowledge非常强大,知识权力可以转化为经济权力。Yahoo.com,是一位姓杨的中国孩子在斯坦福大学读书时用

5 000美金办起来的。现在大家都知道 Yahoo, 他的资产不计其数。

知识可以转化成经济力量, 可以转化成政治力量, 转化成法律力量。知识会转化, 知识无处不在。新型知识分子拥有的力量远比战国时期的孔子、孟子强大。

但今天的知识体系还缺了一个环: 没有组织成今天的哲学, 也没有组织成今天的价值系统。这个工作要靠在座的各位来完成。

Net world, 我们称它资讯革命, 除此以外还有生命革命。克隆, 我们天天从报纸上看到这个字眼。自从那个多利羊出生之后, 我们整天提心吊胆, 生怕哪天克隆出一个许倬云在这儿讲演, 我还不知道呢! (笑声)

资讯革命、生命科学是刚才说的全球意识的最后一块砖, 构成了新的知识体系。

你们看图上的金字塔, 最上面尖尖的像避雷针一样, 代表掌握最高层知识的人, 他们数量很少, 也是掌握最高财富和权力的人。下面是其他人, 直到盘底。我特别感到, 现在的权力和财富愈来愈集中, 集中到金字塔尖像避雷针那么小的区域里。

特性。刚刚讲了世界秩序, 并拿它和东亚文化圈和秩序来对比。它有一个核心, 这个核心就是今天最占优势的欧美。它们相当于东亚秩序里的中国。其他国家都要向它学习, 就像以前日本、朝鲜向中国学习一样。学习者若学习得快, 往往后来居上。我们对日本常常看它不起, 叫它小日本。其实日本不算小, 今天日本也强大得很, 在世界上也算大国。我们平心而论, 就是拿明朝时代日本和中国的艺术品相比, 也是不相上下的。再看儒学, 朱熹学中, 阐释得最精致、面面俱到的人不是中国人, 而是韩国的李退溪。中国人不懂他, 可是洋人读朱子学时, 常常遇到李退溪。他解释得比中国人还好。这说明后来者也可以与之并驾齐驱的。

在世界秩序中, 霸主在欧美, 文化核心也在欧美, 但是学习者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从日本近代经济的发展上已经看到了例子。

日本的生产量与经济实力和欧洲相差不多,比中国大,我们要佩服它。学习者可以不逊于核心的。

在社会财富上,分配非常不均,不仅表现在社会结构上,也表现在空间上。世界上将有若干超级城市,它们拥有的知识力量和经济力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政治权力和社会控制力超过其他任何地方。它们中间谁是“霸中之霸、王中之王”很难说,要通过竞争,而且这个中心可以移动。换句话说,将来新的世界秩序,从空间上来说,有若干中心,其中必定有一个统领全部。今日看来,纽约有可能。但不一定,如果我们做得更好,中心也可以在我们这里。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中心都市。都市有市区,也有郊外,还有贫穷地区。世界格局将非常不均,力量、财富、权力等等,都是如此。这样是不是好呢?不好。能不能挡住它呢?很难挡住。

中国传统的秩序,并不公平,但和欧洲秩序来比,有它的优点。欧洲在罗马为中心的时代,封建贵族散布各处,谁是他们的掌权者、掌财者?教士和贵族。这个阶层是不开放的:贵族是世袭的,教士基本上也是贵族出身。而中国的特点是它的精英——士大夫阶层,是开放的。只要能在科举中进榜就能等于这个阶层,并有机会接近最高层。中国出色的文学家、经学家、乃至宰相没有几位是世家出身,几乎都是平民出身。所以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要比欧洲开放、公平。以此为榜样,我们盼望将来的知识贵族是一个开放的阶层,进出的标准仅仅是学问而不含身世,没有特权;只靠能力,只靠开放的竞争。

但地区性的差异总会存在,南京就比旁边好嘛,但南京就是比不上上海嘛。但这种差异也是开放的,一个地区集中的人才多,人心齐,经过努力后就会有有一个新的核心。美国有一个硅谷,靠的就是当年计算机人才云集于彼,成了现在的世界知识中心。愈是知识革命,人的“脑矿”就愈重要。用中国模式来看,未来的世界秩序应该是“类似中国型”而不是“类似欧洲型”。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能不能继承第一阶段的中心,成为第二阶段的中心,要看自己的努

力。十几亿人口,出聪明才士应该很多,但要喂饱这十几亿人口也不是小事。优势劣势都有,我们做得好,未尝不可使新的中心移到我们这儿。当然,不能通过战争。

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是演变的:从汉朝出现考试制度一直到清末,士大夫阶层是越来越大的,进入也越来越容易,到了明代,他们的思想转换已经非常活跃,只是清代之后才渐渐闭塞起来的。

欧洲则是断续的:从教庭思想一下断裂成启蒙思想,中间没有演变的过程。而未来世界以知识为主体力量的秩序,我想也应该符合中国的模式,即是演变的。但历史的转变是人类决定的,历史没有“非如此走”的铁律,每一代可以选择自己走的方向。刚刚我说了新的秩序不是公平的,基于两个方面:一是我们的价值观念,认为大家相差不多才叫公平,将来这个观念会不会存在不得而知;二是,假如我们仍认为公平分配、利益均沾才是好的秩序的话,如何实现这一点,也是将要思考的。

再拿中国过去的人权来看:中国把人的权利看作是天生的,人就是人,人有七情六欲,孟子说人有四端:礼义廉耻,后来又成了仁义礼智,这些是人本身具有的权利和责任。我国古代的社会福利是同族同区同村的人互相保证。1949年我离开家乡无锡时,我们许家在家乡无锡还有族产,这是不属于任何家庭的,属于许家共同所有的。我读高中时还有族里的几块钱奖学金呢。还规定,族里的孤儿寡妇可以在族产里拿到多少担米。这就是家族负责的中国式福利制度。

这种福利不需要今天所谓的“列国体制”来承担。在“天下国家”的体系内,全世界都分享一个福利不现实,如果能用中国式的福利制度是不是更好?当然不是通过家庭。

西方式的人权是:上帝给你的一套人权——我不信上帝就没人权啦。西方是国家主导的社会福利,天赋的公平和正义通过国家给每一个子民。如果模仿中国式的人权价值,我想我们可以建立起一套公平正义的价值系统,构建一套福利分配系统,来使未来

世界秩序的不公平得到校正。这要靠我们各位努力,这不一个人、一门科学可以做到的。

这一天的来临,“二战”前夕就有人预言了。一个德国哲学家,后来移居瑞士,叫雅士塔,达尔·雅士塔(即雅斯贝尔斯——编者注),他预言:人类会有两次大突破,第一次突破在孔子时代、在耶稣时代、在佛陀时代;第二次突破在20和21世纪之交。他是哲学家,他意指的突破不是指科学上的突破,是指科学突破之后,人类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新的价值系统——Value System。

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价值系统:佛教的、基督的,中国式、西方式、马列式等等,它们中间有冲突也有和谐。很多人想求同存异,提取共同点,找到统一。人与人的分歧就在这不同点上,所以工作不能舍开异点求大同来完成。这需要许多解释工作,寻找意义,寻找需求,再加以界定。

孔子就扮演过这样的角色。不同的学生问孔子“仁”,孔子的回答都不同。当时尚未有“仁”这一套价值系统,没有标准答案。“仁”在诗经里的意思是外表好,有风度,形容贵族的。孔子以此为载体,把它变成了“德性、内涵”。把这个属于贵族器宇轩昂的字眼转换成普通平民都有的内涵。这个工作孔子做了一辈子,他学生做了两百年,儒家做了两千年。这一套价值系统不能靠拼凑而得,要靠不断的探索,思考。

我们现在也要找一个字眼,把它变成全人类共有的价值,这需要你我的努力。

我希望将来是一个知识普及的世界,每个人都有机会跻身知识巅峰;是一个精英开放世界,有民主的政治,资源是全人类共享。

我们继往开来,未来的秩序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得到启示。What it is? What it to be? Or what it shall be? 我们今天所做决定了我们未来所得。

我今天报告到此结束,谢谢!

东南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推荐

录音整理：段胜全 未经本人审阅

林安梧 台湾清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
宗教与哲学教授

儒道文化与台湾现代化

[2000 年 5 月在华中理工大学演讲]

一、楔子,从服饰文化与意义价值认定谈起

杨校长,在座的各位教授,各位年轻的朋友,非常高兴地来到华中理工大学。这是我第一次到华中理工大学来,第二次进行学术交流。因为今天下午我们已经在高教所经过了三个多小时的对话,今天晚上这样一个讲题是由张曙光教授在电话中跟我确认的。

我目前在台湾的清华大学任教。台湾有清华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等等,以前大陆有的大学基本上都有。有朋友问我,那么有没有武汉大学?凡是以地名命名的就没有了,以免混淆。(笑)

我刚才进门的时候,杨校长看到我穿的这个衣服,我想他大概有一种格外亲切的感觉,因为我猜想在杨校长他们这代人年轻的时候对这个衣服都会有一种格外的感情。我们台湾的清华大学除了那个校训充满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意味以外,整个校园基本上是比较洋化的。校训叫作“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取自《易经》乾坤两卦的《大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常常鼓励清华大学的同学说,清华大学的同学应该具有

乾坤天地的精神。有很多朋友问我：林老师，你为什么一定要穿着唐装套着西装，头上还要戴着一顶帽子，这个帽子还是法国帽？我说，其实我是在表达一个议题，这个议题就是今天的议题：儒道文化与现代化。（笑）

我想在座的各位朋友一定会觉得，站在你前面的这位中年林老师的这身穿着打扮还算协调。有认为不协调的请举手。大部分同学都还是认为这是协调的，我就是要证明说儒道文化与现代化是协调的，而且从服饰上表明它们是协调的。服饰其实代表一种身份，代表一个意义，代表一种价值向度，也代表着一种文化的内涵。

我还记得在 1998 年年底，我到珠海去开一个两岸的伦理学会议，路过广州，12 月底我到了香港，1999 年 1 月又在香港召开了一个“中国文化与 21 世纪”的学术会议。在经过这番折腾时我特地带了一件长袍。我想：中国文化与 21 世纪，中国文化具有代表意味的服饰是什么呢？平常穿的那个对襟的唐装还不够，这个场合里头应该把长袍穿上去吧。但是我心里又打算，如果有老先生穿长袍那我就不穿了。结果开会时大家都没穿，我心里打量着是否应该鼓起勇气来穿。第二天，我主持会议跟我发表论文的时候，我穿了一袭长袍去，当然也是鼓足了勇气。（笑）结果每一个人都跟我说，非常好。于是，我那天的讲题临时就换了，叫“从长袍谈中国文化以及 21 世纪的挑战问题。”（笑）

大家有没有考虑过，原来是我们自己的服饰，原来那么平常，而我现在要穿的时候竟然要鼓足勇气！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带有一点叛逆性质的。我们是叛逆的叛逆，因为第一场叛逆就是彻底的西化，第二场叛逆是被彻底西化了之后再叛逆，那就是回归。我记得第一次穿上长袍是我大三的时候跟女朋友在台北的大街上散步时穿上的。走在街上，后面年轻小伙子指指点点说：“奇装异服！奇装异服！”（笑）这是我第一次感到故国衣冠在目前被年轻人斥为奇装异服。说老实话，当时有一种休克的感觉，不知该怎

么办。怎么会这样呢？我的想法就是，原来衣服是一种表彰我们身份，表彰我们的认同，表彰我们对文化的肯定，而为何大家竟然全部放弃了呢？这很值得我们反省。更何况穿着对襟的唐装衣服是非常方便的。它有三个口袋，而且它可以盖过皮带，穿上它是很轻松的。但是，你如果想去买唐装却不知到何处去买。在台湾也很难买到，有朋友还误认为我是在大陆买了带回去的，但是大陆的朋友也问我：“林教授，这衣服你在哪买的？我们大陆都买不到！”两岸的朋友们其实对这种衣服并不是不认同，并不是不那么喜欢，结果他想要去购买、想要它成为穿着的一部分，却那么困难！

二、中国文化是两岸重要联系的良性桥梁

两岸的朋友其实对于中国的文化有着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很愿意为这种文化努力，很愿意参与到这种文化里面来，但是却不知从何参与起。当阅读到的书本不是《论语》，不是《孟子》，却是很直接地对孔老夫子、孟老夫子骂了一顿；当他想了解《老子》、《庄子》，但是他还没了解到《老子》、《庄子》时，却先读到了对《老子》、《庄子》的批评；当他想了解这个文化的根底，却不太有机会，正如同我要买这样一件对襟的唐装都不是太容易。你说，这样的中国文化的追求是不是带有一点悲情呢？一点悲感呢？那我今天就想跟在座的各位朋友说：如果你们有这样的悲情，这样的悲感，那么你们今天不妨跟林老师学习一下，作为一个文化的追求，也可以在服饰上表现，学校没有规定不准穿对襟的唐装衣服吧！（笑）

我说了半天，其实一个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服饰来跟大家说，近一百多年来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些误解，于是提出了一些误解之后的假问题。譬如我们很怀疑甚至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妨碍了现代化，甚至认为应该把中国文化传统全部排斥出去才能现代化，把一切坏的因子都归结到了中国传统文化身上，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这个族群向前进步的最大障碍。但是这样的

感觉、这样的认定基本上是错误的。值得我们深思。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中间经过了明郑、清朝统治,结果甲午战争失败后割让给了日本,日本窃据台湾长达 51 年。之后台湾光复了。据我所知,我们的先辈们在日据时代是通过我们的中国文化跟日本人作抗争的,跟日本人作对决的。当时的中国文化被台湾人作为非常重要的内在生命意义的一部分,也是作为自我认同的最重要的表征之一。当然这些年来有些变化,这些变化是因为政治的或其他的因素造成的,但是在骨子里大家对中国文化是认同的。在台湾你到处都可以发现华夏文化传统。所以中国文化是两岸重要的联系的良性桥梁,这是最值得重视的。

中国文化在哪里呢?它存在于你生存的氛围内。中国文化在你生活的周遭无时无刻不存在着。今天下午我们经过了三个小时的对谈之后,大家提出中国文化在哪里呢?我说其实在台湾你可以到处感觉到:端午节我们是放假的,清明节我们是放假的,中秋节我们是放假的,中元节本来就是应该放假的,因为在暑假,元宵节是放假的。这些节日加起来也不少,当然还有教师节——孔子诞辰日也是放假的。这就是中国文化的表彰。每年过年我们都要回家团圆,过年要贴春联。对联文化是很能表现台湾人的中国文化情结的,很可以表现台湾人对儒道文化的重视。譬如你见到的这幅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二件事读书耕田”。这就是儒道文化的表现。还有台湾到处都有那种小土地公庙。你可以在商店门前看到他们挂的对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笑)气魄宏伟!这都充分地体现了中国文化。

三、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妨碍现代化

中国文化传统在台湾其实是无一日中断。蒋介石的年代,为了对抗中共,就提倡中国文化。我愿意在这里说蒋介石提倡的中国文化是假的,他不是真正为了中国文化而提倡中国文化,因为他

是为了巩固他的政权,为了他的统治;但是蒋介石不反对中国文化,这一点是真的。就因为蒋介石在不反对中国文化的前提下,中国文化在台湾一直延续发展着。这延续的发展它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我就给各位讲讲儒道文化在台湾现代化的过程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我其实前面就提到传统文化并不妨碍现代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近五十年来台湾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这就是所谓的台湾奇迹。这台湾奇迹使得很多社会学家重新去理解、去思考。“东亚四小龙”的崛起跟儒教文化圈都有密切的关联。请问,这背后有没有一个特殊的关联?也就是说,儒教文化圈跟经济的发展、跟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是否有它的关联性。

我们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原来在德国有一个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在他的《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教与道教》里面都提出:中国之所以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是因为中国的宗教文化缺乏像基督新教的伦理,而西方资本主义精神跟基督新教的伦理是有密切关联的。后来韦伯的这个论断使得许多人进一步论证说,正是因为有了西方基督新教的伦理,所以才有西方资本主义的精神,扩而大之才有了现代化。中国之所以没有现代化,或者说在现代化的路上充满了荆棘,全是因为我们缺少了类似基督新教的伦理。一直到目前为止,许多学者都是这样误认的。由于“东亚四小龙”的崛起对韦伯的这个理论提出了质疑,于是一个反论就提出了,认为“东亚四小龙”的兴起跟东亚文化圈有密切的关系,可见儒教的伦理是有助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有助于现代化的。其实,像这些论断里面都充满了西方核心国家为主导的思考方式,因为这些思考里面无形之中导引我们首先承认资本主义的东西才是好的东西,资本主义就是现代化,现代化就是好的。这都带有洋人沙文主义的倾向。

四、解开方法论的本质主义之谬误

我们常常被误导。我们在被误导之下,做了非常多的虚假论述和虚假研究。所以大概民国以来一直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传统文化是否妨碍现代化?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对你说传统文化妨碍了中国的现代化,因此必然得彻底扬弃中国的传统文化。另外一面的传统主义者告诉你传统文化有它非常优秀的本质,它不妨碍现代化,它是可以从这个本质开发出所谓的现代化,所谓的民主与科学。这样论断,其实都是将传统文化在方法论上作一种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式的论断——所以要抓住它的本质,或者彻底扬弃它,或者肯定它。

这些论断表面看起来是对立面的两端,但是我要说它们都犯了本质主义的谬误。也就是认为传统文化有一种本质性的质素,需要彻底扬弃或彻底的百分之百的肯定,这都是有问题。因为在台湾这几十年的发展里,尽管有许多人也在作这种争议,但在发展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传统文化其实就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恰当的调节,同时现代化也就在传统文化的发展中获得另外一种调节。在彼此相互调节的情况下,使得整个现代化就在各种因缘的撮合下恰当地往前走了。正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当然我们也不能百分之百地说台湾成功了,但是必定会成功,这我们是可以肯定的。原因何在?原因就是我们有十分敦厚的儒道佛文化作为整个现代化的根底。

我倒不是说儒道佛的传统中国文化推动了现代化,而是要说儒道佛文化它之所以会进入现代化的历程,是一个历史的潮流,非得如此不可。当然,也有其他历史因缘的撮合,有韩战,有越战,有西方核心国家的带动,还有一群技术型的科技官僚。非常重要的还在于台湾这块土地上中国人的努力,就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地走向现代化。

五、中国文化原来有很强的调节性力量

台湾走向现代化,在这背后,有儒道佛文化作为非常重要的调节性辅助。因为只要你深入儒道佛的文化底层,你就会知道,儒道佛三教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到了宋明理学,特别在明代中叶以后,就三教同流了。这时候三教就已成为华人生命底层的一部分。请问,什么是儒呢?“孝悌人伦”就是儒;什么是道呢?“自然无为”就是道;什么是佛呢?“缘起性空”就是佛。

儒的人伦孝悌在台湾有多深入呢?只要政治人物被揪出来认为他不孝不悌、不注重家庭伦常,这个政治人物就很难继续下去了。作为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里,在台湾来讲的话,多半相信整个大地母土天地所共同形成的这个总体,它有一种自然的和谐性的调节力量。人不可以与天争,人不可与天地相叛,人要在这整个天地的大自然的调节下恰当地知分知命好好地生活下去,多半人是相信这一点的。至于佛教思想在民间已经民间化成为另一种因果报应思想,多半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甚至有更长远的生死的观念认为要积德,要为子孙后代积阴德,要为这个族群的生存积下德性。

这是整个台湾民间流行的观点。它形成了一种和谐的调节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你时时刻刻留有余地,它思考问题时有一个吞吐量。所以到目前为止,在台湾经济的构成中,没有出现韩国那样的大托拉斯。有人认为台湾就是出现不了这种大托拉斯,所以我们现代化的进程要比韩国慢,台湾很多中小企业好像每一个人都想当头,所以当时也引发了许多争议和批评。但是在最近几年的经济风暴里面,我们却发觉台湾承受经济风暴的能力要比韩国强得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大托拉斯,我们中小企业很多,而中小企业它可以集结起来共同面对金融风暴,它有另外一种构成方式来形成一种总体的力量。

我们不要让人家说你们中国人都是一盘散沙,其实错了。中国人当他分散出去后又重新集结起来时力量是很大的。它有一种很奇特的联结方式。这种方式使它竟然成为了其他经济构造体,而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它是一个很宝贵的对应方式。我不是这方面的研究专家,但是在台湾东海大学曾经有社会学家作过这方面的研究,发现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克服了许多经济上的困难的。这是很独特的。这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文化原来有很强的调节性力量。

六、“理论的逻辑秩序”、“历史发生的秩序”和 “实际学习的秩序”的差异

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就是因为具有了这种调节机制才克服了许多难关。我说这点其实是想跟在座各位同学说,现代化并不是我们传统文化自己独立生长出来的东西,现代化其实原先就是特指西方化、西方的现代化、资本主义化的某一个向度。西方的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发生历程,有经济的生产因素,有社会构造方式,有整个政治历史的变迁历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程。就这个历程来讲,应该把它理解成这是一个历史发生秩序。但是现代化已经成为全球的核心价值,并且通过了全球网络系统在全球展开的时候,作为华人的我们,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里面,其实不一定是循着原先别人的路线前进。我们其实是一个“实际的学习秩序”,“学习秩序”与“历史发生秩序”是两个不同的秩序,所以并不是把以前的东西重新来一遍。

这里,我们要搞清楚“理论的逻辑秩序”、“历史发生秩序”和“实际学习秩序”这样三个问题的差异。韦伯诠释资本主义发展与基督教新教伦理精神有密切的关系,这实际上是一个理论上的原思考,是一种后设的形而上学的追溯,也是一种理论逻辑秩序,是事后的“先见之明”。中国近100年来,大部分的思想家、学者在涉及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的时候,都在这三个秩序

上发生了混乱。比如说,就我所知,大陆有学者至今仍然赞同韦伯的观点,认为西方因为有了基督教,才会有现代化,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应该赶快推展基督教。这是荒谬的。还有人认为,儒教文化有助于现代化,所以为了走向现代化,就应该推展中国传统文化。这都犯了误将理论逻辑秩序作为实际学习的次序所造成的错误。还有一派告诉你,我们要按照人家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发生的秩序一步一步地(笑)重来一遍。不是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实际的学习过程。就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这与“摸着石头过河”是相应的。这才是实事求是的原则嘛!

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不必花太多的时间去争论“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妨碍现代化”,而是应该正视“我们如何现代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开始一步一步地想,现代化的特质是什么?我们怎样让我们的生活世界,整个存在境遇,通过组织结构的运作方式,把它呈现出来,实现出来。这时,你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者,你就好好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质素阐释出来,让它成为对话的一个视点,参与到现代化过程中。你作为西方文化的传输者,你就好好地把西方文化中的优秀质素阐释出来,参与到现代化中去。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近 50 年来中国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影响力的思想,使得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近 10 年,使得中国 100 多年从来没有这么富强过。所以,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如何取得新的协调、融会,这是需要进一步做的工作。因此,我们不应该花那么多时间在理论逻辑上去作争论,也不要老是固执于西方现代化原来发生的历史秩序,而应该重视实际的学习秩序。学习意味着调整。

不妨对在座各位朋友说,台湾原先一直就在争论着理论的逻辑秩序问题,争论着历史的发生秩序问题。这是非常有趣的,历史就是在潜移默化中啊!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发现,两派人原先就在争论的历史发生秩序问题还是理论的逻辑秩序问题,通通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五十年来毕竟大家还是在实际的过程

里面一步一步地学习。

就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在课堂上没有被很重视——不可能被重视嘛,因为在整个西方文化的大潮下怎么可能很被重视呢?当时像我这样的人去念文科的根本就是少数。特别是念中国的文学、中国的哲学,那简直是被视为异类。(笑)但我想讲,台湾其实就是因为这块土地的中国人很勤勉,因为这块土地上到处有中国儒教、道教、佛教的文化根底,它在整个西方化的过程里是一个调节性的力量。其实很重要的不在于说你怎样去重视这个调节力量,很重要的在于你努力去学习,而在学习的过程中你不必太在乎你自己的文化传统到底是好还是坏。你肯定它这是我的文化传统,它就会渗透出来参与到你的现代化学习里面,你不要抬举它,它就参与进来了。这是很有趣的。

七、筷子与叉子的比喻:中西文化的基本异同

让华人文化优秀的质素参与到现代化的过程,长出新的苗芽,在我们已经学会理论决定性原则,对于对象的客观性、客观原则有了恰当的把握之后,我们还能够把握它是怎么生成的,这是多么可贵和重要的事啊。我们清楚地知道任何一个存在的对象。作为一个存在的对象是经过了我们的话语系统,经过我们主体的对象化活动以后才成为一个被决定的对象,所以任何一个存在的事物是人们的建构才使它成为决定的对象。

在这个过程中,语言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在语言之上的更高的是“无言之境”。无言之境不是什么神秘,无言之境正代表着一种总体的根源。两千多年前道家作了很深刻的思考,所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西方当代的海德格尔也深受这样的道家思想的影响,他曾经跟中国的哲学家一起翻译道家老子的《道德经》。这个过程里面,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十分深刻的。

对于一个存在的事物,我们清楚是经由主体的对象化活动才使得它成为决定的对象,而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一种生命的彼此的交流互涉和感透合而为一。比如要讲到的两岸问题,两岸同胞血浓于水,这个话就这么简单。这个意思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有这么一种真实真诚的合而为一的感通。你忍心打仗吗?不忍心啊!你忍心自己的同胞成为自己枪下的亡魂吗?不忍心啊!两岸都不忍心啊!孟子说“不忍仁人之心”!这种最真实的生命感通,是华人文化中最重要东西。它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理解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基础点。

它关联到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为、行动,以及认识的方式、伦理态度,甚至我们使用的餐具都相关。大家都知道,西餐是叉子,中餐是筷子。两者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叉子,就是我刚才讲的主体的对象化活动,把握了对象——主体通过叉子这个工具,强行侵入客体,控制客体,举起客体。(笑)筷子呢,筷子是主体运用工具,它不是强力地侵入客体,而是让主体与客体联系起来,达到一种均衡状态,举起客体。(笑)华人思考问题是最有弹性的。

八、儒道文化的“道德”是“天地有道,人间有德”

我们今天这样说下来其实是想谈很简单的问题,原来儒道文化并不妨碍现代化,也不是儒道文化的发扬才促进了现代化,而是在现代化的实际学习过程中,儒道文化起了调节性的作用。这个调节性作用使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能够得以渡过;同样地,在现代化的过程里,回过头来也使得传统文化获得了一些新的调节。

这些调节慢慢地使得某些东西成为现代化的表彰,成为现代化的表现方式。比如,道家虽然会告诉你“小国寡民”,会告诉你“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但是道家更重要地是告诉你:在一个生存的场域里面,有恰当的、自然的和谐性的调理原则,人们

都应该恰当地用这个方式生存,它重点在这里。

其实,依照道家思想,或者依照儒家思想,“道德”这两个字眼原来是非常好的字眼,才不是大家一听就头痛的字眼。“道德”,道生之,德蓄之。道德原来是生成的。“志于道,据于德”。我为什么特别提这一点呢?因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恰当地参与了客观性原则的物质,恰当地组织制度结构的建立,使它成为一个人们共同认可的话题。在这样的生长的过程中,人们的德、人们的本性因此就涵养出来了。

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你们不觉得我们在这里的这个秩序还不错吗?这就是“道生之,德蓄之”。因为今天的灯光好,今天的温度不高,今天的麦克风效果很好。如果这个场地不好,麦克风不好,大家又没有椅子坐,温度在摄氏 40 度,你说在座的各位朋友要求你们有多好的德性,这可能吗?不可能的。所以谈道德,在华人的传统里,应该是“天地有道,人间有德”的。所以这个存在的境域、存在的场域的恰当安排是十分重要的。这是道家。

儒家则要求你不能太过于依赖外部世界,重要的是你要自觉,作为一个主动能动性的人你应该参与道,所以你要起一个志向,对于你生存所涉及到的这个生活的世界所构成的整个历史总体,你要有一个志向,你要参与它,这就是所谓的“志于道”。当你参与它时,那个“道”才会向你显现,向你生长。这样,才能蕴育成为你的“德”。

九、迈向 21 世纪:“乾道难知惟诚立命,坤德未毁斯土安身”

我要说的是儒道文化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它不是起着推进的作用,它也不是起着阻碍的作用,它是在现代化的学习过程中起着—个恰当的调节性作用,并且在现代化之后还可以起着—个制约作用。这点是值得我们去重视的。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已经既成的东西。中国文

化是历史之所产,同时参与历史之能产,作为历史之能产的一部分参与到历史,我们这样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样来理解儒道思想。文化的积淀在于伦常之用语,你有时不清楚,它没有浮现到你的意识层面来,但是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

长时期以来,我们在认识中国文化时,都好像是带了一副墨镜,所以所见皆黑。我只不过揭开了这个墨镜的一点点,使它起了一点微明。就这点微明,我们都可以发现中国文化的许多非常可贵的东西。如果大家现在戴的墨镜全部揭去,中国文化将大白于天下!我们进入到21世纪,对于人类文明将有更大的贡献。我们所讲的不是去统治这个世界,而是要殊途同归,百虑而一致。我们作为世界文化的一个对话的向度,这点是可贵的。

最后,我想用1990年第一次回到大陆参加学术会议所做的一副对联来结论:对联是这样写的——“乾道难知惟诚立命,坤德未毁斯土安身”。在近一百多年来,中国这块大地上遭受了多少苦难,但是我们这个大地母土仍然充满了生机,仍然充满了坤厚之德,生命的力量很强,文化的生命力很强!这个大地母土仍然足以让我们安身。就这一点来讲,我认为是应该肯定的。至于我们的这个族群何去何从呢?不知道!历史不是用我们空口说白话可以预定的。但是人的心是真实的,一种真实的内在的动源,我们通过这个真实内在的动源,我们就能够确定我们族群的生命。这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传统文化是需要大家参与的,现代化也是需要大家参与的。在学习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更广泛的包括当代文化,以及在这块土地上的西方文化传统,这块土地上的各种哲学传统,都应该是作为我们这个族群向前迈进的一个重要的指数。我相信在我们这个族群所具有的调节性的和谐的生长力量的作用下,21世纪中国人将会更好,全人类也将会更好!你说是不?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推荐

录音整理:侯著洲 本人审阅

李洪山 美国肯特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 博士

美国人的中国观 ——国民形象与中美关系

[1999 年 6 月在华中理工大学讲演]

最近中美之间发生了很多事情。美国对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以及美国对中国驻南使馆的袭击,由此引发了国内学生抗议、海外华人的抗议活动。其中,很多美国人也参加了抗议活动,所以说美国人不只一种中国观。中美之间发生的一切,使我们有必要看一看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怎么看待对方,尤其是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人。在这个时间,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正在发生着变化,就像我们对美国的看法发生了变化。20 天前,中美互称“战略伙伴”,这来之不易。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后来克林顿总统访问中国以后,才逐渐达成共识:我们可以尝试建立一种战略伙伴关系。现在很少提这几个字,我们提美国霸权主义,而美国的《考克斯报告》说暂住美国的中国人是间谍、小偷,中国老百姓是暴徒,他们正在制造新的中国形象。

我所在的克利夫兰 5 月 10 日的一份报纸头版上的一条消息:抗议者在摇撼着美国大使馆——主要指一个学生在一排武警面前,手里拿着石头砸美国大使馆。他们的目的是告诉美国民众中国人在砸美驻华使馆。这成了美国人念念不忘的东西。美国媒体认为中国派数以千计的学生到美国大使馆抗议,美驻京的外交人员被当作人质扣押,不能出来。美驻华大使尚慕杰作为一个政客,

很能做秀——他一个人很勇敢地保卫使馆及其物品。他们的目的在于说明发生在中国国内的抗议是一种报复行为,受害者不是中国,更不是三位牺牲了的中国记者,而是美国的外交人员。一方面他们完全扭曲事实,另一方面也同时制造另一种中国人的形象,如我们所看到的《考克斯报告》中描写的那样。中国形象问题,成为美国新闻媒体攻击中国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时候谈民族形象、国民形象是很重要的。我们这段时间游行,美国人也承认我们实际上没有做什么具体事情,我们没有扔炸弹,也没有实行真正的贸易制裁,也没有中断贸易关系,具体行动很少,当然提了很多要求。实际上做得最多的是重新认识对方,重建对方的国民形象。这个国民形象不光对中美关系现在很重要,对未来也很重要。今后中美关系往哪个方向走,与我们这个时候建立的对方国民形象有直接关系。如果我们各自把对方当作敌人,很可能今后成为敌人;如果经过交涉以后,平息下来,仍能维持一种非敌非友的正常关系,也许两国关系正常发展。当然,现在设想两国重新成为战略伙伴很难。如何认识、看待对方很重要,尤其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人,对今后中美关系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我们长期以来认为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比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要深得多。中国领导人这样认为,我们大多数同学、同事也这样认为。其实美国人很早以前也有人这样认为。在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写过关于中国 19 世纪末外交政策的文章,他当时下结论:当时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比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要深得多。这一点我们很少怀疑。为什么还要讲讲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尽管我们对美国有很多很深的了解,但对美国人如何看中国这个问题,我们认识并不是很多,不是很深刻。我们对美国的政治体制、军事实力、经济体系,还有社会、文化都有一定了解和研究,但对美国人究竟如何看中国,研究不多。南开大学研究美国史的一位教授,写过一本《中国人的美国观》,比较详细地讲中国人如何看美国。研究中美关系的专家都知道现在还没有一本

中国人写的《美国人的中国观》。正是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对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不很清楚,所以往往很容易对美国产生一种盲目的偏爱、盲目的崇拜、盲目的夸大的期望。我们以前有过,最近仍然有。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我们对美国有很高的期望,我们认为美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不一样。在“一战”后,我们指望美国帮助我们赢回我们所有的领土和主权,对美国的所谓民族自立寄予很高希望。但是,在 1919 年 5 月初,当美国同意让日本从战败的德国手中取得山东半岛管辖权时,中国知识分子愤怒了,我们觉得被他们骗了,被侮辱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寄予了很高的期望。5 月 8 日这个经历也一样,十分相像,我们对美国有很高的期望,我们对他们有一种偏爱。一旦他们袭击我们驻南使馆,造成三位新闻记者的牺牲,我们又一次感到愤怒,又一次感到被侮辱,被出卖。这种感觉也就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对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不是很清楚,总觉得他们对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华民族有很正面的看法。通过回顾历史,会发现事实不是这样的。这就是今天讲这个题目的原因。

在讲国民形象之前,先讲一下什么叫国民形象。国民形象指一国国民对另一国国民的印象、认识与了解。不同于国家形象、民族形象,它产生于国民之间直接或间接的沟通、接触和交流。国民形象的特点在于不仅反映一国民众对另一国民众的认识程度,同时也折射出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你對自己怎么认识,也可以通过其他民族的认识来反映出来。自我印象、自我认识和他人的认识联系在一起。

国民形象为什么重要?与对外关系、对外政策有什么关系?总的来说,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制定、执行,很难超出这个国家的国民、尤其是政策的制定者对另一个国家的了解和认识的程度。国民形象是制定外交政策、发展外交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可惜我们对此研究不多,希望这一次美国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事件引起大家对国民形象的关注。研究国民形象,当然要看看历史,只有通

过历史,才能看清美国人怎么看待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华民族。

1784 年,美国的“中国皇后”号载着许多西洋参来中国,结果赚了一大笔钱。拉斯腾是管货员,回国后写了一份报告,讲述在中国做生意的经历。报告中说中国是一个巨大市场,希望当时美国的联邦政府资助美商到中国做生意。报告交给了当时的国务卿约翰·杰。美联邦政府 1786 年委任沙利做广州领事。可见,中美关系是在商人的推动下建立的。沙利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作为一个大市场,商人有利可图;但中国政治制度专制,劳动人民愚昧,中国画家没有创造力。美国人最早是通过美国商人和水手的描述来认识中国的。中国政府规定:美商来中国不许带家眷,也不能在中国长住,不许进城。所以这些商人和水手生活很单调,只好信教,请牧师跟随他们来中国。从 1830 年起美国牧师陆续进入中国,刚开始只是服务于美国商人和水手。后来,在中国传教的美国牧师是第一批真正静下心来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美国人。19 世纪,美国的传教士成为美国人了解中国的最主要途径,他们发表文章介绍中国情况,基本上只是负面介绍:宣传中国人愚昧,政府残忍,君主专制、暴虐,中国需要他们来拯救。他们不光在中国传教,向美国介绍中国,同时也在他们自己寻求利益。所以《望厦条约》中包含有美国传教士在中国设教堂、传教的自由,治外法权条款等。治外法权不只是一个法律概念,同时也意味着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美国人作为一个民族、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比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中国各种宗教作为宗教要优越,中国人、中国民族、中国宗教成为次等的。传教士在中国这么多年,尤其在 19 世纪,一直是美国人认识、了解中国的主要途径。塑造一种负面的中国形象对传教士来讲是必要的。传教士在 19 世纪是帮助制造中国形象和国民形象最主要的一股力量。

美国人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了解不仅仅是通过到过中国的人,有些没有到过中国的人,他们在塑造中国形象上也起了重要作用。这批人影响最大的,在 19 世纪可以说是工人、工会和工会领

袖。他们对中国没有多少了解,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最多是来自于在美国的中国工人,直接或间接的了解。在他们眼里,中国人都像劳工。这些工人和工会领袖人物在塑造负面的中国国民形象上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 19 世纪制造中国形象的还有一股势力:政客。他们为了拉拢工人选票,站在工人一边,攻击中国移民和中国劳工。在工会和政客的合作下,美国国会在 1882 年通过第一个排华法案。中国移民几乎停止,直到 1943 年才废除排华法,可以每年限额 105 名中国移民。

20 世纪以后,商人仍是促进中美互相了解的一股活跃势力,这是个讽刺,他们希望中美之间打开大门。牧师影响减小,传教士在中国影响下降,工会影响加强。美国最反对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是工会,最反对和中国进行贸易的也是工会。

进入 20 世纪以后,有几股其他势力加入中国形象塑造的行列:教育者、新闻记者和外交官。但总体上说,美国关于中国的形象仍以负面为主。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对中国国民形象的塑造有以下几个特点:

- 1.在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和认识是负面的,不是正面的。

- 2.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和认识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 3.达到负面认识的出发点和角度不同。中国的负面形象是由美国各个利益集团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来决定的,也是由这些利益集团塑造的。商人、工人、工会、政客和传教士,都有他们自己的利益和目的。他们塑造的中国形象和中国有多大关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为他们的利益服务,这是他们塑造中国形象的一个显著特点。他们不光塑造中国形象,各个利益集团尽自己努力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哪个集团占上风,美对华政策就反映这个集团的利益,这个政策也反映这个集团所塑造的中国形象。

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常常是负面的,是有原因的。首先,中美

差别太大,两国有不同的语言、文化、历史、风俗、习惯、哲学和宗教。正因为如此,美国人很难了解中国。再者,他们不愿了解中国,有很强的优越感。他们的优越感建立在很多基础上,如种族、宗教或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实力,以及意识形态。美国人对中国没有兴趣,了解中国很片面、很缺乏、很浅薄。

美国人对中国有没有在某一时期有正面形象呢?有,但往往很短暂。即使是正面的,也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正面形象往往也是因为他们觉得中国有点像美国,或可以变得像美国了,这时候他比较认可中国,中美关系这时也比较好。但是由于正面形象较短,很快就由一个正面的友好的关系一下子摇摆到负面的敌对的关系上。长期以来,中美关系在敌人和朋友之间两极摇摆,非敌即友。两极的变化和美国对中国的认识有关系,也和美国对中国从正面到负面的反复变化有关系。要解决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是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在过去的一两个世纪中,中国形象的大幅变化,总是操纵在一小部分人手里,他们在塑造中国形象上起了左右全局的作用。美国老百姓对中国知道得太少,你告诉他们什么,他们就只有接受什么,很容易被操纵。要让更多的美国人到中国看一看,百闻不如一见。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是旅游、参观访问、学术交流等等。国内的相应配套工作要做好,在增加民众互相了解上花些钱是值得的,会有回报。我们还要加强对美国媒体的工作,让他们公开、公正、如实反映中国的情况。

只有美国人了解中国,中美关系搞好了,中美两国才都有和平环境进行建设,我们才可能把中国建设得更好。帮助美国人民了解中国,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需要每个人尽一份力。

我们中国人要想取得外国人(包括美国人)的尊重,我们自己必须自强、自尊、自重。这反映在很多方面。美国人的优越感也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对外商也一样,给外商最好的待遇就是国民待遇。西方世界、日本和韩国都是这样,我的国民最重要,我能给你最好的待遇就是把你当我们的国民一样,而不能让你比我的

国民更高、你的企业比国企待遇更高。这是从作为政府政策来讲，这些方面可以做些调整。这些调整有利于帮助外国人正确、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

我们中国也要提供条件让外国人、美国人完整、准确、客观地了解中国。这一点不光政府要做，老百姓也要做，你和我都要做。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供稿

未经本人审阅

【编者絮语】本篇演讲是1999年5月发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后不久所作的。在整理本篇演讲稿时，又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为什么美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有损两国关系的事情？这篇演讲揭示了其中的一个原因。中美关系不仅事关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因此，除了在政治、军事上坚持不懈地与美国霸权主义作斗争外，在文化、舆论上，我们还要同美国国内存在的一股“妖魔化中国”的势力作斗争。

赵 林 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 博士

张星久 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

中西文化对谈

[2000 年 4 月在华中理工大学演讲]

赵:中西文化比较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张教授的专长是中国文化,我主要是研究西方文化的,我们各自从自己研究的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希望能够寻找到一个结合点。中西文化都有着悠久的传统,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都曾创造过辉煌。可以说,一直到明朝中叶,中国文化在总体水平上都始终是高于西方文化的;然而在当今世界,西方文化无可争议地领导着时代潮流,中国文化则显得相对滞后。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西方文化自我更新的速度要比中国文化更快一些,而这种较快的自我更新速度又是由于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化杂交”所致。我们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往往爱一概而论,实际上,西方文化是多种文化传统相互碰撞、组合的结果,在它的内部包含着许多子系统,这些子系统之间的差异性是很明显的。一般而言,西方文化至少包含着三种传统,一种是希腊的,一种是拉丁的,还有一种是日耳曼的。这三种传统交织在一起,很难说哪一种传统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主流。希腊文化传统虽然就民族的范围而言似乎是最小的,但它的影响却非常深远,不论是对于古代的罗马文化和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还是对于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现代文化,甚至对于西方今天的所谓后现代文化,希腊的影响都是深入骨髓的和如影随形的。希腊

文化传统既体现为一种追求知识的科学精神,同时也体现为一种弘扬人性的人文精神。拉丁文化传统在西方历史中是与国家主义和法权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在古代塑造了气度恢弘的罗马帝国,在近代则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发展和法制体系的建立。日耳曼文化传统虽然介入西方历史较晚,但是它却与源于东方、长于罗马的基督教有着内在的精神默契,16世纪以来在日耳曼文化圈中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对于西方现代文化的崛起和西方社会的转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内部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超越和彼此融会,促进了西方文化这个大系统的自我更新。而中国文化自秦汉以来,基本上是循着一条所谓“以夏变夷”的路线发展下来的,各种异质文化在中国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面前不是被同化,就是被排拒,从而使儒家文化始终能够保持一种唯我独尊的纯粹性。在生物遗传学中有一种现象,叫做“米亚德现象”,就是指杂交的两个亲本在子代中呈现出一边倒的遗传结果,即只有一个亲本的性状得以显示,另一个亲本的性状则完全消失了。正是这种保持自身纯粹性和独尊性的文化“米亚德现象”,导致了中国文化自我更新功能的退化。

张:刚才赵教授谈到西方文化的传统有三种,我理解西方文化从一开始就不断地受到异质文化的冲击,因此是多种文化交汇、叠加的结果。包括东方文化如阿拉伯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无疑也推动了西方文化的自我更新。而中国文化则地处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中,它的活动长期以来仅限于亚欧大陆东部的一个自然地理单位之中。这个自然地理单位可以称之为华夏文化圈。当时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周边文化,基本上都属于华夏文化的分支,它们之间的共同性是很高的。在先秦时期,各周边文化还保持着各自的文化独立性,但是通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冲突、融合,到了秦统一六国之后,彼此之间的差异性就越变小了,从而培养了中国文化极强的自身繁衍能力和自我认同能力,并且也形成了对异质文化的极强的同化能力和拒斥能力。

赵：中国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华夏与四夷之分，当时以黄河流域中游为华夏即正统文化，东边称为夷，西边称为戎，北方称为狄，南方称为蛮。夷、戎、狄、蛮均为贬义词，与生番虫豸相通。在中国文化史上，从先秦时期开始，以夏变夷始终就是主导，当然也曾经有过以夷乱夏的情况。

张：比如说南北朝时期，就是比较危险的一次。

赵：南北朝时曾一度形成了“五胡乱华”的局面，匈奴、鲜卑、羌、羯、氐等少数民族占据了半壁江山。后来又有契丹、女真、蒙古族的入侵和满族人入关，建立了辽国、金国、元朝和清朝。元朝的统治是短命的，才 90 多年；清朝的统治却可以称得上是长治久安，如果不是由于鸦片战争和西方列强入侵，还会持续得更长一些。但是无论是短是长，有一点是根本性的，这就是外来民族要想在中国站稳脚跟，就必须以华夏文化或儒家文化为精神支柱。蒙古人在马背上得天下，也想在马背上坐天下，将深通儒家文化的南宋子民贬为最卑贱的四等公民，到头来只能是昙花一现，很快就灰飞烟灭了。清朝的统治者们吸取了蒙古人失败的教训，多尔衮入关之后就强调，要想治理好汉人，就必须沿用汉学。

张：清初的统治者在这一点上是比较成功的，比如说为明朝的崇祯皇帝举行国丧，祭拜孔庙等等，这些都是尊崇正统思想的表现。

赵：西方的情况就不同了。罗马人征服希腊，虽然也吸收了希腊文化的许多东西，但是罗马文化与希腊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它把希腊文化所缺乏的一些东西，如法权关系和国家崇拜等带到了西方文化中。到了罗马帝国时期，罗马文化开始向着物质主义的方向发展，整个社会陷入一种醉生梦死、穷奢极欲的放纵之中。这种粗鄙的物质主义和纵欲主义与希腊质朴而和谐的文化风格是截然不同的。到了公元 5 世纪以后，随着日耳曼蛮族的入侵和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基督教文化终于在罗马文化的废墟之上树立起来，而基督教文化与罗马文化从一开始就处于针锋相对的直接对立之

中。二者一个是物质主义的,一个是唯灵主义的;一个注重现世的、物质的和功利的东西,另一个注重彼岸的、精神的和超越的东西。贯穿整个欧洲中世纪的教俗之争,说到底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再现着罗马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冲突。当然,基督教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逐渐背离了自己的原则和宗旨,基督徒尤其是神职人员的实践活动越来越严重地偏离基督教的精神理想,从而在基督教社会中造成了一种普遍的虚伪和痛苦自我分裂。对这种普遍虚伪和自我分裂的批判与超越就导致了作为西方历史的重大分水岭的两场文化运动——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在随之而来的西方近现代文化中,希腊的、罗马的、基督教的成分以一种合而不同的形式相互联系着,彼此之间既有内在相通的契合点,又保持着相对独立的文化特性。可见西方文化的这几个源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中国文化那样以一种成分为主导来消融、同化其他成分,而是采取了多元共存、兼收并蓄的形式。正是这种多元化的特点使得西方文化更易于自我否定和自我更新,而中国文化的历史惰性和超稳定性大概也与那种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强化的自我认同和一元化特点有着直接的联系。

张: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也有一些东西是一脉相承的,比如说一种超越性的倾向,对形而上的问题的关注。在这方面,从希腊文化到基督教文化,再到西方现代文化,彼此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希腊人注重形而上学,基督教文化强调唯灵主义,有了这种形而上的和宗教的支撑,西方人才会在关注现实世界之外,始终保持着一种对终极事物的兴趣。相形之下,中国人的眼光往往局限于现实世界,强调经世致用。比如做学问,中国人强调学以致用,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叫做“理论联系实际”,学术为现实服务。在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有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求知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的好奇心和精神愉悦。西方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如开普勒、牛顿、爱因斯坦等人,他们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杰出成就往往与他们对终极问题的宗教情怀密切相关。

赵:汤因比曾经说过一句发人深思的话,他说:“世俗世界的巨大成就往往是圣城工作的意外收获。”西方文化虽然在世俗世界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它的精神始终指向一个超越性的维度。希腊人崇尚神和英雄,基督教徒向往天国理想,即使在看起来十分功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仍然有一种反资本主义的精神理想在始终不渝地批判着现实。共产主义理想从一开始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孪生物,虽然它出人意料地在东方结出了果实,但是它的根基却深深地植于西方文化的土壤中,与希腊的超越精神和基督教的天国理想有着内在的渊源关系。西方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把眼光投注到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之上,这种东西对于现实生活来说或许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是它却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否定和超越。而且从整个历史过程来看,西方文化还具有一种两极跳跃的极端化特点,罗马文化一头扎入了声色犬马的物欲洪流,基督教文化则执迷于摧残人性的灵魂救赎。然而在这两极对立的背后,始终潜伏着一种自我超越的内在冲动,一种否定现实的形而上理想。正是这种根本性的内在冲动和形而上理想,促使西方文化得以不断地实现文化形态的自我更新。

张:相比之下,中国文化则更多地具有务实精神,它更注重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人,特别是人们的现实的道德修为。因此,与中世纪基督教文化过份偏执于异化的彼岸生活相比,中国封建社会还是更多地表现出了一种人文精神。中国文化最高的理想就是道德境界,就是个体自身的道德修养和人际关系的和谐。极高明的大同理想就落实于个人的正心诚意修身养性的道德实践之中,正如朱熹所言:“其高极乎太极无极之妙,而其实不离乎日用之间;其幽探乎阴阳五行之赜,而其实不离乎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朱熹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条目,可以说是道尽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全部理想。

赵: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苗力田先生,积毕生研究西方哲学的心得和参悟中国文化的体会,在一次西方哲学的学术会议上对

中西文化的差异作了如下概括：中国文化重现世，尚事功，学以致用；西方文化重思辨，尚超越，学以致用。这种差异早在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就初现端倪，在中西文化的两位圣人——孔子和苏格拉底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孔子虽然也表现过一些超越精神，如“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是他的人生志向始终是经世致用和兼善天下，而不是自我超脱和独善其身。儒家知识分子具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们的知识修养和道德修养都是为了成就功名和跻身朝政，所谓“学而优则仕”及其科举制度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内圣是为了外王，修身养性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这充分表现了中国文化的入世性和功利性特点。相比而言，苏格拉底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知识，把知识本身当作目的，对现世生活采取了一种否定和超越的态度，他的一句名言是：“应该追求好的生活更甚于生活本身。”而这种所谓“好的生活”，说到底就是一种彼岸性的理想。苏格拉底的超越精神后来通过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而影响了基督教，成为基督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精神砥柱。

张：胡适先生认为，孔子在精神上也有某些与苏格拉底相同的东西，即思辨、怀疑，学原于思，如孔子也曾说过：“朝闻道，夕死可也。”但是总的来说，苏格拉底毕生追求知识，求知本身就是目的；而孔子求知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求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其实在中西文化的早期，许多“原点”都具有共性，中西文化的分野是从“轴心时代”才开始的，在以后的历史演化中逐渐变得泾渭分明。早期希腊人与殷商时代的中国人一样，都注重祖先崇拜和血缘关系，都具有一种原始的天人合一倾向。后来中西文化的分野，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地理环境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它导致了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希腊半岛土地贫瘠，四面环海，希腊人要想谋求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通过海洋这个宽阔的跳板向外扩张，这样就培养了一种勇于开拓的冒险精神。这种征服海洋和向外扩张的冒险精神后来在近代欧洲人那里再一次强烈地表现出来。而古代中国人则

由于地处内陆,黄河流域土壤肥沃,环境的挑战性相对要小得多,因此养成了一种安土重迁的惰性心理。这也是中西文化产生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赵:张教授认为中西文化在早期有许多共同的性质特征,我们研究二者的分野应该从源头开始,这是非常重要的。孔子认为商代文化的特点是“尊神事鬼”,商代讲究祖先崇拜,注重求神问卜,事无巨细均须先卜而后行。同样的,希腊城邦文化的前身——克里特、迈锡尼文化也具有崇拜鬼神的特点,它受埃及文化的影响较深,对死后的生活比较关注,敬亡灵、求神谕之风颇为盛行。这两种文化在时间上是大致平行的,殷商时代大约是在公元前17—前11世纪,克里特文化的鼎盛时期约为公元前16世纪,其子遗迈锡尼文化最后也是毁于公元前11世纪。商朝灭于西域小邦周人之手,迈锡尼则灭于北方蛮族多利安人之手。在中国,周人取代商人的统治,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而且也是一场宗教革命。随着政权的变更,周人崇拜的“靡常”、“无亲”、“惟德是辅”的至上神“天”就代替了与商人有着血缘关系的至上神“帝”,商人与至上神之间通过供献牺牲而维系的赤裸裸的物质交换关系,在周人那里被改造成一种通过宗法礼仪制度而维系的道德联系,“天”成为高高在上的抽象性的道德监督,它与人德相呼应,人要想承受天命,必须“以德配天”。而“德”又具体表现为宗法礼仪,从天子、诸侯、大夫、士以至庶人,在居室、婚娶、丧葬、祈祷等方面均有着严格的规定,彼此不可逾越。到了春秋时代,孔子及其弟子又进一步对周代僵化刻板的宗法礼仪制度进行了内在化的改造,将外在性的“礼”转化为内在性的“仁”,将“仁”解释为“亲亲”、“爱人”之心,并且将“德”之根基深置于人心固有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等“四端之心”中,使仁义礼智成为人性之本。由此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决定了中国文化从人的内在本性入手,通过修齐治平之道最终达到大同理想的基本进路。

张:发生在中国商代至春秋时期的这个由外向内的聚敛过程

决定了后来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既然一切超越的东西都落实在人心固有的仁义礼智之间,那么人只须向内下功夫,就能由内而外地达到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从而成己成物,内圣外王。

赵:与此同时,在西方也发生了一个意义重大的文化变革过程,这就是从希腊多神教向基督教的转化。通过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主义的中介,自然直观性的希腊诸神被彼岸性和超越性的唯一上帝所取代。如果说中国文化在轴心时代的文化精神变革走的是一条向内聚敛的道路,那么西方文化在同一时期走的则是一条向外发散的道路。基督教的上帝和唯灵主义的理想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抽象物,与人直接对立着,它们构成了现实的人的彼岸,人只有通过痛苦的自我否定才能达到这个光辉的彼岸。这就使得西方人不是向内在的方面去发掘良知,而是向外在的方面去寻求救赎。由此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分野:中国文化以人性本善为出发点,在内在的道德良知上下功夫,将眼光投注于现实性的人伦规范;西方文化以人性本恶为出发点,向超越的灵性世界求解脱,将希望寄托于彼岸性的宗教理想。

张:关于这种差异,我们也可以从政治和法律的角度来观察。中国严格地说来是“文化中国”,孔子和先秦儒家在奠定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方面功不可没,胡适先生在《说儒》中认为孔子对中国文化的作用类似于耶稣对西方文化的作用。中西文化均把人性视为逻辑和历史的起点,所有的政治、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都是开始于对人如何定性的问题。在希腊神话中,连神也都是有缺陷的,神也经常犯一些不可避免的错误,因此在西方文化中对人性中的恶的倾向一开始就是高度警惕的,人们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人性中的弱点和人堕落的可能性。后来在基督教文化中,这种人性本恶的思想由于“原罪”理论而进一步被强化,因此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和基督教社会的法律制度乃至生活规则都是建立在人性本恶和人必定犯错误的理论预设之上。除上帝外没有一个人能够通过内在的道德自觉而达到至善,因此必须设定种种外在性的人法或自然

法来限制人的行为,用强制性的方式使人向善。而儒家学说则将人性看作是本善的,这样就预设了人人皆圣贤的先验可能性。人只须在修心性、致良知方面下功夫,结果必定是“六亿神州尽舜尧”。但是在现实层面上,儒家也承认成仁的道路是非常艰难的。在现实社会中圣人毕竟是凤毛麟角,孟子说,“五百年自有王者出”,但大多数人还是芸芸众生。而且尽管人性本善,但是在实践领域中人与禽兽的差别却很小,人一不留神就堕落了。因此儒家时时教导人们要“戒慎恐惧”,要“吾日三省吾身”,时刻保持一颗趋善避恶的警惕之心。可见,虽然儒家对于人最终的良知发现和道德自觉充满了信心,但是它也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任重而道远的。

赵:我想,也许正是由于在人性论上,中国文化强调人性本善,因此对善的追求很容易导致一种回溯的过程,从而培养了极其顽固的文化保守心理,认为最好的东西往往就是最初的东西,就是尧、舜、禹时代的美好景象。这种文化保守心理造成了中国人的守旧、崇古情结,墨守成规,不思变革,“天不变道亦不变”,最终造成了自我更新功能的退化。在基督教文化中,这种对往昔的眷恋被一种对未来的憧憬所替代。基督教文化由于把人性看作是邪恶的,“原罪”使人生而具有了从恶或堕落的天然倾向,因此人应该把眼光投向未来的彼岸世界,寄希望于拯救的福音和每个人对自己邪恶本性的根本克服。在基督教的这种进化主义历史观中包含着一种深刻的辩证法:这就是人只有告别自己的原始本性,才能复归神性;只有告别伊甸园,才能以一种更高的形式重返伊甸园。堕落是自我回归的必要途径,没有堕落,人就不能成其为人。黑格尔把亚当、夏娃生活的伊甸园称为一种缺乏自我意识的禽兽状态,亚当、夏娃偷食禁果以后变得心明眼亮,才发现自己原来是赤身裸体的,于是感到羞耻,产生了自我意识。从此,人就与只适合禽兽生活的伊甸园告别,开始了自我分裂、同时也是自我复归的漫长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既是一种堕落,也是一种升华,它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根本,因为人说到底就是一个在堕落中升华的过程。

张:堕落是人生的开端。人只有首先承担了原罪,才能深切感受到救赎的恩典。就此而言,基督教文化将人引入了一种向死而生的状态中,将罪恶当作得救的一个必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赵:人如果不堕落就会永远滞留在禽兽状态中,只有以一种否定的方式、堕落的方式才能超越人之初的禽兽状态,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自身。因此,基督教文化中虽然有很深重的罪孽感,而且给人以阴郁恐怖的感觉,但是在这种罪孽意识的笼罩下,在战战兢兢的恐惧中,人经常感受到一种自我超越的升华感。如果人总是认为自己是充满道德的,是一尘不染的,反倒是非常可怕的,因为这样的人往往会丧失向善的动力。一种在自我陶醉中凝固的道德就是一种邪恶。人这种生灵就像罗丹的那尊半人半兽的塑像,他的上半身已经挣脱出来了,下半身却仍然停留在动物状态。人只有在这种痛苦挣扎的感受中,才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升华是从堕落中开始的,他的希望来自于他的绝望。更重要的是,当人处在这种艰难而漫长的挣扎过程中时,他的眼光必须向上看,他需要一个上帝。无论这个上帝是否真的存在,但是他对于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心理慰藉,当人把眼光投向他时,就会忘记现实的苦恼而在心中充满了希望。这种文化传统在西方一直延续至今,今天西方的科学技术水平如此发达,但人们仍然需要一个上帝。重要的并不是上帝对于人们有什么实际的功用性,而是如果没有他,人就会变得自暴自弃,缺乏神圣感和道德心。因此,西方的罪感文化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确信在人之上始终有一个抽象的道德监护者。

张:这种超越性的上帝常常提醒西方人注意人类自身的有限性和理性本身的缺陷,这种缺憾意识导致了西方哲学中的怀疑论,说到底就是不断地反省自身和批判现实。我们过去常说,西方人爱自由,其实西方人的自由观念一开始就是以某种普遍规则作为前提的,上帝曾经是一种普遍规则,近代提倡的自然权利、基本人权等等也是一些普遍规则。自由是有其界限的,并非随心所欲,而是以服从某种权威和纪律为前提。然而在中国文化中,由于过分

相信自己,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的道德心性,“我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我心”,结果导致满街都是圣人。中国人的自由观念历来就缺乏一种规则意识和秩序意识,发展到极端就是老庄式的自由,天人合一,随心所欲,完全的解放。这种自由固然很吸引人,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却没有可行性。中国现在正处于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过渡的阶段,因此规则和秩序是非常重要的。这些规则和秩序在今天更多地体现为外在的规范性的法律,而不是内在的可伸缩性的道德。

赵:学术界许多人认为,西方是一种宗教文化,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中国文化推崇中庸,讲究和谐,它不像西方文化那样老是走极端,因此在贬抑人性和尊重人性这两个方面都不如西方文化走得远。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认为,中国人以其与自然融洽游乐的态度,随遇而安,不去追求太多的东西,因此很少产生绝望和厌世的情绪。相对于自然而言,中国人更重视人伦;相对于死后的状况而言,中国人更重视现世的生活。对于大多数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来说,“死去原知万事空”,因此“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是中国人的传统想法。而西方人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一直受着苏格拉底的“应该追求好的生活更甚于生活本身”这种信念的鼓舞,或者如耶稣所宣称的那样,“我的国不在这世界”,从而将希望更多地寄托于死后的灵性世界。我曾经在一本书里把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称之为“协调的现实精神”,其基本特点是以现世性的人伦关系为核心,通过协调性的伦理意识来实现文化和社会的自我肯定;西方传统文化精神则称之为“超越的浪漫精神”,其基本特点是以彼岸性的神人关系为目的,通过超越性的宗教意识来实现文化和社会的自我否定。

张:在儒家文化中其实也有超越的一面,尤其是在原儒或真正的儒家那里,往往也会迸发出一些足以与西方圣贤相媲美的超越精神。只是像某些新儒家们所说的,儒家的超越是一种内在的超越,它与西方基督教所倡导的外在的超越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维

度和价值取向。儒家知识分子毕其一生孜孜以求的“仁”、“道”、“理”等东西,与基督徒们所追求的“天国”、“上帝”等概念一样,都是人类最终极的理想,差别只在于理想的具体落实处不同,一个指向现世,一个指向彼岸。儒家把超越的理想落实于现实的生活之中,同时又以这种超越的理想不断地调整着现实生活。过去我们常常爱把儒家思想与中国的封建专制混为一谈,这是“五四运动”造成的一种误解。其实儒家思想本身既有与封建专制相契合的一面,也有与封建专制相抵牾的一面。儒家精神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始终没有完全与现实的政权同流合污,始终保持着一种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性和超越性。所以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它培养造就了一大批铁骨铮铮的士大夫,为了儒家的理想敢于与天子争是非,宁可杀身成仁,决不苟且偷生,如魏徵、海瑞等人。儒家实际上也是有其内在的生命魅力和高远理想的,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很难比较高下,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各有各的历史进程和价值取向。应该说,儒家文化是非常适合农业文明的,是调整得非常有效的一种文化。此外,儒家对于生命追求的庄严感、对于知识的进取精神以及那种普遍性的仁爱精神,都是一些非常宝贵的精神资源。但是这些优秀的传统精神资源自“五四”运动以来,尤其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被人为地破坏和淹没了,从而造成了我们文化传统的断裂,这是一场极其惨痛的文化灾难。

赵:确实是这样。现在,当我们进行文化比较时,可能多多少少都带有一点价值倾向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中国文化持悲观态度。恰恰相反,我认为,一个真正热爱自己本土文化的人,应该有一种悲剧意识,用中国文化的术语来说,叫忧患意识;用西方文化的术语来说,叫罪孽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真正地直面自己的文化,真正地通过自我批判实现文化的更新。在价值层面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各有长短,很难说孰优孰劣。中西文化各自的价值取向不尽相同,一者指向内在的良知,一者指向超越的精神。中国文化近两百年来的落伍,关键在于过分地痴迷于自身

的传统,拒绝以一种开放的心态与外来文化进行融合或“杂交”。按照生物学的理论,一种过分纯粹的物种是难以在环境变迁的挑战下存活的,只有通过杂交才能获得新的生机,才能在不断变异的过程中发扬光大。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中曾经有过与外来文化成功“杂交”的先例,如佛教的东渐和本土化。反之在世界文明史中也有过反面的教训,如古代埃及文化的灭亡正是由于过分固守自身的纯粹性。我想,通过近代以来闭关锁国的沉痛教训和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国文化在新世纪里将会面临一个自我更新的历史契机,正如西方文化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所面临的那个历史契机一样。五千年来,人类文明正是在“东风”和“西风”彼此消长的过程中发展的,不同文化是世界历史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数百年”。500年前,贫穷、愚昧的西方人在面对着咄咄逼人的奥斯曼帝国和灿烂辉煌的明朝文化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西方文化在几百年后会领导世界潮流。但是在今天,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状态之中的中国人应该具有这种前瞻性的眼光。当然,中国文化的振兴不仅需要经济上和物质文明方面的腾飞,而且更需要一种深层的文化精神的重铸,以作为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根基,就像新教伦理之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关系一样。急功近利可以缓解一时的文化焦虑,但是它决不是一个落后文化的自我更新之途。只有通过漫长而艰难的文化精神批判和重铸,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状态,使中国文化跃升到与强势的西方文化平起平坐的地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谨以此言与诸君共勉。(热烈掌声)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推荐

马敏 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 博士 教授

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流

[2000 年 11 月在华中科技大学演讲]

今天,我和大家谈谈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流方面的问题,希望大家多提出意见。

首先,我想简单地说说什么是文化。根据学者最近的统计,光文化的定义就有两百多种,所以一句话很难讲清什么是文化。但用英语说,culture,就比较好理解。从词根上来讲,它有耕作、开发的意思。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它是教化的意思,即把一个人变为有知识的人,把不太文明的人变为文明人。

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指人类生活的总和。梁漱溟讲: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实际是讲人类生活的方式,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都可以归结为大文化概念。所以 80 年代文化讨论热的时候,很多问题都放到文化领域来讨论,原因就是文化涉及的面太广,牵涉到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问题。从狭义来讲,文化是人们创造的全部精神活动,包括意识、心态、观念、习惯等等。一般来讲,有关文化的著述,主要是从精神活动,也就是狭义方面入手进行讨论的。西方人最初认为文化是艺术。而中国人习惯于从修养、涵养方面来谈论文化,什么是文化人?文化人就是有知识、有涵养,教养比较好的人。

谈文化,关键在于区分两个词:文化与文明,culture, civilization。这两个词有联系,很相近,但还是有细微的区别。文化与自

然相对应,文明与野蛮相对应;文化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共时性,而文明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历时性。从内涵讲,文化讲究久远,文明强调状态。某种文明的整体可能因时代的变迁而逐渐崩溃,但文化因子或者说文化要素还可以继续存在而积淀为一种文化传统。比如说,古代有很多文明,两河文明、罗马文明等等,这些文明随着时代的推移已经湮没。是不是文明的消失,它的文化精神就不存在了呢?文化精神不会随着文明的消失而消失。比如希腊文明虽已消失,但它的文化精神不仅影响到希腊,而且也影响了世界,以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希腊文明遗留下来的文化。奥林匹克精神就源于希腊文明, fair play, 公平竞赛。所以,文化和文明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但它们也是有联系的。文明繁荣的时候,文化也就繁荣;而文明衰落之时,文化也很衰败;文明受到挑战,文化也会随之出现新的变迁,比如中国的近代就是这种情况。当然,以上所说,都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

接下来,我想概略地讲一下中西文化的不同特征。中国文化主要是指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创造的一种文化,它包括汉族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外来的佛教文化,还有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甚至还吸收了西方文化,唐代就吸收了西方文化。因此,不能简单地把中国文化归结为儒家文化。西方文化,从地域上来看,则比较含糊,到底哪一块算西方?俄罗斯算吗?所以我们说西方文化是有一个大致界定的,它是指从古希腊到罗马的文化传统,加之后来加进去的基督教文化传统,然后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等一系列运动,近几百年来盛行于西欧、北美的一种文化传统。这样一套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化传统相比,各自有何特点?

五四时期,有人这样归纳中西文化的区别:中国文化是静的文明,西方文化是动的文明,一静一动;有人认为中国是农业文明,西方是工业文明;后来又有人归纳为西方是海洋文明,中国是大陆文明。这些都是从某一个方面来归纳的,难免有一定的片面性。我

认为,总体上说,中西文化的区别有四点。

第一,天人合一与天人两分。在中国,主张天人合一;在西方,主张天人两分。中国文化传统强调天与人的协调关系,强调以人为本,重人轻神。中国传统典籍中讲,“天道远,人道迩”。孔子说,“敬神如神在”。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敬神就有神,你不敬神就没有神。人和天是互相协调的,不是隔得那么远。西方是把天神圣化、绝对化,上升为主宰一切的东西,比如上帝。天就是天,人就是人,分得很清楚。天是主宰,统治一切。虽然各种宗教有各自的理解,但大体观念是一样的。天主教认为人是通过神职人员来与上帝沟通的,人神之间有一个中介。所以它特别注意神职人员的等级,强调神职人员的威严,人不能与上帝直接沟通。宗教伦理改革就是要解决人与神的直接对话问题。新教主张人和神可以直接沟通,上帝在人的心中,神职人员只是起辅导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人人都是平等的,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这就超出了西方一般的平等观。西方比较强调对天道的看法,天道既是神道又是自然之道,从而发展出一种系统的神学、哲学体系,同时由于重视自然之道,又发展出比较系统的自然科学体系。所以西方科学,特别是在近代发展很快。而中国重视人道(这个人道不是指人道主义,而是人事、人伦之道),发展出成熟的古代政治伦理思想。所以说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相当发达,而在自然科学和神学方面相对而言不是很成体系。另外,教会系统在西方社会充当非常重要的角色。西方古代是政教合一,近代是政教分离。这之后,民众、社会方面的事务,包括人的思想方面,教会仍在发挥作用。

第二,中国是重礼制轻法制,西方是重法制轻礼制。传统上,中国相对来说比较重礼制,法制则相对薄弱。中国人讲求以礼治国,以德安邦。这是儒家的政治理想,管理国家的理想模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秩序,礼就是一种秩序。每个人都有其严格的位置和等级,等级和位置通过礼来加以规范。但礼不是完全的强制,它还讲道德,讲仁义礼智信,讲道德伦理,用

它感化人,使人自觉遵守秩序。礼在外,德在内,两个加在一起维持农业社会的秩序。中国没有西方那一套社会组织架构,没有神职人员、教会系统,但过去传统中国也能保持民间社会的秩序,就是靠“礼”和“德”来维系。西方有一个法制传统,法制就是契约关系。人和上帝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人与人之间也是契约关系。从契约的精神里引发出法制体系。西方基本上都有严格的法制,什么东西都要依据法律。人与人的关系也是法律关系。在中国,老子打儿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美国,这也有严格的法律,不能随便打,打儿子、打老婆都是犯法的。西方主要是依靠法律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

第三,中国人重群体价值,西方重个人价值。中国人重家族、重群体的发展,“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层层推出。比如巴金的小说《家》描写的就是一个几代同堂的大家族。在社会上,中国人讲老乡关系,老乡之间互相照应,老乡就是一帮。过去很多地方都在外地建会馆,你到外地去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去找会馆。比如说,你是山西人,到北京去,你就可以去投靠在北京的山西会馆,这样你也就有了依靠。中国人善于利用各种各样的关系组成各种各样的群体。从传统上看中国人是一帮一帮的,长处是有一个依靠,短处是人的个性得不到真正的发展。比如说,在一个大家族中,上有祖父、父亲、叔伯一大堆,压着你,管着你;下有弟妹、晚辈看着你,你要为他们做榜样。因此,中国人往往是在群体中寻求自身价值。西方不一样,虽然它们也讲家庭、讲群体,但在思想深处,西方人是个人化,家庭不能对个人管很多,独立性也就强些。好处就是独立自主,坏处是个性发展到极端就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比如说,在学校管理上,中西文化的对立表现得很尖锐。如对学生宿舍的管理,西方人就不习惯中国有这么多规矩,这是文化和价值观的不同。

第四,中国传统上比较重直觉的感悟,相对轻视理性的思维,而西方重理性思维,相对轻视直觉感悟。西方人强调规律、强

调逻辑,特别是德国人,做什么事情都讲求一个“根据”。和德国人一起去看电影的时候,他把什么都搞得井井有条,几点见面,几点去,什么都考虑得好好的。中国人讲一种直觉,儒家讲道德哲学,道家讲艺术的哲学,佛家讲宗教的哲学,尤其是禅宗,讲“顿悟”,叫“当头棒喝”,一个道理,拿根棍子敲一下,道理就在里面悟出来了,其中的逻辑、理性过程等都没有,都可以省略。再比如说,中医可以医人的病,但其中的道理总是讲不清楚,就知道医什么病抓什么药。中国文化讲整体把握,讲模糊性,讲到最后,容易产生一种神秘主义的东西。

归纳而言,中西方文化各自有各自的传统,中国文化传统大致是一种伦理型的,西方文化主要是科学性的或者是理智型的。中西文化应该是各有所长。中国文化即使是静的文化,也有自己的长处;西方文化是动的,也有长处。但双方也有缺点。中国的静,强调稳定,强调安静,强调以静制动,等等。但太静了,就容易使人的思想受限制,缺乏活力。西方的动,动得太厉害了,就容易损害别人的利益,容易转化为扩张性、侵略性文化。从这个角度讲,西方还有一个个人主义,极端了,有时候就是利己。去过美国的人就知道,如果你不去要求的话,一般没人来主动帮你。你提出来,别人就来帮助,你不提出来,谁也不会理你。久而久之,你就会感到非常孤独。在国外,这种文化不适应的情形非常多、非常突出。其实,文化本身,很难说哪个更优秀,哪个低劣,应该说各有优劣,各有长短。这两种文化如果互补,或者相互吸取,对彼此都一定有好处,可以相安无事。但是在历史之轮驶入近代后,中西两个文化系统之间却由全面接触而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我讲的第三个问题就是中西文化的冲突以及冲突中的交融。

冲突主要是从近代开始的,按我们中国的说法,近代是从1840年开始的。这种冲突一直延续到现在。

爆发于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是英国为了向亚洲扩张而发动的一场殖民主义战争。尽管鸦片战争的严重后果要到以后若干

年才逐步显现出来,但由此而引起的中华民族的危机却是极为深刻的。中华民族不仅遇到了通常意义上的“亡国”、“亡天下”民族危机,而且遇到了封建经济和政治制度解体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传统文化的全面危机。从广义文化的视角看,中国近代的民族危机根本上就是一种文化的危机,中西文化之间的竞争构成中外矛盾的关键。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所至,总是要破坏被侵略国的传统文化,争夺被侵略国的文化控制权,这在中国尤其明显。正因为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直接领土占据,不存在像殖民地那样的直接政治统治,因此,西方更需要在中国不仅是在物质上,而且更多地是在文化上表现其霸权和优越性,希望以文化渗透来为其经济利益的攫取铺路。这是以往任何一次“亡国”或“亡天下”的民族危机都没有遇到的新问题。可能正是有感于此,李鸿章才提出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的命题,多少察觉到了近代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严重性。

鸦片战争后的文化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华夷之辨”的儒家传统世界秩序观的崩溃,一是儒学中心地位的逐渐丧失。

“华夷之辨”和与之相联系的中国中心观,是儒家士大夫对世界秩序的基本看法。以这种观念来观察世界,士大夫往往认为华夏族在文化上优于其他少数民族和世界民族,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同时,他们自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其他诸夷(即少数民族或外来民族的贬称)皆是中国的属臣,应定期来朝拜。但鸦片战争后,部分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士大夫已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并不优于西方文化,甚或在某些方面还落后于“外夷”,于是以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口号,终于提出了学习西方的问题。从不以西方为对手,到不得不以西方为对手;从自认为优于西方,到放下架子要学西方,这显然是传统“华夷之辨”旧观念开始破灭的征兆。也是在鸦片战争前后,人们才逐步形成以近代地理科学为基础的世界观念,那种茫茫宇内,中国既是大地中心,又是“天

下”之“共主”的愚昧、陈腐观念亦开始破灭。严峻的现实是：唯我独尊的华夏文化非但没有受到国际社会的太多的恭维，反而被摆在“落后”的位置，被“洋人”所轻视。由此而产生的心理震动和文化危机意识的确是创深而痛剧的。

另一方面，鸦片战争后的中西文化冲突，明显表现为中学的步步退缩，西学的步步紧逼，似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其突出表征是：儒学逐渐脱离其中心位置，对时代的精英再无昔日的吸引力，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纷纷远离这种正统思潮，而成为其叛逆。相反，时代精英们对西学却趋之若鹜，顶礼之，膜拜之，与儒学的门庭冷落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中国近代史上，从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没有一个不表现对儒学的反叛（至少在早期是如此）和对西学如痴如梦的学习和汲取。相反，那些饱学的儒学大师如倭仁等，则显得黯然失色，不能入居时代的主流。

儒学中心地位的失落，又同儒学内部文化秩序的崩溃分不开。儒学的核心公式是“内圣外王”，由“仁心”的内核向外层层扩展，最后为天下王。在这种内部秩序中，格物致知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它仅是修身的准备；经世致用是次要的，因为政治的基础是教化而非施政能力本身。但由魏源、龚自珍等在近代学术中首倡的“新经世致用”，重点却在“用”与“器”之上。虽然儒家“本末”的思考程序仍然在支配着士大夫们的头脑，但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都越来越本末倒置，离传统的儒学相去甚远了。这些，均是传统文化秩序逐渐崩溃的象征。

为什么同是中西文化间的遭遇与碰撞，鸦片战争前后的情势与明末清初时期竟有如此之大的不同？

考其原委，乃是因为鸦片战争后的“西学东渐”过程是与“西力东渐”过程相联系的，与明清时期相比，西方已经经过了工业革命的洗礼。所谓“西力”，一言以蔽之，就是西方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但又不是一般意义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而是特指由18世纪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现代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质言

之,即西方新兴的近代大工业文明。它首先体现为以蒸汽(以后是电力)为标志的巨大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像变魔法似地“使千百个工厂,千百根烟囱瞬时拔地而起,机器的轰隆声震动大地,汽笛的尖嚣声划破长空。人成了自然的主人……大批人走出农村,走进工厂,无数人群在飞旋的车轮旁流汗劳动,农村被遗忘了,城市成了一切。”其次,近代工业文明又体现为一种很难如同机器一般直观感受到的组织力。工厂制的出现使人类可以通过分工和劳动集体化来大幅度增加产量,提高效率,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西方工业文明的东来,犹如“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之后,便释放出无法控制的“魔鬼”,工业化意义上的西方化是无可避免的了。从“西力”与“西学”的关系来看,西学是以西力为其基础和载体的,“学”往往借助于“力”而开辟其传播渠道。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传教总是跟随于通商和大炮之后,传教士的地位要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才日隆。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实要靠西力——武力和经济力的综合来加以证明,而后才能为中国士人所折服。单这一历史过程就花了两三百年的时间。

总之,正是由工业革命所激活的巨大生产力、组织力、创造力,以及与之紧密相联系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思想意识、文化形态(即“西学”)融汇成一股气势磅礴、无坚不摧的“西潮”,滚滚东来,对东方农业民族形成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威胁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民族的基本生存方式和社会组织框架,当然也包括其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传统文化。这便是中国近代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根本由来。

随着西方文化大量传入中国,中国开始有了近代自然科学,有了近代民主、自由意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随之而发生改变,传统文化本身逐渐向近代转型。

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是与整个中国近代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转型相一致的,是这一大过渡过程的产物与体现。在近代变革的潮流中,中国社会和文化至少发生了

三个层面的转型,存在三个层次的变革。一是物质层面的转型。它包括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所倡导的“开铁矿、制船炮”的洋务运动,再到私人民间企业的创办,各类事业开发活动的兴起。二是制度层面的转型。它始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这一运动的实质和关键,即是将工艺—科技的物质层面改革推向改造政治制度的更深层次。三是社会心理和思想观念层面的转型。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上千年儒学文化传统的国度,与农耕社会相适应的心态和观念可以说根深蒂固、无孔不入,因此,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变革极为困难。尽管“西学”传入中国后,就已经开始了冲击和改变中国人文化观念和文化心理的过程,但这一过程的发展又是缓慢和曲折的。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才于根本的政治革命之外,发生了较为正规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

从发生次序和内在逻辑关系看,上述经济—政治—观念三个层面的转型和变革,系一种层层递进、步步深入的过程,它与西学东渐的轨迹大致重合。但在实际历史过程中,这三方面的转型和变革往往又交错重叠,很难清楚划分开来,并不是说在某个阶段中只有某一方面的转型和变革,而是说在某一阶段中某一层面的转型和变革居于主导地位。如果从大文化视角加以观察,三个层面的变革反映了中国文化在近代历史上的整体演变历程,三方面缺一不可。近代产业发展不充分和思想启蒙的不彻底,已使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吃尽苦头,得而复失。反过来,政治革命的失败,又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障碍重重,民主启蒙更加难以进行。那种看来形似“补课”的历史回复,似乎正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反映出文化转型在三个层次变革的均衡、互补中螺旋式推进。

传统文化转型的过程也就是近代文化重建的过程。但究竟应当如何在传统与近代的两极构筑中国的新文化,却困扰了中国好几代人。在近代中国,西学几乎成了新学的代名词,因此,如何处理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构成中国近代文化重建的关

键,谁也无法回避。

在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变的艰难历程中,特别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与撞击中,中国文化既显示了其优秀的品质和丰富的内涵,同时也暴露了其种种缺陷与弊端。虽然经过伴随现代化进程的一系列巨大的历史变迁,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已经瓦解,新的文化体系已初具规模。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传统价值观的冲突并没有得到完善的解决。这一方面表现在对传统文化中积极健康、充满活力的因素继承发扬得很不够;另一方面表现在对其中消极陈腐、不利于现代化的东西批判得还不彻底。因而,这些都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生着尖锐的冲突。

根据有的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归结起来,有以下 10 个方面。 重农抑商与现代商品经济的冲突; 平均主义传统与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冲突; 因循守旧的传统与现代革新创造精神的冲突; 悠闲散漫传统与现代效率的冲突; “反求诸己”的认知方式与现代科学知识的冲突; 泛道德主义传统与现代多元价值取向的冲突; 家庭本位传统与现代个性自由的冲突; 家长制传统与现代平等观念的冲突; 尊官贵长的权威主义传统与现代民主精神的冲突; 人治传统与现代精神的冲突。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确存在不适应现代化的一面,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何五四一代人会提出如此激烈的反对封建传统的口号,为何近代史上的仁人志士总是在向西方寻求真理?对中国文化进行综合调整,使之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是一项复杂和艰巨的文化系统工程,只有通过这项文化改造工程,克服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种种冲突的方面,中国文化才能最终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已积弊重重,一无是处,必须彻底摧毁,从根本上全盘抛弃中国的传统,而是说,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要有一种理性的批判精

神。不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与拒绝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来说,都同样是不可取的。

但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的世界化是密切相关的。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飞跃发展,尤其随着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以知识经济为主体的信息社会时代,世界正在更紧密地连成一个整体,任何地区和民族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共同发展。所谓中国文化的世界化,一方面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另一方面是世界文化走进中国。这是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文化和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需要,是一种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

21 世纪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纪呢?和平与发展仍将是人类社会的主题,世界未来文化的发展趋势将是东西方文化的渗透、互补与相互融合。在过去的世纪里,西方社会的物质得到了高度发展,为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相比之下,东方相对落后了。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亚的崛起,特别是最近 20 年中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香港、大陆经济的高速发展,说明东方正在迅速地追赶西方,21 世纪将是东方和西方激烈竞争的世纪。中国文化将对 21 世纪人类争取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做出更大的贡献。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种种危机的困扰,如生存环境的危机、价值信仰的危机、道德与精神追求的危机等等。和西方文化相比,以“天人合一”观念为哲学基础,强调伦理道德的中国文化,在解决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危机上具有特殊的作用和价值。

比如,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在环境治理、人文精神的发展等方面就很重要。应当用人文精神来指导我们的日常生产活动。如果一味地去征服自然,结果就造成资源、环境诸多问题,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前些时报纸上曾热烈讨论过“山羊、生态与人”的问题。一些人将北方草场的大面积破坏归罪于山羊,这是极其片面的。其实,山羊的问题主要还是人的问题,这跟人过度的放牧密切相

关,是人对自然的破坏,而不是羊的罪过。新西兰遍地都是羊,有充分的草地来放牧羊,他们的放牧管理就很合理,而我们就很差。可能要想另外的办法来保护草皮。我们应当思考人怎样去适应于自然,也可叫师法自然。在今天,应更多地强调用人文的精神来结束这种过度地征服自然。所以,海德格尔讲,人类应该有一种诗意的居栖。不应该搞成机械化的生活,就是一味为了赚钱,为了发明,为了创造更强大的生产力。如果人这样下去的话,人生活的本质的东西就丢掉了。我们现在搞“三讲”,讲反腐倡廉,我说这些搞腐化的人应该学一学老庄,学会怎样去自然地生活。人拿那么多钱干什么?人的生活需求其实是很简单的,卧不过三尺,饭不过三餐。所以说这样搞腐化,对人没有好处,对生活没有好处。人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和谐,感到和谐、知足,懂得怎样去欣赏生活,怎样去诗意地生活。我们人类要学会和谐地与自然相处。这些方面,中国文化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的缺点,能够在今后的文明发展中发挥作用,所以孔子说“和而不同”。这种精神,中国人应该多讲。一方面,我们要走文化创新的道路,也要融入世界,但另一方面还要保持中国文化的特色。所以,面对 21 世纪,在中西方文化问题上,我们应该博采中西方文化之所长,构建新时期中国的新型文化,根本上还要大步地走向世界。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然,中国有句老话,“有容乃大”。在今天,中国文化应该有“海纳百川”的勇气和胸怀面对世界,面对未来,通过文明之间的交流,使我们的民族文化发扬光大,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推荐

陈雄伟整理

文化与人生

龚育之 全国政协常委 著名党史研究专家

何祚庥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五四精神的历史意义

[1999 年 5 月在北京演讲]

龚育之：首先，我想考证一下什么时候开始纪念五四。我还没有来得及细致地做这个工作，只是粗略地做了一下。五四运动发生在 1919 年，那时候党还没有建立。五四之后，毛泽东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其创刊宣言就以世界的眼光、文学的语言对五四做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俄国革命之后，怒涛西行——当时西边有德国革命、匈牙利革命；然后转而东行，于是异军突起，在长城渤海之间，就发生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南下过黄河和长江，然后来到闽水和湘江。这么一个怒涛来了，“天地为之朝思，奸邪为之鄙夷”。毛泽东写这些话在 1919 年 8 月，评论的是当年的事情，还说不上把五四作为一个历史节日来纪念，但毛泽东用文学的语言对五四作了一个很高的评价。

那到底什么时候提出纪念五四的，我想这是很有意思的。因

为提出纪念五四就是对五四的历史意义的评价的一个提升。有很大意义才会纪念,而且纪念也不是为了历史,都是为了当前,为了推动当前的工作。我想也许有人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历史考证工作,什么时候最早提出纪念五四。我就手头资料查看了一下,我觉得应该注意的是 1924 年中共中央发了一个关于纪念五四的通知。1924 年是五四运动 5 周年,同时也是共产党成立以后得以迅速发展、国共合作领导中国的第一次大革命开始的一年,也是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这个中央文件有两位签名:陈独秀、毛泽东。陈独秀是中共中央局的委员长,毛泽东是秘书。这个通知要求各地的党组织、团组织纪念五一、五四、五五、五七。通知是在 4 月 19 日发的,其中讲到纪念五四有两种意义,这就为后来认识五四意义奠定了基础。

一、复国权运动。五四时期,中国被外国侵略,被反动政府出卖,所以学生起来,国民起来,要求恢复国权,保卫国家的领土,保卫国家的利益,反对卖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政治上是以反帝爱国为宗旨的救亡运动,同时也是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用什么来启蒙呢?科学、民主。不光是五四运动当时的见证人这么说,孙中山也这么说。自北京大学的学生发起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素质预备,五四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成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救亡与启蒙,反帝爱国和革新思想,我想这两个始终互相交错、互相推动,哪一个也离开不了哪一个,哪一个也压倒不了哪一个。真正要讲新文化运动,应该还要追溯到 1915 年,它是从陈独秀写的《敬告青年》开始的。

当时中央还讲到纪念五一,五一是什么意思呢?五一劳动节。那时候叫劳工神圣,劳工是工人阶级,五一为工人阶级的节日。为什么要纪念“五五”?“五五”是马克思诞辰纪念日,纪念马克思诞辰是为了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群众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爱国、反帝、民主、革命的群众运动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共中央关

于纪念五四运动五周年的通知,包含了很多层次的含义。五四运动本身有两层含义:救亡和启蒙。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要结合、群众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要结合、救亡、启蒙、反帝、爱国、科学、民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潮流就在中国产生了几十年的影响。

1939年,是五四运动20周年。当时,中共中央在延安,正在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由于有延安这么一个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党进行了许多思想、文化、理论的建设。在五四2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五四运动》;进行了一次演讲,叫《青年运动的方向》;同时还写了两部最重要的著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这些著作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完整理论的一个基础。而这一工作的完成,是由纪念五四20周年引起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以五四为标志分成两大阶段,五四这是这两个阶段的分水岭,是转折的标志。五四以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但资产阶级没有力量,革命得不到发展和胜利。五四以后,工人阶级和他的政党走上了历史舞台,在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领导下,中国民主革命走入一个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所以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工人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本身的性质和任务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由工人阶级领导,因此,这个革命胜利的前途就不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可是中国人要搞社会主义还不能一步登天,要分两步走,经过新民主主义再到社会主义。这样就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方向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首先要反帝反封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不打倒,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所以说进行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前途是社会主义。这样,就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革命的一套自己的革命理论。在这套理论中间,对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做出了这么崇高的评价: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和干部上

作好了准备,开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新时期。这样的评价就是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语言做出的评价。这个评价毛泽东后来还作了许多发挥,一直包括“七大”,都作了一些发挥。这个评价的正确性被后来的中国革命的历史所证明。

1949年是五四运动30周年,30周年的五四运动是在哪里纪念的呢?在解放了的北平。过去纪念五四都是在国民党的压迫底下,今天我们人民解放了,我们高高兴兴地在解放了的土地上,举着红旗,排着长长的队伍,去上街游行。这是我们中国人民的解放,中国青年的解放,大家高高兴兴地。这个变化就是五四运动30年后所收获的最大成果: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所以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30年,赢得了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是一个最伟大、最光辉的结果。

于光远有一概括,就是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就是1919—1949年,第二个30年就是1949—1979年。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我看这也是一次在党的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纪念活动。为什么呢?是因为这次纪念活动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的背景下进行的。建国以后,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都取得了伟大成就,这是伟大的一面。但是又走了弯路,遇到了挫折,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因此,“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要重新总结经验,到底我们有哪些成就、那些正确的东西应该坚持下来,那些是导致我们的失误、挫折,给人民遭受一些苦难的东西,我们要怎样加以纠正过来。这就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马上就进入了1979年。因此,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就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这样一个背景上进行的。

我认为,这个纪念活动对当时的历史转折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时纪念活动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命题,叫做“三次伟大的

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第二次是延安整风，第三次就是以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的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从哪里解放出来？从两千多年封建的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底下解放出来，束缚了人民两千多年的思想禁锢被打破。打破了思想禁锢，那么各种思潮就纷纷进入中国，互相比较，互相辩论，都希望在中国扎根。在各种思潮的激荡中，中国革命的中坚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最符合客观发展的规律，最符合中国人民革命的需要，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第一次思想解放。

毛泽东也讲过五四有个缺点，就是形式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教条主义是五四运动的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这样党内就出现了一个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国际经验神圣化的一种偏向，妨碍了我们把马克思主义跟中国实际相结合，扼杀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摸索、创造出的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一些成果，中国革命又遭受了好几次失败。总结经验教训呢，毛泽东说要解决思想问题，不是换两个人的事。你换了前面的“左”的错误的王明，说不定还有人“左”得更厉害呢！所以马列主义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出一条中国革命的道路。外国革命都是从城市起义，工人阶级领导。中国呢，大部分人口在农村，工人阶级最先进，可是人数很少；工人阶级集中在城里，但城里面反动力量控制得最严密。所以我们可以到农村去，到反动力量统治薄弱的地方去，把中国最广泛的农民群众成功地组织起来，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政权。这一套，完全是中国的创造。教条主义就接受不了这个理论，认为你这是逃跑，是富农路线，中国共产党完全变成农民党了。第二次思想解放就是要解决这么一个思想问题，使全党认识到，马列主义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个结合的成果，就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对于毛泽东思想，以前有的人赞同，有的人不赞同。经过整风后，大家赞同了，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所以第一次思想解放，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传播;第二次思想解放,克服了教条主义,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从而赢得了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那么,为什么还有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下面就要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毛泽东讲过,五四是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但也有它的弱点,那么,延安整风有没有它的不足或者消极的方面呢?看来也有,这就是后来发展起来的个人崇拜的因素。有人认为,毛泽东领导我们取得了胜利,过去的实践证明他的决策基本都对了,那么凡是他讲的都是对的,不需要继续接受实践的检验;而且如果谁讲了不同意见,就被打成反党分子、反毛泽东思想分子。你看彭德怀提了很好的意见,结果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刘少奇办了很多事情,也是很好的,也只因和毛泽东的意见不同而被打倒。应该说,个人崇拜问题在建国前后还不是很显著,大概从50年代后期起就逐渐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就发展到极端。于是,毛泽东他做一个什么决策都不需要讨论,不需要争论,不需要实践的检验,而且谁要说一个不同意见,就会被打倒。这样一来,革命和建设就很难进行下去,所以这就需要有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为什么“两个凡是”不好呢?“两个凡是”就不赞同把毛泽东的决策拿到实践中检验,这不是一种迷信吗?所以就需要有一个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把人们的思想从长期的个人崇拜、“两个凡是”的禁锢底下解放出来。解放的结果呢,那就是一个历史的大转折,改革开放,搞现代化建设,思想理论上就形成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这两者综合起来,很好地总结了建国以来我们正确的实践,同时也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失误和教训。

我想今年纪念五四有它的特殊含义,这就是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很好地总结经验,总结80年的历史。这80年包括民主革命的30年;建国以后的30年,从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有从1979—1999的这20年。那么这第三个阶段了已经有20年了,这

20 年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就,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也有很多新的东西要去总结。

今年来纪念五四运动 80 周年,我想又会成为第三个历史大阶段(可能 30 年,也可能 40 年)中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次。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在刚刚纪念了十一届三中全会 20 周年之后,又是即将纪念建国 50 周年的时候,又是本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所以,应该好好地回顾一下过去,展望一下未来。因此,我觉得今年纪念五四要特别很好地总结一下历史。80 年历史,30 年民主革命历史,30 年新中国的历史,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20 年的历史。在总结历史中,很好地来看清我们走过的道路,看清我们今天纪念五四要继承的历史传统,要开辟历史的未来。五四精神的基本的东西:救亡、启蒙、科学、民主、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今天、在当代具有什么样的意义;站在时代的高度,对这些精神应该有什么样的理解;或者说,从邓小平理论的视角来对它有什么新的认识,新的理解。比如说救亡、恢复国权。应该说,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原始意义的救亡、恢复国权这个历史任务就完成了,但是,我们国家统一还没有完成,这是一个。第二个,国家富强道路还很长。而今天在世界范围里,科学、经济发展很快,国际竞争极为激烈,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旧猖獗。霸权主义、强权主义以它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最先进的武器为后盾,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什么道理都可以不讲。我看霸权主义仍然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外国列强之压迫在一定意义上今天仍然存在。因此,爱国、自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这仍然是我们民族也是我们共产党人奋斗的主要目标。

何祚庥:刚刚龚育之同志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发展过程谈了五四精神的历史意义。“科学”是五四的另外一个重要口号。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如果观察一下当代世界上有哪些重大的成就,我一直以为 20 世纪与 19 世纪相比有两大成就。第一大成就是自然科学的发展

加快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使得 20 世纪与 19 世纪有着显然的不同。我举个小例子:19 世纪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是马车。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到故宫里面,乡土便道就是最好的路,坐的是马车。马车现在看起来缺点太多了,速度太慢,而且由于城市人口比较多,大家都要坐马车的话,就带来城市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马儿要拉屎,到处拉,拉得城市臭气熏天。所以 19 世纪的城市被称为肮脏的城市,就指的马粪太多。20 世纪我们知道有一个大发展,就是小汽车出现了,有了它马车就看不见了,这是很大的进步。当然也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汽车“拉”出的尾气太厉害了,也是污染。但不管怎样评价,小汽车相对于马车来讲,总是大大的进步。另外一种进步是人民生活多方面的提高和改善。今天用来采访的电视,这是过去没有的。这样一比,可以说,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大变化。不承认这种变化是不行的。如果要追问这种变化从哪里来,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件事情就是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刚刚龚育之同志讲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情况,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社会主义也有相当广泛的传播。当然,社会主义在 20 世纪也经历了一些挫折,甚至包括某些失败。但总的来讲,20 世纪比起 19 世纪,范围大多了。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另一个情况,20 世纪虽然比 19 世纪有比较多的发展,但生活比较好也只是在发达国家,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在拉大。总之,20 世纪与 19 世纪相比,已经是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我们展望未来,展望世纪之交,我们相信 21 世纪在这两方面还会有重大发展。所以我觉得应从历史的跨度来看五四,从历史的跨度来看世纪之交。所以在纪念五四运动 80 周年之际,联系 20 世纪人类社会的巨变,展望 21 世纪,我觉得,发扬五四所倡导的科学精神就非常重要了。

邓小平理论中含有一个重要的命题,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认为,这个观点是一个新的重要理论。1951 到 1955 年,

我曾经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那个时候我们年轻,对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状况是很关心的,而且极力想把科学搞上去,于是拼命地宣传科学重要。但宣传来宣传去,效果还是不太好。我们想了各种办法,要突出科学的重要性,但一直没有很好的名词,没有很好的想法。一直到了1988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后,我觉得好极了。邓小平同志第一次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在1975年,是针对“四人帮”严重破坏科学技术事业、破坏生产力的发展的情况讲的:科学技术重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但由于“四人帮”的阻挠和干扰,这一思想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和执行。1978年,在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再次强调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加“第一”是在1988年,并且非常明确地说,马克思说科学是生产力,是对的,我看还不够,是第一生产力。这就在马克思的基础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当时读到这个话以后,我感到非常之高兴,非常之兴奋。邓小平的这一重要思想,奠定了科学的历史地位。

邓小平非常强调发展生产力。党的十三大的报告当中,给社会发展的动力作了一个新的概括:社会生产力是最终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的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为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找到了一个新的手段,就是要发展科学技术。而因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叫做“第一生产力”,它对生产力的影响最为关键,最大。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刚刚我们已经举了一些例子,看得很清楚。这是20世纪以来才发现的事情。对科学技术对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的重要作用的认识,在19世纪有一些朴素的见解,到20世纪就看得更清楚了,但在早年就不可以这样说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根据当代科学技术和社会迅速发展的形势提出的新的重要思想。1989年,邓小平在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时候,指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看到科学技术发展引起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推动的话,就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见,邓小平同志非常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

要性,因此才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思想。

我一直赞成这个重要的思想,认为它对我们理解当代很多问题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比如讲我们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来说,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危机,而且危机有一个周期,大概四年一期。这种周期性循环到了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大恐慌,使全世界的生产力水平下降了一半。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在那个时候已经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严重地破坏了当代的生产力,好像已经到了头了。但结果呢?资本主义这几年还在发展。其中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发达国家发现了科学技术的作用。科学技术可以开拓新的市场,开拓新的需求,而这种新的需求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因为需求才有推动。比如说过去大家都不用电脑,现在是电脑进入千家万户,电脑的需求就大大扩展。由于有了电脑,需要联网络、信息高速公路,这都是重大的新的需求。这种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新的需求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所以,这几年发达国家经济上有些波动,但大体上还是可以的。本来说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可这几年还不怎么垂死,要分析它的原因,就是科学技术帮助了当代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使它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时期。看不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就要犯错误。所以科学技术成为了解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再举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差不多完全被摧毁,如果从经济发展的数字来看的话,当时还算落后国家之列,人均GDP很低很低。但是50年来,人家现在变成世界上第一流的强国,原因何在?非常重要的原因,虽然经济破坏了,但是一流的工人还在,一流的技术人员还在,一流的管理人员还在,他们的政治家多年和经济打交道,比较熟悉经济的工作。所以在战后有这批基础存在,他们就能弄到资金,弄到装备,然后运转起来,就是世界第一流的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看出,决定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除了经济之外,还要看到科学和教育、人民的科学知识文化水平。即使一个时期经

济受到破坏,只要这个基础还在,仍然很快就可以起来。所以,你要是没有这样一个观点,就简直不能理解当代的国际形势。由此可见,邓小平理论中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基本的思想。这是从世界的形势来看,如果从中国的实际来看,邓小平同志的这个重要思想对于我们中国就更为重要了。因为我们中国科技比较落后,除了我们要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之外,还要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作用,向科技进军,有了这些因素的有机结合,我们国家就可以发展得更快,所以我觉得这个观点很重要。

五四有两个口号,一个叫做民主,一个叫做科学,早年我们对民主这个口号关注得多一点,我想现在应该更多地关注另外一个口号,就是科学这个口号。今天纪念五四,要看到科学技术对于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将要起非常大的作用。不过呢,我这里还要补充一句,就是除了看到自然科学的作用之外,还要看到社会科学的作用。当年中国革命找到了毛泽东思想,大家非常振奋,中国革命才有了希望。中国的建设,也走了不少弯路,但我们终于找到了邓小平理论,这是一条康庄大道,我们也感到无比兴奋。特别我们看到,邓小平理论中很重要的思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根据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概括出的一个新的命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家讨论得还不够,发挥得不够,讨论的声音应该更大一点,要大声疾呼。

中国教育电视台供稿 未经本人审阅

金耀基 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 教授

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化

[1999 年 5 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我把五四看成由两个部分组成。首先它是指 1919 年 5 月 4 日发生在天安门的五四运动。五四这一个文化符号所代表的精神,就是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它基本上代表国家或者集体求解放、求自由、求独立的一种需要和精神,所以五四这个爱国主义也好,民主主义也好,是跟辛亥革命以来的民主主义运动紧紧呼应的。但是,五四这个文化符号所代表的不只是爱国主义,或者是民主主义,它还代表了五四运动前后的一个新文化运动。这个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意识取向是鼓吹新思想,批判旧信仰。那个时候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主要是北大教授,都相信要救中国,必须从根本上从文化上来改造,也就是要重估一切的传统价值,清除文化上的一种“蒙昧主义”。后来,这一文化运动发展为更为激进的一种批判,甚至于要打倒儒家的思想(至少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儒家思想产生了一种“去中心”的作用)。那么这个新文化的主调基本上是个体主义的,它是求个体的解放、自由、自主和独立。这种寻找个体自由、自主的文化运动,我认为到今天最强烈地表现在一个观念上,那就是“人权”;而上面所说的那个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运动,它求集体的解放和自主,是表现在“主权”的观念上。

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有很多说法,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认为它是中国的启蒙运动,我不认为它是一个文艺复兴运动,就像

胡适之先生提出的,基本上它是一个启蒙运动,跟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遥遥相接。启蒙运动相信理性可以改造世界,建构一个现代的文明秩序。而理性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科学理性。所以启蒙运动强调理性,而理性的最高表现就是科学,到今天还是有这样一个重要表现。启蒙运动另外一个最强烈的是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强调的是理性、自由、平等,而这些观念到最后基本上都是用“民主”来概括的。所以,用科学与民主来概括整个五四运动的精神,同时也是相当有概括性地表达了中国的启蒙精神,也就与西方的启蒙精神非常相近啦。

今天我们谈五四,我个人认为,至少它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站在 20 世纪本身的角度来看,现代化活动从 19 世纪末的洋务运动开始,一直到维新,一直到辛亥革命,都是从器物层次上的一种革新,然后到制度层次上的一种革命,最后到新文化运动,基本上是思想行为层次上的革命。这个跟西方国家发生的过程并不完全相同。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基本上是在文化思想的层次上展开的。客观地讲,中国一百年现代化道路走得非常崎岖,但从变的观点看,从变革的层面来说,是翻天覆地的。辛亥革命,在我看来,可以说是推翻了中国传统普遍王权的观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就是改变了中国的正统,改变了中国政治秩序,思考政治上的问题从此不一样了。新文化运动是改变了中国的道统。这之前有个道统,孙中山还在谈怎么样继承这个道统。新文化运动就没有,它改变了中国的道统,改变了中国文化宇宙,也就是重新建构中国文化秩序。

其实,五四精神的遗产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继承辛亥革命一直到狭义的五四运动的寻求民族国家的解放、自由的意识,这是一个精神遗产;另外一个遗产是寻求个体的自主与解放的价值意识。这两种意识,就是个体主义与民族主义,实际上都是现代性的主要内涵。现代性内涵并不是说本质并不冲突的,它也冲突,这两个是构成现代性的主要内涵,前面一种强调民族国家的解放运动,基本

上强调一个集体性的东西,后一种强调个体的理性表现。这两者虽同是五四遗产,但在 20 世纪的中国,由于长时期以来都处于一个外患内忧的局面,集体价值始终在主流上是置于个体之上,国家与个人被看作是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一般人的观念。所以在 20 世纪中国盛行的思潮中,不论是三民主义还是马列主义,基本上都提高集体的位置,强调集体价值。孙中山强调国家的,马克思强调阶级的,列宁强调党的,毛泽东强调群众的。所以在 20 世纪中国始终是集体理性压倒个体理性的,它是与中国的历史时空不能分离的现象。所以五四遗产本身有一种内在的复杂性和内在的紧张性。但不管如何,五四遗产已经成为中国的文化新传统,已经变成中国现在的文化的传统,以及我们今天要从事现代化的重要的文化资源。但是我们要张扬这个五四现代化传统,就必须要从了解五四内在的问题中,从反省五四当中去继承。

五四新文化活动,基本上要求批判精神,要求个体解放。所以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胡适之先生,1960 年在美国发表一篇《中华传统以及将来》的文章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说对于过去坏的传统都清除掉了,也产生一种推陈出新的作用,如他常常提的“纳妾制度”的废除,“体刑”的废除等等。他认为它们的废除或者是解体,应该看成是中国从她的古老的孤立的文明枷锁中得到解放。我们可以说,没有五四的解放,中国现代化工作不知现在还停留在什么地方。从历史的视野来看,五四使中国的思想文化很勇敢地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五四象征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应该看作是中国的国家建构的动力。因为王朝没有了,整个天下的观念没有啦。但是,怎么样建立一个现代的国家呢?五四那个时候所形成的反传统的激进态度,在整个过程中并不是非常健康的。现代化有很多种,有不同形态的现代化,天下没有惟一的现代化形态。在这点上,今天在反省五四的时候应该提出来。

对五四的反省,必然是发展五四的必要条件。五四提出的科学民主到今天为止,还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今天,我们真正快要

进入 21 世纪的时候,看看 20 世纪人们到底在寻求什么样的现代性,在旧的秩序分解后寻求怎么样的一个现代文明秩序。科学、民主精神来自 18 世纪西欧的启蒙运动,但西欧启蒙运动本身并未完全得到它原来要得到的解放,有人认为根本上就是失败的。我个人倾向认为不是失败,而是认为它是没有完成。所以我们今天讲科学民主问题,强调科学的重要性。如有位学者说,过去的科学在世界之中,现代的世界在科学之中。这是个非常深透的看法;罗素也讲过,你今天要了解世界的事物,必须靠科学来了解,必须靠技术来改变世界。强调科学的重要性,大家可以完全了解。可是在五四之后,跟西方一样,也出现一些‘科学万能’的现象,把科学作为万物的尺度。是不是科学可以做万物的尺度,这个很重要。假如迷信到这个程度的话,一定对人间的持续的价值秩序产生一些颠倒。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讲,在中国出现了这种现象——迷信科学的现象。我想科学理性不是一个问题,但科学理性的膨胀,把它变成万物尺度的话,就是一个问题,这在今天的科学界也有所反映。

下面,我来谈谈民主。民主在 20 世纪的中国恐怕不是像科学那样受到欢迎,也不是像科学那样受到崇拜。但要真正改造中国现代的政治秩序——我强调现代的政治秩序,我看跳不出民主。民主是种政治方式,它承认个人尊严、个人目的。我认为民主最重要的,它比其他制度恐怕更特殊的不是别的,而是它强调的是程序理性。西方的一部民主自由的历史,其实是一步一步建立的程序理性的历史。今天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主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合法的公共秩序的建立。当然人可以有序而没有自由,但如果没有秩序,他们也不可能有自由,必定有权威之存在,才能谈权威的限制。

今天,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当然我们有充分的自主,充分的独立,当然你也可以说,西方还有一些国家拼命地希望中国不要强,这些都是存在的。可是作为一个国家,中国的独立性、自主性已基

本建立。而今天又进入一个新的局面,真正的所谓全球化的局面,全球化趋势非常强烈。在从 20 世纪进入 21 世纪时,全球化趋势出现后,有一个怎样新的世界的文明秩序,我想这是从五四到今天为止,出现的新的挑战,新的命题。谢谢各位!

中国教育电视台供稿 录音整理:张炜 未经本人审阅

张磊 广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1999年5月在北京大学演讲]

首先要说明,我把新文化运动这个启蒙运动划分为明确的前期、后期。它的前期是反思,是补课,是对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对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做的破旧立新的不足给予补课,它是一种继往的任务,是继往。到了后期,在五四运动促进下,它就具有另一层启蒙的内涵,那就是以共产主义为主潮的思想启蒙运动,因此后期是创新,是开来,从此中国社会政治运动和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下面从三个方面极简略地汇报一下。

第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辛亥革命以后,虽然民国已具有形式,然而我们明确看到,在政治和思想中,依然乌烟瘴气,极其混乱。袁世凯和北洋军阀走马灯似地统治我们的政坛,而同时,在意识形态方面,依然存在严重的封建意识,而这种封建意识是密切配合了袁世凯的“洪宪称帝”和张勋的复辟。比如说,上海的孔学会。具体说来,维新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启蒙,但它缺乏彻底性,因此,它不可能有鲜明彻底的反封建内涵,尽管它宣扬民主主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不管在社会制度层面上,还是在更深的理论层面上,都是如此。我不太赞成把辛亥革命看成是单纯的政治层面的一种斗争,认为它是一种伟大的启蒙。试想用共和制度取代帝制,难道不能在思想上引起巨大的变化吗?它无疑是一次启蒙,不能低估辛亥革命作为伟大的启蒙运动的意义,尽

管它更多地停留在政治层面上。我认为谁要低估了共和制取代君主专制所造成的思想的重大变革,似乎不够公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中国人民的生活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于是怀疑产生了思想。当时中国的先进人物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为什么向西方学习了这么久,为什么经历了多次的变革,包括辛亥革命这样强烈的斗争,而根本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两座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依然如故?必须进行反思。他们得出结论,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没有很好地挖掘深度,特别是在思想上,没有真正进行“破旧立新”。因此,早期,也就是从1915年到1919年,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们、主将们,认为必须要补课,重新举起反封建的旗帜,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所造成的包括人民群众在内的精神上的愚昧、迷信和虚妄。他们把这作为突破口,举起了相应的民主、科学的旗帜。我认为,这是极其重大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他们是抓住了当时的关键,尽管他们的思想远没有脱离西方的民主主义,但是他们这种补课的任务,继承了过去未竟之业。反封建意识的斗争,在当时无疑是极其需要的,既是历史的要求,也是时代的需求,具有重大的启蒙意义。只有让中国人民思想进一步解放,废除了中世纪思想的束缚,他们才能奋发有为,才能继续进行战斗,因此才有五四运动前所未有的彻底反帝反封建政治斗争,也才有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后期的新的追求和开拓。

第二点,当时这些主将们、斗士们高举了“德先生”、“赛先生”的旗帜,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迷信、愚昧,还有虚妄。他们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这里首先要举到陈独秀。他提出我们必须提倡“德先生”、“赛先生”,来反对封建政治伦理道德等等,反对认识上的没有理性的信仰,反对虚妄、迷信等等。陈独秀提出,要用“快刀斩乱麻”的精神,来对待旧的思想束缚。他指出,我们要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因为对经济社会发展来说,民主科学正像舟船和车的两轮(船指的

是轮翼船),所以他的主将的地位是不能否认的。

除此以外,还要提到当年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共产主义战士李大钊,他后来牺牲在北洋军阀的屠刀下。他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他那种充满激情、深刻内涵的政论在当时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他特别寄希望于未来和青年人,反复指出,中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命运在于青春中国的投胎复苏。在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中,特别是对儒学的批判,对三纲五常的批判中,应该说,李大钊是比较带有分析的态度。他多次说明,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道德标准,他多次说明,我所抨击的不是孔子,而是那些专制帝王所塑造的偶像、他们的灵魂。他能把孔子和后历代帝王加工的封建儒学作一个突破性的划分,这种精神在当时是可贵的,是一种科学分析的精神。

还需要提到吴虞。后来尽管他消沉了,但他当时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来自四川,受到鲁迅《狂人日记》的影响,明确提出,封建制度、封建礼教、伦理道德的本质就是“吃人”,他在文章中讲,讲礼教就是吃人,吃人就是讲礼教。他这种对于中国影响极其深厚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具有重大的思想解放意义。因为家族的问题是和社会制度密不可分的,是它的一个细胞,所以这种批判也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内容。

还应提到鲁迅。因为鲁迅当时没有写很多政论,所以就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公允的评价。他当然是新文化的主将,他的作品,特别是他的小说,是当时新文化运动中的组成部分,文学革命的重要实践。此外他的杂文,是投向旧社会的匕首和投枪,他的《随想录》、《我的节烈观》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在这里要特别提一提他的两篇小说,一篇是五四前写的,一篇是五四前夕写的。在五四前写的《狂人日记》中,鲁迅通过一个虚拟的狂人,指出封建社会最本质的内容,那就是“吃人”。鲁迅借狂人之口指出:“我把二十四史翻来覆去地看,看到半夜,终于在字里行间,看到两个字‘吃人’。”这是他最深刻的结论。只要我们想一想中世纪人民群众的处境,

儿童、妇女的处境,我想他讲的完全是正确的。今天我们很多作品,包括那些“戏说”,那些艺术作品,对于封建社会的描述是违反了起码的真实,大家可以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如果作为严肃的艺术作品来看的话,那是非常令人感到遗憾的。在这里,我特别强调一下《药》的深刻内涵。刚好它在1919年4月出版。这个短篇小说所描写的内涵诸位非常熟悉,我之所以要提到它,是因为这部小说过去受到人们的误解。在某种过激的思想影响下,包括过去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听我的老师讲,这部小说主要反映革命者与群众之间的隔阂,是反映辛亥革命志士们的不足,因为他们没有让群众了解他们的活动的业绩,因而就出现《药》这样的悲剧。我觉得,如果这是《药》的内涵的话,也是很次要的。实际上,我认为,这个作品是揭露人民群众在封建制度下所造成的那种愚昧和迷信,从而为科学和民主这两面旗帜找到根据。我们为什么要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呢?就是要解决、要消灭封建专制制度和愚昧、迷信和落后。所以我想我们提到鲁迅是完全必要的。

除此之外,还有钱玄同、刘半农,他们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这里特别要提到我们的校长蔡元培先生,他当时没有写太多的政论,但他把北京大学从一个旧式的大学堂变成一个近代化的大学,把它变成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也是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据点。因此他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不可磨灭。

此外,包括胡适之在内的其他人,我们都应给予适当评价。有的论者说胡适主要从形式上考虑,但仅就提倡白话文,也是一种重要的贡献。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们、主将们,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承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任务。

新文化运动早期有没有局限性?我想应该有。当我们充分肯定的时候,也应该看到它的不足。但是没有任何根据把新文化运动的某些不足和局限作为否定它的根据,这是没有根据的根据。新文化运动由于大部分斗士都没有掌握科学理论和方法论,因而他们缺乏科学分析的态度,当他们向中世纪开火的时候,有的时候

往往激情压倒理性,因而他们的理论不够中肯,缺乏科学性,但是我们对先驱者不能苛求,而应该加以历史的理解。

最后一点,要简单说明的是,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的促进下,在全国广大群众、各个阶层精神振奋的情况下,继续探索新的道路,因此就不仅仅是补课;终于经过不断的探索,从各种各样的社会流派中,最后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所以今天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谢谢大家!

中国教育电视台供稿 录音整理:张炜 未经本人审阅

王晓秋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五四运动和中外文化的交融

[1999 年 5 月在北京大学演讲]

今年是五四运动 80 周年,我们怎么样来认识五四运动呢?我认为,五四运动是集爱国救亡、思想启蒙、文化革新于一体的一个伟大的民族觉醒运动——中华民族的觉醒。五四运动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民主与科学的火炬,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可以说是有着划时代的意义。那么,五四的精神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它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创新精神。我们对五四运动可以从各种角度、各个方面来加以研究。我今天就想着重从五四运动和中外文化交融的角度作一个讲演。

我们知道,五四时期,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个空前活跃的局面,就是中外文化交融的高潮。外来文化如滚滚浪潮,汹涌而入。当时中国的知识青年如饥似渴地吸收新思想,如痴如醉地迷恋新文化。当时各种主义、学说、思潮、流派,可以说是百家竞起、众说争鸣。在五四时期,几年之间,中国简直成了一个世界文化交融的大舞台。那么,为什么在五四时期会出现这样一种文化现象?它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宝贵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文化又有什么启示?我今天试图运用文化发展的理论方法来加以初步探讨。

下面主要讲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文化交流与开放机制。文化发展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纵向流传,一个是横向交融。所谓交融就是交流和融合,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它的发展一方面要依靠自身文化的不断积累、进步,也就是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要进行继承,批判和发扬;但是,另一方面,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绝对不能是封闭式的孤立的自我繁殖,它必须要和外来文化加以交流,不断地补充丰富,对外国文化进行吸收、借鉴和融合。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横向交流是文化发展、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动力。文化交流能推动不同的国家民族间的文化互相吸收营养,借鉴经验,取长补短,创新发展。它既能维系世界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又能调剂各国文化间发展的不平衡性。

进行文化交流,首先要克服一种文化隔离体制。与文化开放机制相对的就是文化隔离机制。这种文化隔离由地理、社会、政治、心理等因素形成。五四时期之所以会出现中外文化交融的高潮,首先是历史和时代的大势所趋。

我们知道,20世纪初,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了一股汹涌澎湃的世界新潮流。当时北京大学的一份学生刊物叫《新潮》,在1919年1月出版的创刊号上,曾经对这个潮流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它说,“却说世界上现在有一股浩浩荡荡的新界潮流,以俄罗斯革命为起点,由东欧进入中欧、西欧,波及美洲,影响非洲,正位于印度洋,进入太平洋,而来到了黄海和日本海。由于所经洋面最大,所遇障碍最多,所以潮流的吼声越响,浪花的飞尘越高。这股洪流现在已席卷中华大地。”1919年7月,湖南出版的《湘江评论》的发刊词中也有形象描述:“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打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者生,逆它者亡。”

中国内部也存在着接受外来新思潮的条件和要求。我们知道,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和君主专制制度,民主共和观念已经深

入人心。但是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勾结起来,造成了一个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尊孔复古”的逆流。这种情况促使进步的中国人放眼世界,迫不及待地要寻求救国救民的新的思想武器。当时浙江有一个杂志叫《商日半月刊》,它在创刊宣言里就大声疾呼:诸位,旧思想的末日到了,人类解放时间就在眼前了,假如再不趁此吸收新的学说,那么现在到了 20 世纪就要被天演淘汰。

中外文化交流的主体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的变化也是形成这种开放机制的重要因素。我们知道,1905 年废除了科举制度,改革了学制。这样随着新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国近代新型知识分子在逐渐地成长、壮大。他们不同于那种政治上依附式、知识结构是封闭型的旧式士大夫,而是具有初步的新文化科学知识素养,强调自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富于批判精神、进取心理和开放意识的新型知识分子。根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的统计,1917 年全国已经有大、中、小学学生 400 万人左右。当然,这个人数在当时 4 亿人口中只能占百分之一,然而毕竟是形成了一个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充当了五四运动的骨干力量。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近代新型知识分子中的留学生,他们成为沟通中外文化的重要桥梁。在 20 世纪初,先后有三次留学外国的热潮。最初是留日热潮,在 1906 年前后达到高峰时有七八千人,到 1919 年还有 3 400 多人;辛亥革命后又掀起了留美热潮,1918 年已达 1 100 多人;在“五四”前后还出现了留法勤工俭学高潮,1920 年有 1 600 多人。这些留学生在外国直接接触和吸收外国文化,眼界开阔,思想开放,同时,具有比较好的外语能力,因此他们就成为传播外来文化和促进中外文化交融的先锋和骨干力量,其中一些人成为五四运动中的领袖人物和骨干分子。我们可以举出很多,比如留学日本的有李大钊、陈独秀、鲁迅、钱玄同、周作人、高一涵等等,还有郭沫若、郁达夫;留学美国、英国的有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留学法国、德国的有蔡元培、刘半农、蔡和森、向警予等等。像周恩来,他先留学日本,后来又留学德国、法国。

文化交流需要一个开放和民主自由的文化环境和氛围。当时的中国虽然还处在北洋军阀的反动黑暗统治下,但是某些地区和学校却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小气候,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我们北京大学。自从1917年7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北大实行了“兼容并包”的开放方针。蔡元培在北大的第一次演说就明确宣布,“我对于各家学说,异各个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这个方针在当时封建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具有为新文化思想开拓道路的重大意义。蔡元培还积极地聘请了具有新思想的学者到北大讲学。他首先聘请了《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陈独秀说:“我还要到上海去办《新青年》呢!”蔡元培就说:“你可以把《新青年》也带到北大来。”还请了李大钊、胡适、鲁迅、刘半农、钱玄同等人到北大来任教。除了这些学者在讲坛上传播新思想以外,还出版刊物,组织社团,举行演讲,开展辩论,生气勃勃的北京大学就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摇篮,也成为了中外文化交融的一个重要的园地。

通过报纸、杂志、书籍来翻译介绍外国新文化新思潮,是五四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一种最主要形式。五四前后创办的各种新刊物如雨后春笋,多达三四百种,而且多数刊物都宣称以介绍新思潮和改造社会作为自己的宗旨。因此各种报刊都大量刊登国外各种思潮流派和外国文学作品的译著和评介的文章,许多报刊都竞相出版介绍国外思想的专辑。比如《新青年》有马克思研究专号、易卜生号;《新潮》出版了1920年名著介绍特号,在这个特号中集中介绍了爱因斯坦、杜威、罗素、威尔斯、柏格森、韦伯、华特生等人的著作;《晨报》的副刊专门有个译丛栏,曾经刊载了马克思的《劳动资本》和罗素的《哲学之价值》等译文,以及介绍马克思主义、德国康德主义、尼采超人哲学、俄国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日本吉野正浩的民本主义等思想的文章。我看到一份统计,从1918年到1923年,仅《晨报》就翻译介绍了30多个国家170多位外国作家的文学作品。《新青年》、《晨报》副刊刊登俄国作家契诃夫、屠格涅

夫、托尔斯泰等人的小说 48 篇;还有法国作家莫泊桑的小说 26 篇。此外,这一时期还大量出版了外国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著作的译作。

人员交往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除了中国人出国留学、访问、考察、游历、出使以外,还有外国学者、作家、记者、传教士等来华讲学、访问、游历。其中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是美国人杜威和英国人罗素。杜威是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1919 年 5 月,应他的学生胡适的邀请来华讲学。他先后在上海、南京、北京、湖南、广东等十几个省市演讲。当时《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大量刊载他演讲的消息和内容,并出版了一本《杜威五大讲演集》,在两年之间就再版十次之多,很受欢迎。所以,杜威自称“我是把美国最新的文化拿到中国——最古老的文化国家来谈一谈”。杜威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思想当时虽然是风靡一时,但是并不能根本地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因此不久以后也就风流云散。另外一位是英国的新实证主义的哲学家——罗素。1920 年 9 月,他应北京大学的邀请来华,曾经在北京、江苏、湖南等地讲演,宣扬包括劳资调和等内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即行会社会主义,当时《新青年》、《晨报》、《时事新报》、《东方杂志》也纷纷刊登他的讲演和文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五四”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规模之大,翻译介绍外国学说、文学作品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第二问题讲一讲文化冲突与选择机制。如上所说,五四时期形形色色的外国思想文化如潮水般地涌入中国。除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之外,从 18、19 世纪的欧洲的启蒙思想、民族主义到 20 世纪的西方资产阶级鼓吹的新康德主义、新实证主义;从普鲁东、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到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英国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还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俄国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等等,几乎当时所有东西方流行的各种五光十色的外国思想流派都一齐登上中国文化思想舞台,使五四时期的青年感到目眩眼迷,究竟哪种思想、哪条道路才能救中国呢?一度使

他们陷入了迷惑之中。包括毛泽东,他在 1920 年 3 月 14 日给章士钊的信中说:现在我对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即使对于社会主义,当时青年人脑中也是一个相当庞杂、模糊的概念。瞿秋白曾经回忆说:当时社会主义引起人们很大兴趣,但并不十分了解。就好像隔着纱窗看迷雾一样,不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实行文化选择机制。就是说在文化封闭状态被打破、面对新文化的挑战和原生文化环境发生变更、出现文化危机的时候,如何在多种文化模式中间进行选择 and 建立新的文化环境。

文化选择也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一种叫稳定的选择。这种稳定的选择要求保持文化传统的基本特性,即比较保守的选择。比如过去流传的“中体西用”,这种思想就是一种稳定的选择。这种思想实际上阻碍了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在五四时期比较普遍的是一种歧化的选择。那就是说由于不同的人对于不同的外来因素各有取舍的倾向性的选择,造成了原生文化内部多样性的歧化。这种选择可以说也是一种不成熟的选择。第三种是定向选择。它是导致原生文化基本特性定向变化的选择,就是向某些数量非常少但它的发展趋势是一种理想性的文化变异体靠拢。这是一种积极的但又是困难的选择。那么对比多种外来思潮究竟怎么样来进行分析和选择呢?像当时北京大学的《新潮》杂志的发刊辞就指出四点:第一,是要了解今日世界文化发展阶段;第二,是要掌握现代思潮的发展方向;第三,是要明确中国现状和现代思潮间的距离;第四,是要考虑用什么方法把中国纳入世界文化的潮流。所以在选择过程中首先要理解和掌握新思潮或新文化流派的内容和实质。比如说社会主义是当时人们公认的一种新思潮,但不少人或文章却把普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欧文的合作主义或者是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和俄国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波恩·托恩斯的社会民族主义这些流派都当作社会主义思潮来介绍、宣传。那么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误

解和曲解就更多了,有的人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是兼有马克思、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三个人的主义。即使是《新青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发表的文章,也并不都是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除了李大钊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比较科学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主要组成部分外,顾孟余的《马克思学说》实际是赞成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黄凌霜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是根据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所以翻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领会掌握其精神实质,是非常重要的。为此,1920年12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倡导成立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它的宗旨是要深入研究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它的方法就是要首先编译社会主义的丛书、社会主义的研究集,发表论文、演讲。1921年11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又公开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实际上这个研究会1920年就秘密成立了。它以研究马克思著作为目的,收集购买了有关马克思的各种著作、文章,并供会员借阅,组织会员合作翻译《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研究会还定期举行讨论会和演讲会,还分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十个专题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有比较才有鉴别,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曾经组织了题为“社会主义是否适应于中国”的辩论会。辩论会开了两天,最后由李大钊作了总结。一位原来反对社会主义的北大学生说:“李先生以唯物史观的观点论社会主义之必然到来,真是一针见血,使我们再也无话可说。”李大钊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通过与胡适等人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以及与张东荪等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同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及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机会主义划清了界线,加深了对科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使其在中国广泛传播,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流。这里我可以举一个材料:1923年12月17日,在北大25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北大有个平民教育讲演团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中国流行各种关于政治方面的各种主义中,你相

信哪种？”被调查的 426 个男生中，社会主义获 203 票，其他的主义如三民主义只有 103 票、民族主义只有 51 票、合作主义只有 1 票；而被调查的 30 位女学生中间竟有 22 票赞成社会主义，占了绝对优势。于此可见当时知识青年进行文化定向选择的结果。

第三个问题，我们来讲讲文化融合与整合机制。中外文化交融的一般过程，就是通过交流、碰撞、冲突逐步达到理解、沟通，然后在理解沟通中进行选择，进行调试，最后实现汇通和融合。这是不同文化接触了以后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吸收，双方融合而产生新的文化体系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把它叫整合机制。这里就涉及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或者说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间的关系。由于异质文化——中西文化接触发生冲突，所以在五四期间中国的思想学术界曾经展开一场激烈的“中西文化大论战”。在这场论战里面，各种观点五花八门，有的人主张盲目排外，反对中外文化融合：有的固守本位文化，坚持“中体西用”原则；有些人呢，企图用中国文化压倒或者代替西方文化；还有些人鼓吹全盘西化，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还有些人是宣扬东西文化的调和，但实际上往往阉割了文化融合的精神支柱。中外文化的融合是一个文化整合机制，这个整合机制作用的过程，就是在广泛深入地开展文化交流、深刻理解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本身的基础上，来扬弃和重组主体原有的文化结构。既保留本民族文化优秀成果和合理的因素，又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从而把本民族的文化提高到世界先进文化所达到的时代水平。文化融合绝对不是简单的引进、摹仿或者调和，而是经过文化整合，融中外优秀文化因素为一体，对中国文化进行改造、重组、提高和再创造，建立起一种更为适应新的时代更有生命力的新的文化体系。这是一个很漫长艰苦的历程。

五四时期也是现代中外文化融合的一个开端，然而它已经取得充分的效果。比如说在思想领域，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的新思潮传播到中国，就有一个如何与中国的国情、中国的革命实际、中国的文化土壤以及传统文化相融合的问题。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

义者最初由于理论素养不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深,他们通过认真学习研究,特别是在斗争实践中逐步成熟起来。比如通过“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使他们认识到坚持由马克思主义研究实际问题推进中国革命的重要性;通过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促使他们深入地钻研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通过关于社会主义认识的论战,促进他们认真分析中国的国情,并从理论上肯定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认识到必须深入工农群众和实际斗争中去。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才有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是经历了无数的艰难曲折,逐步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领导中国赢得革命的胜利。在这个期间,由于某些人用教条主义、机会主义来曲解马克思主义,曾经使中国革命遭到了重大的损失。所以,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并且在实践中进一步地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再比如说在文学领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他们自觉地把介绍外国文学作为中国文学改革和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力图把西方文学的精华和中国传统文学的优秀成分加以融合,追求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结合。鲁迅是从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开始他的文学道路的,而且提倡积极主动地吸收外国文化及其优秀的成果。鲁迅先生赞成“拿来主义”,把外国的优秀文化拿过来。郭沫若也回忆过他和外国文学的关系。他说,“我接近了泰戈尔、雪莱、撒克帝亚、海涅、歌德、席勒”,并间接地与北欧文学、俄国文学更有接近的机会。他们虽然也崇拜文艺复兴,倾心于人文主义,尊崇易卜生、歌德,但是对他们影响最大的还是19世纪俄国的实用主义作家,像屠格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等等,成为很多中国作家的导师和朋友。五四新文学的发展正是这种中外文化融合的积极成果。

最后我们讲一下第四个问题,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五四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对中国文化思想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促使中国文化跨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它改变了中国文化封闭保守的格局,空前规模地引进、吸收、借鉴外来的文化,开创了文化开放的新局面。在这个中外文化交流的热潮里,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经过艰苦认真的探索 and 选择,终于在各种外国思潮中找到了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认定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从而把新文化运动转变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通过中外文化的融合,中国文化吸收了外来文化的丰富的营养,得到了创新和发展。在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和成果,还出现了一批像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这样可以汇通中西文化的文化巨人,并且成长了一代文化新人,其中包括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郭沫若、茅盾等后来对中国革命和文化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物。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五四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也存在不小的局限性和教训。首先,就是当时的文化开放仍然受到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那种政治环境的严峻的限制,即使是有些局部比较有利的小气候,像北京大学,也常常遭到反动政府的干扰、破坏。其次,由于当时中国的教育不普及、不发展和国民文化素质低,中外文化的交流只能在少数知识分子的圈子里面来进行,缺少群众基础。即使在知识分子中间,因为对中外文化交流的理论准备不够,翻译水平低,以至于缺乏对外来文化的鉴别、消化能力,往往产生对外国思想文化生吞活剥地引进,一知半解地吸收,肤浅地理解,甚至造成误解和曲解的现象,而且常常带有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第三,在中外文化冲突和融合过程中,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上,有些人基本的批判有余,而冷静的分析清理、理智的扬弃建设不足;有些人甚至对传统文化全面否定,一概骂倒,有的主张干脆全盘西化,甚至要取消汉字,走向一种极端的民族虚无主义。这种思想既不符合文化交流发展的规律,又伤害了民族的自尊,反而增加了文化革新的新的阻力。

那么,五四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给予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有什么启示呢?怎样才能继承发扬五四的精神来超越五四的精神,来超越五四呢?我觉得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是全方位的现代化,其中文化教育,特别是人的现代化是关键的一环。它关系到国家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以及国民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制约着政治、经济、国防、科技现代化的发展,所以它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前提和保证,绝不能轻视。在今后发展中,还应该放在极其重要和优先的地位,所以我们现在把科教兴国作为我们的一个发展战略。第二,我们要以宽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怀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 21 世纪。我们要坚持开放,坚持改革,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大力地加强中外文化的交流,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和最新的成果。我们要提倡文化思想和学术的民主自由,形成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创造中外文化交融的良好环境、气氛。我们特别要重视发展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和理论修养,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的理论研究、创作和宣传普及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提高广大群众分析、鉴别和理解、吸收、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选择吸收外来文化中的精华。对于外来文化和民族文化、传统和现代文化的关系,我们应该树立一种辩证统一的认识,克服那种形而上学的片面的观点。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根据现代化的社会发展的需要,把外来文化和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有机地结合起来,经过文化整合,加以提高和再创造,使其发生一种文化突变,建立起无愧于时代和民族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体系,培养出有较高文化素质的社会主义新人,并且造就出一批文化的巨人。我想这就是 21 世纪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必由思路,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我的讲演就到此结束。

中国教育电视台供稿 录音整理:杨晶 殷盈盈
未经本人审阅

刘献君 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 教授

适应社会,走向成功

[2000 年 10 月在华中科技大学演讲]

老教育家叶圣陶曾说过,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不教育。其意思是,要通过教育去启迪学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去学习、思考,自己得出结论。迷则为凡,悟则为圣。凡人和圣人之间的区别,在于是“迷”还是“悟”。教育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启迪学生“悟”的过程,要让学生自觉地去悟。要让学生去悟,教师自己先要悟。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断地将自己的“悟”的感受、收获表达出来,激发学生共同来悟。下面我想结合自己的研究、思考和人生体验,和青年朋友谈谈如何适应社会,走向成功。

一、认识环境的不同特点

任何人的性格特征、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以及成功与否,都是在个体文化和社会文化组成的坐标系中取值。换言之,一个人的成功既取决于个体的素质,又取决于你所面临的环境。因此,同学们走向社会,取得成功,既要认识自己,又要认识环境。

每个特定的环境,都有其自身的传统、风格,都有不同的特点。我们只有认识环境,适应环境,才能改造环境。

同学们毕业后走向社会,岗位千差万别,环境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从学生生活环境进入了职业生活环境。那么,我

们首先要研究、把握这两种不同类型环境的特点。

首先,学生生活环境是经过加工的、秩序化的环境,职业生活环境是自然的、未经设计的环境。学校教育是根据一定的社会的现实和未来的需要,遵循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受教育者获得知识技能,陶冶思想品德,发展智力和体力的一种活动。学校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因此从教学计划到教材、授课、作业,从课内到课外,从班集体的组织到校园环境的布置,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学生生活很有秩序。职业生活则主要靠自己摸索、奋斗,再没有人为你去精心设计了。因此,不同的对待方式,结果会大不相同。

其次,学生生活是浪漫的、想入非非的;职业生活是现实的、郑重其事的。学生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思想言行一般不直接转化为社会现实。做作业是为了消化、巩固课程学习,演讲是为了训练口才和思维……错了不要紧,可以重来。职业生活则根本不同,你设计桥梁,建造楼房、工厂,错了一个数字,后果不堪设想;你当法官,做记者,不实事求是,会造成极大的社会影响;你当教师,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学生。因此,职业生活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再次,学生生活属非分配领域,同学之间不发生利益冲突;职业生活属分配领域,相互间利益相关。学生来校是为了学习,同学之间的感情是非常纯洁的,因而保持的时间也最长。在校期间,也会发生一些矛盾,但毕业后回过头来看,大家都会觉得根本算不了什么。职业生活属分配领域,人们通过职业生活既要成就事业,又要养家糊口。选拔干部时,一个职位,多个人争;评定专业技术职务时,一个或几个名额,大家都想上;工资、奖金的发放,住房的分配等等,都与个人利益相关。职业生活的协调靠政策、机制。刚走上工作岗位时,有些同学对此极不适应。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后工作的领域大体可以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领域,如在政府部门工作,属政治领域;在学校工

作,属文化领域;在企业工作,属经济领域。各个领域的协调原则是理(理论)、力(权力)、利(利益)。但是,文化领域以理为主,政治领域以力为主,经济领域以利为主。这是我们应该把握的。

总之,环境不同,对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不同的环境有其自身的特点,因而认识环境是我们适应社会、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在“无事可干”中走好第一步

80年代末,我和一些做学生工作的同志对我校部分毕业生进行调查。当谈到如何适应社会、走向成功时,几位校友不约而同地提到,要正确对待“无事可干”这一段时间。

所谓“无事可干”,是指刚刚从学校走向社会后一两年内,学生本人对社会、单位、工作不了解、不熟悉,而了解、熟悉要有一个过程;单位领导对毕业生的能力、水平不了解,了解、认识也要有一个过程。因此,相对于老职工来说,在这一段时间,他们显得“无事可干”。面对这样一段时期,大体有四种态度:一是领导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二是充分放松,觉得十多年读书太累,需要好好玩一下了,于是,打扑克、下棋、跳舞;三是埋头学习,准备考研;四是对本单位的情况调查、观察,找准有可能发挥自己优势的地方,同时,学习、思考,作好相应的准备,一旦有机会,马上可以上手。四种不同的对待方式,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无疑,取第四种态度的同学,会比其他同学起步快一些,发展好一些。

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社会为人们选择职业所提供的机会增多了,开始重视人们择业和从业机会均等,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同学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选择待遇比较优厚、并能帮助自己在事业上有所发展的职业,这也是无可厚非的。由于摆在每位同学前面可供选择的机会比较多,因而,一些同学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自己干什么好,心老是浮

的,漂泊不定,很苦恼。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

首先,要把握选择的原则。马克思说:“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我们选择职业时要考虑两个方面:社会和自身。一是社会的客观现实,它所提供的要求和机遇,因为任何人都只能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二是个人的志向、抱负、特长、潜能和兴趣,能够充分实现个人的主体性。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我们要努力找到社会需要和个人发展相一致的工作。

其次,要把握选择的方法。选择的方法是比较。比较是利弊之间的比较。任何事物总是利弊相交,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是没有的。但我们选择职业时,往往希望有利无弊:名声好,收入高,发展前途大,大城市,离家近……这是不现实的。两利相争取其长,两弊相争取其短,只要利大于弊就可以了。

再次,职业、工作一旦选定了,就不要左顾右盼,彷徨不定,而要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埋头苦干,做出创造性的成绩来。行行出状元。任何行业,只要我们选准了方向并坚持下去,都可以做出成绩,为社会作出贡献。任何新事业都是做前人未做过的事,具有探索性、挑战性和风险性。如果一碰到困难、挑战、风险就退缩不前,就考虑换工作岗位,这样的人,一辈子将一事无成,无所作为。

三、会想不等于会做

同学们听课时,可能在想,这些老师讲课,没有几个讲得好的,要是我上去讲肯定强多了。还有一些同学在想,要是我当校长,要是我当厂长,肯定……大家会想,但会不会做,则是另一回事。比如,我唱歌,很多曲子,想起来好像都能哼,但唱出来就走调。因此,会想不等于会说,会说不等于会做,个人素质不等于事业成功。

大学本科毕业,读了16年书;研究生毕业,读书时间更长,确实有了不少的书本知识。但是书毕竟是书,生活中的很多道理并

不在书上。从知识的获取,到能力的培养,到经验的取得,需要一个实践的过程,一个不断总结提高的过程。《李宗仁归来》一书的作者,在此书的前言中写了一段话,意思是:人,如果不是从1岁活到80岁,而是倒过来,从80岁活到1岁,那么,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可以成为伟人。这当然不可能,但强调了阅历、经验对一个人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刚刚走上社会的大学生,所缺少的正是经验。

我们来看看一些毕业生的教训和体会:

一位学生入厂后,以知识渊深自居,终日足不出室,闭门造车。一天正绘一张机械图,一位师傅默然审视良久,说:“这图有一个部位好像不对。”他一听火了:“我学过。我是书本学来的!”师傅说:“我没上大学,可这机器我摸了几十年。我觉得……”他反讥道:“那你怎么没考上大学?”此事传出,全厂哗然。从此,再无人给他“提意见”,一年后,他郁郁不得志地调出厂。

我校有几名毕业生一起分配到天津某单位工作。工作之前,他们就计划着如何在单位大干一番。一到单位就提出一个设计方案送给领导。但时过好久不见回音。为此,他们便认为领导不重视知识分子,原来的冲天干劲化为乌有。过了一年时间,他们回头再看这个设计方案,几个人都笑了。他们说:“想法太幼稚了,初入社会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资本,只能虚心学习。”

一位校友在给学校老师写信时说:“有些刚毕业的大学生以为自己是个人才,可以大干一番事业,总希望有位明智的领导能起用他,否则便会责怪领导不重视人才,干不了几天便灰心丧气,有的便从此一蹶不振。应该让同学们了解,上至中央机关,下至乡镇企业,要毕业生,首先不是考虑他那里缺少一个当官的人来接班,一旦分来一位大学生、研究生,领导首先考虑的是我们单位来了一位学××专业、干××工作的人。所以评价一位大学生的标准,首先是他的本职工作干得如何,是否是一个好的职员。如果在实际工作中,确实发现他在某方面有很强的能力,其他方面的表现也不错,便有可能给他一个能胜任的职务。”

因此,我们走上工作岗位以后,一定要踏踏实实,从头开始,从小事做起,从本职工作做起,虚心向老同志学习,不断积累经验,切忌急于求成。一年只能收获小麦、玉米,十年才能收获参天大树!

四、人的差异产生于业余时间

大学毕业以后 5 年、10 年、20 年,同学之间在学识、成就、贡献以至职务等方面,差别很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爱因斯坦等学者认为,人的差异产生于业余时间。因为 8 小时的上班时间,大家都忙于工作,差别不大。现在实行双休日,而 5 天的工作时间内,8 小时工作,8 小时睡觉,另外每天至少有 4 个小时可以自由支配。两者加起来,每周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超过工作时间。对这段时间利用的情况不同,人们今后的发展也大不相同。

坚持在业余时间进行学习、研究,要有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坚韧不拔的毅力,要掌握正确使用时间的方法。根据我的体会,还必须把握以下几点:

要有明确的目标和规划。以盖楼房为例,首先要进行设计,拿出图纸,然后照图施工,从打地基开始。否则,将木头、砖头搬来搬去,几十年下来,仍然是一堆木头、砖头,成不了房子。进行学习、研究,同样需要订出规划,然后集中精力于一个方向,按照自己的规划,日积月累,必然会取得成功。

要建立自己的知识结构。世界上的知识浩如烟海,例如一个人要把一年出版的新书看一遍,至少需要 600 年;一位化学家,要读完一年内发表的有关化学的论文,至少需要 48 年。这说明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凡是有所作为的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知识结构。一般而言,知识结构包括知识硬核——基础理论、技术理论、应用理论;知识幔层——以论文形式发表出来的各种理论、学说、观点;知识大气圈——在实践中产生的闪光的思想、判断等。我们要据此建立自己相对稳定的知识结构,同时又必须不断吸收新鲜

知识,充实到自己的知识结构之中。

工作、完成、发表。这是法拉第的座右铭。意思是,首先我们要干,干一件事就要干完、干好,完成之后要总结、发表。发表的方式可以是著作、论文,也可以找几位朋友、同事,谈谈你的心得、体会。

干一件事要产生多种功能。比如,你干一件工作,首先要把这件事干好,这是一个功能;干完以后,可以总结出工作经验,这是一个功能;进一步可以从中找出规律,提炼出思想,写出一篇论文,直至著作,这又是一个功能。“笨人”干一件事只求一个功能,“聪明人”干一件事,力求多种功能。这样做的结果,聪明人等于比别人多活了几辈子。

五、多数人对一个人的评价是公正的

即将走向社会的大学生,多数同学都担心社会上人际关系复杂,难以应付,害怕处理不好,影响自己的发展。我们要重视人际关系,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根据我多年来的观察、体验,我悟出了一个结论: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多数人是好的,多数人对一个人的评价是公正的。比如,对一个人的评价,有人把他说成一朵花,只有优点,没有缺点,这不符合事实,应去掉最高分;有人把他说得一无是处,只有缺点,没有优点,这也不符合事实,应去掉最低分。多数人认为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就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多数的人的评价是公正的。

我们认定“多数人对一个人的评价是公正的”以后,那么,在我们今后的工作、生活中,不必左顾右盼,瞻前顾后,关键在于很好地把握自己。一个人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你的品德、能力和贡献。

得出这样一种认识以后,是不是就不要去重视人际关系了呢?否。我1987年曾组织几位研究生对我校120名毕业生进行调查,当询问“进入社会后你最感苦恼的是什么”时,45人回答是人际关

系,13人是“得不到重用”,19人是“得不到理解”,6人是“找不到知心朋友”。这四项都与社会交往有关,共73人,占被调查对象的60.8%。我们生活在社会之中,每一个人都离不开和人打交道,一个人的成功,同样取决于他人对你的支持。而且,能否正确处理好人际关系,也是一个人的品德、能力、素质高低的表现。关于处理人际关系,已经出了不少书,提出了许多原则和方法,如与人相知、爱人如己、坦诚相处、大度宽容、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下面结合自己的体会,谈谈一些认识。

以诚待人是良好人际关系建立的心理保证。你待人坦诚、诚实,别人感到与你交往无后顾之忧、放心,才有可能建立良好的人际交往。如果时时要对你“设防”,不知道你讲的话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他还愿意和你交往吗?即便是虚伪的人,也愿意与诚实的人打交道。

大度宽容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社会上的人们,由于生活经历的不同,各人主观努力的不同,其思想、观念、性格千差万别。如果你在交往中设定,只能与自己性格、兴趣相同的人打交道,那么,你就只能与自己打交道。因此,我们要容得下各种各样的人。

积极增进交往才有可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的建立离不开交往。人际关系不是虚无的关系,它存在于你、我、他之间,存在于现实关系之中,表现为人们之间思想和行为的互动过程。只有在交往中,你才能认识自己、认识别人;别人也才能认识你。只有在交往中,才有可能建立感情、相互信任。好酒也怕巷子深。你如果自我封闭,领导和同事对你的能力、水平不了解,就谈不上信任和重用。

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还要学习和掌握必要的交往方式和技巧。在我的调查中,一些领导谈到毕业生的状况时,谈到了不少人不注意交往方式,如:有的人一天到晚往领导家里跑,左一个请示,右一个汇报。时间长了,领导就会瞧不起你,认为你没有主见。有

的人交往时根本不顾及别人,中午睡觉时,甚至晚上到深夜,一个电话来了,说了半天,又没有什么急事,弄得人家一家人都睡不好。有的人不会打电话,你跟他打电话,他听的时候一声不吭,那么,打电话的人说说就没有劲了,不想说了……这都是一些很小的例子,但说明交往时方法也很重要。

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我们同样要坚信,多数人对一个人的评价是公正的,关键在于把握自己、提高自己。

六、机遇富有弹性

我在对毕业生进行调查中,当问到“影响你成功的因素”时,40%左右的人回答是“机遇”。有人对中国当代名人成功素质进行分析时,把“抓住机遇”排在第一,其他几项依次是:功底与才华、信念、敬业精神、特殊个性、承受力、人际关系、善于表现自己、口才。可见,机遇对一个人的成功有重大影响。

机遇可分为先天机遇和后天机遇。先天机遇是指你生下来是男、是女;你是出生在北京的高干家里,还是像我一样出生在贫穷的山区农民家里……这对你今后的事业肯定会产生影响,但你无法改变,这也就是人们常称之为“命运”的东西。后天机遇是在你成长、发展中所遇到的社会需求,其本质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一种必然需要。大机遇就是那种持久的社会需求。我们通常所说的机遇是指后天机遇,这种机遇对我们的成功则是富有弹性的。

首先,能否抓住机遇富有弹性。机遇是客观存在,但你能否抓住它,则取决于你的素质。有人分析总结,改革开放20年来,有七大机遇:1978年至1986年是文学艺术家的黄金时代;1979年至1992年是个体户成功的最佳时期;1980年至1994年,是演讲艺术发展的黄金时期;1986年至1994年是我国计算机市场机遇的最佳时期;1986年至1992年上半年,是中國人在股票市场上成功的

最佳时期;1992年初至1993年上半年是房地产市场一次罕见的大的成功机遇;从1996年开始,下岗也许是一次机遇。这是从大的方面来说,在每个人发展的空间内,还有很多的机遇。

机遇一般有三个阶段:潜伏、高潮、衰退。在机遇的潜伏时期,它表现出风险大、困难多,要进入机遇将承担很大的压力,但只有早进入才可能取得大的成功。进入机遇晚,机遇就不再成为机遇,而是巨大的负担。抓住机遇,就要审时度势,看准社会发展趋势,及早进入机遇。

其次,进入机遇后能否取得成功,同样富有弹性。抓住机遇,取得成功,需要有胆略、学识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机遇只偏爱那些为事业的成功作了最充分准备的人。换句话说,只有在“万事兼备”的情况下,东风才显得珍贵和富有价值。因此,我们不要在那里等待机会,而是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使自己具备相应的足以胜任的资格。在长期艰苦准备的基础上,一旦抓住机遇,就可以如鱼得水,干出一番大的事业。

任何事业,特别是大的事业的成功,都可能遇到风险,遭受挫折。任何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都会遇到挫折,只不过挫折的大小不同,遇到挫折的时间不同。一旦遇到挫折,我们决不能“把眼前当永远,把暂时当永恒”。不少人的失败都源于此,自以为一次失败了,就永远会失败,一次成功了,会永远一帆风顺。遇到挫折,我们也不要埋怨。我经常观察我们这一代人,有的人,老是埋怨,埋怨社会,埋怨领导,埋怨父母,一辈子下来,背着埋怨两个字,累得要死,一事无成。永远保持积极向上、乐观的生活态度,是取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们一定要积极的生活态度。

七、做应该做而又能够做的事

人的一生无非是做人与做事两大任务,而这两者又是互相联系的。

做事,要做应该做而又能够做的事。这应该是价值判断,意即做事要选择那些对社会、对人民、对国家有益的事,符合法律、法规的事,这与我们做人密切相关。

做应该做的事,这就要为我们自己的行为立法。德国哲学家康德指出,人在自然界中获得知识和在社会中获得自由的过程,就是人为自然立法和为自己的行为立法的过程。人为自然立法,人便能够得到以因果律为内容的科学知识;人为自己的行为立法,人便能够得到以道德律为基础的自由。康德还认为,在审美领域,人的理性表现为判断力,判断力则使人产生审美情感。因而也可以说,判断力就是人在审美领域中的立法。

在做事中,人主要面临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主要遵循效率法则,要求人们掌握科学知识,要求真,遵循自然的规律。在处理人与他人的关系中,主要遵循公平法则,要求人们具有道德人格,要求善,维护和推进群体和国家的利益。在处理人与自身关系中,主要遵循超越法则,要求人们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美。我们要做到真、善、美的统一,即宇宙、人类群体和个体这三种存在形式的对立统一。

我们不仅要去做应该做的事,而且要做能够做的事。世界上应该做的事多得很,还要看自己能不能够做到。例如,我们中国人应该不应该像美国人那样,有小汽车,有小洋房?应该!完全应该!我们中国人在聪明、勤劳方面,决不比美国人差。但能不能够?不能够,至少现在不能够。我们的基础差,地少人多,如果我们中国人都像美国人那样消费,至少还得有两三个地球。

我们做事,受历史的限制。人只能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不可能超越历史。我们做事,受环境条件的限制。回顾我们20年来的改革历程,有些改革之所以没有取得成功,原因之一是忽视了环境条件的影响。我们做事,还受自身能力、素质、兴趣、爱好的限制。我们对自己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分析,选择最适合自己发展的职业和工作,以便自己一生最大限度地发热、发光。

观察一下我们周围的人们,有的人能够做的事不去做,不能够做的事老在做,一辈子下来辛辛苦苦,累得要死,却一事无成。我们要引以为鉴。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供稿

【编者絮语】从实际出发,从平凡人的平凡经历中去体悟出不平凡的人生哲理。这是本篇演讲的一大特色。演讲者不仅是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去体悟人生的哲理,而且还组织进行了几次针对大学生的大型的调查,从大量的事例中去发现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哲理。因此,对于正处在人生关键时期的年轻人,这篇演讲体现出的观点和方法尤其值得关注。

李德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当代人类生存的哲学思考

[2000 年 10 月在华中科技大学演讲]

我到武汉来出差,张曙光老师邀请我到这里来作讲座。这个题目也是他给的,可能有点大,我一下讲不了这么多。我就只从个人角度看我们当代人在未来怎么生存。

到 20 世纪末,人类对于自身的发展有许多的关注点,也有许多的忧虑。现在关于人类生存的思考已不在于个别的、个案的、局部性的,而是在整体性的文化层面上思考。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集中在对“人是什么”的理解上。

这个问题是个潜在的问题,因为现实没有人直接这样提,但是有许多具体问题已经涉及到这个课题。比如说克隆技术,现在围绕克隆人展开了许多讨论,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人”?用克隆技术克隆出的生命是不是人?反过来理解就是“人是什么”?我倾向于在克隆人后面加上一个“体”字,就是说克隆出的是这个人形的生命体,它只是具备了人的初步的物质基础。那么人是什么呢?人是一种社会的历史的动物,完整意义上的人是不可能克隆的,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他是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生命,这与机械制造是不同的。

围绕克隆人还有许多争论,诸如复制出来的人体在什么意义上是人,他是否享有人权等。理解“人是什么”是不能仅仅从自然的生物的状态来看。人是什么呢?如果从生命的形态看,我觉得

人是三重生命的集合体。一是人的肉体生命。二是精神生命,诸如思想、精神等,孔子死了几千年,但他的精神仍在影响着现代人。三是社会生命,这是最重要和核心的,按马克思的话来说,它是人的本质生命。社会生命是人在社会关系中存在的形态,它的存在形态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职业生命、道德生命等。“千夫所指,不病而死”的说法,就是指人的社会生命。

人的三重生命:肉体生命、精神生命、社会生命,只有完整的三重生命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人的现实生命。这样来看待人,那么人的生存和发展竞争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和发展呢?显然,第一,不是仅仅有吃有喝就行了,第二,光是想也不行,更重要的是人的社会生命的环境、条件和社会生命的方式,它要不断的改善,不断的丰富和发展。比如现在出现的网络生活、虚拟生活,这样人的社会生命就介于虚与实之间了,这是一种新的发展。

所以总的来讲,人的生命是非常多层化、非常丰富的,而且生命形式是不断生长和增加的一种形式,不是一种静止的简单的形式。马克思说,我们讲人的全面发展,不是说现有的一切需要都得到满足,现有的一切力量都得到发挥,而是说全面性是一种不断生长的全面性。人发展之后他又会产生出新的能力,这样就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全面,是一种动态的。所以人是什么呢?我说人是一种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生命形态。他包括上面讲的三重生命层次,因此讲人的生存和发展也应从这三个方面来考虑。

第二个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可以思考一下“怎样理解个人,理解自己”。这个问题也是讨论了很久的问题,但是回答这个问题有一个基本的思维方式。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讨论,焦点就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到底对不对?对这个问题大家的争论集中在一是人该不该为自己,人是该为自己还是为别人,二是主观上应该为自己还是为他人。有的人也倒过来说“主观为他人,客观为自己”。当然因为参加的人很多,按照这样的提问和回答方式,有关的基本道理也都讲到了;但是时隔20年后,回过

头来再看这个问题时,我们发现当时人们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有一点没注意到,人们把它不当作问题。为什么呢?就是这句话中的“自己”是什么意思?其实从人的生命多维性和多重性这个角度来看,思考点恰好应该放在这上面。那么人到底应该为不为自己呢,我觉得这话一点也不错,人就是应该为自己,连马克思都讲:只有人才懂得为自己,野兽就不懂得为自己,人如果不为自己,那整个人类为谁啊!为了整个上帝?人类的一切创造活动当然应该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发展,为自己当然也应该不错。你说我们中国人搞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为了美国富裕起来?你说无产阶级革命就是为资产阶级更好?不能这样说吧?!

像这样的问题思考,把主观和客观分离也没什么道理。说“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当你这个主观在为自己时,你怎么控制客观能为了他人呢?客观效果如果没有主观的控制和调节,那怎么能得到保证呢?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换一个角度,我主张我们要对“自己”考虑一下,当你说“自己”“我”的时候,你心目中想的是什么?曾经也有人讨论过“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问题,问我到底是什么主张。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门有多宽,门前雪的范围有多大,就是说你的心胸你的眼界有多大,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从时间上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空间上有多大范围。

从空间范围上来看,我觉得人对自己对自我的感觉大体上有这么几种境界。这是我概括观察的,不一定全正确。当一个人说“我”说“我自己”的时候,第一种人说我,其实不是一个完整的他自己,而是他自己的某一部分,比方说,是某一个器官,如消化器官。只有吃到嘴里的喝到肚里的才是我的,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就是肚皮以内的是我,肚皮以外的不是我。这种人就是不承受与他人的一切社会关系和交往,只是孤零零的生物意义上的一个个体。再一种呢,我叫平庸的自我,简单说就是家门里的是我,家门外的不是我。还有一种,我叫它平凡的我,我觉得绝大多数人在说“我”

时都属于这种状态。这种状态是一种开放的个体,开放自我,就是说他仍然是以自己为起点,但是随着生活实践所到之处,随着自己的社会关系所到之处,他把这些东西也都关心、也都当作自己的事情。比如说我关心我的孩子,我就要关心这个学校,关心一下这个教师的品质吧,学校的高考排名等等。进而很可能我就要关心整个教育制度,至少我要关心一下教育收费的问题,随着实践拓展,可能关心得更远——我们中国人可以关心到科索沃——能够随着具体的实际的事情把自己的自我拓展开来。比如我走在马路上,我就不只把脚底掌的面积乘以身高当作我自己的安全空间,整个交通情况都是我要关心的。最后一种呢,叫伟大的自我。少数卓越的伟大的人物,他们的自我比这个平凡的自我要前进一步,就是主动的站在多数人或人类的前途命运上,来关心人、社会和生活,这样的人将自己和他人人都看作一个大我。比如雷锋帮助别人时,他应该不是说你有困难我来施恩于你,你应该感谢我表扬我,不是这回事。

我觉得从客观上来讲,自我与非我没有特别的界限,时间空间上来看自我非我也没有绝对的界限。你说“为我”的时候,那包不包括你的父母子女呢?包不包括你的故乡和祖国呢?有的人说“我”就包括这些,有的人就说不包括这些。客观上没有绝对的界限,主观上人们有不同的境界不同的层次。这个境界和层次就是不同的个人的思想水平和思想修养,这个别人没有办法强迫你,具体的某一件事情别人可能可以强迫你,但这种思想境界是无法强迫你的。

像我们有些人平时喊“为自己”喊得震天响,可一到节骨眼,就不知怎么办了,就是因为他的眼界太窄,太浅。就像我说的你不要以为喜马拉雅山的雪不关你门前事,至少对于我们这个民族,这个社会,我们是不能这么想的。为什么我们现在急着探寻宇宙外的生命?我想这与理解、关注人类自己未来的命运不是没有关系。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这样,就是你所关注、重视的事情,并不否认你

是应该为自己。我觉得应该要为自己。我不赞成有些口号提得好像我们都要相互洗澡似的。每个人都不洗自己,只为别人洗,洗了一圈你自己还得要洗吧?我不赞成无原则的这样讲。

这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思想,比如白求恩的精神,他是在特定时间特定事情上表现出的一种崇高精神境界。在这个时候毛主席说: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把中国人民的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白求恩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了他崇高的精神境界,但是白求恩不可能一生一世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做的,对不对?我赞成大家都要自己洗澡,然后对于那些不能自己洗澡的人,老幼病残,应该帮他洗,你帮他时候应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们鼓舞人们首先自立自强,然后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友谊之手。

关于为自己和为他人的关系,为自己为我努力搞好自己,我觉得也是应该的。有一年搞爱国主义教育,到中央台开那个座谈会。他们就问为什么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掀不起高潮呢?我说我们也许坏就坏在一味地想掀高潮。我说爱国主义怎么掀高潮?抗日战争日本鬼子打进来了,我们掀了高潮,没事你掀什么高潮啊?我说我们每个人把自己生活处理得好好的,你带着老婆孩子在街上走,穿得干干净净,红光满面,一脸的幸福,外国人一看说:喂,中国人进步了,社会主义好。你这就爱了国了,你不用打着小旗喊着口号才爱了国。平时我们就这样,那么到了关键时刻我们上战场为国捐躯,这个大家也是应该做的。

我说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群众有权力关心自己的生活,改善自己的生活。这个不是坏事。关键在于我们个人对自己的心态的把握应该是清醒的,什么时候是自己一个人的事,什么时候是和大家一起的事,不同的事情要遵循不同的规则。你比如划船,你到公园租一条船休息,你想怎么划就怎么划,无所谓;但如果你参加了一个龙舟队比赛,那么在这里,全体队员应该有一致的行动,你不能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这两种不同关系不能颠倒,你不能用赛龙舟的方法去规定人家休息划船,你也不能用划船玩的方式去参加龙

舟赛。

怎么看待人的生命的问题,我们在谈这个的时候,有时候不看是谁的责任谁的权利。前些日子演那个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时候,梁晓声看了之后就发了一个评论。他说你看人家美国八个人去救一个人,人家就是觉得应该这样去做,没算什么值不值问题,可当年大学生张华救人的时候,我们都还在讨论这值不值的问题。他说这种讨论很可耻,说我们中国人有一种冰冷的理念,说在这种大义凛然的事情面前还要算计值不值,所以很渺小。这个评论发表后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后来梁晓声问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说我又没看这电影。于是租了这电影来看。我看了之后,我对梁晓声说你没看懂这电影。它讲的就就是一个母亲五个儿子有四个都牺牲在了战场上,这个母亲向参谋长提出请让那第五个孩子回来,她想留住这唯一的孩子。于是参谋长就派了八个人的小分队出发去找这个孩子,经历千辛万苦找到这孩子后,他却不走,说我是战士,我现在的任务是守桥,于是八个人的小分队只好留下来同他一起守桥,直到战争胜利。如果你注意到美国人在这里宣传的观点,他这个角色分明,一个母亲一个公民有权力提出要求保护,而且政府必须采取措施给予保护,这就是派了八个人的小分队的理由。这八个人已经不是八个人了,他是政府的执行工具,在这里你不能说八个换一个划算不划算的问题,这是国家机器的职责。然而瑞恩呢?他有两个角色,一个是最后的儿子,一个是守桥的士兵。在这个问题上他选择哪个?他选择了守桥。这就是美国人在这里提倡的精神。他虽然没有大喊口号说大公无私、先公后私,但他通过这个角色说明了这个。这里的权力、责任分得非常清楚。我说梁晓声你还在说别人不该这样讨论,还在指责大多数人思考这个问题的权力。这就正好跟这部电影的精神相反。他那个电影就是说回不回去最后由瑞恩决定,别人是执行政府的职能,没有讲价钱的余地。我说我们这儿讨论张华值不值,首先我们不能否认人们有思考的权力,有这个问题的话人们

去思考去讨论不能说是不是可耻。第二呢,这场讨论的结果是积极的。我当时作过一个调查,这个调查的结果是当时 90% 的人认为张华救人是值得的。这不是从培养这个大学生要花多少钱,这个大学生是学医的将来可以救活多少人来说的,不能算这个账。大多数人最后想通了一个道理,就是不管具体的这事值不值,但我们这个社会要保持这样一种精神。从这个意义上,大多数人认为只要救了就是值的。

而且在这个事情上,我说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就是不分个人不同的角色、地位,简单地说,就是人应该应该怎么样。好像不管什么人都应该一个样子,看不到不同人的这个社会角色、社会权力、社会责任。“文革”的时候,我在厂里党委宣传部工作,一天晚上工人和厨房师傅打了起来,因为饭菜弄得太差了,我去解决。一进去食堂,管理人员就对我说:“你看现在年轻人这觉悟,整天吃大米饭白馍馍还有意见,也不想想旧社会吃什么。”我一听就火了,旧社会吃什么,这是新社会,难道你还想复辟旧社会不成,这大米白面是你给的吗?那时有一句话,叫“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我说这话应该谁说?如果我是干工作的,由我来说,鼓舞自己,把工作干得更好。假如我的工作不好给你添了麻烦,我还对你说“苦不苦”、“累不累”之类的话,你怎么想?那么我给别人制造痛苦就成了理直气壮的了,你不服那就是没觉悟了。话本身不错,但这话是用来激励自己的,不是用来教训别人的,尤其不是用来推脱自己的责任的。就是说有许多话,看是应该对谁说、应该由谁说。我就觉得对人的存在方式,要从社会生命、社会关系这个角度来理解。

对于我们社会现实的许多现象,无论看别人还是看自己,都要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去考虑。对自己实行一种开放式的自我,对别人也多理解,多尊重别人的社会角色、社会权责。我觉得是充分发挥自己社会存在的形式。

我们有些问题解决不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弄得不适,很重要

的一点,就是人们在彼此理解问题上缺乏这样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意识,而往往是用什么道德化、政治化的口号、概念、规则,这个也就不细讲了。好,我要讲的也就到这儿。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推荐
侯著洲整理 未经本人审阅

【编者絮语】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不断追问而又永无确定答案的问题。随着生命科学的新发展,这一原本就十分复杂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这一问题的“个人”色彩很浓,答案往往因人而异,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取向。哲学家对此问题的深邃思索,有助于我们得出自己正确的答案。

苏叔阳 著名作家

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文化

[2000 年 11 月在东南大学演讲]

来到东南大学,我非常高兴。今天我想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这个话题是“面对新世纪的中国文化”。

我准备讲两个部分。第一,就是问题的缘起,为什么提起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从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看面对新世纪的挑战,它能否承担提高中华民族主文化的重任。

我先讲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提出面对新世纪的中国文化。

大家都知道,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有自己的主文化,就是一个民族要有自己的灵魂。没有灵魂的民族就好像是一个无根的浮萍。一个无根的民族是没办法在新世纪立足的,更不要说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了。这样一个民族在世界之林要立足,如果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用的却是一个西方思想的灵魂,这样的民族恐怕是难站稳脚跟的。但是,由于近 200 年来的落后,使得中华民族的人民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是怎么落后的?或者说中国人怎么了?

许多仁人志士就把这个落后的根源最后归结为是我们的民族太古老了,我们的文化太古老了,我们的历史太古老了,就像一个旧房子——这是老舍先生曾经比喻的,说有一个旧房子,里面装满了乌七八糟、各种各样的东西,打扫都需要太长的时间;或者说我们的古老文明再也不能适应新世纪的发展了。所以,曾经有过很

长一段时间,中国人处在一种非常怅惘,或者说非常茫然的状态。大家可以想一想,近 200 年来,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自己抽打自己的灵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不断地在拷问自己,这个拷问在全世界各个民族之中都是仅见的。我说“仅见的”就是唯一的。自己拷问自己,拷问到了非常严酷的程度。我们如果出国的话,就会看到,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的人对自己的文化是采取这样的态度的:自我批判,自我批判到了自虐的地步。以胡适先生为代表,他说,中华民族不如人,文化不如人,甚至连身体也不如人。以至今天中国足球冲不出去,有人说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身体不如人。有人大声疾呼:你们别玩那个了,你们根本就不是玩那个的民族,你们的身子骨就不配踢那足球。从祖宗开始否定起,一直否定到今天。

既然否定了,就举起改革的旗子。近 200 年来,中国所有改革派的旗子,从改革一直到革命,都是举起了“打倒传统”的旗子。谁对传统决裂得厉害,谁就愈加革命。因此,所有改革者先进的标志就是同传统决裂。以至于 200 年来,谁要说中国的传统文明优秀,谁就犯了错误,是落伍的标志。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思想的极端的体现,它还延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化闯了进来。中国要想改革开放,要想前进,似乎就必须彻底否定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当然,也有许多人因为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而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和选择。清末民初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家叫王国维,正当他壮年四十岁的时候,忽然投颐和园北昆明湖而死。对他的死,很多人表示不能理解。有人说是他在学术上钻进怪圈子出不来了,因为他是中国一个国学大师,出不来了,不能自圆其说,因此苦闷而死;有人说是因为“五四”运动开始时,激烈地反对中国传统文明使他感觉到没有出路了。陈寅恪——他的好朋友,是个史学大师,说是他不忍看到我们五千年之大树凋零,他用自己的生命来殉他热爱的中国传统文明。我看这个说法很近乎王国维的思想。我们

再看现代,在王国维以后,有老舍先生。他大概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终于醒悟到,他虽然是学贯中西,感觉到优秀的中国文明将要在他这一代完了,他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殉他所挚爱的事业。总之,近 200 年来的中华民族经历了一个民族自省的过程。在世界各个优秀的民族之中,中国人是做得最彻底的一个。因此,我们的希望也最大。现在德国人开始在进行民族自省,希特勒为什么会侵略别人?虽然 20 世纪 60 年代的德国总理跟希特勒绝无关系,但他走到哪儿都向人鞠躬、磕头。这样的民族是伟大的。世界上有一个民族,我曾经以为它是了不得的,但我发现它从领导到群众都不愿意自省,它就是日本大和民族,所以我说它不是个伟大的民族。(鼓掌)

中华民族经过这样一个自省之后,已经开始认识到我们伟大的优秀文明仍然支撑着我们民族灵魂的主文化。

21 世纪,我们从 2001 年 1 月 1 号算起。其实,哪一天不是很重要,如果日子不是和具体的事情结合在一起,所有的日子都是毫无意义的。同时,所有的日子,对于所有的生命个体来讲,都是重要的。21 世纪的人回过头来看 20 世纪的人类文明,我个人认为,至少在人类的主文化当中,20 世纪人类的文明走向了一个低谷。20 世纪的一个现象,就是市民文化的嚣张。市民文化以美国的文化为代表,它的优点在于把文化从贵族的象牙塔当中拖出来,变成人人都可以做的、类似游戏的东西,像普鲁斯音乐会呀、摇滚乐呀、摇摆舞呀、蹦迪呀。市民文化像游戏一样地流行,使得每个人都可以享受一种文化,而同时民族的主文化开始消沉。所以我们很难分辨得清一个民族文化主要活跃的是什麼。到 20 世纪的末期终于开始觉醒。比如说卡拉 OK——大家还记得的话,80 年代国内大兴群众文化比赛,就是卡拉 OK 大奖赛。各工厂说你们群众文化搞得怎么样,就是卡拉 OK 大赛搞得怎么样。于是不断有人出来把自己无论动听与否、美丽与否的噪音亮出来。它培养人的勇敢以及一人快乐大家受罪的耐性。它仅有的优点就是普及了音

乐。这是日本人的玩意。这是市民文化的发展淹没了主文化。人类终于在 20 世纪末期开始认识到这玩意儿,于是,出现了有钱的人购买文化来创造文化。大家不知是否记得主管修长城的国际基金会在北京通过举行一次艺术演出来募集资金。其中一位画家,拿一把小提琴,照着画板就“啪”地一摔,摔碎了贴在上头,这就是一幅画,卖得很贵。为了修复人类古代的文化遗产,先来破坏人类某种文明的结晶,把破坏与创造合而为一,这就是一幅画——行为艺术。总而言之,人类终于看到了靠这玩意不行。21 世纪的人很显然比 20 世纪的人活得更优雅、更深刻、更有内涵。人类的这种变化说明人类需要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加速精神文明的提高与升华。大家都知道,人类有两门科学:一门是实证科学,就是可以在实验室或其他设施中反复验证的科学;一门思辩科学,包含着自然科学中的某些理论部分,是无法验证的那些猜想。社会科学都属于思辩科学。外界老说中国科学落后,那只是说实证科学一部分。即使是实证科学中的某一领域,中国也不落后。而在思辩科学方面,中国并不落后。

中国的思辩科学原来并不落后,近年来抓得不够,有些落后了。但是 21 世纪到来的时候,中国人会问,我们靠什么来支撑这个民族?我们这个民族靠什么站住脚?靠西方的思想,还是中国传统的优秀文明?

大家想一想,伟大的“五四”运动是很了不起的。它一个最现实的政治结果是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干部准备、组织准备、思想准备。它的优点是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太显著的人本主义,同时把国外个人主义、个性解放思想带进了中国文明。中国传统文明中,更重视民本主义。

“五四”运动把西方张扬个性的思想带进了中华文化,也带来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但是,民主和科学并不是双胞胎。并不是说有民主了也就有科学了——希特勒时的德国科学挺发达,但他并不民主;也不是说一民主了科学就发展了,这并不是一个双胞

胎。再有一个,“五四”运动是大力地张扬了个性的积极向上的精神。但同时,“五四”运动也有它的负面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彻底的否定。“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就是对于中国传统儒家的不正确的看法,以至于今天其负面影响仍然严重。到了今天,对于“五四”运动的正确评价在历史学界的争论是很厉害的,这种争论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面对新世纪的中国文化,这个问题是非常现实、严峻地存在于我们面前的。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能否担当下个世纪或者是很长的时间来率领人民前进的中华民族主文化的角色,能否成为中华民族的灵魂?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当然传统文化原封不动是不行的,是要经过整理改造才能胜任的。

(1)中华民族有选择优势文化的可能。我们来看公元1世纪的时候,中国是个什么状况。中国那个时候是在东汉初,那当然中国是一个雄霸一方的大国呀。如果在那个时候,我们还觉着不过瘾,我们再往前追溯。西方曾经有一个哲人说过,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500年是人类的文化轴心时代,就是全世界不同民族,他们的先辈、智慧的先人对世界上人类所面临的所有的重大问题,就是哲学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也就是生和死、天和地、人和自然等问题,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作出了不同的回答。由于模式的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状态。人类四大古文明,这四大文明的不同回答就造成了今天人类文明的四大模式。中华民族春秋战国时代就是这样一个轴心时代,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当时的大家被称为“子”。他们可以发表言论,开门办学,吸收“本科生”和“研究生”,然后带领一帮学生周游列国。而一个地方的主官想更好地施政,就需要不断地请各个方面人才出来研究一下国策,看谁行。我们苏家有一个叫苏秦的,这苏秦就是主张联合六国来打倒秦国。有一天,人家不听他的,就把他打了一顿扔到路上,他老婆就过来哭。他说,你别哭呀,你看我舌头还在不在?他老婆扳开嘴,一看,说还在。苏秦就说,那咱们有饭吃了。那个时候有“靠舌头”吃饭

的。所以,当时春秋战国时代思想非常活跃。

春秋战国时代思想的活跃就决定了中国选择优势文化的可能,所以那个时候诸子百家争鸣实在是一个幸事。这种传统一直保留到清朝。每个开国之君都进行儒释道三家论衡。清朝皇帝一进关,就开始了论衡,就在北京的建国门的天文台上,先预算哪一天日食。你说一个日期,我说一个日期,看谁说得对,然后来决定是儒教、道教还是佛教来统治这个国家。中国每个朝代的开国之君都进行“三教论衡”,这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因此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不管是哪个民族统治国家,从来没有过以宗教治国,这个优秀的传统一直很少有人知道。

(2)中华传统文明是现在世界上所有文明当中唯一的未曾断裂过的文明。世界上其他古文明,如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都已被战争或时代风云所吞没,它们的文化遗迹只能在日光下、月光下、星光下悠悠地诉说着他们昔日的光荣。只有在中国,我们脚下所踩的每一块土地、每一块砖石都伴有几千年的文明信息。所以,这石头城,萨都刺写的那美妙的南京的《石头城》,它每一砖都有几千年的历史啊。我们和历史同在。也只有中国人,他说的话,写的字,他所看到的景物是同祖先连在一起的。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族可以有这样的自豪感。

为什么只有中国的文明没有被断裂?没有被别人所征服或者淹没?有一个西方学者有一个理论,拿中国文明做比方,他说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要想在世界上站住脚,就必须经过考验,这种考验有三种。一种叫强势文化,兜头盖脑,像大盒子洒水,“哗”就冲来了。如果你这个民族文化是一个弱势文化,你就被他冲没了,像巴比伦呀、印度呀。还有一种是中等势力的冲击,这种中等势力的冲击很可能造成民族文化互相的调和。他还举了一些例子(当然是为殖民主义说好话了),说有些殖民地就吸收了殖民国家的文化。而第三种强势文化的冲击对于弱势文化是不起作用的,晃一晃脑子便过去了。1840年鸦片战争对中华的文明冲击是最大的,西方

的坚船利炮,大炮一直轰,但中华文明在这个强势文化中晃一晃脑子又起来了,没有被淹没。那么这就说明它肯定有正确的东西,它有不能被压倒的东西。

我们来看看,是什么使中华文明在强势文化的压制下重新站立起来。下面我说两点通常会习以为常、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的东西。例如: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却用来放烟火,西方人却用来做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却用来看风水,西方人把它用于航海的罗盘,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做文章倒是很漂亮,可惜都不是事实。公元 1000 年,是中国的北宋,那个时候,除了造纸是东汉发明的以外,给人类带来巨大冲击的三大发明都是在北宋。其中,当发明火药之后,北宋的军队便装备了火药,有蛇形炮管,有攻城掠寨的大炮。假如各位看过《水浒传》,便会知道《水浒传》里还有一个“轰天雷”凌震。这位爷就是专门造大炮的。(笑)从那以后,中国的军队便都装备了大炮和火枪。世界上第一杆热兵器,西方人叫契丹火枪和契丹火箭。契丹火枪是打近处的,火箭是打远处的,契丹是中国北方民族。这种火枪其实是从契丹经过阿拉伯人、波斯人,然后由意大利人带到西方去的。西方人发明火枪的时候,已比中国晚了 400 多年。中国明朝军队 60% 拿的是火枪,清朝军队 90% 是火枪,绝不像今天我们在影视上看到的这些大刀长矛。不是那么回事。只是中国的火枪火炮里没有来复线,那玩艺是人家德国人的,世界上最大的炮就在中国。那么,就必然会问了:为什么这么强大的国家还老是打败仗呀?这就是历代统治阶级不愿回答的问题(这是我的看法)。其实中国落后的原因不在于科技落后,而是统治阶级的政策落后、不正确。比如北宋,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是北宋时期,大家看看《清明上河图》,它表明清明朝代,政治清明的时候,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十分繁荣的。东京开封府是个极繁荣的地方,经济发达。

北宋的造船业非常发达,今天还有一艘北宋的船躺在厦门的博物馆里,当时已有了隔密舱,就是把舱分成一段一段的。西方学

会隔密舱,那是在 800 年以后。那么这么发达的北宋为什么老打败仗呢?连两个皇帝都让人掳走了?原因很简单,北宋统治阶级的政策是错误的,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了。所以一味强调科技并不能救国,你必须有相应的政策。北宋就是个教训。

(3)我们中国为什么在 16 世纪以前在世界上都是先进的?这是因为它内部结构的合理性,是因为它的基本哲学是正确的。基本哲学是讲什么呢?是讲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不管中国的哪一个学派,是儒家还是道家,总是互相渗透的,讲究的是天人合一,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互补的,也是互相克制的,这样一来造成一种全局整体的辩证的概念。中国古代先人就提出了很多在今天看来难以想象或者是不知道这些人怎么会想出来的一些东西。于是就出现了臆想的瞎解释。比如说中国的关于世界是对立统一的这种思想,也就是阴阳、八卦蕴涵的思想,使得今天一些很多有成就的物理学家十分惊讶,在他们获诺贝尔奖的那些论文中,不自觉地都引用中国道家思想——对立两极统一的思想。有一位丹麦科学家,搞量子力学的波尔,他得了诺贝尔奖之后说,国王要给他赏金,说你做个族徽,你找个旗子,我给你个贵族头衔。他毫不犹豫地举起个旗子来,就是阴阳八卦,当他们家族族徽。这个对立两极思想一直到今天,还使得现代的人很怀疑,说中国人的先民怎么会想出这个思想来的。所以有一派“异说”,说中国人不是地球人。

关于地球文明这个问题还在探讨,不管怎么说,到现在为止只剩下中华文明可以看得出它文明发展的逻辑和轨迹,就是我们从前曾经辉煌过,那辉煌绝对不是今天能想象到的。唐朝,西安 100 万人口,外宾占 5% 左右。也就是这城市有 5 万人是外来的,从高级官员到打工仔,外国人都有,长安的桥头经常有人来揽活儿。就拿日本来说,有 12 支遣唐使,不断地向唐朝对口学习。从当官的,一直到工艺杂匠,以致到今天我们失传的许多舞蹈音乐,还能在日本找得到,那都是人家带去的,包括茶道。在唐代,工艺水平也极高。其中武则天有一个金丝编的裙子,那金丝捻制的最细部分直

径只有 0.06 毫米,我们现在用电脑制作才达到 0.12 毫米。我们捻不了那么细。还有一个琉璃栗色瓷茶盘,那盘里看似一汪水,还有鱼飘着,一摸什么也没有。这栗色瓷现在已经知道什么成分了,用多大火烧出来,但我们一烧就烧不出来。所以我们电视家陈家林大导演,就无论他想象力多么丰富,都不能再造盛唐的辉煌。当时盛唐的辉煌远比现在的美国辉煌得多,至少没有美国欠全世界那么多钱,美国至少欠联合国一大堆钱。到清代,我说一个数字,1840 年鸦片战争时,中国工业占全世界的 19.7%,仅次于英国,这大概与同学们想象的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又贫穷又落后、一捅就倒的形象不一样。所以我们落后的原因,除了相对贫穷和技术上相对落后之外,恐怕还是统治阶级的政策,内外政策、治国之策落后。

再有一个呢,中华民族早就注意到关于环境保护问题。我们庄子老先生虽然有点吊儿郎当,想象力却很丰富,他说的话很有道理。他说春三月时你别拔苗,那小苗刚生出来;你别去捕鱼;树木刚长出来,你别拔它的芽。他想象人类最美好的社会,是人和鱼一块儿在河里游泳,人和鸟一起在树林中飞翔。当然他想的不是今天这样高科技发达的社会。有位历史学家批评过我,他说你这个人太过分了,庄子也不是讲环境保护啊。是!庄子可能没有系统的环境保护对策,像法国人绿色行动那一系列的东西。但他的思想天人合一,虽然不能说人与环境的关系就像今天我们所说的一样,但肯定他有保护环境这种初衷。人类的婚姻再也不是为了传宗接代,而是一种游戏。我说,这人还活着干啥呢?人类那么笨,自己创造文明来消灭自己,让人类所有自然的情趣都归于毁灭。对高科技的崇拜到这种程度,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人类从来就有这样一种倾向,我们越相似越希望不同。从前,你要穿一上衣,就有人问,你哪儿买的、什么价钱?说 250,挺好。我赶快去买这 250。现在你那儿 250,我绝不买,我买那 280 的,比你 good。大家穿得都不一样。我们越相似越寻找不同,我们越向前发展越有一种希望回到古朴纯真的欲望。这是中国文化合理性之一。

基本观念还表现在各个方面。比如说建筑,西方的建筑由于王权神授,神和人是分离的,所以地上的人类不断要造高楼,希望到天上与神共享神的欢乐。于是单体的高耸入云的建筑便成了西方建筑美学的一个特点。中国是天人合一,就希望天地人的和谐,因此就希望中国建筑不以单体建筑取胜,而以建筑群体的节奏和天平线、地平线、房屋轮廓线之间的和谐所搭配。你不能说那单体建筑就好,中国这就不好;也不能说中国这就好,单体建筑不行。我曾经接触一个国家旅游局的官员,做报告大声疾呼说,中国造楼不行,历来就不会造高楼,看人家西方。后来我说,你这官是不是说话太随便了点?中国不会造高楼,那汉代宫殿是什么?唐朝的含元殿是什么?还有大量出土的汉代陶器建筑,都是高层呢,怎么不会造楼呢?岳阳楼那不是楼吗?可能造更高点的不会,那不符合中国人的哲学。

(4) 中国传统文明是多元一体,胸襟广阔,兼收并蓄。

首先讲多元一体。我们讲炎黄文化,即黄河、洛水。后来才知道中华文化起源多多,至少有三大人文始祖。一曰炎帝,就是轩辕;二曰黄帝,神农;三曰蚩尤,九离族首领。蚩尤这位伟大的祖先可不能轻视啊。你们看那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正是黄河文明发达的时期,它出土的那些文物和中原地区出土文物相比,就是想象力特别丰富,一个人眼睛非常大,伸出很长,这就是蚩尤的形象,也还长着角。传说中蚩尤是长着牛角的。那么大的铜头,证明了他的冶铜术超过了中原。他的想象力比中原强,他所有的那些俑都是下身很肥大,坐在大地上,面部表情十分丰富,不像中原出土的秦始皇的兵马俑。那说明他的文化在活泼姿势方面超越了中原。还有一个特点,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当中竟然没有文字,这是很奇怪的,但他雕琢玉器、冶铜这些工艺水平非常发达。这就证明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然后互相融合的。就拿汉族文明来说,就经历了几次大的融合。在秦汉时,秦就是少数民族。秦汉是一个大融合。秦汉以后南北朝,也是一次大的融合,使得汉族已经很

不纯粹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吸收了很多少数民族文明,因此形成了优势。

再讲中华文明的博大胸襟。她还能吸收外来文明,中国人吸收外来文明本事是非常之大的。原来,外来文明都被中国同化了。“同化”两个字差点,实际上是被中国文明“消化”了,融合在一起了。比如说我们今天生活中很多东西,吃的柿子酱,西红柿,胡萝卜,香菜,日常所见都来自我们的西邻——波斯、伊朗,还有抽的烟,来自菲律宾,吃的白薯土豆也是来自那儿。我们生活中很多用语来自外来语,很多已经变成我们民族宝贵的东西。实际上是外来的,最主要是我们融合了。西方一个重要思想(不是欧洲,当时讲西方是指印度),即佛教思想。佛教曾经是印度的国教,但佛教东渐,传入中国之后,特别是六世祖惠能加以改造之后,融入了儒家思想,变成了中国三大思想之一,即儒、佛、道三大思想。到今天,我们生活中很多语言来自佛教,比如说“法轮”,什么“世界”、“心宁”、“觉悟”、“感应”、“法”等。佛教也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存形式。

面对新世纪的中华文明,只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扬长避短,经过整理改造后,一定能够承担提高中华民族文化的重任,我们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成为有自己民族灵魂的民族。

我讲完了,谢谢大家!

东南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推荐

未经本人审阅

文学与艺术

陈洪 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 文学院教授

孙勇进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师 博士

南开论剑：金庸的作品有多伟大？（上）

[2000 年 10 月在南开大学演讲]

公元 2000 年，岁在庚辰，南开园。

马蹄湖畔。

秋风起兮木叶下。

甲教授、乙博士登坛论剑。听众数百。论题：金庸的作品有多伟大？

一、且看《天龙八部》的“练门”

甲：记得当年梁羽生借着澳门一场拳师比武，在 1954 年写出《龙虎斗京华》，连载于报刊。

其后，短短几个年头，就有各路武侠作家出道，在各报副刊争夺读者，一时群雄并起，刀光剑影，争做武林至尊。其中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陆续写出《书剑恩仇录》、《碧血剑》等，出手不凡，令武

林刮目相看。到了 1957 年,金庸与张梦还二侠论剑,以《射雕英雄传》和《沉剑飞龙记》摆起擂台,招来式往,斗得煞是激烈。但到底还是金大侠内力远为深厚,笔下风光无限,招式精彩纷呈,在这“雕龙大战”中以大比分获胜,终于一统江湖,登上了武林盟主的宝座。从那时起,40 年来,金大侠在武侠小说界一代宗师的地位从没有动摇过。前年 5 月,大洋彼岸的美国召开了关于金庸作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还有香港(海外)文学艺术协会颁授“当代文豪金龙奖”给冰心、巴金和金庸三人。到了去年,又有一家颇有地位的文学刊物评选本世纪影响重大的一百部文学作品,金老盟主的作品又列其中。据说,拟议中有一颗小行星将命名为“金庸星”。金大侠在文学史上可谓风光无限了。

乙:看样子,您是金庸剑派的拥戴者了。那好,便由在下来充当挑战的角色。金庸先生名动天下这谁个不知?尤其是这几年,说得上喝彩声如潮,什么 20 世纪的经典,位列第四的文学大师,什么古往今来登峰造极,什么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等等,都出来了。“空前”倒也还罢了,“绝后”又有何根据?难道讲这话的人还前知 500 年后知 500 年?所以喝倒彩的声音从来就没断过。台湾的怪杰李敖老早就写过《三毛式伪善》和《金庸式伪善》及《武侠小说”,着镖》,一记飞镖飞向武侠小说,也毫不客气地飞向了金庸。至于在大陆,不服金庸甚至挖苦金庸的调子也不少,王朔有“四大俗”之说,还有人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文章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连郑渊洁的童话都赶不上。

甲:是吗,还有这话?记得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开篇有几句话讲得好,他说天下只有庸人才无毁无誉,能被人大褒大贬的必非庸常之人。有贬低金庸的调子也没什么好稀奇的,不过,话得说回来,推尊金庸先生的可不乏饱学之士。比如,随便举个例子,某著名红学家就说过,金庸是当代第一流的大小说家。他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奇峰突起;他的作品,将永远是我们民族的一份精神财富。

乙：推崇金庸的尽是学界名流头面人物，这在下十分清楚。就比如您刚才提到的那位先生，我听说他还讲过，金庸小说的情节结构，在古往今来的小说结构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他以一个著名红学家的身份讲出这种话来，可不是随便说着玩的吧？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连《红楼梦》在结构上也比不上金庸的小说？

甲：作为个人见解，这样说也没什么不可以，《红楼梦》真的就神圣到了不可超越？

乙：当然，当然。在下对那位先生的话不敢苟同，并不是因为它可能冒犯了《红楼梦》，而是问题是这种说法非常可疑。金庸小说的结构真的就登峰造极？比如《倚天屠龙记》，一开头就写到武当三侠俞岱岩下山，无意间撞见一些小帮派争夺屠龙刀，当时刀是在洪炉上高温炼了很久的。可是后来又写周芷若得到屠龙刀与倚天剑，将刀剑互斫，得到藏于刀剑中的《武穆遗书》、《九阴真经》。问题是藏在刀中的兵书或武功秘笈是用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能在洪炉上炼这么久而不受损伤？如果它们早已在高温炼刀时就灰飞烟灭了，后面周芷若还练什么《九阴真经》，徐达还拿什么《武穆遗书》打败蒙古兵？这就不能自圆其说吧？

甲：我倒没觉得这算多大问题。也许《九阴真经》就是写在特殊材料上，这种事可以做很多种解释。武侠小说本就有很强的传奇色彩，不可以常理揣度，如《天龙八部》中天山童姥的返老还童和桑土公的地行术之类。武侠小说的创作美学原则从来就不是现实主义的，这一点必须搞清楚，如果拿现实主义原则去分析武侠小说，肯定不得要领。就好像你读《西游记》，就没必要质问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合不合乎现实。你看《狼外婆》之类的童话时，大概也没觉得让大灰狼讲人话特别不合理吧？每一文类都有它的写作和阅读规则，这是必须要注意的。不过，你的这个问题是情理问题，和结构没什么大关系。话头回到金庸小说的结构，像《天龙八部》这样史诗般宏伟的作品，场面大、气魄足，人物众多、多线叙事，不是大手笔就写不出来。

乙：好一番长篇大论，倒也颇有启发。不过就算您的武当神功出神入化，一招太极云手，用“特殊材料”和“传奇原则”就把屠龙刀问题给抛向一边，问题还是没完。您既然用一招《天龙八部》反攻过来，那好，在下现在这一招就指向《天龙八部》的破绽，看你如何来接！

甲：是吗，又有什么厉害招数？

乙：金大侠的《天龙八部》，很多人都称道它的结构，有人说它如千寻铁索，环环相扣，简直是妙不可言。但它的破绽其实很多，结构倒正是它的弱项，是它的金钟罩、铁布衫的练门。就比如乔峰打死阿朱一段，可说是全书中悲剧的震撼力仅次于乔峰之死的段落吧？它是全书情节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这段情节漏洞不少，实在经不起推敲。乔峰为什么要打死阿朱？是因为马夫人告诉他段正淳是“带头大哥”，所以乔峰才误杀来为段正淳替死的阿朱。但乔峰的仇人是30年前的武林首领，是现年“六七十岁”的赵钱孙的“带头大哥”，乔峰应该找一个老头算帐，这是明摆着的事。而段正淳在书中出场时是个“四十来岁、五十不到年纪”的“中年人”，30年前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可能做中原武人的首领？精明的乔峰怎么会被这种话骗过去？并且，他又明知段正淳的武功远不如自己，有什么必要一见阿朱假扮的段正淳就痛下杀手而不擒住对方细细盘问？这个地方要圆不过去，《天龙八部》这棵大树上乔峰故事这个大树杈不得拦腰折断？这又如何来说？！

甲：好一记撒手锏！不过还是少安勿躁，第一，我只是说《天龙八部》是大手笔，并没有说它是完美之作；第二，你刚才说的阿朱的例子并不完全是结构问题，其中也有情节疏漏、情理欠妥的问题；第三，金庸作品结构登峰造极的话可不是我说的。其实，我也认为结构恰恰是金庸作品的弱项，比如有些作品结构简单，缺少整体运思营造，如《连城诀》、《飞狐外传》等；有些作品结构失衡，如《天龙八部》，虚构的故事铺衍过甚，造成强枝弱干，“枝”大不掉。再有，人家金庸先生自己也认为他的小说的问题主要在于结构，在对记

者谈起自己近两年再度修改作品时,他也说到《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的最大毛病就在于结构,又说这些结构上的缺陷再改恐怕也改不过来。

乙:您这是以退为守。请恕在下卤莽,这里还得继续追问,一部结构上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作品,还能不能称得上大手笔,还能不能算作典范之作?请正面回答。

甲(微笑):嚯,好厉害。老夫方才已经说过,大手笔之作不等于完美之作,这话当然也不意味着结构上的完美。反过来说,什么叫“结构上的完美”?“完美”的标准是什么?一些篇幅短小的作品不存在前后情节照应不上的问题,但这只能叫做结构简单,而不是完美。真要较起真儿来,有在结构上堪称“完美”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吗?再进一步说,根据一部作品结构上的缺陷就给这部作品划个大红叉子宣判死刑是不是不够慎重?能成为典范的杰出的文学作品在结构上就一定没有毛病吗?

乙:我想应该没有。

甲:这只怕未必!就比如,老夫随便举个例子,举一个你我都熟悉的例子,如《西游记》吧,这部作品够不够得上典范、杰出?应该够吧?但它的结构就毫无高明可言,清代批评家金圣叹说《西游记》像大年夜放烟火,逐段捏捏撮撮,一阵儿一阵儿过。也就是说,它的情节是打了一个山头,又逢一个山头,降了一妖,又冒出一妖,前后只有些简单的照应,如此而已,结构上并没有什么特别讲究的、值得称道的地方。相反要较真儿还能挑出毛病,比如孙悟空大闹天宫时是何等威风,打遍天兵天将,横扫天宫地府,几乎就无对手,最后还得西天佛祖亲自出手才镇伏了他,但等他保唐僧开始西天取经时,往往一些天神的座下童子甚至坐骑化为妖怪,就治得孙悟空束手无策,这种情节矛盾算不算大毛病?即使算大毛病,是不是就严重影响了《西游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乙:当然,这个世间任何一部作品都不是出自上帝之手,都难免有不足之处,就这一点来说,我同意您的看法。不过,话说回来,

即使如此,也还有必要探究一下金庸作品结构缺陷的成因。在下以为,金庸小说的创作过程有个先天的不足,就是它不是纯创作,而是还有商业生产的成分在内。我们毫不怀疑金庸即使在为报刊写连载时,创作态度也是非常严肃的,用金庸自己的话来说,是“一字一句都斟酌,所以一千多字的稿,往往改了又改,起码花两个钟头”。但是毕竟事先没有一个严密的通盘构思,金庸才力再大,也难以把所有的线索都照顾周全。虽说金庸后来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将全部作品修改过一遍,但是毕竟成品已经在那了,总不能全部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吧?所以金庸花近20年时间修改过的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作品,尽管十分出色,但还是留下了一堆漏洞。比如,如果你细读《射雕英雄传》,就会发现,从好几条情节线索,都可以得出黄蓉的年龄比郭靖大的结论。

甲:所以对金庸作品结构方面的评价还是不要绝对化,还是有点儿分寸好。记得温瑞安就说过,金庸的小说不是没有缺点,只不过修为炉火纯青、笔力已臻化境的作者,能把缺陷尽量修饰、减少,让人察觉不出来,而把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这话很有道理。

乙:是这样。既然您也不赞同金庸作品结构登峰造极论,那么我们这一回合的最终结果,看样子就是握手言和了。现在看来讨论一部文学作品,是不能像体育比赛一样,简单而明确地搞出个冠亚军、世界纪录什么的。

甲:对!要的就是这话。天底下本就没有完美的作品,金庸的作品即使在结构上不那么完美,但就其思想和知识的容量来说,还是称得上广博阔大,不比所谓的纯文学作品逊色。

乙:好,说到金庸作品中的知识容量,那我们就来切磋第二个回合,就谈金庸作品中的文史知识算不算高明。

二、由《碧血剑》中的长袍马褂说起

甲:这就要开始第二个回合了?好,那老夫便应战,谈谈金庸

作品的文史蕴涵。金庸是具有深厚的旧学根基的,这就令他的武侠世界里时时可见丰盈而熠熠生辉的儒、佛、易、道、琴、棋、书、画等文化因子,使人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在这一点上,只怕没有哪个武侠小说作家可以和他一争雄长。

乙:岂止是武侠小说作家,就是当代所谓纯文学作家在这一点上也几乎无出其右者。

甲:看样子,你也并不打算否认金庸先生的文史修养。

乙:当然!要想完全否认,那既不明智,也不可能。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一些片断,如《射雕英雄传》中黄蓉为洪七公烧制“好逑汤”、“玉笛谁家听落梅”一段,《笑傲江湖》里祖千秋向令狐冲讲论杯与酒的一段,均堪称神来之笔,称得上雍容华贵。但是,这里要说的是,和上面谈到的结构问题一样,人们对这一点也是捧得过高了。在下不止一次听人说到,可以把金庸的小说作为文史教科书,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入门书。

甲:只怕是不只有人这样说过,而且还有些人就是这样做的。你现在走在街上,随便拉住一个中学生问问,问他们是否知道全真教、丘处机,他们十有八九会说知道。问是怎么知道的,他们又十有八九会告诉你,是从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中看到的。

乙:问题就在这儿,拿金庸的小说做文史教科书就真的那么可靠?前不久我重翻《碧血剑》,见里面写到温仪回忆和金蛇郎君成婚,温氏三老来诱骗金蛇郎君时,赫然写着三老“穿了长袍马褂”,在明末浙西的乡村中,怎么可能有人穿长袍马褂?这样的错误,一个中学生都不应该犯吧?

甲:这我倒没注意。

乙:《射雕英雄传》里写到大理国的辛未状元,但历史中大理国并没有开科取士;《天龙八部》写到了鲜卑文字,可是历史中鲜卑族也并没有文字。

甲:这些问题没什么太大了不起的。武侠小说毕竟不完全等于历史小说,就是《三国演义》也还有个七实三虚,像这种地方,小

说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也无妨。

乙:话虽是这么说,但我记得鲁迅讲过这么一句话:“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实在靠着小说。”问题就在这,你总不希望中学生看了《碧血剑》后受其影响,真的就认为明朝人穿长袍马褂吧?一般读者读了以后,因精彩的小说情节留下的深刻印象,很可能并不姑妄听之,而是信以为真。就比如您刚才说到的全真教、丘处机,看了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一般人会真的以为全真七子是抗金英雄,而实际上丘处机是在金国统治者的支持下进行传教活动的。

甲:这也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这类例子在《三国演义》里多的是:历史上气度恢弘的周瑜给描画成心胸狭隘的典型;深沉而有远略的鲁肃,到了作品中就时常为诸葛亮的智慧谋略惊得目瞪口呆。还有历史中他和关羽的单刀会的真实情形是:关羽无理取闹,鲁肃临危不惧,毅然而与关羽相会,并在会上义正词严驳得关羽哑口无言。到了小说中,英雄和小丑完全掉了过来。又比如马腾,据《资治通鉴》中的有关叙述推断,他很可能是同出于西凉一系的董卓的同伙,到了《三国》中,他沾了儿子马超的光,竟成了忠义英雄。这样的例子在《三国》中多不胜数,但几百年来,这些故事就这样流传着,像周瑜,在人们心中已经成为了器量狭小的人物典型,这种情况,除了一些个别爱较真的文人以外,一般人有谁说了个“不”字?又比如你说的《碧血剑》中长袍马褂问题,《三国》里也有类似情况,比如历史中关羽使的兵器可能是矛,到了书中,却成了青龙偃月刀,其实这种刀是唐宋以后才出现的。但是现在你恐怕不会有那个兴致因为这些而大肆批判《三国演义》来误导群众吧?

乙:上一回合您搬出了个《西游》,这一回合您又抛出了《三国》,而且都是盖棺定论了的经典,用它们来做武器,捍卫金庸,这一手倒着实是高。不过在下这里还是有话说,您刚才举的《三国演义》中的那些例子,是事实,但是,有一样,拿《三国》来和金庸的作品比附,并不天然合理。罗贯中写《三国》,其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创作,更多的是对已有的民间故事资源的整理,如您刚才说的周

瑜、鲁肃、马腾形象及单刀会故事以及整部《三国》的拥刘反曹倾向,这些在元代民间广为流传的三国故事里已经定型,元代各地关帝庙中的关羽形象已经就是长刀红马,这些都是罗贯中无法回避无法改变的巨大的现实,所以他只能写成那个样子。但是金庸先生写《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鹿鼎记》时也同样面临着这些问题吗?只怕没有吧?如果没有,以金庸先生的学识,把作品写得既保持现在见到的作品中所有的巨大的叙事魅力,又不违背史实,不是更好吗?毕竟,鲁迅所说的“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实在靠着小说”,今天也还是事实。

甲:这一驳驳得好,后生可畏。不过,鲁迅那句话,意思与梁启超所说“国民性由小说塑造”差不多,指的是那个文盲半文盲充斥的特定时代。由小说而求知,是功能错位,问题主要方面在读者而不在小说,否则,首先该打板子的就是鲁迅自己,他的《故事新编》对缺乏幽默感和文化常识的人,肯定产生误导。

乙:只怕也不全是文盲的问题吧?现在是专业分工越来越精细的现代社会,隔行如隔山,你要求一个量子力学方面的博士也熟知大理、鲜卑的历史,这可能吗?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不是文盲,但他们文史方面的学问,说不定就是从小说中来,包括金庸的武侠小说。

甲:你的这种看法当然有道理,但是请让老夫反问一句,武侠小说的主要功能是什么?是普及文史知识吗?你拿文史知识的普及读本来衡量武侠小说只怕不尽合理吧?小说就是小说,它的功能不应和普及读物等同起来,不要说是武侠小说,就是历史小说、历史剧,就完全合于史实吗?往远了说,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就常常自由地把事实移前倒后,并且不乏杜撰;往近了说,二月河的《康熙大帝》等系列历史小说,文笔老辣,渲染历史氛围逼真酷肖,刻画人物的言行心理相当出色,但是与历史事实也相去甚远,这又该如何看待?

乙:若照您这么说,武侠小说也罢,历史小说也罢,因为是小

说,就可以不太顾忌史实的制约?如果是这样,我在一部武侠小说里将秦桧写成抗金英雄,让令狐冲一类的侠客叼着雪茄开着桑塔纳,那还像话吗?

甲:当然当然,老夫强调武侠小说、历史小说不等于文史普及读本,并不等于说在它涉及历史背景时就可以将史实完全一脚踢开,不过是说不能拿规范严格的文史普及读物的标准来衡量罢了,还是我刚才那句话,不要功能错位。但这类涉及历史题材、历史背景的作品究竟应该受史实多大程度的制约,说实话,这个问题老夫也没法回答。这个问题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就没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答案,完全是见仁见智。不过你刚才用什么侠客开桑塔那的话抬了一杠,倒使老夫想到,这类作品即使在一些具体细节上与史不合,但在整体的历史氛围上、在历史评价的大关节上不应相去太远。如果你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向读者心中的常识挑战,将秦桧写成民族英雄,让汉朝人抽水烟袋,这首先就会引起读者的怀疑,进而对你整个故事借重的历史氛围产生不信任,当然就会失败。

乙:说到历史氛围,我倒想起了温瑞安的“四大名捕”系列,这些故事的虚拟背景是北宋末年,却全无历史感,有些人物的言论心理不仅仅是现代的,简直就是前卫的了。

甲:但为什么没多少人就这一点质问温瑞安呢?就是因为你刚才那句话:“全无历史感”,因为它历史氛围的营造太差,不存在“乱真”的危险,一般读者都不拿它当回事,只是看看紧张抓人的故事就算了,所以反而没人计较它这方面的问题。金庸的作品不一样,他的小说整体历史氛围逼真,就有可能由“逼真”而“乱真”,人们就要计较。那么首先是怎样才能保证历史氛围的逼真呢,我想这里可能有一个微妙的尺度,就是刚才老夫说到的读者的常识。如果你让作品中的一个唐朝人吟诵宋朝一首不太出名的诗,这似乎不会出什么大问题,但如果你让一个文武双全的唐朝侠客开口吟诵“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或者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问题就来了,因为一个稍微受到教育的读者

看到这都会一愣：“不对呀！这不是苏东坡或陆游的诗嘛，怎么给安到这儿来了？这作者什么水平？！”阅读中断，作品在读者心中形成的历史氛围也随之被破坏。所以，还拿金庸小说为例，他在《鹿鼎记》中把建宁公主与康熙皇帝由历史中的姑侄关系改写成兄妹关系，这不算什么问题，即使金庸在这一章的注解里说明了历史实情，告诉别人，他在小说里“篡改”了史实，这也没关系，没人计较，因为建宁公主不在人的常识范围内；但是金大侠绝对没有那个胆子，在作品中把李渊、李世民改写成兄弟关系，就算他才力再大也不行。因此从这个道理来说，金庸在作品中写出大理国状元、鲜卑族文字，写了也就写了罢，但是《碧血剑》中让明朝人穿长袍马褂那段，最好还是改掉。

乙：不愧是老将，又是一堂大课，倒让在下获益非浅。不过在下这里还是要咬住这样一个问题：即使金庸武侠小说中很多文史细节不合事实不算什么大问题，但如果这类问题能够避免会更好，这种看法您同意吗？毕竟，您在咱们这一回合的一开始也承认，是有不少人将金庸小说当文史教科书的。

甲：年轻人当真难对付。对你这句话，老夫倒没有理由不同意，这里只好让半步了，就这一点我同意你的看法，考虑到金庸作品的广大读者的实际情况，把作品中的一些文史细节尽量写得合乎实际会更好。

乙：这样说来，把金庸的文史修养捧得过高就没有道理了。

甲：年轻人，不要咄咄逼人！首先，文史修养不等于文史知识，金庸小说在这方面的成功，主要不在于他兜售了多少具体知识，甚至也不全在于他逼真地营造了历史氛围，而在于他在《碧血剑》、《天龙八部》、《鹿鼎记》中体现出的对中国历史的独立的思考，以及在他对琴棋书画的描绘中传达出的庄禅意趣，以及整体上散发出的氤氲的文化气息，还有这一切与故事的圆融——这些才是他的高明之处。就传播一般的文史知识而论，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并不比金庸逊色，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体的思考显然不及金庸，圆

融程度更差一些。金庸的作品在总体上以其独特的方式,向已与旧文化比较疏远的现代年轻人也包括中年人,充分地展示了中国古老文化传统的巨大魅力与意义,在这一点上金大侠功不可没。本来中国古代小说是比较强调向一般民众普及文史知识的,但到了五四以后,新文学运动兴起,新的一批作家兴趣转移,目光主要投向现实人生,创作上也主要依赖一己的生活体验,不太注重文化修养的积累,作品也就缺少这种文化气息。金庸在这方面适逢其会地崛起,自然显得格外地鹤立鸡群。再有,我刚才说过,金庸作品中的文史描写,不是简单地兜售,而是能融于作品中,充分地调动文学手段,把那些具体知识背后的文化的魅力给传达出来,这才是认识金庸文史修养的关键。

乙:这样说来,金庸是不是可以被看做“作家中的一流学者,学者中的一流作家”?

甲:你这话真是狡狴,褒中还是带着点儿有分寸的贬,老夫不上你这个当。你这话里透着不承认金庸是一流学者、一流作家,也罢,你可以保留你的看法,在这一点上,姑且求同存异罢。

乙:那好,权且休战,下一回要就金大侠作品中的众生及美女问题向您领教。

甲:“领教”不敢当。但你既有心切磋,老夫恭候。

陈洪 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 文学院教授

孙勇进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师 博士

南开论剑：金庸的作品有多伟大？（下）

[2000 年 10 月在南开大学演讲]

公元 2000 年，岁在庚辰，南开园。

马蹄湖畔。

秋风起兮木叶下。

甲教授、乙博士登坛论剑。听众数百。论题：金庸的作品有多伟大？

三、金大侠作品中的美女

乙：上回咱们谈到金庸武侠小说的结构和文史修养问题，这回再来探讨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否具有现代意识。称道金庸的武侠小说充满现代精神的文章在下也看了不少，但很多称道恐怕都言过其实。

甲：是吗？金庸的武侠小说和《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比，观念的进步应该是显而易见的。金庸的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对旧有的狭隘的民族观念的超越、对个体人格独立的弘扬、对历史文化的反思，应该说都是富有现代气息的。

乙：这些在下并不否认。这里想说的是金庸的作品也有相当多不够现代的地方。比如金庸作品中在对女性人物的描写中所体

现出的男权意识,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女侠们个个都是爱情至上,而反派女性,如《碧血剑》中的何红药,《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她们异常凶残的行径与乖戾人格,都是情场失意的结果。金庸作品,无论作家自觉与否,透过一种高明细致的论述,来巩固传统的男尊女卑的父权意识,即女侠最终都得沦为男侠的附庸。无论才智多么出众的女性,若无真心相爱男子与之结合,一生即与幸福快乐无缘。

甲:但问题是历史中父权意识笼罩一切,事实便是如此。武侠小说既然要依托古代历史背景,便不能太新潮。如梁羽生的《女帝奇英传》,倒颇有现代女权主义的色彩,这部作品你看过吗?

乙:看过。

甲:觉得怎么样?

乙:不怎么样。宣扬现代的女权观念,但是太夹生,像是篇论文。

甲:对,问题就在这里。其实金庸也不是对男权意识不加批判,你还记得《倚天屠龙记》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吗?小说中说到张无忌、赵敏和宋远桥等武当四侠在雪地里交手后,无意中听知,宋远桥之子宋青书因暗恋峨眉女侠周芷若而偷窥诸女卧室,并将前来清理门户的莫声谷杀害,武当四侠黯然离去后,接下来的情节是:赵敏不无讥讽地说,宋大侠他们事后追想,定然不会怪宋青书品行不端,反而会怪周芷若红颜祸水,毁了一位武当少侠。接下来写道,张无忌心想说不定会如此,但口中却说:“宋师伯他们都是明理君子,岂会胡乱怪人?”这段情节中的意味不难读出吧?

乙:这段情节,既含蓄地批判了男权意识,又不刻意把古人拔高得具有现代意识,巧妙地寓批判于叙事中,点到为止,恰到好处,的确是高明。不过,遗憾的是,即便是金庸这样的“明理君子”,作品中也还是有大量的不明理的情节。比如书中常出现的儿女共恋一男的格局,如《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如《碧血剑》的袁承志,如《飞狐外传》中的胡斐,如《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如《倚天屠龙记》

里的张无忌,如《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如《天龙八部》中的段誉,还有那个段正淳,又如《鹿鼎记》中的韦小宝,您就看吧,都获得不只一个女性而且还是美女的垂青。最终的结果呢?当然最好是像韦小宝那样照单儿全收,而且还是七个女人掷骰子决定谁陪韦小宝睡觉,这种情节,连带那个忠心耿耿、百依百顺、奴性十足的双儿形象,完全都是男性的白日梦。但是这样写毕竟太不现代了,只能偶一为之,还得是写在韦小宝这种不是正宗的侠的小流氓身上。那么如果是涉及正宗的侠怎么办呢,当然这些男侠只能择一而终,只有这样才够现代。但其他“入围”而终遭淘汰的女性怎么办?或者心理变态,成了反派女魔头,如《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或者死掉,如《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飞狐外传》中的程灵素;或者出家为尼,如《倚天屠龙记》中的郭襄、《笑傲江湖》中的仪琳;或者终身不嫁以老姑娘而终,如《神雕侠侣》中的程英、陆无双;个别的还有如《倚天屠龙记》中的小昭远赴波斯做明教教主,而且还特地说明,做此教主,便终身为处女。为了保证这些女性对已经别娶的男侠的贞操,真是煞费苦心。如果有哪个女性胆敢对男侠负心,那就一定没有好下场,如《连城诀》中的戚芳、《飞狐外传》中的苗夫人、《笑傲江湖》中的岳灵珊,等等,这些恐怕都透出不平等的色彩,都说不上“现代”吧?

甲:好一张利口,倒也言之有理。看样子这回得让你占足上风头啦。还有吗?

乙:还有。如小说中出场的女性,无论正角、反角、主角、次角,几乎一律美貌,可谓美女如云,而像香香公主、王语嫣、阿珂等更是美貌得惊人。这就怪了,为什么这些年轻的武林女子个个美貌?难道说美貌还是习武的必要条件?作品中的男性,貌不惊人可以照样为英雄好汉,如红花会群雄,如袁承志、张无忌等,而女性却鲜有相貌平平而光彩照人者,这说明了什么?这实际上表现出的是男性将女性物化的鉴赏心态,就是作品中出场的女性无论正、邪、贤、愚,务要有观赏价值,这与《水浒传》的极力丑化女性,实为父权

意识一体之两面。

甲：这种情况，大概既有作者自己父权意识流露的成分，又有作品向广大读者群主要是男性读者群的父权意识有意无意投合的成分。作为通俗文学，毕竟和纯文学不同，不得不面临读者群趣味的强大压力。

乙：现在再看作品中的众生观，也就是看作品如何看待众生的生命。有某知名学者将金庸的作品与《水浒传》中武松血溅鸳鸯楼一段相比较，认为金庸的作品超越了《水浒传》的草菅人命的观念。其实这种说法很大程度是想当然，并不合乎事实。不错，金庸作品中的正面一号很少滥杀无辜，不像《水浒传》中的李逵动不动就抡起板斧不分青红皂白地向人群排头砍去，但这并不等于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就做到了“人人生而平等”。《天龙八部》中的萧远山、慕容博这等巨恶大奸可以立地成佛，被他们无辜害死的乔三槐老夫妇等人的冤魂却无处着落；叶二娘十几年里残害了上千个婴儿，真可说灭绝人性，但一旦披露她是英雄虚竹的母亲的身份，就一切都可以原谅；《射雕英雄传》中的欧阳克做采花这种淫恶勾当，被大侠洪七公制住时，仅仅因为“怕他叔叔面上不好看”就轻轻放过；再如《笑傲江湖》中令狐冲和向问天逃避武林正派和魔教的联合追杀时，向问天为了夺马随手就将无辜赶路人击毙，而大侠令狐冲对他的这位新结义的兄长的如此作为，不过是叹了口气就算了。如果被击毙的是他令狐冲的同门或亲朋又当如何呢？那只怕就另当别论了吧？

甲：你说的这些，都是事实。有类似情节的情节，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即使不说是比比皆是，也实在不少。对于这种现象，我想说两点看法：首先，历史中的侠本就没有众生平等的观念，众生既然只是他们的拯救对象，生命价值的平等就无从说起，由此而连带出的蔑视众生、草菅人命都免不了，历史中的真实情形就是如此；其次，既然金庸笔下的武侠故事是在一些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展开的，那么这些人物的思想观念就不能太新潮，把人物都写得像古龙

笔下的楚留香一样平生从不杀一人,充满了现代的法制观念,终究不大妥当。

乙:话虽如此,但还是可以找到两全之策吧?比如,我们刚才谈金庸作品中的女性描写时,您举的赵敏那个例子,像那个例子一样寓批判于叙事倾向中不就可以很高明地两全了吗?

甲:好一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但你要明白,这种英雄主义的历史观、价值观,几乎是与英雄传奇这一文类连带而生的。用这一文类写作,又要处处、时时寓批判于叙事,只怕不免束手束脚,步履维艰。

乙:我同意。英雄主义价值观几乎就是英雄传奇这一文类先天的无法克服的痼疾,这倒也不能苛责金庸,就像金庸在写武侠小说时,其实也知道他的作品和现代的法制观念相违背一样。但是没办法,既然是写武侠小说,只能那样写。

甲:说到武侠小说与法制观念的关系,别人已经说了很多,不过还有继续说下去的余地。

乙:有人说过中国武侠小说流行,是因为中国是人治社会,西洋侦探小说流行,是因为西洋是个法治的社会。据我所知,金庸对这种看法大体赞成。一次他曾对采访者说过,西洋侦探小说不在中国流行,是因为中国法律不发达,立场很明显。而武侠小说中“法”的立场比较不明显。他还在一篇文章里谈到,武侠小说的世界基本上是很不正常的,看起来是一个浪漫美丽的世界,但实际上是一个很不理想的社会,一个只讲暴力、不讲法律的社会。

甲:这些话大体不错,其实不只是金庸,很多人都说过类似的话。一些现代学者总喜欢从侠对法的破坏的角度来贬抑侠及武侠小说,认为这是法制观念淡薄的表现。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并不天然合理。因为我们一直忽略了但又很有必要追问的一系列问题是:什么是法?法的本质是什么?法是否天然就代表着绝对正义?具体的法的形式又是否绝对完美?事实上,难道法不是和道德一样,只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契约?只不过它更强调形式的

严密与稳定,并要借助于国家机器的强制执行罢了。它并不必然地意味着绝对的善、正义和真理,雨果的《九三年》正是建立在对此深刻怀疑的基础上。中国古代社会尤其如此,这正是侠客滋生的土壤。韩非子说的“侠以武犯禁”与现代学者批评的破坏法制根本不是一回事。韩非子绝不是指责侠对正义的冒犯,而是强调侠危害了君主的统治,破坏的是法治。在韩非子那里,“法”不过是与“术”、“势”并列的工具而已。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就算古代侠自掌正义有其历史合理性,那么今天民众喜读武侠小说是否意味着并强化了法制观念的淡薄?其实这话应该反过来说,为什么民众会法制观念淡薄?是因为在民众心中法并不意味着正义或远远不能担保正义。至于为什么民众会有此“落后”观念?是因为武侠小说读多了,还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法制建设远远不健全,还不足以使民众树立起对法的信赖?不错,民众喜读武侠小说,有历史形成的国民性方面的原因,但现实社会状况的影响也同样不可低估。与其将武侠小说的风行看成对法制观念的树立的威胁,不如将其看成现有法制建设状况远不尽如人意的标志,从而敲响警钟,不是更有积极意义吗?因此,对于武侠小说的风行,“警钟论”比“威胁论”更合理一些。

乙:这一“警钟论”的辩护倒也别开生面。不过说来说去,最后要归结为一句话,金庸武侠小说的思想观念并不像有些金学家吹捧的那样,全盘儿现代。

甲:接受美学有条重要原则,叫“视野融合”。意思是说只有读者的期待视野和文学作品相融合时,才谈得上理解接受;而读者的期待视野又因时而异,因此讨论作品的接受就不能不牵涉到时世的变迁。而现在的文化背景是:经过五四运动的初步启蒙,封建文化的表层如旧礼教受到扫荡,但又并未经深刻彻底的批判,因此旧的深层文化心理仍在,新旧杂存。一般读者的期待视野如此,武侠小说作者的心态也是如此,作品的思想内涵也如此就不值得奇怪了。事实上,冲决网罗、走在时代前面的思想很少有先借通俗文学

发难的,无它,通俗文学自有其创作、接受、流布的规则。相比于“纯文学”,它更强调娱乐趣味,而不是新思想的开掘乃至革命。它的主要功能并不是改造群众,恰恰相反,它的生存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广大读者既有的趣味,如此一来,妥协和迁就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关于这一点,金庸作品也给了我们足够的启示。

四、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大雅之作吗？

甲:就金庸作品的具体问题谈了很多,但还没涉及总的定位问题。就是金庸的武侠小说能不能进入雅文学的层次,能不能和鲁迅的《狂人日记》、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平起平坐？

乙:现在评论界好像一边倒的论调是“能”。金庸不是被评为排名第四的文学大师吗？他的作品不是被选入了百年经典吗？如您所说,他去年不是又和巴金、冰心一道被香港授予什么文豪奖了吗？像北大,还开了关于金庸的讲座。

甲:金庸的作品取得的巨大成功,或者保守一点说,产生的巨大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这些都足以说明,金庸的作品已登堂入室,从整体上提高了武侠小说的品位,超越了通俗文学的层次,一定程度上进入了雅文学的领域。

乙:这只怕未必。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在世界范围的影响恐怕远远超过卡夫卡的作品,至少在中国是如此,但你能说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就是比《城堡》、《变形记》更高明的作品？就已摆脱了通俗文学身份,进入了雅文学层面？又如三四十年代,旧武侠小说也同样风靡一时,还珠楼主五十多集的《蜀山剑侠传》,每一集印出来,万册之数三四天内就一抢而空,但是今天恐怕没有人会认为《蜀山剑侠传》有多么杰出吧？

甲:但金庸的武侠小说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和《蜀山剑侠传》不可同日而语,就其艺术表现力来说,要超过当代许多所谓高雅文学作品。

乙:这一点我并不否认。实际上在下以为金庸的武侠小说仍大体属于通俗文学层面,并不等于说它就低于雅文学作品一等,而是认为只有先有个正确的定位,才便于思考的深入。

甲:通俗文学作品的主要特点是它的消费性。比如日本的著名推理小说,松本清张的《点与线》,我第一次读时,对作品中表现出的细密思维叹服不已,不愧是推理小说中的经典,让人敬佩。可有一样,即使是这样出色的作品,我看了一遍后,就将它束之高阁,再也没有看第二遍。同样,很多二三流的武侠小说也是让人看过就算,很少能让高层次的读者一看再看。但金庸的作品却不同,很多读者,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有良好文史修养的文化人,都对金庸作品读过不止一遍,这说明金庸武侠小说的被接受已经超越了消费的层次。

乙:金庸的作品我就看过不止一遍,但《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一些篇目我也看过多遍。据我所知,有的年轻学生看《泰坦尼克号》也看了多遍,但在我眼中《泰坦尼克号》仍然不过是个通俗大片。

甲:但是,这里我问一句,将《泰坦尼克号》看上多遍的人中有高艺术修养的吗?而金庸作品的读者则不同,他的读者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具有很高文史修养的人。虽然我们不必盲目崇拜权威,但这个现象本身在那里摆着,就说明一定问题。

乙:即使是文化修养高的人反复阅读金庸作品,原因也很复杂。据我所知,有不少人是出于消遣的目的,即使看了多遍,不过是反复消遣罢了。就比如在下有时看书、写文章累了,也会找本金庸的小说来翻一翻,让大脑休息,但这时如果找一本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来休息,那行吗?不可能的事儿!后者不是用来消遣的嘛!

甲:你用读书时是否有沉重感来区分雅俗文学,未免简单化了。其实让人深度思考的作品读起来未必就一定都很沉重,《好兵帅克》就富有喜剧趣味,让人读起来很轻松。再则说,你似乎忽视

了一个事实,就是很多文史方面的学者不仅仅是将金庸的作品作为消遣,他们明确地宣称,将金庸的武侠小说视为经典。

乙:说了半天,绕了一圈,话头又回到了很多学者称金庸的作品为经典上了。看样子还得换个角度来谈。前面我们在谈金庸作品的结构问题时,曾说到,金庸的创作有商业生产的成分在内,作为促销《明报》的方式,每天为报纸写一段,这种报刊连载本身就是个商业行为。而注重商业效果恰恰是通俗文学作品写作的一大特点。

甲:报刊连载多半是商业行为,这话大体不错,但并不等于说连载的作品就都是通俗文学。这里我可以举一个反例,比如日本著名文学家川端康成的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古都》,就是从1961年底到1962年初在《朝日新闻》上连载的,但《古都》可绝对是雅文学中的雅文学。所以用是否为报刊连载来判定作品的创作是不是商业生产,进一步判定是不是通俗文学,恐怕证据不充分。

乙:那好,既然报刊连载这种外在形式不足以说明问题,那我们只好深入到作者的内部创作动机。即你的写作是意在传达个体的生命体验,还是成全大众的趣味?你写作时心目中的理想读者是谁,是留给二三知音鉴赏,还是博得越多的人喝彩越好?你的作品是不断地自我拷问、自我超越,通过纵深的开掘将笔下的世界引向一个未知的领域,还是仅仅用高明的手法对爱情、寻宝、仇杀等俗众感兴趣的故事原型进行横向组合?如果是前者,在创作时就会力避重复,如果是后者,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重复。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周伯通、周癲、桃谷六仙这类人物反复出现,这主要是出于喜剧趣味的考虑,而寻宝、寻找争夺武林秘笈以及比武大会的情节也一写再写;还有主人公通过各种奇遇而内力大进,一下子超过别人练了几十年,从而大出风头的情节也不少,金庸无论怎样求变求新,这些基本的质素其实并没改变,只是用高明的方式来重复而使人不觉其重复罢了。从这些地方来看,金庸的作品并没有超出通俗文学的范畴。

甲：你这番话颇有见地，但也不是滴水不漏。金庸小说的情节细分析起来确实没有超出爱情、夺宝、仇杀那几大元素，但人们为什么读起来不觉得重复？就是因为金庸在讲述这些好看或动人的故事时也融入了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对历史文化的深度思考，使各部作品传达出的人生况味不同，这就超越了通俗文学的层面。你读《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天龙八部》、《鹿鼎记》这几部作品时的感受可能完全不同，这就不是简单地可以用“重复”二字概括的吧？另外你的动机决定论也有不足之处，比如历史小说，它可俗，去迎合大众，迎合市场；也可雅，融入对历史的思考，或个体生命的感悟；还可不甚俗也不甚雅，就是比较单纯地普及历史知识，你说历史小说这一文类应归入雅文学还是通俗文学？二月河的作品读者定位应属一个较高层次吧？作品中写的漕运、治河、吏治、科举等内容都不是俗众关注的问题，而且作品中还有大量的诗词、典章、酒令、医道等方面的内容，明显可以看出有追步《红楼梦》的意图。但即使是这样的作品，也仍有迎合大众趣味的内容，如神乎其技的武侠及法术内容，还有关于性的自然主义描写，都使其其中的一些内容带有强烈的通俗文学色彩。动机决定论之二分法，大体上理论框架可以成立，但具体的创作实践又远为复杂，可能会有许多中间状态。又比如阐释政治意图的文学作品怎么算？如“文革”时产生的《金光大道》之类，你说它是雅文学，它并不意在传达个体的生命体验；你说它是通俗文学，它又没有什么商业动机；当然，你如果认为那根本就不算文学，我也没办法。但《烈火金刚》、《新儿女英雄传》以及讲述咱们天津卫的《血溅津门》之类的“抗日传奇”又该怎么算？创作是复杂的，用理论去简单地一刀切，这种做法很危险。

乙：这样说来，金庸的作品究竟该如何定位，是通俗文学包含雅文学因素呢，还是借通俗文学外壳体现雅文学精神呢，这只能是见仁见智了。

甲：是这样，我们在这里的探讨并不是为了得出某种确定结

论,而是抛砖引玉,以待高明。所谓“未济终焉心缥缈”,留一点思考的余地吧。

乙:那我就等着真正的绝顶高手横空出世华山论剑吧,咱们这段南开论剑就此结束。

南开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供稿

录音整理:索海军

【编者絮语】“金庸迷”中既有文人雅士,也有贩夫走卒。金庸以他的武侠小说缔造了 20 世纪后半叶文坛的一个神话。金庸的世界里,既有传统文化,即希望通过个人的修炼从而达到“内圣外王”(个人人性的完满和能力的极度向外扩张);同时又有着传统文化所不能包含的内涵,这些内涵是直指现代的。编者以为,金庸世界里也有一个“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

孙绍振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文学经典的审美价值

[2000年4月在东南大学演讲]

先提出一个引子,武松打虎为什么生动呢?它是美的,但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其方法是不科学的。它一方面是美的,一方面又是不真的,所以与我们通常所接受的真、善、美的理论发生了冲突。它有一种经典性的美的艺术形象,但不一定是很真的。通常的理论告诉我们:美就是真的。为什么美呢?因为它反映了生活的真实,深刻的、本质的、典型的真实。那现在这个打虎是假的,为什么美呢?那就要思考一下。

美和真的关系不是那么简单的。有的事是美的,也的确是真的;有的事是美的,但它恰恰不是太真的。这是常识。银幕上有两个演员演谈恋爱的情节,他们演得很好,可以得金鸡奖、百花奖,他们演的情节是假的,但不妨碍他们是美的。如果今天我是一个演员,来演武松,打一头真的老虎,那我绝对不敢演,你们也不敢来看。经验告诉我们,美和真并不是完全统一的关系,虽然我们 cannot 否认它们有统一的一面。我相信你们会同意这一观点。

要读经典性的文学作品,但要真正读懂经典是不容易的。一个经典往往经过多少代人读,多少个专家读,还能发现新的奥秘,这才是真正的经典。为什么?这就要了解文学艺术的特点,比如我们刚才讲的武松这个形象。再比如绘画。齐白石的虾之所以是艺术,首先它们是假的,真虾挂在墙上不值钱,画上的假虾可能值

几百万。因为文学艺术首先是假定的,是想象的。如果不是假定的,演什么戏呢?写什么小说、诗歌呢?要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一个艺术家,首先要学会假定艺术的想象。要欣赏艺术,就要懂经典,就要了解艺术的特点。艺术不是照相,也不是照抄,整个艺术形象是要把作家的个性、情感、气质、学说、修养,整个的人格投入进去,那才能叫艺术。所以武松打虎这样一个经典片断,它除了反映武松的神力、勇士的气概、气魄和他的力量以外,还表现了当时的作者的感情,也许还包括民间关于英雄的理想。这些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了这样一个经典的形象。明朝人张岱的笔记说,有一个说书人说武松,说得非常好。开头说,武松到岗,店中无人,便大喝一声:“店家拿酒来。”店中的空酒缸嗡嗡作响。这个片断很精彩,要能欣赏它,首先要认识到这反映的不仅是武松的身体素质,更是他的精神状态,还表现了当时人们对具有超人力量和胆魄的英雄的理想。欣赏经典,要建立一个观点,美的首先是假定的,通过假定,达到一种客观现象的某一特点和自己精神的某一特点的水乳交融。再仔细分析一下,武松好像并不是在整个过程中都是一个英雄。他首先过岗喝酒,吃牛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位教授分析说,孔夫子曾说过,食、色、性也。水浒的英雄有一个特点,可以大吃大喝,但色不可以碰。这表明武松的确是个英雄),接着武松要走,店家对他说不要走,有老虎。英雄有个特点,有很强的自信心,不相信群众。所以武松坚持要走。走了一阵,上了山,自信心遭到严重打击——看到了县衙门关于老虎的告示。但他又不肯回头,怕被店家耻笑。他又犯了第二个错误,爱面子。然后又麻痹大意,刚开始手中还有哨棒,但又因为惊慌失措把哨棒打断了,被迫无奈之下,赤手空拳把老虎打死了,做了半个小时的英雄。但正下山时又看到两头老虎,这时又绝望了。这是一种非常平凡的人的心理状态,所以武松也有胆小的时候。一方面是他有平凡人的心理活动,一方面又有神力和超人的气魄,这就使武松这个形象成为了经典。这两者相结合,就是经典的成因。同样的打虎,李逵也有一

回,他一下子杀了四头老虎,但不能称其为经典,他的心理是平面性的,他轻而易举地杀了四头老虎。可见,艺术是假定的,又不完全是假的。假定过程所表现出来的心灵的过程是深刻的,而这是以前的所有的经典文学作品所没有表现过的。比如《三国演义》,其中的英雄都是没有心理活动的,都是视死如归的。比如关公一面下棋一面做手术,毫无惧色。这种英雄离我们太远,而《水浒》中的英雄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英雄是超人的,但又是凡人。什么东西动人呢?就是心理过程的真实性。对打虎的方式的描述和对过程的刻画比起来,哪个更重要呢?当然是人的心理过程。所以我们在写小说、散文的时候,要想象。想象的时候不太真实,关系不大,但是人物的心理过程一有漏洞,就会出大问题。人物的心理过程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读者就产生了抗拒性,或者是无动于衷。所以,我们欣赏时要有一个观念,我们不能首先问他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真的,而要问他人物的心理过程,以情感为核心的心理过程。这种过程和那个打老虎的方法的科学性是两个东西,打老虎的科学性是真的,那是一种科学认识的真,这是认识的价值。人们心理的情感的认识过程叫情感价值或者叫审美价值。有这个感情过程并对它进行深刻地表现,我们就认为审美价值很高。打虎的方法很科学,就是认识价值很高。我们不要混淆了审美的美和科学的真之间的关系,这两者既统一又有区别。我们要分析一个作品,首先要分析美和真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看一个文学作品,看不下去,首先要看一下观念是否搞错,另外看分析是否对头。

有一首诗:“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我们如何分析这首诗呢?首先写酒之前,写酒杯也很美,这是一种情感价值。正要喝酒的时候,又得到命令要上前线。在正常情况下,军令如山,但这是在上前线之前,还是要喝个痛快。为什么这样写呢?诗美在哪儿呢?首先它不是真的,哪可能“醉卧沙场”呢?一是军令如山,虽有美酒但不得痛饮;二是出征命运未卜,回不来的可能性极大,担心都来不及,哪还有

心思喝酒呢？而在诗中，美酒是诱人的，不管将来如何，眼前是美好的。这是假定性的，所以说它表现的是生命的可贵，一种乐观的情绪，这是一种生存状况。

所以，我们要分析诗通过假定所要达到的一种心理状态和情感。要正确分析情感的价值、审美的价值跟实用的科学价值之间的关系。通常说真、善、美是统一的，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在分析艺术作品时，要认识到它们的区别，对待一个事物并不是只有一种态度。我们的思维要符合逻辑，要准确鲜明，但是人对世界的态度、价值的判断，并不只有认识这一种。除此以外，还有两种价值——美的价值、实用价值。朱光潜先生曾经解释过：人对待世界有三种价值观念，很通俗。如果眼前有棵树，如果是一个植物学家，他会说这是一棵落叶乔木；如果是一个木材商，他会说这树可以卖钱，可以作梁，可以造纸等等，有实用价值。科学价值叫真，实用价值叫善，还有一种价值叫美。比如说白杨树，我说这不是白杨树，这是一个哨兵，它每个叶子都向上——茅盾《白杨礼赞》就是这样描写的，这既不科学也不实用，它表现了诗人的情感。

再举一个例子：《范进中举》。有一个江南的秀才，中了举人，喜极而狂，狂笑不已，停不下来。吴敬梓如果只是这样写，还只是科学的真，没有心灵价值。但作者通过这个情节描写了范进与其丈人的矛盾。范进家中很穷，经常要向他的老丈人借钱，因此常常挨老丈人的骂，范进很怕他。当范进中举后，其丈人一改往日瞧不起他的样子，来祝贺范进。没想到范进因高中喜极而狂。有人说，只有让一个范进很害怕的人打他几耳光，才可以治好他的病。于是大家就让范进的老丈人来打。但这时范进的丈人又不敢了，又开始自叹，认为女婿是很能干的。人没有变，但感情、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心不古，世态炎凉，它反映的社会心理是非常真实的。有了一定的审美价值，才可能有一定的社会价值。读任何经典都不能忘记这一条。

鲁迅也犯过这样一个错误。他认为刘备写得不真实，说这个

形象是完全虚伪的。我们不管是真是假,但认为写得有水平。政治家满口假话,但他作为文学形象很得人心。鲁迅对诸葛亮也很有成见,说《三国演义》为了表现诸葛亮的机智,太夸张了,说“多智近妖”,认为他不真实,并举草船借箭为例子来证明。但从审美的角度来看,这是真实的,是一种情感的真实。那《三国演义》为什么动人呢?他的文字不是很美,情节过于繁冗,为什么呢?其价值不在这里,不仅是智,还要有审美价值,要有艺术的感染力,要有很高的情感价值。《三国演义》在写斗智时,还写斗气,斗气就是一种情感的表现。周瑜的出现便起了这个作用。他与诸葛亮斗气,由于多疑引起多智,又由多智引起多妒,这个心理过程很真实。所以何其芳先生说:“多智近妖都无所谓,只要人的心理状态出来了,就是伟大的创造。”所以要有一个观念,要抓住人物的心理。卢梭讲过:“人能了解整个宇宙,但最不能了解的是自己。”

为什么要有小说艺术呢?艺术表现人物内心,探索人物内心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唐玄宗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故事,白居易写了《长恨歌》,洪瘳《长生殿》中也有记叙,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唐明皇内心的世界,“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人的确有神圣的一面,也有不神圣的一面。托尔斯泰说“人有神性,也有兽性”。这种心情只能用戏剧表现出来。所以说唐明皇和杨贵妃的分分合合表现了一种情感艺术价值。《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之所以高,就是因为它把林黛玉和贾宝玉之间的纠缠、相疑写得淋漓尽致。有一种观点认为,林黛玉和贾宝玉是进步人物,因为贾宝玉不愿去考试、不愿当科举制度的接班人,黛玉对此表示支持,而薛宝钗则劝过一次宝玉,要他去参加科举考试。因而林黛玉是非常美好的,薛宝钗则是不好的,因为她没有与黛玉和宝玉一起反对封建制度。我觉得这个观点欠妥当。曾有人把薛宝钗分析为女曹操。何其芳先生认为薛宝钗是一个牺牲品。林黛玉用自己的整个生命去爱宝玉,同时又不断地去折磨他,在伤害宝玉的情感的同时也伤害了自己的健康。但这种情感的价值是比生命还重要

的。情感真挚,这是林黛玉的价值。人不是完全为科学、为实用而活的,人同时为情感而活。就如周瑜、林黛玉、安娜·卡列尼娜一样。人的生命都投入到这种情感中去,这才是一种审美价值。所有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人本来是一个动物,人首先要生存,生存是非常困难的,因而强调科学的、实用的价值,要讲真和善。真和善都是理性的,因此还要讲情感价值,讲美。美即为人的情感,人的精神世界的完善表现为人的个性、人的想象力、人的创造性、人的完整性,以及人的生存状态的美好和生命的质量。薛宝钗与林黛玉的分歧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还表现在情感上。林黛玉把情感看得比生命更重要,而薛宝钗则不然,她是一个理智胜于情感的人。把感情看得比生命重要的人叫美,把感情看得无所谓的人叫丑。这就是美丑的对立,而不是道德的对立。要分析宝钗就不能单说她是女曹操,耍诡计,是阴谋家,而要从情感的角度去分析。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再举一个例子。想来大家都看过《雷雨》。繁漪是个相当不错的角色,原因就是她很阴险,她干了许多破坏周萍与四凤关系的事。但整篇读来,我认为她是一个非常有个性、有感情的女人,因为她把自己的个性、感情看得特别重要。而周朴园则处处压抑她的个性和情感,他对她是一种文明的折磨。因此,繁漪对周朴园的反抗是一种对枯竭的情感世界的反抗。所以曹禺在这个人物的提示里这样写道:这个人是苍白的,对自己感情很重视,对现实是反抗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繁漪同林黛玉具有统一的价值观,为了感情什么都可以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是美的。有人说周朴园是个伪君子,这个说法不很正确。爱的反面是冷漠,丑是冷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薛宝钗是丑的,但从道德上来说,她不一定是错的。繁漪是美的,但与善恶无关;周朴园是丑的,但他不一定是伪君子。而安娜的丈夫连痛苦都是伪装的,所以这个人是丑的。这样,我们欣赏作品就有了一个准则,就是审美的价值,情感的价值。当然,情感是离不开理智的。从更深的程度来

讲,情感与理智、情感与道德之间有一定程度的统一,但也有一定程度的分歧,即有一些错位,但也并不是分裂,互不相干。两者重合、完全统一,文学作品就不能感动人。完全分裂,就不真实。把握住这个既统一又错位的关系,是欣赏文学经典的关键。先讲清楚文学的情感世界,然后才能讲清楚它的某种程度的认识价值。所以我不太赞成说有一部小说具有充分的百科全书的功能,这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不过是提供了阅读文学经典的一种思想。这是我的看法,我们根据的是康德的审美价值理论。

问:《红楼梦》中众人的痴是曹雪芹的成功之处,但其中林黛玉葬花吟(桃花诗)的前段是拷贝苏轼的蝶恋花,是否是《红楼梦》的败笔?

答:我想是败笔。《红楼梦》中有败笔。在我看来,曹雪芹是个天才的小说家,但《红楼梦》中诗不如词,词不如曲;在诗中最美的是排律,较好的是律诗,偶尔有两首较好的绝句,《好了歌》之类的曲最好。如果说有败笔,那并不奇怪。任何一个作家都有败笔。

问:重读经典对我们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有何影响?应该如何提高我们大学生的文化素质?

答:我们有句话,叫“温故而知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重读以后会有新的发现。我读书不多,但我有一个好处,喜欢重读书。马克思对莎士比亚的戏剧每年重读一次,我在年轻的时候喜欢郭沫若,每年重读一下他的自传,到现在得益匪浅。

问:您今天叫我们重读经典,可是我们连初读都没有时间(迫于学习与就业压力)。随着科学的发展,分科愈细,读完博士已30多岁了,如果工作到50岁的话,已经花去了一半的时间。孙教授,您认为当今的学子应当如何在人生道路上选择才会更加符合您所说的一个健全的人?

答:健全的人是一种理想。我就是个半边人,不懂科学,虽然我曾经花了些时间读科学史,读爱因斯坦传,但我还是不懂科学。

你们主要是一个科学人,如果懂一点人文方面的知识,多读一点经典名著,毕竟还是在朝做一个全面的人努力。出科学成果,得诺贝尔奖也不错,对国家是有重大的贡献的。由于你的贡献,就会有更多的健全的、全面的、有个性的理想的人。这就是你们的贡献。谢谢大家!

东南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基地推荐

录音整理:朱明华 未经本人审阅

【编者絮语】现实世界有多复杂,文学的审美世界就有多复杂。虽然从终极意义上讲,真善美是统一的,但审美的世界还是有其特殊性的,这就是演讲者告诉我们的,审美的世界是情感的世界。离开这一点,我们就很难理解经典的文学作品,也就很难对诸如薛宝钗、繁漪、卡列尼娜等文学人物有正确的理解。

王乾坤 武汉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回到你自己

[2000 年 4 月在华中科技大学讲演]

同学们来自众多的学科,据说多是学理工的,这很难得。我尝试用大家都好理解的一句话来提起今天的演讲,于是用了这个标题。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鲁迅思想特征作一个较为明快的勾勒,二是借以说明我们该怎么继承鲁迅。

回到自己,很容易被理解为道德上的个人中心主义。为了不受常识过分干扰,我们姑且借用两个概念,破一下这个思维习惯。

每个人都同时有许多身份或角色。比方说我一身多任,有教师的我、作家的我、纳税人的我、市民的我等等。回到自己不是回到其中的某个角色之我。在哲学上,这所有的身份或角色都可视为同一种性质的我,即我的在世属性,我的现身状态。不妨把这种经验状态的我叫“宾我”,即处于宾位状态中的我。宾我是多样的,有色的,可变的。

然而,我就是这一切宾我的总和吗?假如某一天,我心血来潮,改变这所有的关系状态,我就不是我了吗?不,不管我怎样变,都是“我”的变化,而且此后还是“我”。这就是说,总有一个无形的我在不断地后退,让人无法捉摸,它超出一切经验之我,姑且把这个我叫“原我”。

所谓回到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宾我向原我的回归。

那么“回归”是怎么一回事呢?是取消我的宾我性吗?是要宾

我直接地变成原我吗？不是。它并不意味着消灭自己在世状态；而不过是说，宾我要聆听原我的呼声，要找到自己的意义之根，使宾我避免沦陷为与原我疏离的异己物。人是一个物质结构，也是一个社会的存在，当然要同这个世界打交道。也就是说，人只能改变宾我，而不可没有宾我，不然人在这个世界上就无以依附。聆听原我不过是说，我之为我的最终根据，不应该是肉体之我、族别之我、国属之我、职业之我以及任何意义上的荣誉之我，等等，而只能是原我。否则我们就会被肉欲、金钱、职业、荣誉等等牵着鼻子走，成了这些外物的奴隶。这样，我就不再是我，而是与我对立的“非我”。

我们平时很难想到原我，那是因为原我不是一种可以感觉的对象，而是一种纯粹自我，超验自我。在座的同学一定有人要问我：有“超验”、“纯粹”的东西吗？能拿给我看看吗？我说，拿不出来，“超验”也经不起实证科学的“检验”。在科学之域，我与你一样，也相信这个实在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都没有。然而在生命哲学中，情况就不同了。人虽然在时空中，但要追寻有限生命之外的永恒，人可以想象和体验出一个经验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的世界，可以指向他无法表达的超时间之维。

其实，如果不从科学实证的思维惯性去运思，原我并不神秘，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体验到的。比如我做了一件亏心事，总是不安，好像有另外一个我在冥冥中对我进行审判。又比如，我们对自己的一个个角色之我，总会有一种悬欠感、不满感，因而不断地向着自己也说不清所以然的境界追求着、超越着。又比如某个很显赫的人物在死去之前突然洞悟自己枉活一世，如此等等。这都是原我在无形地产生作用，都是主我（可以看作原我的另一种表达）对宾我的一种呼唤、一种裁判。正因为人有一种无限圆满的精神向度，当下的我才感到不满足，才感到烦恼，否则我就不会发现生活的无聊，就不会有对于有限的挣脱感。所以原我是自我的原动力和方向指引，它提供生命的终极意义，它告诉我怎样才是作为

自己活着,怎样才活得有诗意,而不只是经济的、职业的、技术的、肉体的动物。鲁迅的《过客》中,说有一个无以名之的声音在召唤自己不停息地走下去,这个声音可以看作原我之音。

然而,如果片面强调原我对自我完善的意义,而否定宾我的存在理由,也有可能导致另一种危险。极端论者可能这样想:既然一切宾我都有欠缺,都有异己性,都可能成为自我的对立面而成为非我,那么我们何不一次性地把有限的宾我全都废掉,留下纯粹的原我,这样岂不更好?有些修道之人就是这么干的。他们认为既然在世的一切都是有色、有染的,不干净的,都是枷锁或牢笼,那么就干脆遁入空门,有的甚至采取禁欲主义的自残,或者自杀以“升天”,似乎彻底地斩断了一切宾我的沾滞。但是,连生命的物质载体也给革去了,还有什么原我、本真可言?所以这是一切纯正的宗教也反对的。原我不可以离开宾我而存在,呈现生命的意义。

一定要从原我与宾我的依存关系中,把握“回到自己”。健康的“回到自己”是在人的“有限”与“无限”之间,“宾我”与“原我”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鲁迅正是这么做的。他从两个向度运思,在原我与宾我的张力关系中认识自己、回到自己。

一方面,鲁迅认为离开了当下的追求是好笑的。他这样调侃道:“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著现在,执著地上的人们居住的。”就是说,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同时,他认为人又不能满足于当下,沾滞于当下,而应当不断地怀疑和批判当下,寻找人的“性灵之光”,“致人性之全”。对于自己,他常有一种欠缺感,这种欠缺感推动着他不断寻找自己,向上超越。

有同学问,他最终找到了这种自己吗?如果你所指的“自己”是一种目标实体,那么我说:没有,也无法找到这种实体性自己,因为原我没有实体性。正像数学上的原点不是一个可以画出的点一样。鲁迅非常清楚,他认为现实中的人总是一个“中间物”,不可能

成为一个完善的范本。因而回到自己不是达到某种至高的目标，而是在“没有上帝来主持”的情况下，“自己裁判”，“以己为中枢”，不断地走路，不断地寻找。“回到”是一个不断敞开着的过程，原我就在这个过程中。

原我是一个具有德国色彩的哲学概念，康德而后的哲人们多由此运思。鲁迅在评述德国哲学家斯蒂纳尔时，用了“自性”这个词。“自性”就是自我本性，原本性，这里可以与“原我”等义。鲁迅将其看作一切经验人生的统领：“唯此自性，即造物主。”他说的“以己为中枢”与此等值，这都是鲁迅生命哲学的最高命题，他的一生就是以此为中枢进行组建的。我们不妨以他的一些生活扇面为例，简单谈谈他的这种人生。

鲁迅当过教师、官员、编辑、作家，遵过“将令”，参与过各种联盟，而且干得都不错，但这些角色在他的生命中，只是派生的、从属的、第二性的，而没有左右自己的神圣性。对飞来的一顶顶桂冠，他总是一一“撕去”或者“奉还”。比如他很害怕做演讲，他说：别人把你拉去，介绍者说你是一个思想界战士，大家哗啦啦鼓掌，这样，不管你愿还是不愿，战士作定了。他说这是“苦极”的事。为什么苦极呢？鲁迅的说法是：“一变名人，自己就没有了。”有人恭维他是“学者”、“文学家”、“导师”，他说这是精神的枷锁，故意把你说得与众不同，以此来束缚你的行动。因此他宁愿掷了这尊号，化为“泼皮”，相骂相打，愤则大骂，悲则大哭，乐则大笑。回到自己构成了他终身的文化批判事业，这更为大家所熟悉。我这里只说一点，他之所以批判礼教，就是因为从中看到了两个字：“吃人”。而所谓吃人不过是说，大家都沦为了封建大网中的一个伦理角色，没有个性，没有自己了。

谈到鲁迅的个性气质，世人都喜欢用“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来形容，这当然是不错的。但如果不从“回到自己”来把握，理解就可能是极为肤浅的。“千夫”不只是所谓“军阀”、“反动派”。在他的时代，能横眉冷对军阀和反动派的人太多了，每一

个革命者都可以为之。由鲁迅的思路而论,“横眉冷对千夫指”其实就是他早年引庄子之语说的:“举世毁之而不加沮”。这类的话他说了很多,比如“连万众不慑”、“遇万物而弗为移”,也就是不怕成为“公民之敌”。

回到自己是鲁迅自信力的根据。他十分反感记者们动辄向洋人打听对中国的印象,说这就恰如“求签问卜”,没有自信。他更反感中国人动辄向“国联”寻求公理的做法;尤其对政府看洋人脸色行事的奴才相,更是左右开弓。这是“回到自己”在民族关系上的合乎逻辑的延伸。

有必要指出,鲁迅的自信与我们日常的用语有所不同,不是指“必胜的信念”。鲁迅的感觉可没有这么良好。在他那里,自信不在于相信自己万能,无坚不摧,而在于每个人的独自性:“人各有己”,任何人都不能代替我。我有我的欠缺性,我也有我的唯一性、神圣性。在这种人生领悟中,人可以用审视的眼光打量这有色的世界,高屋建瓴地俯视万物,从容地对待成败毁誉、生死苦乐。

自信与勇敢相连。鲁迅不惮开罪天下的大无畏,正是以独自性的生命领悟为前提的。一种勇敢,如果是以外物(角色也是外物)为根据,是不可靠的。比如屈原,不可谓不勇敢,但是他并没有把最终的根据收回到自己,而始终把自己看作一个臣民。所以一旦君王不察其芳,国人莫知于我,活下去的勇气就成问题了,只有自沉汨罗。

大家都承认鲁迅幽默,然而一个不自信的人是无幽默可言的,只有小丑滑稽。回到自己是鲁迅幽默的根据。因为如果人有一种对于原我无限性的襟抱,就可以从容地笑看“宾我”生活中的一切紧张、危险、坎坷乃至死亡,就可以给看起来庄严的“一本正经”以轻松的亦庄亦谐的调侃。

与此相连,回到自己同时是忏悔、自嘲、自我解剖的根据。一个人如果能在原我的识度洞看人间喜剧、闹剧,把无价值的东西撕开给人看,他也能烛照自己生命中的阴暗、有限、卑下、无能为力、

无可奈何。于是鲁迅同时有那么多自嘲、自剖、忏悔。鲁迅是自信的,同时又是自卑的。然而请注意,这里的“自卑”决不是一个“自惭形秽”之类的通常用语,而是一种生存论上的罪感、悲剧感。它来自人无法完全与原我无差别合一的无奈。然而这种由无奈而来的“绝望的抗战”,恰恰又是一种充满悲剧力量的“回到自己”。

今年是鲁迅诞辰 120 周年,讲一讲继承鲁迅的话也是组织者所要求的。怎么继承鲁迅呢?倘要我给出一个简洁的答案,那就是:“回到你自己”。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始,不断有人提出“回到鲁迅”。它大体上可以看作“拨乱反正”总气候在鲁迅研究中的表现。这个口号勇敢地把鲁迅研究从狭隘的政治实用主义中拯救出来,将其置于学术的格局中,因而可以说这个口号划分了建国以来鲁迅研究的两个时代。

然而如果像一些人那样,把这个口号置于客观主义的研究框架内,却是经不住往深处究诘的。因为鲁迅一旦进入你的解释活动,一旦你说“我要回到鲁迅”,鲁迅就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与你不相干的“客观实在”,而与你的主体性、主观性发生关系。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承认,一切解释活动无不如此。这是现代哲学解释学给人的一个启迪。

所以“回到鲁迅”在一个方面虽然是正确的,但其背后却可能有一种更深刻的解释危机。

比如我可以这样反问:在思想的研究上,根据什么证明只有你才是“回到”,而别人不是在“回到”呢?这个根据是无法找到的。靠“权威”一言拍板吗?靠“逻辑”推论证明吗?这显然不经一驳。现在有一个语式很流行:“公认……”似乎被公认就成了定论,就可以万事大吉,这也显然是不经一驳的。“公认即通过”是一个民主社会的操作法则,然而“少数服从多数”对学术判断是无效的,甚至常常是有害的。

不过,“客观回到”或者“还原”的最大问题还不在于如上的学术

难堪,而在于它可能忽视解释者的生命创造。

我们知道,是思想构成了人的伟大,人的一切生命创造之源即在于人的能动意志。没有这种意志参与的“客观回到”,即便复制式“还原”是可能的,也毫无意义可言。复制鲁迅难道没有意义吗?没有。因为鲁迅之为鲁迅,其全部价值在于他同自己的时代情境处于一种特定的对话关系中,然而我们无法复制这种对话关系。“仿我者死”,其深刻的哲学秘密便在于此。

我们还知道,鲁迅的出现,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性事件。然而这之所以是一个“创造性事件”,正是因为鲁迅根据其在世情境,创造性地解释了以往的事件,在于他立足于他的时代,“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如果他只是客观地回到尼采、回到斯蒂纳尔、回到卢梭、回到拜伦、回到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有他自己,都不会有上世纪这个思想史上的“创造性事件”。我们还知道,鲁迅的“朕归于我”与中国道家的“道法自然”、儒家的“反身而诚”、佛家的“依自不依他”都有关系,但是你无论如何不能说,鲁迅的“朕归于我”及其个性人格可以归于上述任何一种体系,以致很多研究者看不到他与儒道佛的因缘与痕迹。其独特的思想格局何以形成?即在于他不是客观地回到孔孟、老庄、释迦牟尼,而是以己为中枢地回到他自己。

那么学习鲁迅就不能提了?学习,不是模仿。亦步亦趋地去模仿他的杂文、他的笔法、他的文风,不管多么惟妙惟肖,都会失败,甚至会显得滑稽。为什么?因为这是学习“结果”而不是学习“原因”。如果我们上面的分析可以成立,那么学习鲁迅的法门就是像他那样“回到你自己”。

基于上述理由,我以为“回到鲁迅”的说法应该有一个补充性修正。

有同学说,每一个人都“回到自己”,那还有什么“继承鲁迅”可言呢?我的回答是,回到自己就是继承鲁迅。“朕归于我”、“以己为中枢”难道不是他说的么?难道他讲了一辈子“立人”,不也是希望他的学生、他的同胞站起来,回到自己么?

鲁迅的遗嘱中有一句：“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是胡涂虫。”其实这就是对生者“回到你自己”的遗嘱。所以，“回到”应该逻辑地包含其悖题：“离开”。没有“离开”的“回到”，只能是一种无改于父道的守灵；不“回到自己”，不创造自己的生活，被动地生活在他的影子下，似乎是对他的继承，实则与他无关。因为这样，他所毕生努力的启蒙主义于是成了乌有，他的“立人”之“道”于是就被弄成了一条相反的“道”。他显然不希望看到我们成为这样的“糊涂虫”，尤其是在 21 世纪。

下面请同学们提问。（略。该部分已收入作者同名著作中，可参考。）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推荐，本人审阅

【编者絮语】黑格尔在《美学》中分析人物性格时，十分注重人物性格的“坚定性”，孟子讲“浩然之气”，他们强调的都是要有一个坚定的“自我”，从而显示出人格的伟大。有了这个坚定的“自我”，我们才不会在经验世界里作一朵随波逐流、永无根系的浮萍。

鲁迅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写出了“不朽”的阿 Q，也不仅仅在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二十四史是“吃人”的历史，而且更在于他人格的伟大。这也许是我们今天纪念鲁迅诞辰 120 周年的意义。

丁宁 北京大学艺术系教授 博士

马斯洛人本主义艺术心理学评介

[2000 年 4 月在北京大学演讲]

人本主义心理学 (Humanistic Psychology) 是西方 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一种心理学流派。它是由 A·马斯洛、罗洛·梅、卡尔·罗杰斯等建立起来的具有广泛基础的心理学。它不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那样探求人的意识的隐蔽之处,也不像行为主义的心理学那样注重刺激与反应的模式,而是倾心于人的“高级意识心理”,从而耀眼地成为心理学的第三种力量,即精神分析与行为主义心理学之外的第三种声音。

人本主义心理学和艺术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与马斯洛酷爱音乐和美术有直接的关联。在威斯康星大学读书时,马斯洛一度下了决心,打算以对音乐心理学的研究作为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却没有被校方顺利地接受。尽管在其以后的工作中,马斯洛本人很少对美学进行过直接而又深入的研究,但他却一直认为,审美问题是值得认真对待的重要课题。

确实,人本主义心理学,特别是在马斯洛的论述中,专门或直接涉及艺术与审美的文本并不算多,但是,人本主义心理学无疑在诸多方面给艺术心理学提供了独特的启示。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将西方艺术心理学的研究中的“人文性”(即与“科学性”相对的性质)推向了极致的境地。以下,我们就人本主义艺术心理学思想的荦荦大端作一勾勒。

一、需要层次理论

要了解人的内在动机,需要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侧面。马斯洛充分意识到了需要在人的内心世界中的地位,因而,颇为全面地勾画了人的需要的构成和层次性特点。在马斯洛看来,人的需要由低级到高级可分为七个层次,犹如一座金字塔。这七个层次是:

生理需要作为维持个体生存和种族发展的需要,是人类原始的、也是最基本的需要。作为一种缺失性需要,它可以引起匮乏性动机。例如,对于衣、食、住、休息和性等的需要,一旦得到满足,紧张消除,兴奋降低,就失去了动机。这种需要在人类的一切需要中是最需要优先加以满足的需要。

安全需要是指人希望有稳定的职业,有生活的保障,喜欢处在安全、有秩序、可以预测的环境中,并愿意选择熟悉和已知的工作。这种需要得到满足,人们就会产生安全感。否则便会引起威胁和恐惧感。

归属与爱的需要是指人希望归属于某一团体,成为其中的一员;希望有知心朋友,和同事保持友好的关系;渴望得到爱并把爱给予别人。爱与性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等同。性行为不仅为生理需要所决定,而且还受其他需要,特别是爱的需要所支配。

尊重需要是指希望尊重别人,也希望得到别人尊重的一种需要。它是和人们渴望富有实力、成就、名誉、声望,获得独立与自由相联系的。这种需要的满足,会使人产生信心,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并满怀工作的热情。否则便会产生自卑感,丧失信心。

认识需要是人们渴望了解外在与内在世界的要求。这一需要几乎是没有限度的求知过程。作为超越了生存满足的要求,它出诸内心,因而持久而又强烈。

审美需要指的是人对于美的事物的观照、品味与享受的需要。这种需要融入了所有的健康人的人格之中,只是不像其他需要那

样能轻易地诉诸言词的描述。不过,心跳加快、屏息凝气、全神贯注、舒坦畅快以及激动颤抖等均是这一需要实现时的具体感受。

自我实现需要是一种实现个人的理想、抱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希望完成和自己能力相称的工作,越来越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物的需要。各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不同的,只有实现他们最高的理想,他们才会感到最大的快乐。

马斯洛认为,这七个层次的需要,只有较低层次的需要基本得到满足时,较高层次的需要才会发生。总之,每一时刻最占优势的需要支配着一个人的意识,成为组织他行为的核心力量,已经满足了的需要,就不再是行为的积极推动力。

移之以论艺术家的需要:首先,看一看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确实,人们只有满足了生存的需求之后,才从事艺术活动。巴尔扎克在债务重重的压迫中挥笔不停,以超乎常人的毅力拼命写作;梵·高若是没有弟弟提奥的随时接济,很难在饥寒交迫中创作出精神深刻的杰作。当然,艺术家不是酒醉饭饱之后才进行创作的,但是,生存的需要的基本或部分的满足却是极为重要的。同时,艺术的创作也使艺术家获得了心情的宁静,仿佛停止写作或画画就是一种最大的失落与痛苦,尽管从艺术中所获取的生存条件并不总是能尽如人意,即使是杰出的艺术家也不例外。

其次,是归属与爱的需要。一方面,艺术家像常人一样有这一需要,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归属感与爱是艺术建立其博大的情感世界的支柱。艺术家的归属感既是具体而微的,又可以推及开去,包括国家、民族等,从而获得非凡、特殊的意味。同样,爱也是如此,作为一种不能被剥夺的体验,爱是艺术家传达中的最重要的元素。没有爱的渴望(或者爱的剥夺)的体验,艺术作品的动人力量是无从谈起的。

再次,是尊重需要。艺术家所从事的是特殊的职业,其劳动成果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而同时也是为了精神上的满足:创造力的确证、普遍的认可以及艺术生命的未来延伸,

等等,这些均是艺术家更为在乎的东西。

第四,是认识需要。应当说,艺术本身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成果。艺术家固然以历险类作品、成长体小说、写实的美术、叙事的舞蹈等作品让人领略丰富的认识意蕴,同时,在抒情类的艺术中,人们也同样可以淋漓尽致地感受到具有特定时代、地域和个性特点的曼妙、深刻或回肠荡气的意绪。艺术家之所以要实现认识的需要,当然还有特别的缘由。对他来说,认识与其说是外在的要求,还不如说是内在的冲动。而且,正是这种出诸内心的认识欲望,使得艺术家的眼光尤为特殊:总是别有情致,而且意犹未尽。

第五,是审美需要。无疑,人不能缺失这样的需要,而艺术家更是如此。对于艺术家来说,这样的需要几乎就是他的某种天性的成分,甚至构成了他的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审美已经是非常内在化了。安格尔 80 多岁依然在激情洋溢地作画,透纳和莫奈在后期视力欠佳的状态下画出非凡的杰作,托尔斯泰到了晚年仍然笔耕不辍……

最后,是自我实现需要。在一篇当时没有发表的提纲里,马斯洛指出:“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人的身上有无限的潜在能力……从有潜能的意义,人是宇宙中最令人惊异的现象,是最具有创造性、最精巧的生物。多少年以来,哲学家们一直在寻求真、善、美,论述它们的力量。现在我们知道,寻求它们的最佳地方就在人们自己身上。”虽然自我实现也是所有的人的一种需要,但是,它的实现却常常又有限度,甚至遭遇极大的障碍。自我实现在现实中变得不是那么的一帆风顺,然而,艺术家却在这一点上与常人拉开了距离。一位作曲家必须作曲,一位画家必须绘画,一位诗人必须写诗,否则他始终都无法安静。他一定要忠实于自己的本性——这正是艺术家实现其自我的真实情形。

当然,马斯洛在需要层次论中片面地强调了个人内在价值的实现,忽视了社会理想对人的积极性的作用。同时,马斯洛又把人的需要看作是自然禀赋的。此外,我们也应该注意,马斯洛的所论

是人的意识的“顶楼”(即高级的意识心理),而对潜意识探讨的匮乏又使得这种论述显得不甚完整。再者,他似乎没有顾及某些需要实现中的受挫也可能激起艺术家创造的动机。

二、自我实现理论

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的过程就是人发展或发现真实的自我、发展现有的或潜在的能力的过程。自我实现的人是人类的典范,是社会上最有价值的人,他们具有以下特征:(1) 接受自己、他人和自然的能力;(2) 建立深厚、融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3) 洞察现实,保持知觉与现实的和谐关系;(4) 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5) 鉴赏的不断更新;(6) 自主性;(7) 创造性;(8) 民主型的性格结构;(9) 高峰体验;(10) 返璞归真;(11) 不受文化和环境的束缚;(12) 同情和爱的情感;(13) 善意的幽默感;(14) 辨别善与恶、手段与目的的能力;(15) 超然独立、离群独处的需要。

马斯洛认为,人类具有真、善、美、正义、欢乐等内在本性,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达到人的自我实现关键在于改善人的“自知”或自我意识,使人认识到自我的内在潜能或价值,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就是要促进人的自我实现。

马斯洛坚信:“生活的真正成就来自于我们自己的高级需要的满足,特别是自我实现的需要”;“高级需要的满足能引起更加合意的主观效果,即更深刻的幸福感、宁静感,以及内心生活的丰富感……”那些生活在自我实现水平上的人们,事实上也是最博爱、并在人性上是发展最完全的人们。”

有不少的艺术家虽然可以吻合马斯洛上述的自我实现者的特征,但是,马斯洛所列举的有些特征却未必都是艺术家的秉性。例如,艺术家可能是一种自我感极为强烈和敏感的人,并且在创作中渲染这一点;艺术家能够洞察现实,但是未必保持知觉与现实的和

谐关系。恰恰相反,他们的知觉有时就是与现实不和谐,甚至有时是与现实的格格不入感导致了艺术的冲动。而且,马斯洛显然没有把艺术家的痛苦放到应有的位置上。所以,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特征实际上尚未更加深入地进入艺术家的内心世界的奥秘。

三、高峰体验理论

高峰体验是马斯洛自我实现中的重要概念,指人在进入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状态时可能感受到的一种欢乐至极的体验。马斯洛列举能产生高峰体验的情境和时刻有:(1)爱情;(2)审美感受,特别是古典音乐欣赏;(3)创造激情和灵感;(4)领悟真理;(5)顺产,母爱;(6)与大自然的交融,如在原始森林中,海滩下,丛山中;(7)体育比赛,翩翩起舞时,等等。高峰体验是自我完善过程中的一种自我奖赏,类似宗教皈依时刻的神秘体验。尽管它产生时的刺激因素各不相同,主观体验却彼此相似。它的特征是瞬间产生,转眼即逝,因而往往逃过人们的注意,使人们弄不清它的性质。但这样的时刻到来能产生强大的冲击波,使人摆脱一切怀疑、恐惧、压抑、紧张和怯懦。这种体验多发生在自我实现者身上。

根据他的抽样调查报告,这些特征包括暂时的时空混乱感、惊奇和敬畏感、巨大的幸福感等等。人们还普遍提到,一些完全相反的事物,如善与恶、自由意志与宿命等都在一瞬间被超越了:一切事物都得到了辉煌的统一。马斯洛还指出,经历高峰体验之后,常会留下深远的影响,对人有脱胎换骨的作用。“尽管生活通常是单调、平凡、痛苦、别扭、不令人满意的,但只要看到美、真理和生活的意义确实存在,一般来说人就会更容易感到活着是有价值的。”

确实,在艺术创造与接受中,人们不难感受到一种短暂的狂喜、入迷、出神、极大的幸福感和愉快感或者所谓“诗意的狂喧”(rhapsodic communication)。在这种短暂的时刻里,人们能感受到敬畏、崇拜和奇妙的心情,体验到“此时此地”以及真实而统一的存

在的感觉,同时也体会到超越与神圣。无论是灵感或直觉的状态还是心心相印的意会,是不唤自来的神来之笔还是完成的喜悦等,均是确凿无疑的高峰体验。

不过,马斯洛不仅描述了关于高峰体验的诸种普遍特征,而且还把它们与精神的完全健康联系在一起。换一句话说,他把高峰体验提高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加以认识。在他看来,“一个内心矛盾重重、精神处于混乱状态的人很可能因为达不到高峰体验而失去理智。心绪烦乱的人不会有高峰体验,只有情感健康的人才会有高峰体验。实际上,一个人的情感越是健康,他就越有可能产生高峰体验。同样,我们经历的高峰体验越多,精神世界就越是健康”,“没有高潮,人类怎么能够得到休息与拥有平和的心境?怎么能享受真正的具有存在性价值的娱乐(play)?没有高潮以及各种形式的高峰体验来提供一种完成感,我们就会总是感到自己处在游移不定的中间状态。我们总是在努力,总是在坚持,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永远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如同一直在山腰攀登,永远达不到顶峰,得不到休息。事实上,任何真正的满足都带有一种微妙的终极体验,容许人们停下攀登的脚步。有时候,这种终极体验非常尖锐与强烈。但是,真正的完满感、真正的终极状态——真正的无以复加的终极体验,完美的高潮,这才算得上是真正的高峰体验。完全的高峰体验不仅对精神上,而且对身体上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它是一种完全的释放,全部的耗尽,彻底的满足”。

可以说,将高峰体验强调到这样的地步,实际上也暗含了对艺术的一种特别的肯定,尽管马斯洛无意进一步地区分艺术的高峰体验与非艺术的高峰体验究竟有怎样的差别。

此外,马斯洛还涉及了高原体验(plateau-experience),虽然这一概念倒并非他的原创。所谓高原体验,指的是对于感受到的敬畏与神奇做出平静的、稳重的积极反应,是一种平和而又持续的欢乐心境;与高峰体验相比,它没有那么强烈的感情色彩。相反,它

更多地含有理性与认知的成分,也更多的是出于意志行为。例如,一个母亲静静地坐着,照看她的小宝宝在地上玩耍。其实,艺术活动中不少的体验状态恰恰是与此相吻合的,未必均体现为高峰体验。

四、存在性世界的描述

马斯洛在阐释自我实现的哲学涵义时,将它同人类的终极价值与存在价值联系在一起。他说:“似乎有一种人类的终极价值,一个全人类努力争取的远大目标,不同的作者给它取了不同的名字,如自我实现、自我完善、整合、精神健康、个性化、自主性、创造性、生产性;但他们都一致同意,这些意味着充分实现个人的所有潜力,也就是他能够彻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充分实现他的一切可能性。”在马斯洛看来,人类的终极价值就是自我实现,这是全人类都在努力争取的远大目标。它的内涵包括存在价值的一切表现,如真、美、完整、合二为一(对立面得到统一,仇人化为挚友)、生气勃勃;与众不同、完善、必要、完成、正义、秩序、纯朴;丰富、轻松、诙谐、自我满足等等。自我实现者将这些价值融入自身,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同时,马斯洛认为,在超越性体验的时刻,人们直接了解了人类的最高美德与理想。他把它们称之为“存在性价值”,例如,美、正义和完善等。相反,在日常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则是一些次要的“匮乏性价值”,如恐惧、怀疑等。他同时也推断,心理健康的人更容易经历心醉神迷的神秘体验。

马斯洛曾经这样描述他所理解的“存在性世界”:

1 通过有意识的进入存在性世界,可以走出匮乏性世界。去参观艺术展,参观博物馆,观赏美丽或者庄严的树木,去图书馆读书,到山上或海边去陶冶情操。

2 默默地体会那些值得赞赏、值得热爱和尊敬的人,感受和思

考他们的美德。

3 .进入奥林匹斯山的清新空气,进入纯哲学、纯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领域。

4 .努力缩小注意的范围,全神贯注地陶醉于一些微小的世界,例如,蚂蚁或地上的昆虫;细细地观察花朵或地上的叶片、沙粒和尘埃;专心致志地观察而不受外界干扰。

5 .用艺术家或摄影师的眼光来观察物体的本质。例如,用镜框将它镶起来,把它和周围的环境分开;把物体放大了看,眯着眼睛以观察它的大概轮廓。或者从另一个异常的角度来观察,如把它颠倒过来看一看,或通过镜子里它反射形成的影子。也可以将它放入特殊的背景中,用特殊形式来摆放它。长时间地盯着它,同时进行自由联想,任意发挥。

6 .长时间地与婴儿或儿童呆在一起。他们比其他人更接近存在性世界。有时候,当你与一些动物,如小猫、小狗、猴子或猩猩呆在一起时,你也能够感到存在性世界。

7 .站在历史学家的高度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反思:一百年、一千年后它会是什么样的呢?

8 .从别的动物的角度来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思考,如自己在一只蚂蚁眼中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9 .假设你只能再活一年了,你会怎样对待你的生活呢?

10 .思考一下,你的生活在一个远方的人看来是怎麼样的,例如,一个远在非洲的小山村里的人,他是怎样看的。

11 .当你看到一个熟人或熟悉的情况时,假设你是第一次见到,用一种新鲜的眼光去看。

12 .当看到同样的熟人或熟悉的情况时,换一种方式,假设这是最后一次见到了。

13 .以伟人的睿智、哲人的眼光来看问题,如以苏格拉底、斯宾诺莎、伏尔泰的眼光来看问题。

14 .试着与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交流,同他们交谈或给他们写

信。例如,与贝多芬、苏格拉底、威廉·詹姆士、伊曼纽尔·康德或阿尔弗雷德·怀特海等交流,而不是只与你生活中的人交流。

在上述的描述中,艺术无疑是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当然,马斯洛也意识到,“自我实现的人,即那些达到高度成熟、健康、自我完善的人,能够给予我们如此多的教益,以致他们有时看上去就像是另一种人。但是,对人性发展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对人性发展的终极可能以及人类抱负水平探寻是一项棘手而曲折的任务……”

确实,对于存在性价值的提升与实现,艺术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间接的,因为存在性价值更是艺术以外的重大问题。

北京大学教务处推荐

李光羲 著名歌唱家

我的演唱生涯和美育情怀

[1998年5月在北京轻工业学院的演讲]

老师们,同学们,先作个自我介绍。我于1929年出生在天津,今年69岁。1954年考到中央歌剧院,至今已做了44年演员。

大家都知道,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那时我才两岁。到1945年日本战败,那时我将近16岁了。16年中有8年是在日本人的奴役之下生活,艰苦而悲惨。我父亲原先的工作很好,收入也不低,可没想到,在我17岁时,他去世了。我的大学梦破灭了,再念书是不可能的,就找了一份工作。解放后,我考入了中央歌剧院,做了演员,走过了44年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的道路。最近,文化部组织了一批专家为十位老演员写传记,我有幸被搜罗进去。(笑)我之所以愿意让人写一写,是因为我觉得大概我所走过的道路,能够给青年们提供一个范例。(笑)

艰苦生活是坏事,可也不尽然。每当我到大学、中学甚至幼儿园时,我总觉得我这一生有一个遗憾:没念过多少年书,没有幸福的童年。所以,每次我都有很多感慨:我这个没进过大学门的人,能够在高等学府的讲台上为大家作报告,战战兢兢的,很羡慕你们。(笑)艰苦生活使我珍惜生命,热爱生活。现在的家长都很爱孩子,把一切都给了孩子。可这也使孩子独自生活、独自思考的能力不强。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挨过3次饿,并不是指三顿饭没吃

饱,而是长时间的挨饿,老是饥肠辘辘。到 1945 年,抗战胜利了,打开日本人的军需仓库,把他们搜刮中国人的大米、白面、白糖都亮出来了。我一看,这白的是什么呀?不认识,不知道那是白面、白糖。

人呀,无非有两种需要,一是物质生活,为了生存,要吃饱;二是精神生活。人类社会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是因为积累了文化,这其中包括了人伦、道德、科学、艺术等等。小时候,在敌人的铁蹄下,亲戚、朋友、同学死去的事情经常发生。因此,当我偶然在收音机中听到一段好听的音乐,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和艰苦生活一对比,音乐真是太美妙了。虽然那时的收音机只是一个木头匣子,声音不太大,但还是整天守着听。在 1942 年、1943 年,我十二岁时,北师大音乐教授王纯芳,经常在北京电台搞音乐讲座。交响乐、古典音乐、贝多芬、亨德尔、巴赫、肖邦等等,我很喜欢。为什么呢?因为交响乐和民乐不同,很丰富,很优美。中国音乐无论演奏什么乐器,全是齐奏,一个调儿,而交响乐则不同。中国音乐就是一个线条,外国音乐是好多线条,交叉和重叠演奏。现在想一想,正是当时脑子里所装的这些东西成了我以后搞专业的基础。

1945 年,抗战结束,由于国民党腐败,没过两年,社会又乱了,生活再次陷入失望和困难当中。有一天在学校看到一份布告,《新生晚报》招募学生利用下课时间去送报纸,我就应聘了。送报纸的同学中有一个是牧师的儿子,他觉得我嗓子挺好,问我是不是喜欢唱歌,我说喜欢,并且说,从小学到中学,同学老师都说我唱歌好听。于是他就邀请我参加基督教会的唱诗班。大家看外国电影,可以看到教堂中用音乐来赞美上帝,这也是西洋音乐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记得那天是 1946 年 12 月 24 日,即“Christmas Eve”(平安夜),在教堂里唱了一场《弥赛亚》,那是德国作曲家亨德尔的作品。那天当听到《哈利路亚》时,所有的教徒都站起来了,我也站起来了。在当时的环境中,觉得真是神圣、崇高,音乐把一个虔诚教徒对上帝的信仰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种气氛给了我很大的震

动:音乐的力量如此之大!从这时起,音乐在我心中的分量更重了。我很快参加了唱诗班,每星期练习两次。一晃四年,从不识五线谱到成为唱诗班的骨干,再到拿到任何谱子,开口就唱。专业水平就这样提高了。

虽然我没学过声乐,也没学过乐理,可我在音乐的接受、理解和表现上,多年来几乎没遇到过什么困难。1954年我考进了中央歌剧院,首演了古典歌剧《茶花女》。同行一些人所遇到的困难,我都能克服。他们就问我从哪儿学的,我说只是因为自己喜欢,在唱诗班中自觉地练出来的。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只要你全身心地投入你想获得的知识 and 学科之中,一定会出现奇迹。”所以当我听到这句名言时,我想我就是得益于对音乐的热爱,它是一种心灵的寄托,一种自觉追求。

1947年,我开始在我父亲原先所在的开滦煤矿做职员养家糊口。解放后,看到同辈同学都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心里特别着急:难道这一辈子就在办公室抄抄写写吗?不甘心!后来到北京,一位同学鼓励我到文化宫的文工团唱歌,虽然它是业余合唱队,但老师都是专业演员。我就去了,立即就被当时中央实验歌剧院的一位指挥发现了。他问我是否有兴趣考中央实验歌剧院,这正是我所盼望的。1954年9月,我考进了中央实验歌剧院。

1954年国庆节后,我来到了北京。当时特别兴奋。因为自己没有任何学历,而周围都是从美国、德国、苏联归来的留学生,延安时期文工团的老干部以及音乐学院的高材生,这给我很大压力。生活上也紧张了很多,工资从原来的160元降到59元,少了100元。同学们,100元在当时可是8个学生一个月的饭费呀!怎么办呢?卧薪尝胆,只有在排练当中,不断地向别人学习,看别人如何表演,如何合乐,如何选歌,借以提高自己。

1955年元旦,中央歌剧院要在当时北京最大的剧场——天桥剧场开音乐会,我就报名了。另外还有好几个20多岁的青年演员。经过领导审查之后;只有一位被选上了,就是我——李光羲。

(笑)我就这样参加了 1955 年的国家剧院音乐会,上去一唱,观众就不让下台。唱的歌中尤其受到观众欢迎的是《相逢在匈牙利》。没有多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来人找我,他说我唱的比保加利亚原版的还抒情。(笑,掌声)

1956 年,周恩来总理提出,新中国要建立自己的剧场艺术,凡是世界上好的艺术经典,我们都要介绍给老百姓。中央歌剧院就分到一个任务,演出意大利著名古典歌剧《茶花女》。那可是全国文艺界的大事儿。院领导觉得我有些条件,排练时,就把我排在了除老演员、中年演员之外的第三组。平时主要是排一、二组,第三组主要是看别人排戏。排了 3 个多月,偶尔让我上去试排一下。当时由一位莫斯科大剧院的老歌剧演员作为艺术指导,当 12 月底公演彩排时,他建议让我参加彩排。彩排以后,大家都在问:“那个李光羲是从哪儿来的?在哪国留过学?是哪位老师的得意高足?”后来,我们的院长周巍峙向大家介绍,说我只是个天津的业余爱好者。打这儿以后,我就在舞台上站住了。

大家知道,现在歌剧不景气,票价很贵,观众买不起,演出很少。目前中央歌剧院一年演不了 10 场 20 场的。创作周期太长,投资太大,一上台就得 100 多人,不得了!最近,歌剧《图兰朵》和《马可·波罗》应邀去台湾演出,共 10 天,190 人,每位演员最终只得 190 元人民币的酬劳,真叫可怜!可在那时,一出戏上演后,连演几年不停,并且场场满座。

我想,一个演员要做出些成绩,一是先天条件,二是自己的热爱,三是台上长期不断的实践,最后还要有创新意识。比如一场音乐会,十个人唱,谁都想唱观众熟悉喜爱的歌,被观众记住,但是不能都抢这几首歌呀!这时就需要领导协调:这个歌让给他唱,那个歌让你唱。只有一种情况下可以不让,就是一首歌应由它的首唱者来唱。我想,这就是我的机会和出路。于是我就经常看歌本,听收音机。从 1956 年起,就积攒自己的首唱歌曲。所以这些年来,我从不抢别人的歌,因为我的歌都是自己唱出来的,是群众喜

闻乐见的。我经常对专业演员讲,要想让观众知道你,必须把你唱的歌和你的名字联系起来。一听《便衣警察》,刘欢唱的,《北京人在纽约》,刘欢唱的,那么刘欢的名字一定能够流传。一个人只能用他的成绩和成就去体现他的自身价值。若真想取得成就,就得有创新。今年全国人大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有一句话:精神文明建设不但要提高人们的素质,还要启发人们的创造性。这是第一次提出创造性的问题,十分重要。

我们这一辈经历过不少困难。如“文革”十年都被赶下了舞台,不许唱歌演戏了。周总理在1972年接见外宾时,外宾要听抒情歌曲,就把我们一些人招了回来。当时,我们正在农村种稻子呢!借此机会,我受中央台的邀请,录了《北京颂歌》、《远航》、《南京长江大桥》等歌曲,算是恢复了演唱生活。“文革”结束之后,又唱了《周总理,您在哪里》、《最美的赞歌献给党》、《祝酒歌》等等。我从50年代到90年代,因为有自己的创造、自己的歌,名字就流传下来了。这里,根据我个人的成长经验,我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如果你的理想和兴趣符合你自身的素质和条件,只要你忘我地投入,你总能做出成绩。

1962年我演了柴可夫斯基根据普希金的长诗《叶甫根尼·奥涅金》改编的歌剧,演了描写“四清”的歌剧《夺印》;后来还演了描写哈萨克牧民生活的《阿依古丽》。“文革”之后,演了阿凡提的故事《第一百个新娘》。当然“文革”中,浪费了很多时间。前不久,一个电视台采访我,他说:“你的理想是什么?”我说:假如有来生的话,我还想做演员,只是别再来一次“文革”(笑)。“文革”时期,我36岁到46岁,作为一个演员,最好的年华都耽误在“文革”期间。

现在,有时很高兴,有时难免很悲伤。比如,去年,我们经常合作的吕文科,唱《克拉玛依之歌》、《高高的兴安岭》的吕文科,突然死了。想起这件事,心里就很难过。总之,合作者与机会不会再多了,自己好自为之吧!只要别人还喜欢,我就再延续一段。所以,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主题歌《走进新时代》,选演员时,选了个年

轻的,20多岁的张也;中年的代表是李谷一;再选一个老年的,代表60岁以上的,就是我,我们合作唱了这首主题歌。别人就说:“嘿,又在春节晚会上亮相了!”我就说:“给个机会,让别人知道人还健在。”(笑)

我从1981年起在北京朝阳区担任人大代表,参政议政,也许可以利用自己这点儿影响,替老百姓呼吁呼吁。后来进了全国政协,从第六届一直到第九届,这也是自己一个学习提高的机会。1994年,通过作家冯骥才的介绍,美国传记学会要我的材料,把我收到《世界名人录》中去。

下面我就谈一谈歌唱艺术。唱歌是一个最有群众影响的艺术门类。应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乐器——嗓子。人们爱唱歌,借此抒发自己的情感。所以,无论我在哪儿谈心得体会,都有人爱听。那么现在大家经常听到的,有3种唱法。这也是中国特色。一是美声,一是民歌,一是通俗。这三者既有共同之处,也存在着显著差别。什么是美声?从十五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开始,欧洲的声乐逐渐形成了一种系统的科学的发声方法,就是美声。美声有它声音的特色,讲究共鸣,讲究长线条,讲究色彩。现在美声在我们的音乐生活中不太景气。因为通俗音乐太时髦了,影响太大,到处都是,并且它浅显易懂,配器丰富,电子音乐很美妙,节奏鲜明,又经常描写个人心里的那点爱,那点眼泪(笑),特别能撩动年轻人的心,把年轻人都夺去了。要想发展美声唱法,只有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创作出好作品,让大家喜欢,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民歌就很有优势了。现在的民歌歌手很多,曲目也很多。所以每次春节联欢会排练,从全国各地集中来的民歌歌手一大帮,没有一个长得不漂亮,没有一个嗓子不好。但有一个问题,她们都模仿一个人,不是彭丽媛,就是董文华。前几天,还有一个记者问我,他说:“李老师,现在唱歌都是一个味儿,分不清是谁,好嗓子挺多,都是那一个表现方法,一个味儿。”我说:这确实是一个问题。繁荣是好事,但没有自己的特点,就缺乏生命力。那么,民歌的特点是什么

么？语言清楚，声音明亮，所表现的内容特别贴近我们的生活。另外一种就是通俗唱法。我认为，所有的通俗音乐歌手全是天才。为什么呢？他们不用学习唱法，就是凭自己的本嗓唱，过去说“这个人不够格，声音不够明亮”。现在不这么认为，不够明亮就对了（笑），越哑一点儿，越暗一点儿，越对味儿。所以有些通俗歌手，本来默默无闻，一歌就红了。可是，如果在戏曲、美声、民歌领域，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戏曲也好，美声、民歌也好，必须经过严格的聲音培训。要把你的自然声带变成歌唱的声带，至少也要下十年八年的功夫，否则根本建立不起来那样的振动，那样的气息支持，那样的共鸣。通俗音乐的兴起，是个大好事，使所有的人都有演唱的机会。还有卡拉 OK。“卡拉 OK”即“空白乐队”。“啪”——乐队一起你就可以随着伴奏唱起来，不会词儿，它给你打出来了。从娱乐角度讲，这谁都能唱，太方便了，真是极大的进步。但是也有问题，因为它的曲目内容较杂，有不少品味不够高。

借此机会，我谈谈美育问题。有人说：‘你们唱的歌和流行歌曲有什么区别呀？’我说：“除了方法之外，我们唱的歌题材广泛，可以描写祖国、朋友、理想、大自然和奉献，可通俗音乐大多只限于描写个人内心，这就是最根本的区别。”当然，也要抒发个人内心情感，然而，人还有更高尚的情感。为什么要进行审美教育？因为美育可以培养人的高尚情感，使人热爱生活，投身生活；只有这样，才有奉献精神，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专长服务社会。一幅好看的画，不用别人讲，我自然就喜欢，虽然我分析不出道理来；一段好听的音乐，我听了，能够产生美感，尽管我不懂乐理。美感来自于何处？人的心灵。所以有人说：“美育为树人之本。”为什么不是德育、智育、体育才是树人之本呢？德育和智育是通过理性的认识和记忆获得知识，懂得道理，而艺术通过直接感受触及心灵，让你动心。小时候，看了一幅画，一辈子不忘；听了一段音乐，似乎旋律深深地扎根在你的心灵中了。这时，我们就会感到：“啊！生活真美好！”俄罗斯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说：“谁不爱美？谁不期望着别人

说自己美丽？但是，人呀！只有可爱才美丽，而美丽并不一定可爱。”所以说“美育为树人之本”。

许多年轻人说，听不懂交响乐，什么第几乐章，什么主题，以及和声、复调等等。这不要紧，只要你多听，就会有所感染，有所顿悟。要知道下这个功夫是值得的。一位老先生讲：你知道什么叫经典吗？为什么有的作品，不论是文学、美术，还是音乐、戏剧，就能成为经典？经典不是自封的，不是领导规定的，而是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几千年、几百年前写出来，世界流传，到现在，仍是世界流传。谁让它流传的呢？老百姓！有口皆碑，这就叫经典。所以说，经典的东西，有机会你去接触，去欣赏吧，绝不上当。我们呼吁电台、电视台、教育部，请你们多放一些经典音乐，让孩子们多听一听，他们就会被吸引了。如果整天都是通俗音乐，你能怪孩子们不喜欢高雅音乐吗？为什么搞交响乐家庭出来的孩子都喜欢高雅音乐？从小熏的！全国政协开会，我就向教育部建议，发行五元钱的一种带子，是专家精选的古今中外的名曲，通俗音乐用不着提供，大家都有，在课余时间，在学校的广播中放。可以报曲名，也可以不报曲名，因为音乐本身就动人，过耳不忘。北京有一个学校，设计了一个“四名工程”，就是名人、名画、名曲、名言。比如这个星期，学校就放这一首歌，下了课就听，听一个礼拜，大家都会熟悉的，老师再讲，这是某某的作品，什么时期的，同学们就记住了，层次自然也提高了。学校的墙上经常挂一些画，什么时期、什么人所作、什么派别，同学们都明白了。通过这个“四名工程”，同学们了解到很多艺术上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方式。

同学们，大学是一个大熔炉。在学校里，除了本专业以外还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你的成长绝不能仅靠单方面的哪个学科，不管是学什么专业，都要有意识地学些如艺术等专业之外的东西，那么你们这个大学就没白上。凡是经典的东西，只要你下点功夫去接受它，就会体会出它的价值。这就是欣赏，不怕不懂。

也许今天在座的有些声乐爱好者会提出来，你能不能告诉我，

怎样能唱好歌呀？那么，我现在就谈点我自己的经验。

首先一点，是要从心灵和情感出发。你不是爱唱歌吗？我建议想唱就要唱你认为好听的歌，也许别人听着觉得不怎么样，可我就这么唱。从美出发，从自我欣赏出发，这是最主要的。

第二，注意音准节奏准。你爱听的歌，它必定有一个韵律，韵律当中就包括最基本的音准和节奏。“蹦蹦—蹦蹦—蹦蹦……”哎，它就和你的心灵合拍。然后，它还有一个美妙的旋律引着你，你的情感、你的美感跟着它走。高明的作曲家他所创作的旋律就是能引导着人跟它走。人家那儿蹦蹦—蹦蹦，你快了慢了都不行，你要合拍合槽，这点是个基本功。你耳朵里有个音准：得逮住那么几个主要的音，不管怎么样，回到那儿，那个音是准的，那么你就可以保持一个旋律的准确音型节奏。然后呢，每一首歌，它总有起伏，有高潮，你得分析分析把高潮放在哪儿。只要你在唱歌时注意这几方面，就会比那种随便哼哼的要规范，就会有提高。

还有一点，就是唱歌的三元素。第一，声带，是发声器官，它振动能够出声。振动的振源在哪儿呢？动力是哪儿呢？气息。怎么好听呢？就是声音出来之后调动声音所碰到的各个共鸣腔体。这儿是咽腔，这儿是口腔，这上面是鼻腔，这儿是头腔，下边是胸腔。不管多好的嗓子，就是那么两片非常坚硬的、有弹性的肌肉，他最大的音量也就不过两片振动。为什么它能出这么大声？就因为当它振动的时候，首先振动了你的咽管，在咽管里产生一个声音；然后，这咽管下面连着你的胸腔，再上就是我说的那几个腔体，那么，这声音出来是自然的声音。当你用一种方法或者是天才一出生就都有了，那各种共鸣都挂上了，它就会产生一个音柱、一个焦点，能够又好听，传得又远，又在声音之外产生一种由于共鸣而发生的泛音。

泛音是什么呢？比如一个钟，一敲“铛”，这没有泛音，必须是“铛——”敲了之后它所产生的共鸣余音还在震动还在响，这叫泛音。谁唱出来的泛音多，谁的音色就美就丰富。就好像这碗面只

搁点盐不好吃,还要来点什么佐料才好吃。泛音就是佐料。再作一个比喻。比如说我这儿有一台灯,声带就是这灯泡。之所以它亮,是因为有电,电就是咱们这气息。那么在这儿能够聚光照着我脸,比那灯泡更亮点,因为有个罩子。它有反射,有折射,使它出来的光更集中照在我脸上。就这么个道理,那就是我们唱歌的共鸣。

除了我刚讲的这些基本要素之外,还要根据你的自然条件,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避免喊。使劲喊就不会有优美的声音,就容易伤嗓子。第二,就按照你自己所追求的那个美感去品那个味。当然这不是说你爱唱什么就唱什么。如果说这歌音域特别宽你唱不了呢?我的意思是说一定要唱你喜欢的力所能及的歌。我们都讲,唱歌要深吸气。深吸气是什么意思呢?有人唱歌用胸呼吸(模仿抬肩抬胸)(笑),用胸呼吸有个缺点,脖子就僵了,它就不可能造成一种弹性和松弛。如果你用腹部呼吸,向下吸,上面不留痕迹,用细的小的气柱支持你的声音,必定更有把握,支持得更有弹性。就如同我现在拍一巴掌(只用双手在一起碰,)噗!噗!噗!拍不响。我必须是(拉开臂膀,)啪!啪!啪!大家看看,我都抡开了。唱歌也是这样,深的呼吸能很好地支持你的气息。

梅兰芳大师有一段名言:“别人都喜欢听我唱,其实最喜欢听我唱的是我自己,我在那儿品味的韵味进入我的创作状态。假如我自己都不喜欢,我还怎么能让别人喜欢呢?”这段话很深刻。你自己产生了美感,别人就会感觉到了。比如那一年,我唱《周总理,您在哪里》,唱完了之后拍了电影。等到在电影院放映的时候,我周围好多人都哭了。这靠什么呢?就是靠我自己脑子里认为周总理还没去世,他应该活在我们心中,他的音容笑貌就在那儿,虽死犹生。这种真实的感情首先感动了自己,然后感动了别人,这就是艺术。所以,我想我们喜欢唱歌的人,只要在脑子里把这个关系理解了,弄通了,你再追求你唱歌时的声音,就会产生更多的美感。

问:假如现在学的专业自己不感兴趣,怎么办?例如不爱好英

语,怎么办?

答:那就改行吧。——也不太容易?(笑)。我建议你最好还是爱学(笑)。因为英语是个手段。我们到基层去参观,看到有的企业老板,三十几岁,对他自己那个学科那么熟悉,对于市场那么熟悉,英语说得棒极了,自己打电脑,自己开车。这不就体现你的才能和价值吗?你干嘛要拒绝学英语呀?即使为了谋生,你也要多掌握一点谋生的手段。所以,人不能全从兴趣出发。我想现在你选择你的专业,这里面既有爱好问题,也有一个从实际出发用理性去指导你为一个目标而献身的问题。是不是这样的?!

问:请谈谈访问欧洲和美国的观感。

这几年我所见到的美国变化特别大。1993年的时候,我看见所有的中国人在美国都有点寄人篱下、捉襟见肘的感觉,大家整天都在打工啊、念书啊,都在拼搏。1997年我再去美国,看到很多美国支柱产业,像电子业和汽车业等都有很多中国的工程师。西部的硅谷,大批技术人员都是中国人。生活面貌有了大的改观,自然,人的精神状态也不一样了,令人高兴。

说到艺术,美国的艺术消费是多样化的。你今天在这儿看交响乐、歌剧,明儿可以到那边儿去DISCO厅,还有歌舞厅,什么都有,并行不悖,你可随意选择。所以我去美国和欧洲之后,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层次。层次就是吃大餐的时候,你也会吃;蹲在便道上喝豆腐脑儿时,也觉得很香甜。(笑)能上能下,这才叫层次。是不是呢?

从发展上来讲,中国发展的速度比美国更快。比如我见到的上海、深圳、大连、青岛、广州,还有广东的那几个“小龙”,实在发展得太快了。像上海吧,几年不见,真现代化,变化真快呀。所以有人说,赶快到欧洲和美国那些发达国家去看看吧,等再过些年去就可能觉得:哎,还不如我们这儿呢?

美国历史短、文化浅,就花钱买文化。一个美国老板到英国去旅游,看到有座石头砌的桥特别漂亮,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

现在市政特别困难要卖掉,240 万英镑,谁买归谁。他一下把钱交了,编了号之后把这桥运到美国去了,建立在亚利桑那州一个城市,成为美国一个景点,叫伦敦桥。这就是美国,就这样搞文化建设。

问:人要不断发展所必须具备的是什么素质?什么是最基础的?

答:大家知道,《论语》一开始的一句话是什么?“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所以孔子的学问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学习,学你有用的东西和吸收那些并不直接有用但是能丰富自己的东西,就是要树立一种终身学习的观念。就我个人来说吧,小时候没念过多少书,也没有学历,如果我不学,不多听,不多积累,我什么也不会,什么也没有。可是在我周围有些人生活环境很好,小学中学大学留洋,名牌大学,名教授的门生,可还是有个别人一事无成,非常平庸。我想其中有个原因,就是他们背了个包袱:我是名牌大学的,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我是如何如何……这就束缚了自己,不能做到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

所以,我要说,人是非常渺小的,而人又是非常伟大的。伟大的是你不白活一世,你因为对于别人有用而体现自己的价值,我们大家都在这个意义上伟大。相反,如果一个人只会想自己,而对于别人没有任何好的作用,别人一定都不会理他了,他必然会苦恼。这就是渺小的。另外,一个人的渺小还表现在:无论你有么大的作为,也比不上人类所创造的文化,那是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东西。你是非常渺小的,因此你不学习你就失去了人活着的最基本的意义。

北京轻工业学院美育教研室供稿

录音整理:邱楠楠、刘婷

刘震云 著名作家

永恒的家园与我笔耕的领地 ——文学是什么及我所从事的文学

[2000 年 10 月在东南大学演讲]

江苏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产生过许多伟大的作家和著名的学者。他们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起过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今天非常高兴能到著名的东南大学来演讲,来向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学习。东南大学的前身是中央大学,在这个学校出现过像吴健雄、梁漱溟等优秀的人物。今天我主要谈两个问题:文学是什么和我从事的文学。说得文一点,也就是永恒的家园与我笔耕的领地。

下面先谈第一个问题。

文学在日常生活中是非常不重要的,因为它只是我们从事正常的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之外的一种消遣。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凡是从事文学的人都非常贫困,不管是屈原,还是李白,还是杜甫,还是曹雪芹,物质上的贫困和他们后来精神上的不朽形成强烈的反差。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连喝酒的钱都没有。但我想在曹雪芹先生生活的那个年代里,比他地位高的人数不胜数,就更不用说当时的大臣、皇上。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在皇上、大臣的眼里,曹雪芹像一个蚂蚁,他是不重要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即几百年之后看,我们已经忘了当时的皇上是谁,大臣是谁,但是我们仍然知道有曹雪芹。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为什么要看

《红楼梦》？我们为什么要尊重曹雪芹？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人在日常生活中存在非常大的恐惧，对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容易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一种差错，这种差错将给我们展现什么样的岔路，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我觉得这种恐惧最根本的源头就是生和死。我们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他对这个世界的治理和改造都做出了丰功伟绩，但是他对自我的时间永远无法把握。我们时常从电视上看到一些非常伟大的人去世了，我们对他们的去世非常的悲伤，但是我们留不住他们的生命。不但现在的许多伟大的人物去世了，而且大清王朝的许多人物也去世了，比如曹雪芹先生时候的皇上、大臣，包括曹雪芹先生本人。但是直到现在还有几个大清王朝的人没有死，还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什么时候想再见到他们，他们都可以走到我们的面前。这些人是谁呢？就是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袭人、晴雯，当然还有贾琏。这就非常地让人深思，也让人恐惧，因为文学它可以把一个时间固定在一个地方，我们无论什么时候看到贾宝玉、林黛玉，都是那么青春妩媚，那么的栩栩如生，薛宝钗非常的大度，林黛玉非常的小心眼，还有晴雯、袭人，她们好像我们的朋友，给我们演示着当时的悲欢离合。我觉得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和它存在的意义。它把我们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梦想通过文学作品给我们实现了，它就是要留住时间。我觉得曹雪芹先生是我们民族在汉语写作中做过卓越贡献的一个艺术大师。他在《红楼梦》中进行了那么多的情感投入和精神思考，比如他在《红楼梦》中有几个关系都探讨得非常深入。

第一，大和小的关系：大处着眼，小处落笔。他写的是大红大绿的东西，但是他入笔的地方都是从最细微的生活琐事开始：怎么吃饭，怎么睡觉，怎么过元宵节，怎么过生日，又怎么过中秋节，他从天上写到了地下，又从地下写到了人间。他的起笔就非常不寻常，他明明要写人，但并不从人写起，文章一开始写的是一块石头和一朵鲜花的对话。

第二,他在《红楼梦》中探讨了远和近的问题。《红楼梦》中肯定有一个他的理想人物,这个人物就是贾宝玉。他身边围满了女孩子。但是我们从曹雪芹的作品中可以发现,贾宝玉的身边是围着很多女孩子,他跟每一个女孩子都非常地要好,他见到姐姐就忘了妹妹,见了妹妹就忘了姐姐,他离这些人非常的近,但他又离这些人非常的远。他越是离这些人近,就越是离这些人非常的远,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他真心爱的人,包括林黛玉。他和凤姐一块儿上坟,走到农村,看到农村一个女孩子在纺棉花,他走了那么远还从马车上回头看这个女孩子。我觉得贾宝玉在这个时候是非常悲凉的。有时候我们投入我们自己的感情来理解这个人,其结果往往不是作者原意。比如另外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孔丘。孔子有一句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到现在我们理解为一种非常兴奋的事情,就是朋友从远方来,感到非常的高兴。其实如果我们想一想孔子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他当然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但他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下——如果他有地位的话,他就不会四处流浪,周游列国找不到一个知心的统治者。当贵族向他瞟过来一个眼神的时候,他感到非常的兴奋和惊吓。他妻子生孩子的时候,好像是鲁国的一个大臣或者什么人说:反正别人家送来的,也吃不完,搁在家里臭了也是臭了,送给孔子一条鱼吧。孔子捧着这条鱼,心潮难平,说,我们生了一个孩子,贵族还惦记着我们,那就管我们的孩子叫孔鲤吧——因为送来的是鲤鱼。这样一个人说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样的一句话,那他的心情肯定不是兴奋,而是一种非常悲凉的体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们身边围满了朋友,我们有什么心里话,有什么烦恼,通过身边的朋友,我们可以发泄出去。这个时候从远方来了一个人,我们觉得他讨厌吗?我们的心里话已经对我们身边的人说完了,远方来了一个人,我们觉得他是多余的。而正是因为身边没有可说话的人,突然从远方来了一个人,孔子才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其实远方来的这个人是不是他的朋友还难说,但是他这句话

对他周围的人与环境充满了谴责。所以贾宝玉身边就是这样的。他离这些女孩子越近,他的心就离她们越远。

第三,曹雪芹先生在《红楼梦》里边还探讨了一个对我们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清洁和肮脏的关系。贾宝玉生活在这样一个富贵人家里,每天都要洗澡,每天睡觉前的时候都要熏香,而且是跟丫鬟一块睡。他日常的生活就是这么富贵和一尘不染,就是这么体面,但是曹雪芹先生把贾宝玉最后的出路安排为让世界上两个外表最肮脏的人把他带走——一个是秃头和尚,一个是瘸腿道士。我觉得曹雪芹先生对这个世界看得非常的透,也非常的悲凉。

另外有一个现代文学的大师钱钟书先生。钱先生的《围城》是一本非常好的小说,《围城》里边钱先生有些语言是非常刻薄的。他说,有鸡的地方粪多,有女人的地方笑多。我觉得钱先生对世界的理解在某些细节上也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高度。他在作品中曾经写过这样一个细节:一群穷困潦倒的人要从上海到内地的一所大学去讲课,走到半路已经弹尽粮绝,没有钱了,于是就在一个小镇上停下来。那时还带了一个女孩子,这女孩子叫孙柔嘉,生病了,而且由于没有钱,就只租了一个房间,男女混居,跟主人公方鸿渐隔着一道布帘子。半夜的时候,方鸿渐非常注意这个隔帘子的女孩的动静,他发现她发烧,说胡话,好像突然被梦魇魇住了似的。方鸿渐就叫醒她,说:“你醒醒,你做什么梦了?”孙柔嘉就告诉他说:“我梦见有个小孩的手,他一直在推我。”然后方鸿渐说:“奇怪啊,我也梦了有个小孩在推我,而且也边推边说:‘不要压着我的红棉袄。’”第二天早晨,由于这一惊吓,孙柔嘉小姐出了一身香汗,感冒好了。两个人一块到旅馆的外边散步,这时才发现这旅馆建在一座乱坟岗上。(过去乱坟岗扔的尸体有两类:一类是被杀头的人,没有人收尸。还有一种人由于当时不懂计划生育,医疗条件差,生了很多孩子,这些孩子生出来不一定都能存活下来,有死掉的,死掉的孩子是不能入自家的祖坟的,必须扔在乱坟岗上。)这时孙柔嘉说:“你说也奇怪,这孩子已经死了那么多年,我们在梦里碰

见他,他的手怎么还是那么小?”这时候,方鸿渐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觉得说出了钱钟书先生对文学的理解和文学的真谛。方鸿渐说:“不但是孩子,就是我们多年不见的朋友,什么时候我们想起他,他在我们眼前依然是风采伉人。”我觉得这就是文学之所以存在,并能与时间进行对抗,且能够在我们心中站得住脚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有孔子似的悲凉和感觉身边没有朋友、特别孤独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来,还有文学。

接着我再用一段时间讲讲第二个问题:我所从事的文学。

(一)第一次投稿。我开始创作是1982年。1982年,我24岁,在学校开始学习写作。当时我们学校已经有两位非常有名气的同学,他们是陈建功和黄蓓佳。我记得当时我第一次投稿,当然不敢往大的刊物投,就投到当时我们学校学生自己办的一个刊物《未名湖》。投到《未名湖》后,过了两天,有一个人告诉我说:“很好,但是要修改,过两天编辑找你谈。”这个编辑就是和陈建功、黄蓓佳一个班的,上课时我老爱坐在她背后的那个女孩。我听到这个消息有双重的兴奋。(笑)我问什么时候谈,她说明天晚上;我问在哪儿谈,她说在你宿舍。我当时觉得很好。第二天,到了晚上我就观察屋子里其他五位同志的眼神,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离开宿舍。直到七点半,走了四个,留下一个,也不知他在那儿磨蹭什么。我说你不去图书馆啊?他说去倒去,但是现在不去。(笑)最后,大概7点55分他终于走了。(笑)8点,女孩来了。在这之前我花了两毛钱在我们学校的小卖铺买了一袋茶叶(在这之前,我没有喝过茶叶水)。因为当时我觉得袋茶——就是一根线吊着的那种茶——是世界上最高级的茶(20年后,我知道那是世界上最差的茶,因为里面全是茶末子),所以就买了一袋那种茶,把我的杯子洗得非常干净。那位编辑来了后,我就给她泡茶。她说:“还喝茶呀?”我说:“喝吧,反正整天不都这么喝嘛!”(笑)她喝了我的茶就说:“这篇小说好的地方就不说了,我们着重说一说它的许多欠缺的地方。”我说说吧。我记得她好像说了十点,说:“你按照这十

点好好地改一改,再拿给我看看。”她出门以后,我把十点全忘了,因为我一直在端详她喝过茶的我的杯子。(笑)我就想:别糙蛋了,你说的是什么呀。然后过了几天,我什么都没改,把稿子原封不动地交给了她——在这之前,有一件特别遗憾的事,她进门的时候,我问了一句话:“吃了吗?”她说,吃了。我觉得这句话也是使我心情特别别扭的一个原因。因为这是乡下的问话——三天之后我又碰到了她。我说:“我按照你说的十点做了修改,改得怎么样?”她说改得很好——因为上午接到的条子很多,同学都让我谈一谈开始尴尬的事,我也就谈一谈。

(二)与我无缘的“改革文学”。当然接下来我也进行了一些创作,但我觉得这些创作都非常不成功,而且可以说是处在一种摸索和学习的阶段。因为当时在社会上处于潮头的作家是王蒙先生、李国文先生、蒋子龙先生,他们在写改革的文学,就是《乔厂长上任记》之类的。看到他们写改革,我也想写改革,但是最后我发现我的写作,不管是工厂还是学校,还是机关,全被这些大作家改革过了,没有给我留下一点插脚的余地。

(三)令我幡然心动的乡情。后来,我分到单位开始工作,当时我的创作非常苦恼。在我苦恼的过程中,有一个转机来临,这个转机是因为我的一个乡下朋友来看我。因为我当时刚毕业,住宿条件很差,这位朋友在我这儿只呆了一天,晚上他就悄悄地走了。他走的时候给我留了一张便条,这张便条放在他带来的一个麻袋上,他说:“来的时候,没什么好的带给你,就给你带一袋花生。花生的下半部分是生的,你可以剥一剥,然后在锅里煮着吃;上半部分是你嫂子给炒好的——用沙子给你炒好的。你吃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塑料袋打开,抓出来一把,然后赶紧把塑料袋系好,这样的话,花生才不绵。”唉呀,他走了之后,我心里特别难受,我想起了跟这位朋友一块相处的时光。

我是15岁当兵,在这之前我是一个乡村的孩子,由我的外祖母养大的。我的外祖母不能生育,我母亲是她抱养的。我母亲的

父母死得非常早。但据我母亲跟我说,我早逝的外祖母在乡村是一个非常体面的女人,她临死前,她的大女儿,就是我的大姨,有非常沉重的心理压力。据我娘讲,我外祖母在行将就木的时候做了一件非常有气魄的事。当时,我大姨要生孩子,大姨的婆家就说她生孩子的时候,就不要通知我外祖母了,因为她娘家穷,而且我外祖母也快死了。谁料这个非常体面据我母亲说还长得很漂亮的农村妇女,突然这一天从镇里雇来一辆驴子大车——这个时候据说她已经浮肿,她从四更起来开始梳洗打扮,打扮得非常体面;又从大户人家借来一件非常体面的褂子穿上,然后赶着驴子大车,停在十几里外我大姨家的门前,一下子就把大姨的婆家给震住了。据说她非常勇敢地从大车上下来,以坚毅的余力不要任何人搀扶,一步一步走进了大姨的婆家,向他们做出了一个非常庄严的示威。

据我娘讲,她在完成这一壮举之后很快就死了。她死的时候,周围围着一圈的孩子。死了,孩子一哭,又回来了;又死了,一哭,又哭回来了。最后这个老太太可能实在受不了了,就告诉她的女儿:“下次我再走的时候,就不要叫娘。我本来身子特别地重,然后我在梦里走啊走,走到一个河边。河边的草和花都非常好,我坐在那儿洗了一个脸,觉得特别轻松。但这个时候,我突然听到我的小儿女在喊我。我想我还没给他们做饭呢,于是我就回来了。一回来后,我就躺在这儿,浑身又是这么的沉重。下次,我再走的时候就别再喊我了。”我觉得周围的孩子在这个时候非常有大家风度,下次他们娘走的时候,他们果然就没有哭喊,他们的娘就走了。后来,我母亲就被现在的外祖母抱回来养大了。据我这边的外祖母说,她这边也是非常体面的人家。这边的外祖父一辈子是给地主打长工为生的,据说他们当时做的活在周围的村庄非常出名,所以雇他们的东家就特别多。我是在这样一位老太太的呵护下长大的,长大后就开始当兵,当兵回来复习了一段时间就考大学。这个朋友到北京带的这袋花生就使我想起当时在塔铺的时光。我记得当时我在塔铺的时候是20岁,跟一帮复习班的同学在一块儿复

习、玩耍。有一天晚上,我拿着书本到河边去散步,散步的时候碰到一个农村的女孩用耙子在那里扒草。但当我散步回来的时候,发现她不扒草了。她突然在河边拿出镜子在梳洗和打扮自己。这时候夕阳的余光正打在她的脸上,连她脸上的绒毛都可以看到,我觉得这个景象非常非常的美。还有一次晚上我散步,站在乡村的蒲岗上,放学的孩子背对着我往他们自己的村庄里面走。有两个女同学的辫子非常长,在暮色里晃啊晃地就看不见了。我觉得这样一段生活我特别想写。它没有改革,但我热爱它。最后我开始写《塔铺》。从我开始写作到写《塔铺》这个过程,可能有八年的时间,八年摸索的时间。

(四)新兵连里的故事。《新兵连》主要是想悼念一个朋友。我这个朋友跟我一块儿去当兵,他对军营的生活特别地不习惯,很早就想从军营回家。他回家的办法非常独特:他自己把领章和帽徽一撕,打个车票就回去了。当时我们当兵是在一个靠近外蒙的地方。他这事弄得整个团都非常紧张,以为这个朋友叛逃了——因为当时我们跟苏联和蒙古的关系非常紧张,所以半夜的时候我们一团的人站在边境线上,我们的团长走在列兵线的前边,说:“他要是投降,就让他投降;他要是顽抗,就让他玩命。”这个时候听到许多子弹上膛的声音。最后发现他不是叛变而是逃回了家乡。我复员的时候,曾经去看过他一次。我一进村,就发现整个村子的人都说他有神经病。神经病最大的表现就是他不到地里干活,买了一整套的《马恩全集》在家里攻读。整个村子的人都说他的这种举动是疯了。在一个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度里,一个攻读马列的人被认为是疯子。当我考上大学的时候,我发现他真的病了。他本来谈了一个对象,他疯了,这个对象就跟了另外一个人。我这位朋友非常的勇敢,就把另外一个给干掉了。本来他杀了人应该枪毙,可是当公安局审讯他的时候,发现他真的疯了,因为审讯员提出的问题,他回答的时候审讯员听不懂。因为他说的全是《资本论》上的话。《新兵连》当时主要是为了悼念这样一位朋友。

写了《塔铺》和《新兵连》以后,我才刚悟出了一点文学的道理,接着又写了《一地鸡毛》、《单位》、《官场》,还有像《故乡田野黄花》和《故乡乡土流传》。

(五)平常人平常事。当写《一地鸡毛》的时候,我最大的心理疑问,就是不知道在当地的人、在街上的人,他们这种重复的生活的支撑点是什么?有时候我觉得非常的迷茫:当我们站在大街上的时候,作为一个生命的个体,每一个人跟另外的人都不一样;但当我们上班或下班,看到自行车人流的时候有一样东西非常相同,那就是表情。他们以相同的表情骑着自行车,往前走。他们今天知道明天要干什么,明天知道后天要干什么。他们的日子是重复的、琐碎的,那么是什么支撑着他们的生命力,把这非常琐碎的、重复的生活过得那么有意义呢?因为从生命学的角度来讲,一个生命体必须要得到社会价值的承认才能够生存下去,但95%的人都不可能每天去机场迎接外国元首,也不可能哪个大楼落成了让他们去剪彩。他每天起来所要做的就是洗脸、刷牙,然后上班、下班,然后在单位里发生种种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但我最后在一个地方发现了他们生命的支撑点,那就是菜市场。我们可以发现在菜市场买菜和卖菜的人情绪都非常投入,一斤菠菜或一斤韭菜,你说是1毛7,我一定要还到1毛3,这个差价是4分钱,如果有4分钱的硬币丢在地上也没人去捡,但一到菜市场,你就会看到两个人锱铢必较,毫厘必争,有时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他锱铢必较、毫厘必争所得到的4分钱的肯定超过了4分钱本身。当他拿着1毛3分钱的韭菜往家走的时候,我觉得他战胜的不是韭菜,也不是卖韭菜的贩子,而是整个世界。这个时候他就跟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开会的时候,哪个国家的总统或是首相从这个会议上拿回去一揽子计划没有什么区别。当我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因为我们的菜市场随处可见。正是当我从菜市场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我开始写《一地鸡毛》。当然这是在社会上受支配地位的95%的人的这种日常生活

状态,而且我对有些知识分子因为没有评上职称而跳楼自杀这样的事,觉得很可理解,因为这时候职称的意义肯定超过了职称本身。

(六)官场人生。除了写 95% 的人的这种日常生活的状态,另外 5% 的人的生活状态我也没有给他们拉下,就写了一些官场、官员这样一些东西,像《回顾 1942》。这 5% 的人在生活中整天处于支配人的地位。他每天吃得很好,睡得很好,每天上班、下班的任务就是支配别人。但是我又发现这些人也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平易近人。这平易近人的最大的表现,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发现他们身处高位,整天过着那么体面的生活,但当他们之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时候,他们所采取的策略和斗争的方法,和我们村里边一个妇女丢了一只鸡所采取的那种叫骂的策略和斗争的方法没有任何区别。当我发现这 5% 的人这么的平易近人,我发现天空中又撒下来另外一缕阳光。正是在这两缕阳光的支撑下,我完成了 1991 年之前的创作,当然这种创作过程是非常的幼稚,都是处于一种学习的阶段。

(七)走向心理领域。1991 年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对以前的创作非常不满意的感觉,就是我发现我对于人的时间的认识是非常不准确的。因为在以前的创作中主要写的是张、王、李、赵白天的生活,他们清晨起来怎么刷牙、怎么洗脸、怎么到菜市场买菜、怎么拿着 1 毛 3 的韭菜往家走。但是我最后发现张、王、李、赵在买菜、洗脸、刷牙的时候,他们的脑子里还飞旋着许多别的东西,就好像我们看到这种熙熙攘攘的自行车的车流一样。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他们骑着自行车从起点到终点呢?过去我写的只是他们骑自行车的过程。这过程中他们肯定想了许多与自行车无关的事。今天上午我还举了一个例子,比如:一个农民在日里劳作的时候,过去我们就写他在日里劳作,他在日里一下子劳作五个小时,这五个小时他思绪里翻腾的是什麼,全被忽略掉了。我想他在劳作的同时脑子里肯定产生了许多许多别的想法。比如村子里有一个寡

妇。这个寡妇原来跟谁好,现在又要跟谁好。在想这个的时候他的思想肯定非常投入。在想完这个的时候,他肯定又想到镇里裁缝,这个裁缝长得也非常的漂亮。想完这个裁缝又可能想到别的什么什么,甚至想到电影里的明星。当他背上锄头回家的时候,他老婆问他:“你今天干嘛了?”他回答说:“锄地。”过去我们觉得他就是在锄地,其实在锄地的过程中有很大的精神飞升。这个精神飞升在那个时间段中要占到60%—70%,而他想到锄地只能是占到30%—40%。我觉得在过去的创作中我对时间的分配非常地不合理。有时候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还会产生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我们突然听到一种声音,我们好像对这种声音特别的熟悉,似乎多年之前曾经听说过,但是具体在什么地方听到过想不起来。我们曾经见到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可能是个花杆的铅笔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好像这个东西多年以前我们也曾经见过,具体在什么地方见过我们也想不起来。我们还曾经到过过一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觉得特别的熟悉,包括它的气氛,青草发出来的气味,周围的山山水水,我们好像曾经到过这里,但是其实我们又没有到过这里。《故乡面和花朵》在北京发行了之后,还包括原来在刊物上登载过的一些部分,有评论家说里面用了许多现代派的手法,接着就讨论这种现代派手法跟西方文学的关系。其实我觉得有些现代派的手法主要也不是受西方文学的影响,而是直接从生活中得到的启发。我觉得还有一种我们不能忽略的现象就是晚上。不管这人是多么的高贵还是多么的贫贱,白天他们的生活状态可能非常的不一样,他们吃的饭菜有很大的区别,他们每天的工作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到了晚上,他们非常一样,就是他们都在进行着伟大的艺术创造。我们白天的生活节奏是非常固定的,起床、上课、下课、吃饭,但到了晚上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时间的节奏不是这样的,非常的现代派,非常的意识流,刚才你在这个场景,转眼之间你又在另一个场景;刚刚你面前站着这样的一个人,转眼之间又是另外一个人。也许白天我们刚到一幢大楼或者一座商场,但晚上在梦里我们再看

到这幢大楼或商场,它已经烧焦了。又或者梦里边我们正在梳洗,从下水道里突然钻出来一只蛤蟆,这只蛤蟆转眼间又顺着下水道下去了。这种艺术的创造性我觉得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存在。这种存在对创作的启发比西方文学要大得多。还有,我们可以在梦里见到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永远也见不到的亲人。正是因为觉得以前的创作对时间的分配不合理,所以开始放下 30%—40%,我们一块来谈一谈 60% 和 70%,这样就有了《故乡面和花朵》。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东南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推荐

经济与社会

张培刚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 教授

理解中国 需十分谨慎

[2000 年在香港大学演讲]

主持者张五常：今天我很高兴地向大家介绍张培刚教授。张培刚教授早年毕业于武汉大学，那时他才 20 岁出头。记录显示他才华出众。随后他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工作了一段时间。大约在 27 岁左右（1940 年），他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学者，进入哈佛大学。他在哈佛一直学习到 1945 年，33 岁时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威尔士奖金。他在哈佛的老师是熊彼特、张伯伦、汉森、哈伯勒、列昂捷夫。我刚才还查到一些著名学者，这些学者都毕业于哈佛大学，并且都获得了大卫·威尔士奖，他们是张伯伦、雅可布·维纳、伯蒂·俄林、罗伯特·特里芬、保罗·萨缪尔森、罗伊·麦斯勒、罗伯特·索洛、彼特·肯伦、莱斯特·瑟罗。他们都非常有名。所以对中国学者来说，那时能获得威尔士奖是不容易的。现在请张培刚教授给我们作报告。

张培刚：我首先要感谢张五常教授和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为我提供了这次很好的机会，来这里和大家见面，讨论学术问题。

张五常教授我早就听说过,但一直没有见过面。1999年5月,他访问我们学校,我们一见如故,很有相见恨晚之感。此后我们成为很熟的朋友。当然,我比他年长22岁。我们两个人都姓张,这是一同;第二,他刚才很友好地列举了所有得哈佛大学威尔士奖金的著名学者,我有幸也得到了1946—1947年的威尔士奖金。而张五常教授得到了1967年芝加哥大学的著名奖金(即芝大政治经济学博士后奖金)。我比他大20岁多一点,他比我晚20年获奖,这是第二同;第三个相同是,我们都是读书人的性格,在中国就是士大夫的性格。我们的兴趣和性格在很多方面相同,所以才能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

为什么要讲这么一个题目呢?因为一般来说,要经济发展,要实行改革,经济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作为一个大国,就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而且区域差异很大,现在又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光谈经济因素就非常不够了。中国的复杂情况决定了她所进行的经济改革——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相当艰难的过程。因此,单纯地用经济因素来解释这一过程中的经济现象,有很多方面就解释不通,或不能完全解释通。所以要借助非经济因素,综合到一起来考察,才能把中国的许多问题弄明白。如何实行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使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兴旺起来,就如同一个人生了病要好起来一样,首先要找医生看病,要摸清病因、病源,然后才能对症下药。经济问题,特别是经济改革问题也是一样,首先要搞清楚为什么以及是什么因素阻碍了经济发展。对于中国经济近百余年发展不起来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是不能完全用经济因素来解释的。我一向主张将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教育的等等各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当然这些因素有轻重之分),一起来解释经济现象,这样才能找到真正的病因。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悠久,而东西部的差异又非常悬殊,所以必须将经济因素和非经

济因素结合起来考察,因而叫综合考察。这样才有希望把中国的病因找出来,搞清楚。这就是我要讲非经济因素这样一个题目的原因。下面我想就三个主要方面来谈一谈。

一、历史因素

首先一个方面,我想谈一谈历史因素。

我以前把历史因素叫做历史的幽灵。我经常在考虑历史的幽灵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在这里,我也要向张五常教授和在座的诸位请教。有一个问题我想了十几年或许是二十多年:为什么中国和日本同是东亚国家,在上一个世纪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了,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其中原因安在?日本过去是向中国学习的,明治维新以前比中国还落后。后来,日本向西方学习。而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愈来愈受列强的欺侮。在这段时间日本却乘机起来了。今天我们在这里要搞清两个问题:第一,是什么因素影响中国几千年,特别是近两三百年的经济发展?尤其是民国以来的经济发展?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提到的,同处东亚的日本为什么能够乘机兴起,而中国却迟迟未能发展起来?

要想回答第一个问题,首先就要用历史分析的方法,从历史方面来考察,探根溯源,寻找历史幽灵。历史幽灵就是历史上主要阻碍我们发展的因素。就中国来说,中国历史悠久,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有三千多年。但中国历史上很强盛,到1368年明朝开始的时候,中国还很好。又过了一百多年以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就落后了。中国早就有指南针、印刷术,为什么从这时开始就不行了呢?特别是最近一两百年大大落后了呢?中国有三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一百多年受列强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加上解放后还有近30年“左”的倾向的干扰,所以我称之为“313”。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特点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解放后的前30年经济有发展,但牺牲也很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

失更大。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恐怕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有一个重大的原因,那就是土地制度改革的问题。西方在封建社会以后,通过文艺复兴,到产业革命,再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一步步发展。中国却一直徘徊在封建状态,后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也有资本主义的因素、但不能独立自主。中国的封建制度与西方的封建制度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厦门大学前校长王亚南教授研究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领主型的土地制度与西方的时间差不多,但中国地主型的土地制度时间比较长,比西方要长一千八百多年,所以我们的封建制度特别长。最近一个青年人写了一本书,他说这表明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很有生命力的。但我却认为,这也表明中国的封建制度对中国的整个经济发展造成了有害的影响。什么有害影响呢?主要就是它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体分析,也就是使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难得产生出来,同时也难得产生中产阶级。而要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和市场经济,中产阶级是一个重要因素。所以,中国的封建制度很有生命力,适应性很强,这一方面是它的优点,另一方面却也阻碍了整个经济的发展,这又成为它的弱点。这里,我特别强调土地制度改革。张五常教授的《佃农理论》也是研究土地制度和租佃制度的。我认为,中国的土地制度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解决。孙中山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这个主张很好,但却没有真正实现。我们大陆解放以后实行土地改革,这一步是正确的。这一步走了以后,农民的积极性很高。可惜,后来搞合作化运动,又搞人民公社,就把土地制度改革造成的积极性扼杀了。人民公社化就是吃大锅饭。大家一起去上工,上工就是磨洋工,没有生产积极性。这个制度是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发展的。我们是个农业国家,农业制度的好坏,关系整个经济的命脉。这就是解放后头 30 年,尽管农业生产每年还有一定的收成,但是发展很慢的原因。所以到 1978 年,邓小平的改革首先就是改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 年取消人民公社,因而农民的积极性大大地高涨起来。但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农民只有短期行为,

没有长远观点,掠夺性使用土地肥力,不愿在土地上进行投资。1988年我就提出来,农民之所以不愿在土地上进行投资,是因为这个土地还不属于他,不要说所有权,就是使用权也不属于他。因此我主张把所有权跟使用权分开。所有权叫田底权,使用权叫田面权。所有权可以归国家或归集体,但要把使用权商品化,可以转让,可以继承。现在进一步承包30年不变,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思想。不过每个农民承包的土地面积还是太小,问题还不算完全解决。说到这里,我想起那天我把张五常教授送给我的《中国经济革命》(1993)拿给他看,我在上面作了一些注解,说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与邓小平的观点不谋而合,我的观点与邓小平和他的观点又不谋而合。可谓一邓二张不谋而合!

其次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日本的明治维新为什么成功,中国的戊戌变法失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西方列强一开始就欺侮中国,而日本国家较小,资源又不丰富,所以西方列强没有把日本当作侵略的重点,日本就利用列强侵略中国的空隙机会发展起来了。而中国过去一直夜郎自大,外国人来了还要别人磕头,一直到鸦片战争打不赢了,才不得不屈辱求和、割地赔款。当权者自此就很怕外国人。另外一点,甲午战争失败使中国赔偿日本两亿两白银。日本把这笔钱拿去发展教育,所以后来日本的初级和中级教育非常发达。这对日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总的来说,外在的原因是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是首当其冲,日本则不大被他们重视,这是一方面。内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形成一个中产阶级,日本很早就产生了中产阶级。日本下级的武士道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再就主要是商人,还包括自由职业者如医生、律师、会计师等等。工业革命开始时,这些人就形成一个阶层。他们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再次,中国的戊戌变法失败,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还有一个原因是维新派的领袖人物问题。日本充分利用了维新人物。日本维新派的领袖如伊藤博文,跟我国翻译《国富论》的严复都留学英

国,学海军。但伊藤博文回国后受到重用,官至首相;而严复回来之后,没有被朝廷重用,只好个人搞翻译,先后翻译《原富》(即《国富论》)、《群学肄言》等名作,没有真正发挥其所长。中国维新派还有很多人物没有发挥作用,因为中国当时还不想真正地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和新的知识。尽管有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没有真正学习西学。所以科学技术与教育的问题,民主与法制的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明治维新成功和戊戌变法失败,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明治维新很现实,实事求是,拥护明治天皇,实行改革。可是我们的戊戌变法人物,改革精神可嘉,但却找错了依靠的对象,他们找到不掌实权的光绪皇帝,没有找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假如当时找慈禧太后,尽管她比较保守,但她基本上是同意维新派的改革主张的,她实行20%—30%的改革,比不当权的光绪皇帝答应实行90%或100%的改革都要有效果。而日本假如打倒了天皇,它能实现明治维新吗?戊戌变法就是走错了这一步,以致前功尽弃,有人杀头,有人出逃。所以我们希望青年人要有改革精神,但改革以前一定要弄清楚要依靠什么人,要革什么人的命,要革掉什么东西。

二、人口与地理的因素

第二个方面是人口与地理的因素。

人口因素不用多说。人口本来是社会进步的一个积极因素,但人口太多了,就成为一个负担。我是农村出来的,农村有两句话,我觉得是至理名言:人多好种田,人少好过年。人多好种田表明劳动力多,这是生产的观点;人少好过年则表明人太多了,在经济不太发展的情况下,每个人能够吃到的东西就少了,这是消费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就犯了错。只因错批一人,枉增三亿人。这也说明当政者对任何问题都要小心。对人口问题,我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把人口和资源这两个因

素都作为限制性的因素。另一方面,我把生产技术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看成是发动因素。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口是一个限制性的因素,所以我们国家实行节制生育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由于节制人口和经济发展,中国的人均寿命从解放初期的 35 岁,已提高到现在的 70 岁。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其次我想说一下地理因素。地理因素好像是一个死的因素,其实这个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刘易斯是用二元经济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当然也有道理,但是中国的问题特别复杂,二元经济还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经济问题,要用多元经济才能解释。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从西部到东部(或者从东部到西部)看一看。前几年,甚至现在,在云南西部和西藏一些地方还有刀耕火种,这就是原始社会的遗迹,所以那些地方生产非常落后。那些地方尽管在解放以后,生产和生活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改善,但耕作技术的改进不大。而在东部,比如上海,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几乎与发达国家的情况差不多。这说明中国的地域差别非常大。大致说起来,在空间上从西部到东部的发展,就好像是时间上从古到今的演变过程。这就是中国的多元经济的特点。因此,我们采取政策的时候,绝对不能一刀切,必须实事求是,有区别地对待。执政者一定注意到这一点。

三、政治因素

第三个方面,谈谈政治因素。

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我觉得任何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首先要保持一个社会的稳定。如果社会政治不稳定,一切的改革和一切的发展都谈不上。我们的国家为了保持社会政治的稳定,实行一些大家不一定喜欢的政策,或者有时候是难以理解的政策,经过研究之后是应该可以理解的。现在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试一步。所以我们改革的特点是:改革不是一下子完成的,而是走一

步看一步,有时快一些,多数时候是比较慢的;然后再摸一步走一步。对于一个大国这样做还是比较好的,也是必要的。稳定的政府可以减轻社会活动的交易费用。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改革时期实行开明的中央集权,还是合理的。比如说计划经济,虽然毛病很多,而且我国正在实行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但建国初期,如果不搞计划经济,中国的经济就很难得建成一个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体系。再比方说苏联,如果不实行计划经济,首先建立重工业体系,二次大战时就不可能抵抗希特勒的进攻。重工业的发展使苏联在战时能够一下子把汽车制造厂变成坦克制造厂。假如苏联不是实行计划经济,建不成强大的工业体系,希特勒早就打进莫斯科了。如果希特勒消灭了苏联,欧洲也就完了,整个世界的格局也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对很多问题,都要辩证地看待。比如中国,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一批老干部挨整,亲身尝一尝受委屈的滋味,恐怕也就难得有后来的平反冤假错案和改革开放。当然像“文化大革命”这种悲剧,不能再重演。计划经济在中国开始的时候,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种作用也是不能否认的。中国如果没有计划经济时期奠定的基础,也就难得有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没有计划经济建立起来的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即使引进了市场机制,也不能马上发挥作用。这里还要补充一句,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靠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作为依托的。这就使中国实现了第二次工业化。

最后说一点,经济发展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先导,而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进行文化教育体制的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是集中式的,当然许多人不赞成集中式的。但这种集中式在一定时期内还是有必要的。

问:您刚才讲得非常好,我们收获非常大。但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您讲到了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不能进步。现在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这么多年了,您觉得中国是不是走进了新的历史时期,是不是未

来与过去不一样,过去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是不是已经慢慢地不存在了呢?

答:我认为历史的幽灵消除了一部分,但还没有完全消除。

问:为什么西欧有产业革命,有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中国却长期没有呢?

答:这个问题很大。我个人认为,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受儒教影响太深,儒家思想的束缚过大。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刚才说过,中国的封建制度特别长。这说明儒家的思想对中国封建制度的巩固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在儒家思想中,商人是受重视的。谋利是不好的,故有君子总是言义而不言利,小人总是见利而忘义之说。轻商的思想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而这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兴起又具有很大的束缚作用。等到中国的资本主义快要兴起的时候,西方列强的入侵又使中国失去了兴起的机会。在发展经济学中,我曾说过,我们现在的发展与发达国家过去的发展不同,在17、18世纪时,各国都没有发展,少数国家先发展起来了;现在世界上已存在一批发达国家,穷国要想发展起来,非常困难。当然现在的发展也有有利的一面,比如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可以利用和借鉴,不过,在发达国家的遏制下,应用起来代价也很大。所以,穷国仍然受到富国的欺侮,各国并没有真正平等。现在的发展就是要做到各国真正平等。回过头来说,儒家思想统治中国几千年,有其优越之处,但它对市场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非常明显。比如,就我个人来说,我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学习工商管理,到哈佛后先读了一年半的工商管理,还有半年就可以拿工商管理硕士(MBA),但我没有拿,因为我不想学成后出去做生意赚钱。我转到经济系,重新读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研究农业国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我的很多好朋友也不想赚钱,这说明传统文化中的言义而不言利的思想对我们影响很大。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推荐

张卫东整理

曾宪梓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香港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

勤俭与诚信

[1997 年 10 月在浙江大学演讲]

我出生在广东梅县的一个贫穷的家庭里面。4 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留下了妈妈和我们兄弟两个,过的是非常贫困的生活。解放初期评成分的时候,我们评的是雇农。就是没有田地,什么也没有,一无所有。我们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

由于苦,我们穷苦的孩子很早就去从事各方面的劳动工作。这些劳动工作对我们个人的今后的发展奠定了一个不怕苦、也挨得起苦的精神。

我小学读完了以后,就没有机会再读书了。解放后,我利用了我们国家的免费教育、助学金的发放,有机会读完了中学和大学。

1961 年,我从中山大学毕业,那个时候已经 27 岁了,年龄比较大了。读书的时候,还算可以,在老师的教导下,有了比较好的成绩;毕业以后在农科院工作了一年半。

1963 年 5 月 31 日,我离开了祖国,经过香港,到了泰国。当我通过罗湖桥的时候,回望祖国,我内心感到很内疚:祖国把我培养成长,我现在就走了?所以说,当时我就暗地里下决心:曾宪梓啊,你是个穷苦孩子,是共产党、新中国把你栽培成长的,你到了外面,要把大学生的架子放下来,只要不偷、不抢、不骗,什么事、什么劳动,都得努力去干,希望你能有成功的一天,有机会回报祖国。

(掌声)

1968年初,我带着家人,定居香港,开创了我们的一个小作坊。因为我们一家6口人,妈妈、太太、三个孩子,还有我自己。如果我出去打工,我养不活我们的家人,怎么办呢?当我在泰国、香港两地来回跑的时候,就看见有厂家做领带。因为帮助我哥哥做过领带,我懂得做领带这一行,定居香港以后,就研究、发展领带这一行业,以养活我们一家。那时,我们住在一个60平方米的地方,用4平方米的空间作为领带制作的工厂。一个小裁床,一个小烫床,一个国产的蝴蝶牌的小缝纫机,一把剪刀,一个尺子,一个烫斗,就开创了我的领带工业。

那是家庭手工业。我们开始带来了节余的6000元钱,就用这6000元钱开创了我们的一番事业。那个时候我们一无所有,什么事情都是自己亲自干。6000元钱用来做什么呢?买点布,买点毛衬,这样就开始了做领带。我每天要到街上去叫卖,一天至少要卖5打,就是60条,才能赚到50块钱。全家一月要1500块钱的开支,我每天赚50块钱就够了。每次出去的时候,我就持这个目的:今天卖不到5打,我就不回家,无论如何要在街上卖掉5打才回来。

在从业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自己就用毛笔字把“golden”、“line”两个字凑到一块,就组成了现在的“金利来”。就是这样的,你们都认得吧?!有了“金利来”,名字不错吧?!“金利”都来了,很有意思吧。(笑声)“金利来”这个名字,也为我们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前途。

这个日子不容易熬,如果一天赚不到50块钱,我们全家就要挨饿,孩子还要读书。这就逼得我要节省俭用,逼得我节省时间,加快速度,也造就了我勤快、勇敢、坚毅的性格!

有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喜欢‘6666’”?我说那是巧合,因为我用6000块钱,住在60平方米的地方,我们一家6口人,一天要卖60条领带才能养活我们一家。(笑声,掌声)

我做领带的时候,天天在研究,在香港研究,1973 年有基础的时候,我就跑到世界去研究。1973 年,我们夫妇一起去环游世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开拓见识和眼界的机会,这对我们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开始走新的路线,就是想走高档的路线。要走高档的路线怎么办?没有牌子,谈不上。那个时候,我就说,“金利来”这个好名字,我要把它发展成为世界名牌。我看,在市面上,都是外国的名牌,有时看起来挺心痛的,为什么就没有我们中国人的名牌?为什么就没有我们香港的名牌?所以,我就下定决心,希望我们中国人能够成功地创造中国文字的世界名牌。这也是个理想,我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经过多年的努力,“金利来”终于成为中文字的世界名牌!(掌声)

我看我们中国的同志们开创他们名牌的时候,都喜欢用外文。用洋文字来做名牌,在让顾客接受的情况下,这个看起来比较好。但是,要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呢,是要有自己的理想。“金利来”本身就抱着这种理想。在创造名牌的过程中,虽然吃了苦头,但最终还是成功了!

“金利来”本身的发展是我自己的一种理想追求,就是中国人希望用自己中国人的文字来创造一个世界名牌。这个名牌不但香港人接受了,我们中国人接受了,全世界的人们也接受了。而我是根据什么来创造我的事业,发展我的事业的呢?是怎么做的呢?我在这里提出四个字,希望与大家共同探讨。这四个字是:勤、俭、诚、信。这是我一生追寻的创业、发展、做人、处事,对待国家、人民的写照,我是按照这四个字去做的。

勤:勤劳,能够生产物质,创造财富。

节:节俭,就是省吃俭用,只有节俭能够节约资金。

诚:诚实。34 年前我到香港的时候,一个朋友也没有,不认得一个朋友,但现在有无数朋友。诚实呢,能交上许多朋友。做事业,做买卖也好,做什么事情都好,社会活动也好,政治活动也好,经济活动也好,没有朋友是不行的,没有朋友的支持是不会成功

的。诚实能广交朋友。

信：守信，守信用，不但是个人的生命，还是事业的生命。现在我把守信当成是事业的生命。没有信用，就没有生命。言而无信，不足以立足社会；言而必行，能使大家信服你。

我办的中学也是以“勤、俭、诚、信”作为校训的。现在有无数的同学给我写信，他们说这四个字很有用。我们曾宪梓中学的高级中学，去年才开始有毕业生考大学。我们学校是一个新学校，老师不是最好的，同学入校成绩不是最好的，但是他们竟然能够百分之百考上大学，这就是一种精神。精神的鼓励，给他们创造了美好的前景。今年考大学，92.6%的人考上了大学。这么一个新办的高级中学，能够取得那么好的成绩，而且去年的理科状元就在我们学校，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在一个正常普通条件下，他有一种精神力量。他们所说，曾先生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学校，我们要为曾先生的“勤俭诚信”做出实践。他们努力以后，都实现了。这是我人生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为教育事业做出一点奉献以后，得到了最满意的一个答复。

很多人不了解我，他们说我喜欢名誉，现在名誉不是很多吗？我说，荣誉不是去争的，而是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做的。荣誉，是人民群众给我们的，我要把它很好地对待。但这是有很大压力的，也是个担子。不要以为你拿到荣誉就很高兴，可以显耀了。荣誉不是用来显耀的，是用来为大家服务的。我之所以能够接受荣誉，那我就要下决心去支持授予我荣誉的单位或人民。（掌声）

我并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但是我有指导思想，就是，我是新中国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在穷困中成长起来的，没有祖国的栽培，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天的曾宪梓。这是我的思想根源。过去、现在和今后，我所做的一切，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一个：终身回报祖国。（掌声）

回报祖国有多种形式。我在香港生活了30多年，我那时候就规定自己，要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以不同的方式，像大家一样，为

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因为我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所以有这个任务,有这个责任。那么坚持办学,坚持做公益事业,这只是回报祖国的一种形式。

1977年我回到家乡后,我就开始捐赠。我每年给自己有个任务。回报嘛,不能说你今年想回报就回报,明年不想回报就不回报,行吗?不行。我的任务是根据我财产的增长来决定。那时候,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回去看到破破烂烂的母校,我就建了一座教学楼。县政府给我鼓励,要立上我的名字,我说不要立名字了,这是我对母校的回报。他说,不行。你要带好头,要带动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多做好事,多关心国家,这个教学大楼一定要用先生的名字命名。要我带头,我就答应了。我在他们的鼓励之下,开始做更多的工作,带头鼓励港澳同胞、海外华侨都回到家乡捐资办学,办公益事业。不要忘了祖国的教导,我牢记在心,不敢怠慢,也不敢忘记,要从我的言行中去体现。那时我就说每年拿100万出来吧,那时我的资本才几千万呀。后来资本多了一点就捐300万啦,又多了一点就500万啦,财产越来越多了,就1000万啦,明年就是2000万啦。这是我自己给我的任务,而且这个任务是公开宣布的。你偷偷摸摸地暗中想,不敢讲,就没有人民群众对你的监督。(笑声,掌声)我讲了,就得到了监督,不但我自己监督自己,我太太要监督我,还有人民群众监督我,看曾先生明年2000万是不是完成了。

这个回报祖国,要有个任务,不是想就做,不想就不做。当然我不是宣传我自己。这样,我每年捐的钱愈来愈多。但我捐出的钱多,回来的钱也越多。我从几千万到现在的几十亿,那不是多了吗?钱没有少。我劝我们的老板,我说你们关心公益事业不会错的,做好事是有好报的。多捐钱,钱会回来的,这一点没有错。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要努力去做,而且这是最好的享受。我去了某个地方,这个大厦又是我捐赠的,我还没有死,我自己就看到了;我看到我捐赠的中学,他们都有很好的成绩,这是最好的享受。花天

酒地才是享受？那不对。

一个人没有钱要去挣钱,要正当地去挣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要不择手段,一定要用正当的手段去取得你的劳动所得。但是有了钱以后,怎么办?怎么做?那就要思考啦!有了钱,钱可以使人做更多的好事,钱也可以使人堕落,那就要自己选择了。

我认为,人生在这个社会上是短短的几十年,一转眼就不见了。我们要在有生之年,珍惜有限的生命,在这有限的生命里,要尽自己的能力,能够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同学们,我的讲话如果大家有个参考价值,在你们的人生旅途中能够起点作用,我认为这是我回报祖国的另一种形式。我参加香港的各种社会活动,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发表观点,也是回报祖国的另一种形式。

我捐赠了不少学校,不少桥梁、医院,我要赞扬我的爱人和孩子。我捐了那么多钱,到现在为止是4亿多元,爱人和孩子从来没有反对,而且很乐意支持我做的公益事业。

我在十几年前宣布过了,我的这个回报是终身的,只要“金利来”还在,曾宪梓不死,那我回报祖国就不会停止。

比一比,我们自己事业发展了,富有了,但还是有不少贫困人,生活得很不好,所以“勤俭”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自己要勤俭,而且大家都要勤劳,节省下来的钱发展自己事业,来帮助他人,帮助穷人。我今后的任务就是把自己剩余的钱用来扶助贫困的人,让他们能像我当年一样,受到国家关心补助,也能够成长。

我教导儿子,除了这四个字以外,还有两句话,讲给大家供参考,可能对大家有用。我个人认为这两句话的颠倒和排列顺序就决定我们的前途。很简单两句,就是“收入和支出”。用简单话来讲,就是“做”和“玩”。如果只顾玩、花钱,而做得少,收入少,支出比收入多,那怎么办呢?就借呀。借了不还,还借得上么?借了不还,就是骗了,骗不到了就偷,偷不到了就抢,他的前途能怎么样啦?

如果你做那么多,就用那么多,那么一生就是贫困的、穷苦的。一发生意外呢,就是负债了。所以我们必须先做,做很多很多,用得少,那么他的财富就会多了,日子就好过了,前途就好。我就对我儿子说,两句话安排好,你们就前途光明;两句话安排得不好,你们就没有前途。

我教育我的孩子要学会骗人。有人说,曾先生你是不是在发神经病呀?这点上,你们听起来恐怕会吃惊。我要大家去学骗人,是为了防止被人骗,学会骗人而不骗人,这是好人。(掌声)我要我的儿子学会骗人,但绝对不去骗人。如果你学会骗人,去骗人,那是犯人。(掌声)我很会骗人,但是我从来没有骗过人。我为能在香港上市,跑遍了全世界,也跑遍了全中国,我还可以很大声地讲,曾宪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骗过任何人!多骄傲,多自豪啊!(掌声)

还要给你们讲“数”。我是1,学习成功,加上个数,那就是10了;你大学毕业了,多了个0,就是100了;等到你有成就的时候,多个0,就是1000了。以后10000,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百亿。后边的0很重要,但前边的1更重要,也就是人倒下去的时候,剩下来的是什么呢,都是0,无意义了。(掌声)

当自己还在时,叫有生之年,要创造财富,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只要你有这个决心,有这个理念,那么对我们国家,对我们这个社会都会有好处。我们金利来集团在中国差不多有1000家分支机构,我们公司的一个原则就是提倡四爱:爱祖国、爱公司、爱家庭、爱自己。不爱自己行吗?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无数个集体所组成的,是由无数个家庭所组成的,是我们全中国人民共同组成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富强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个人的表现也与国家息息相关,个人努力的成就跟家庭、跟公司、跟国家息息相关。所以我们提倡要四爱。

我们大家都是无知者,生下来的时候只会哭,只会笑,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每个人要了解自己是无知者,从无知到有知,从知一

点点到知多一点,希望不断努力,不断求知,知道得更多,这才是我们进步的动力。如果你认为自己知道得很多了,满足了,那你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就不再进步了,甚至目中无人,高高在上,指手画脚。这对我们个人没有好处,对社会也没有好处。

再讲一讲香港。香港回归祖国,这是我们百多年来的全国人民的夙愿。经过大家的努力,在中央政府的正确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策指导下,香港能够平稳、平和、平静地回到祖国的怀抱。还有最根本的一点,那就是我们的祖国富强了,强大了。只有强大的祖国,才能够平稳地、平和地充分对香港行使主权。在香港回归的日子里,不少外国朋友,不少外国人士都对我们谈,想不到!一个政权交接这么大的事件竟然能够那么平静、平和!我的回答就是,因为我们中国强大了,不再是过去的落后的中国。“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人想打我们就打我们。今天的中国,你看,强盛了,而且在不断强大。十五大今年要开,它将为我国 21 世纪制订作指导的总方针,这将使我们中国的发展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仍然有长期的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意味着我们中国的发展前景更加明朗。香港回归是一件大事,十五大召开也是一件大事,这两件大事都完成得非常好,我们中国明天更加灿烂,更加美好!谢谢!

中国教育电视台供稿 未经本人审阅

朱善利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教授

中国与 WTO

[2000 年 12 月在北京讲演]

我们这个题目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简单介绍一下世界贸易组织,接下来谈一下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所做出的努力,最后讲一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

世界贸易组织是在 1995 年 1 月 1 日正式成立的一个组织,如果追溯的话,它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后的 1948 年,由 24 个国家在当时签署了一个协定:“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简称 GATT。当时中国曾经是签约国,又是创始国。到了 1950 年,台湾当局宣布退出“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当时台湾当局在 GATT 中占据一席之地,尽管当时台湾已不代表中国,但是因为台湾提出要退出这个组织,所以在提出两个月以后,GATT 决定中国不再拥有这个席位了。此后,我国曾作过多方努力要恢复中国在 GATT 中的地位,但都没有成功。因为当时台湾在联合国各种组织中占据了席位。后来中国相继在这些组织中都恢复了席位,唯独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一直没有成功加入,到现在为止中国仍在努力要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作出的最大的一次努力是 1986 年,即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前,在 GATT 成员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时候。原来叫“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就是这些组织的成员在一起解决一些关税与贸易方面的事务问题。后来世界经济关系

范围扩大了,不光是贸易、货物往来,还有服务、投资等等,而这些问题在原来关贸总协定的框架下并不能解决,因此乌拉圭回合谈判就是要解决这样一类问题。中国当时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这次谈判过程,主要代表是龙永图,现在是外经贸部副部长,这次谈判从 1986 年一直持续到 1993 年,与抗战时间差不多。在 1993 年 12 月决定成立一个新的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已不复存在。这样一个新组织的框架比原来要大得多,从 1995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开始运行,总部设在瑞士的日内瓦。

现在我们谈谈这个组织究竟起什么作用。世界上有很多组织,像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世界贸易组织也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是一个贸易性的组织。中国是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同时也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要成员,唯独在世界贸易组织中不是,所以这是一件很不正常的事情。这个组织的主要功能是要协调各个国家的贸易争端,或是与贸易有关的一些争端,现在主要是解决一些投资方面的争端。如果两个国家发生贸易争端以后,这个组织可能会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组织实际上是各个国家在里面平等地解决争端的一个组织,当然,这个组织还要接纳新的成员。所以加入这个组织可以有利于国家解决贸易争端。除此之外,它可以享受普遍的互惠条件,比如说:贸易双方的产品进入对方国家可以享受一定的优惠条件,凡是这个组织的成员都可以普遍享受与各成员国之间的互惠条件。如果不加入这个组织,只能通过两国关系订立一个协议达到互惠共识。加入这个组织以后,只要给一个国家某项优惠条件,其他国家也可以享受同等待遇。显然,这会给这个国家贸易和经济带来许多实惠。当然,这就意味着你要对其他成员国开放市场,因为这个条件总是互惠的。现在这个组织估计是 135 个成员,其中发达国家是 29 个,发展中国家是 106 个,发展中国家在这个组织中占近 80%。这里面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不管国家大小,一个国家一票。若两个国家发生争端,举例来说,如果

某个国家,像印度和美国发生贸易争端,印度要求成立专家委员会来解决这一问题,则由大家投票,除非大家投票一致反对,说不能够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来解决,否则就得成立。所以加入这个组织对任何一个国家解决贸易争端都是有好处的。有时你通过单方面贸易关系来解决两国争端,小国和大国相争时,大会占优势。比如,巴西和委内瑞拉曾经和美国发生争端,说美国的空气清洁法妨害了这两个国家的利益。巴西和委内瑞拉如果不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若以国家间的关系与美国单方面解决这个争端的话,大家可以想象,美国是很强大的,解决的结果可能不会太有利。而事实上是世界贸易组织起诉了美国,美国败诉,败诉的结果是美国要修改它的法律,不能用自己国家的法律去伤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也有很多人对世界贸易组织有些误解,说这是一个富国的俱乐部,穷国在里面没有任何地位。事实上不是这样。一个成员国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如果你要享受别的国家提供的贸易优惠,你也必须对另外一个国家提供贸易优惠,你也必须开放市场。

这个组织的重要性还表现在什么方面呢?其他一类组织,如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的产生不会有什么困难,尽管发生了许多争端,但最终都不会特别不顺利;像世界银行的行长,它的产生也很顺利。世界贸易组织 1995 年成立,到现在还不到 5 年时间,它的总干事的产生是非常费劲的。主持日常事务的是总干事。上一任总干事退休以后,本来应在 1998 年年底产生一个新的总干事以便于交接工作,1999 年 4 月就应交接工作,但大家相持不下,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争端比较大。最初竞选的人很多,后来只剩下两人,一个是摩尔,是现任的总干事,另一个是泰国的苏帕莱。由于总干事这个职务争了很长时间,一直协商,所以到 1999 年夏季才产生,是双方妥协的结果:由现任总干事摩尔干 3 年,从 1999 年到 2002 年,到 2002 年就不再选举,由泰国副总理苏帕莱接任此职。这仍然是妥协的产物,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个

问题上总存在着一些争端。比如刚才所说的在决策方面大家是对等的,但最后争端都是由总干事来协调,所以争夺这个职务相持了很长时间,最后才产生这样的结果。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争谁来当这个总干事。大家都知道,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总共开了三届部长级会议:第一届 1996 年,第二届 1998 年,第三届刚刚在美国的西雅图结束,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没有任何结果,也就是说流产了。开会的时候会场外头很多人在游行,使得当时的仪式都没有举行,最后于 12 月 3 日结束了。本来会议拟定启动新一轮的谈判,这些部长要坐下来讨论下一轮谈判谈些什么,结果这个问题也没有谈,因为大家对新一轮谈判谈些什么问题没有达成统一意见。按照上次乌拉圭回合谈判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如服务、贸易问题等在下一轮谈判中肯定要谈,比如说电子商务问题、政府采购的透明度问题、知识产权问题等等好多问题要放进来。争执的问题,有发达国家之间的争执,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争执。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争执主要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矛盾,如农产品补贴问题。美国也是粮食大国,土地多,农产品的成本比较低,而欧洲地少人多,农产品生产成本较高,所以美国指责欧洲农产品补贴太多,使得美国农产品打不进欧洲市场而发生了争执。因此美国说这个问题开会一定要解决。对于这个问题,欧洲也不妥协。欧洲曾经阻止了美国农产品向欧洲类似倾销这样的行为,因这事双方没有达成共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争执的问题,就是美国和其他的一些国家坚持要规定劳工的工资标准问题,比如说要规定劳工的最低工资限度。发展中国家劳工非常廉价,按美国标准的最低限度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始终不能沟通。最后这个部长会议就这样流产了。等到下一年,看一月份各国派代表参加的千年会议会谈些什么,但有一些可以肯定,像服务贸易问题、农业问题是肯定要谈到的,至于其他问题是不是能提到议程上来,要看情况了。大家都希望这次谈判能快些,不要像乌拉圭会谈拖

那么久。当然也有人预测不止三年,比方说乌拉圭谈判开始说是四年,后来还是拖了三年,1998年才解决问题。大家可以试想100多个国家在一起谈,是个什么情形?中国好多人在这之前都不过问这个事情,后来突然一下知道了,因为中美在11月15日签订了一个协议,就是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突然对这样一个问题感兴趣了,而且中国确实做了一些工作。

做了哪些工作?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这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世贸成立之前,一个是在世贸成立以后。在1986年,就在乌拉圭回合谈判启动的时候,中国就向当时的总干事提出要求恢复中国在GATT中的签约国地位的申请,同时也参加了乌拉圭回合谈判。刚才说过这样一个组织有很多规则,最重要的规则是国家在调节其贸易的时候用的手段要求尽量用价格控制的方法,而不采取数量控制的方法。我想解释一下,因为在座有很多同学不是学经济的,不了解这些情况。我们知道,一般一个国家在控制经济的时候国内通过的两种手段,一种是价格,一种是数量。价格控制的方法就是用市场来调节其价格,东西买多少由市场来决定。数量控制的方法就是政府规定你给我生产多少东西,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就采用这个手段,企业不计成本,一年只要完成多少产量。后来通过市场价格来调节而不下硬性指标,价格高的时候就生产多一些,价格低的时候,大家不愿生产,这样就通过市场来调节配置资源。在国际贸易方面也是这样,一个是价格控制,一个是数量控制。数量控制就是我限制你不让你进,比方说我限制你今年的进口量不能超过多少,像美国对待中国的纺织品就通过限额,超过限额就不再进口。还有一种就是价格,也就是关税,你的货物进入我国可设立关税,高的关税可以在100%以上。比如在你国家产品卖10 000元,而进入我国的关税还不止10 000元。关税一高,就可以限制一个国家向另外一个国家的出口。像我们国家过去对很多产品就使用比较高的关税,同时也使用限额;还有一种就是发许可证,有许可证才能进口,没许可证就不让你进口。所

以我们可以说一类属于价格调节,一类属于数量调节,那么关贸总协定规定一个国家的贸易要使用关税的手段,而少用数量调节。因为数量控制更为厉害,不管你卖什么价格,限额一到我就不让你进口了。而世界贸易组织也继承了这一原则,就是要减少数量控制手段而使用关税手段,而且要降低关税。提高关税就阻碍了国际间正常的商品流通,所以各个国家都要降低关税。我国取消了很多数量上的限制,还降低了关税。我们可以从 1992 年到 1997 年我国的关税总水平来看,降低了 60% 多,从 40% 多降到 17%,它是指总体水平。比方说我国的汽车关税在 80%—100% 之间,越好的汽车关税越高,差一点的汽车关税要低些。总体上来说,关税水平大幅度降低,实行进口许可的好多商品我们取消了许可制度,当然还保留了一些,世界上其他国家也会有所保留。但中国的努力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前并没有取得多少结果,所以到 1995 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的时候,中国提出要加入这个新的组织没有成功。在这以后,我们又做了很多方面的努力,如江泽民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面宣布了中国要在 2005 年把我国的关税总水平降低到 10% 等等。那么现在这个关税水平在世界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全世界关税的平均水平是 6%,就是把全部商品加权平均了以后是 6%,其中发展中国家是 13%,发达国家是 3%。我国现在是 17%,2005 年要降低到 10%,就可以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因为发展中国家现在是 13%,再过几年也会有所降低。其实我们国家实际关税水平真正要计算的话并不高,是比较低的。我们原来成立了一个课题组计算过,对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等,国家拿到的还不到 10%,可能是由于我国以税收优惠的方式,某些企业采取其他的方式使国家的关税并没有拿到那么多。实际上,只需进行一个简单的计算就可以了,即用国家进口得到的整个关税税收除以整个进口商品金额的总和,就可以得到平均关税比例。其实这个比例是很低的,并没有名义上那么高。所以我们国家要主动降低关税,以便更好地促进国际间商品的流

通。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后又做了多方面的努力要求加入,取消了很多种商品配额方面的限制,但仍然没有加入。因为当时许多国家对中国的要价太高,发达国家说中国不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应该以发达国家身份加入。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发展中国家可以享有很多优惠条件,关税的总水平比发达国家要高。在补贴方面,世界贸易组织禁止向国外出口进行补贴。原来许多国家都采用这种手段,比方说你出口商品时我再给你一些补贴,适当鼓励你出口;还有你出口我才给你贷款,这些做法都是不允许的。对于发展中国家可以采用优惠贷款这样的补贴方法。另外,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也享受一些优惠。所以如果不是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这个组织的话,意味着有很多优惠条件你享受不到。像刚刚我们所讲的发达国家关税总水平是在3%,如果我国也把关税降到3%,那么我国的工业会被冲击得一塌糊涂,所以我们不能这样,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分,世界上有一个计算的方法,人均GDP低于1000美元的国家就称为发展中国家。我国显然低于这个水平,我国的GDP大约是8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1万亿美元,我国12亿多人口,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怎么能把我国归入发达国家?中国肯定属于发展中国家,为什么把我国划分为发达国家呢?这原来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部分人高估人民币购买力,认为人民币虽然按汇率计算和美元无法相比,但实际购买力并不差,比方说住房,在北京两居室房子一个月房租几百元,在美国却要花上几百美元房租,折算一下,人民币的购买力比美元还强。但中国不会这样算。如果按照这种折算方法,那中国农村房屋好多都是自己盖的,要算房租的话还要更低,另外一方面也租不出去,如果用纽约的房价来折算,那农民收入都很高了。所以不能用这样的计算方法,因为那些东西是不能上市场进行交易的。像这类的计算方法我们是不太赞同的,他们把我国的国民收入估计高了。所以我国仍然应属于发展中国家,那么就要享受很多优惠了。根据现在中

国对外谈判的结果,至少在与美国谈的结果中,我国的关税可以降低,但不是按照发达国家水平的要求。大家知道,现在跟美国已经达成协议了,与美国达成协议就表明中国已经一只脚踏进世界贸易组织了。在这之前我国已经谈了很多国家,大家都还不知道,而与美国达成协议大家一下子都知道了。原来美国对中国加入世贸这件事上阻挠最大,与美国的问题解决好了以后,与欧洲很多国家的问题也就好解决多了。所以中国很快就有可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了。但现在又暂时缓了一段,就是因为西雅图部长级会议流产了,关于新一轮谈判谈什么还没有定下来,所以中国加入世贸暂时搁下来,但这已无所谓了。为什么原来抓得那么紧?因为一旦新一轮谈判要启动了,就不在接受新的成员了,如果这次会议说了什么时候开始谈判,假设要谈五年,那中国就至少得五年之后才能加入进去。现在中国可以缓一下,可以在以后再去争取。其实中国现在已经与很多国家谈判都达成了协议,很多国家原则上都已经和中国达成了共识,所以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只是时间问题了。

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第三个问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将面临一些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问题。

中国非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可吗?现在学术界也存在着两种观点。有好多人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会把我国的民族工业冲得一塌糊涂;而另外一种观点说,入世对中国有百利而无一害。现在我在这里要纠正这两种极端的看法,两种看法都失之偏颇。我们只能用这样一句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利大于弊,权衡一下是利大于弊。那么利和弊各自表现在哪些方面?我们首先来谈一下这个问题。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第一个是关于外贸体制方面,即外贸管理体制,其中也包括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原来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很落后,而且是多头管理,像我们原来机电产品进出口是机电部在管,其他很多产品

又是外经贸部在管,各个部门制订的规则都不一样。世界贸易组织要求的一个最起码的条件,就是你这个国家所规定的政策要透明,究竟是什么样都要摆出来。而我们好多文件连我们国民都不能看,是机密,这是不行的。你规定的东西必须明文规定,必须有章可循,所以这一点要求我们对这套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所以我们将可能面临一个挑战。大家都要看到,我们的很多部门都要受到冲击,但是这些体制的东西是无形的东西,可能受到的挑战更大。我们好多机构之间相互扯皮,办事效率不高等等,这样的弊端将来都要消除,它要求我们管理者的素质都要提高。关于这个问题有许多东西要学。

第二个,关于部门的挑战。我们的部门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可能要面临挑战。有哪些部门呢?我大概列了以下这些部门:第一个,农业;第二个,民用航空;第三个,保险;第四个,电信;第五个,银行。这是主要的,当然还包括其他一些方面。我们讲的服务就包括文化这个产业,也就是教育文化这个产业也可能要列入这里面。我想一个个来谈一谈。

首先是农业。大家认为农业可能要受到挑战。农业问题是中美贸易谈判中间一个摩擦很大的问题,我国总理亲自到美国与美方签订了一个协议。1999年4月,朱基到美国签订了农业方面的一个协议,就是美国的农产品要打进中国的农产品市场。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以2%的人在生产粮食,98%的人都不从事农业,但它仍然有粮食过剩。而中国,60%以上的人在经营农业。当然我们的粮食也是自给了,自给率达到95%以上,我们说我们中国人能养活自己了。但是我们有60%以上的人在生产农产品,美国只有2%,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农产品有好多方面生产力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投资成本比美国要大。所以农产品对美国开放,有好多人说我国的农产品会受到冲击。但是目前,根据农业部门某些专家所提供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个冲击并不会太大。哪一类农产品关税降低的幅度会比较大呢?像葡萄酒从60%降到了

20%，奶酪从 60% 降到了 12%，这两个降得比较大；其余的东西降得比较少，像水果、小麦、玉米这些东西仍维持在 14% 左右。这个关税水平会对中国农产品市场造成的冲击并不会太大。像外国葡萄酒，城里人喝喝而已，中国农村不喝葡萄酒，谁去买葡萄酒呢？中国农民就喝那个老白干，不会买它多少。还有奶酪，我们都知道好多城里人对奶酪都吃不习惯。西方人喜欢吃的奶酪不一定我们就喜欢吃，虽然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喜欢吃，但汉族人毕竟还是占多数。汉族人并不喜欢吃奶酪，并不会导致奶酪的大批量进口。小麦也许不是这样，但运输成本也很大。美国生产小麦、玉米的成本的确比我们低，但是按 14% 左右的税率来看，它们并不具有多大优势。还有水果，我看商店里的美国水果也是看的人多，买的人少。现在关税要降了，中国在水果方面仍有优势，因为中国在水果这一块基本上是顺差。当然中国的果农要改良它的品种，而不再用老的品种，老的品种在中国市场上都卖不掉，更别说拿到国际市场上去卖。好多地方产的苹果很难吃，没人买，都烂掉了；还有四川盛产的桔子几毛钱一斤都没有人愿买。但是也有好的品种有人买，也不是一定要买国外水果吧。有一些农产品比如大豆油，大家预测对中国市场冲击比较大。因为美国产的大豆出油率比中国要高，他们是 20%，我们才 15% 左右，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优势。但是我们说，大豆可以有其他用途，我们可以去重新进行资源配置，油产品的进口也不要紧，我们可以出口其他一类东西。

航空、保险、电信、银行等等，这些产业叫做国内带有垄断性质的产业，我们说这些行业有些在亏本，有些在赢利，电信是赢利的，航空是亏本的。但是这些行业都是国内少数几家在经营，而且国家给予特权不让其他人来经营，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可能受到冲击比较大。

以航空来说，民用航空，说是有几家航空公司，南方航空公司、东方航空公司，等等有好多航空公司，但事实上并无多大决策权，许多事情还是由政府决策，它并不是一种市场行为。

1984 年我到广州去开会,去买机票。那时买机票要单位开证明,是县团级单位的证明才有效,还要单位负责人签字。你想想,当时办事好难!现在回想一下,思路也变了。那是官商作风,不是市场行为啊。加入 WTO 肯定会受到冲击的。你不去拉客,客人都叫人抢走了,就这样。现在是不让外国航空公司来中国经营民航,将来人家一开通国内航线,你瞧一瞧,你遇到的冲击当然大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保险和银行业。首先谈谈银行。咱们银行也是垄断,国内就是这几家银行:工商行、建行、农行等几个大银行。大家都有感觉,银行的服务态度现在比过去好多了。以前银行里面,你进去以后,那脸很难看,存钱好像要求着他似的,取钱也好像要求着他似的。你也确实要求着他,对吧?你要取钱的话,他不给你取,你也没办法。你没想到是你的钱就应该去取。现在银行好了一些。银行里面包括好多业务,但要和国际接轨的话,和人家比,那要差得多了。像银行里开展消费信贷,我们现在也开展,但要好多条件啊。我们一个学生,MBA 的,贷款去读书,就交两年的钱嘛。他办了好多手续,包括担保人他都找了。银行说不行。那去找谁呢?说找老师,让老师来担保。老师有固定职业,找其他人担保不行。国外是这样:你去上学的时候,银行给不给你贷款,是计算你未来的收入有多少。这个很重要,就好像一笔风险投资。大家知道杨志远,雅虎的创始人之一,现在美国的大富翁之一,资产上亿了。原来就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人家为什么给他投资?风险投资啊?!人家觉得你有希望,就先给你钱,出来以后大家一起发财。在美国,别的我不敢说,读 MBA 贷款肯定能贷到,将来你是能赚钱的呀。有没有风险呢?是有风险的。就是说,一百个里面可能两三个是有风险的,百分之九十几都没有风险。哪有一点风险都没有的呢?你那一点风险又算什么呢?国内读书贷款有好多条件,就是不给他。住房贷款也是一样。现在市场上住房贷款,你到银行去办一下看看,很困难,而且年限受限制。国外住房贷款,长的话,一般都是 30 年。我们这儿呢,十几年。他叫你到银

行去,在那里排队。大家时间都很宝贵,就这样排着队等。寄来一张不就行了吗?而交涉好长时间,结果还是不行,还得去。还一定要去,你好几千块钱在卡里头啊!因为北大把你的工资都转到里头去了,你说你不去行吗?你理论说得过他,实际上你奈何不过他。最后去了。我说,像你们这样,将来国外银行进来肯定要被挤垮,哪有像你们这样的?是你们为我们顾客提供服务,还是我们为你们提供服务啊?那服务员说,你说的是对的,是我们为你们提供服务,我们是要改善服务。但他不是决策人。办卡的时候,我说了,不行的话,北大把那卡退了嘛。如果说你要把我的工资每月转到我的卡上面去,不叫我自己去领钱,你还要给我好多优惠,比方说免费开支票等等。为你提供了方便,到时候钱就自动转给你了,提供多少方便啊,每月积攒了多少固定的钱。那么,这笔钱可以作流动资金去发放贷款,多方便啊。你都知道了,北大有多少钱,一下子都转给他了。现在倒好,换张卡还要我们去排队。北大有好几千个老师啊,每个人耽误一分钟,那是多少时间,你不去考虑考虑。实际上每个人白天去排队,要耽误多少分钟时间呀。哪有这样做的?我需要办卡的时候,再去办卡。现在不是这样,他强迫我去办的卡,然后强迫我去换,这样能行吗?我就举个这样简单的例子。大家可能习以为常了,可是你看看国际上标准的银行是怎样为你服务的:卡到期给你寄来,你用不着换了,除非你自己觉得需要换,这是你的权利,那是你的钱。

保险也是。在座的可能没有几个跟保险公司打过交道,如果你要打交道,经常会闷着一肚子气。我和保险公司打过交道,将来你们打交道的机会肯定多了,市场经济就是这样。像美国,平均每100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做保险,经营保险业务,创造的就业机会多达百分之一。咱们中国将来有多少呢?咱们12亿多人,有1000多万人要经营保险,咱们现在经营保险的人也确实太少了。美国是比较高的。美国没有人不同保险公司打交道,只要到了他的国土上面,就要和它打交道。像我们,如果是他邀请你去美国

的,他就给你交了保险了,你的医疗保险已经给你交了。如果你要带上太太和孩子去,他告诉你如果他没有单位上保险,你必须给他们上保险,强制性的医疗保险。也就是说,你必须和保险公司打交道。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人寿保险、财产保险等等。比如你买个汽车,马上给你保险,第三者责任险你必须得保。你可以不保自己,但是你的车要撞了别人的时候,保险公司给你赔呀?你必须得保第三者责任险,所以必须和保险公司打交道。中国现在少,因为在一个企业里面,企业把你所有的风险都承担了,生老病死全部担当了。市场经济下不是这样,不能担保你所有的东西。讲个笑话,一个人过去要是出生在北大里面,比较出类拔萃的话,这一辈子一直都会呆在北大。北大什么都有,什么都给你保了险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不这样,它需要自个儿去保险,跟保险公司打交道。咱们的保险公司是怎样的呢?他们的服务差多了。在国外,要是你的车出了事儿,如果是你把别人的车撞了,你的保险公司去赔别人;如果是别人的车把你撞了,那是他的责任,他的保险公司会赔给你。警察会来看这事故是谁的责任。你给保险公司打个电话,保险公司说,只要有警察在现场做了鉴定就行了,你可以把车开走了。比方说,我的车被别人撞了,对方保险公司不要你把车开到保险公司去照相,你只要开到修理点,看看修这车要多少钱,然后你给他报个价,隔着报3家,只要报3家。你可能找了100家,你可能报的3家都是最高的,保险公司从3家中挑一个最低的给你。行了,支票开给你,你修不修车不管你。所以说解决这个问题很方便,一张支票一开就行了。再看咱们的保险公司。我回国后买了个车,那个车倒霉,刚买来就被人家撞了。第一次还好,给一个国外的人撞了,是当时美国来的一个人在谈一个项目。那人还好,给我写了一个东西,说倒车的时候没注意,我的车把你的车撞了。行了,去找他的保险公司,赔了。第二次又被别人撞了,撞车的人跑了,不知道是谁。找保险公司吧?当时我去找它真是费劲啊!保险公司说你到某个指定厂家去修去。我说,你们这是开保险公司

还是开修理厂的啊？怎么能指定到哪个厂家去修呢？保险公司说，那是我们的行政单位。我说，我这是新车啊，人家厂有规定，在这一年之内，必须到特约维修点去修，如果不到特约维修点去修，将来出任何问题，人家不会负责。他不干。我说，这儿特约维修点有十几家，你随便找一家。他说不行，你必须到那一个地方，否则你要自己去修，只能修 400 块钱，不能超过 400 块钱。我说我退保行不行啊？他说，退保行。他还算可以，说你入保退保自由。我说，行了，你给我退保吧，我不在你这儿保了。它那个管投保的态度不错，总经理也跟我说好话：对不起啊，你的要求我们都可以满足。我去特约维修点，人家告诉我说，400 块钱怎么可以修啊？后面的保险杠给撞坏了。光一个保险杠出厂价就是 600 块钱，加上花的工夫钱，外边再给你喷上漆。成本价至少 600 块钱，它给 400 块钱！你想啊，保险公司和修理厂达成什么勾当。这可不行啊！保险公司要为顾客着想，不要为自个儿着想，是你为别人提供方便，还是要别人为你提供方便？这好多是观念问题，和上面我讲的是一样，这是官商作风。就是没有反过来分析。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在签订加入 WTO 协议里面，我们有很多业务要对外国人开放。我们现在是对外资的保险公司不开放的，对外资银行业也是不开放的。像银行业，我们不允许他经营人民币的业务。以前经营人民币业务只是在上海浦东搞试点，而且人民币业务不能够针对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公民，只能够针对国外企业和外国人；吸收外币存款，也只能对外国在中国的公民和外国的企业。保险公司也是，我们许多险种不让他加入的，我们的团体险、健康险、人寿险，好多不允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他可以介入了，有规定的。原来我们保险只允许他在上海和广州两个城市进行，而且进行的险种受限制。入世 5 年以后不受地域限制，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做，它拥有的合资保险公司的股权可以达到 50%；险种可以经营团体险，可以经营健康险，可以经营人寿险。一般人家不愿意经营个人险，都愿意经营团体险，这是保险业方面最基本的常识。比如说健

康险,如果保险公司规定一个收费费率,买健康险你必须每年交多少钱,那么健康人都不去买。没病我去买什么保险?只有有病的才去买,觉得身体不健康了,将来得了病以后,保险公司给钱。所以保险公司认为凡是去保险的个人都是身体不好的。可是团体就不一样啊。像北大集体去保险,这里面是有概率的,他知道这里面有多少人会有病,多少人没病。不能大家都有病吧?有病的人是少数,所以都愿意保这个团体的,平均每个收费是多少。现在国家不让他们做,以后不一样,让他做了。财产险也允许它经营。像我刚刚讲的那样,人家进来后,我们凭什么跟人家竞争?我们说的冲击就是这个冲击,所以这是面临的一个挑战。

好,再看我们的电信。电信也是个垄断部门,这个大家都知道。现在电信还好些,我们现在总是怀着一种感激的心情看待这个事情。什么感激心情?我们北京过去装电话的初装费,要五六千块钱,现在低多了,大家都很高兴。尽管有一些费用还在涨,比如说通话的费用在涨。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现在好多国家初装费都不交了,而且那个通话费很便宜。我们可能没有想过这个。如果初装费不收了,通话费很便宜,你会怎么想啊?我们现在经营的基本上是中国电信和联通两家,而且联通的量很小,只搞无线通讯,基本上有限制,中国电信都垄断了。据说中国电信现在也在分,分开以后也就那几家,而且价格也是自定的垄断价格。平常打电话的时候,我们一分钟电话打到美国,要花多少钱?十六七块钱吧。但是你到美国以后,买一张电话卡往中国打,或者不买卡的话,就装一个电话,往中国打多少钱呢?最便宜的时候,就六七十个美分吧。六七十个美分和十六七块人民币,你折算看看?我有时跟中国电信那些人说,你们啊,究竟是有什麼理由要中国打电话到美国比美国打电话到中国要贵啊,有什麼理由啊?是你们的劳动成果比人家高呢,还是你们的设备更先进、比人家更贵呢?收这么多钱!他说,不是,是经营的问题,管理成本太大。低了的话,就要亏本。再举个例子,香港的国际电话业务也是香港电讯垄断,当

时给它一个特权,就是让它独家经营长话业务。去年香港特区政府规定,从1999年1月1日后,长话业务放开。这一放开你猜怎么样了?想不到的便宜。有两家公司加进来,一家叫做城市电讯,另一家就是香港新电讯。三家一竞争,打长途电话就压低了。从香港打电话到加拿大和美国一分钟7分钱。有人不信,比打市话还便宜?当然,可以告诉大家,这个价格里,三家都亏本。这是为了争夺这个市场,争夺顾客。可见竞争对消费者有利。这样一来,对香港电讯威胁大了。香港电讯原来还没有到这个价格的时候,亏本就已经有20多亿了,这样一压,亏得更厉害了。这就迫使你要改善管理,降低成本,赢得消费者。消费者不管你是谁,谁的东西便宜,我就用谁的。我们现在不让别人来经营中国电信业务,尤其是基础电信,但将来要放开,已经答应了。入世以后,要逐步放开。咱不要说美国那些电信了,就是香港这几家电讯公司,以这个价格打几下看看,中国电信恐怕在竞争中也不行啊。这是垄断的问题。

刚才我们讲的几个产业都是垄断性行业。垄断性行业一旦放开以后,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了,第二个是价格下降了,消费者受益了。所以这些行业将来面临着一个冲击。我过去说了,我们中国企业,我们算的时候,说国有企业赢利。开始改革的时候说,放开中小型企业,抓几个大企业,叫“抓大放小”。几年以前我就讲过,这种改革思路事实上不是一种大的改革思路,只是很窄的改革思路。当时从搞活国有经济的角度谈国有企业改革,所以要“抓大放小”。为什么要“放小”啊?小的都亏本,大的还赢利,把亏本的都放下去了。要不国家要背上财政包袱,所以就要放下去。为什么还抓大的?因为大的还赢利。大的怎么赢利?你查查它赢利的原因是什么?小的为什么亏本呢?你查一查它亏本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放开以后,有竞争了,民营企业、私营企业来跟它竞争啦。大的搞垄断,所以赢利了,像中国电信一家经营,收你一个初装费五六千,能不赢利吗?要是放开竞争,你瞧瞧,它能赢利吗?所以

说,要是放开竞争的话,赢利的又要亏。与其这样,还不如早点放开,不要等到亏本的时候再放开。你要放中小企业,卖中小企业,现在没人买了。好的时候有可能,不好的时候谁来买呢?买了,不是企业,是个债务。它的资产只有 100 万,然而它的负债是 110 万,你买过来要替它报销 10 万块钱,你会买这样的企业吗?大企业、垄断企业将来面临的竞争最厉害。原来靠垄断挣钱,一旦放开以后,就要亏本。所有这些企业遇到的挑战,可能是很严峻的。

接下来我们谈一下受到高关税保护的一些产业。不是垄断性的,但是高关税保护的一些产业,比方说我们的汽车业。我们的汽车业的关税是 80%—100%。这意味着,我们买一辆进口车,我们要多付出一倍以上的价格。加入 WTO 以后,关税降低,会怎么样呢?当然,汽车业也是属于幼稚产业或者说是稚嫩产业,我们国家要给予保护。我国进入 WTO 以后,汽车产业是我们国家的稚嫩产业,要保护它。现在继续要收高关税,但几年以后,逐步要降低了。当我们的关税收得很低的时候,我们的国内市场可能就撑不住了。等到像那个雅阁的车卖得跟桑塔纳一样便宜的时候,大家就可能不去买桑塔纳了,就去买那个雅阁的车了。像前面讲的一样,它也面临一个怎么样降低成本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国家,尤其是汽车企业并不是没有竞争力。我仔细观察了一下,根据公布的统计数据,上海大众去年大概是 16.1 亿的销售收入,利润大概是 9.3 个亿。你想这利润率是多高?50% 以上的利润!这个业绩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汽车公司的业绩,比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的利润率都要高。但是一汽大众,它的销售额很大,是二十六点几个亿,但是他的利润是多少呢?只有几千万。这是《经济参考报》上公布的一个数据。你再算算它的利润率是多少。企业家要算利润率,不要去算你赚的钱的绝对数是多少。你拿 1 亿块钱挣了 100 块钱,人家拿了 1 块钱就挣了 100 块钱,你想想看,哪个挣的钱多呢?我们的潜力很大,桑塔纳有足够降低价钱的潜力。如果他把价格降低一半下来以后,仍然还是赢利,就是在国外企业

进来的情况下,也不一定能打垮桑塔纳。当然,我们有一些企业很可能是要被打垮的。这就要迫使企业去改善经营,改善管理。所以国内汽车业面临一次挑战,但是如果通过改善管理的话,也是有很多潜力可以挖的。现在看看国内汽车厂家,许多都亏本了。亏本肯定垮。中国的汽车有多少厂家?120多家。咱们现在知道的,就一汽、二汽、上海大众这么几家。实际上有很多,有120多家。这不行啊!搞不成规模经济,年产量很低。国外年产量几十万算低的,都是上百万的大企业。美国就三家很有名的: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考莱斯勒汽车公司,日本有几家大的公司,咱们都是小规模。汽车是需要一定规模才能把成本降下来的。所以汽车业现在是在搞高关税保护,加入WTO以后,可能不能再指望这个了,练自己的内功,把成本降下来。同样,像其他行业,比如说,像医疗这个行业,也是这样。我们看看现在医院里面,基本上不是靠医生的医术去赚钱,而是靠医药赚钱,而且那药的价格是离奇的高。比如说把保健品当作药去开。这是什么弊端?过去公费医疗沿用下来的东西,反正吃再好的药也是去报销。这是讲医院里卖药。你去了医院以后,不管你什么病,首先让你去检查一下,做个CT吧。光检查费就好多。他不是通过医疗技术改进,把功夫花在胸外科、脑外科手术的功夫上。医药行业里就要靠自己去搞技术革新了,也会促进医院这个系统去改进。现在我们不允许外国医生在中国开业。当然,医疗问题、教育问题、文化问题,在世贸组织里头都有规定,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些具体东西,下一轮谈判里头可能要具体一些,都是服务行业嘛。我刚才说了,下一轮谈判千年回合之后就要启动了,都是关于服务行业的,还有农业方面的同时也放在这里面谈。像这些行业里面,将来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也是面临一个很大挑战。

接下来,我谈一下我们虽然面临一些挑战,但是也面临一些机遇。首先第一点,我们可以利用世界贸易组织得到多边互惠这样一个条件,也有利于我们利用这个组织解决争端。现在有好多国

家的争端,包括我们和美国的争端,有时两个国家之间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入世以后,我们可以上诉到世界贸易组织去,通过这个来解决。第二点,它可以促进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从长远来看,也有利于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现在好多人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疑义:外国人一来,把中国的民族工业都冲垮了,中国的民族工业不存在了。这是一个狭隘的观点。美国人都不承认说他在中国的厂是美国的厂,他把总部迁到了中国就等于是中国的厂了,就不在乎是什么名字。说什么可口可乐把中国挤了,这是很幼稚的想法。你想想,美国把公司办到了中国,资金到了中国,吸收中国的劳动力就业。美国在中国的公司,或者日本或者其他国家在中国的公司,有多少他们自己的雇员?多数是我们的雇员,是解决我们的就业问题啊。然后给我们政府交税。当然它也要赢利。中国如果把资金放到美国去,美国当然也欢迎啊。你叫什么名字我不管。中国人在美国办的公司也是起的中国名字。比方说我在美国看到一个餐馆,叫“老戴记”,英译名叫“uncle Dai”。好多这样的名字,像“燕京”啊什么的。外国好多东西来了中国就取中国的名字,像“宝洁”、“可乐”,使它尽量能够中国化。它给中国交税,增加中国的就业,解决中国资金不足问题。如果咱们都不买它的东西,首先失掉工作的是中国人,中国政府也征不上税了,它可以把资金投到其他地方去。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你很难说这个产业是哪个国家的产业。你要加入到国际分工体系中间去,否则你会永远被排除在外。还有一个笑话,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日本一个小女孩跟她妈妈到了美国加州,到洛杉矶去。现在日本到处是麦当劳店,中国也有好多麦当劳店。小女孩没有出过国,第一次出国,到洛杉矶一看,哎呀,这地方有这么多麦当劳店,就说:“妈妈,美国这地方也有麦当劳。”她没想到麦当劳就是出生在美国的。现在世界上到处都是了,小女孩就判别不出麦当劳到底是哪国的了。现在好多公司都是世界性的公司,叫多国公司或跨国公司,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结果。它能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为什么这样说

呢？中国这么长时间的改革、开放，仍然是在推进中国经济增长，那么近几年，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其中大约有 2 个百分点是来自于对外贸易。就是说，如果没有外贸这一块的话，我们经济很可能要降低 2 个百分点，那就会造成好多人没有工作了。今年我们的外贸出口预测有可能接近 2 000 亿美元。2 000 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按照我们这个人民币和美元兑换的比率，是 16 000 多亿人民币。16 000 多亿人民币占我们国内生产总值多大比例？20%。肯定能够带动中国经济增长。你的东西贵，在国内卖不动，在国外能够卖动，这不就能带动就业吗？否则你在国内卖不了，工厂不是更要关门吗？如果卖出去更多的话，不是更好吗？原来美国限制我们，像纺织品不让我们出口那么多，有限额。我们加入 WTO 以后若干年内，它要逐步减少配额，有利于我们向国外出口。出口增加的话，卖出去的东西可以增加我们的就业，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第三，它可以促进中国农业的第二次革命，也可以说是第二次改革。我刚刚已经说过，中国现在有 60% 以上的人在经营农业。当然实际数量没有这么多，我们说农村人口是这么多，我们真正经营农业的可能就一两亿人。但是一个发达国家，只占百分之几的人在经营农业。当然，我们不可能降到跟发达国家一样，百分之几的人来生产，不是这样。但是，现在我们很多人在农村，劳务成本就很大。为什么这样呢？中国现在基本上还是小规模经营。每一家一户就这么一块土地，你怎么可能在这块土地上面实行大规模经营呢？土地要向少数农民手里集中，实行农业大规模经营，减少农业人口。所以农村面临另外一次大的改革，否则，是不行的。这也是一次机遇。我们要发展中小城市，事实上好多农民已经不种地了，到城市里面来了。如果再不进行这样一种改革的话，就要麻烦了。中国土地现在还不能转让，将来必须要让土地能够转让。不让转让土地的话，农民也不种地，土地就要荒废了，就荒掉那块地了。这不行啊，对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是不利的。而现在你让他土地转让，他又不转让。我问过他们，为什么呢？他们说：现在我

土地没有了,将来我回哪去啊?!城里面不是我呆的地方啊。问题是我们还有户口制度,所以说将来我们的户籍制度也要改革。第四,我要讲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还会促进中国现有企业体制改革。但是我们现在面临什么问题呢?凡是容易改的我们都改了,凡是难改的,我们都放在那儿没改。这是最难的问题了,就是企业制度问题。怎么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我们说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起作用。比如说上市公司,就不起作用。现在股票价格不行了。大家都指望股票,不是去投资,而是去投机、赚钱。几千万的股民啊,其他国家很少见。那么多的人都指望在股市上发财,都是投机,哪天听到个什么利好的消息,就赌他一把。原来国内有人计算,上市公司上市5年了,平均的净资产赢利率——这还是去年的统计结果——只有百分之二点几呀。上市5年的公司,我不排除这里面有好的公司,平均的赢利率是百分之二点几,而且这个赢利是不是真实的都很难说。咱们好多上市公司怎么搞?造假账。有的是一上市就造假账,上市以后跌破发行价。是先骗财政,后骗银行,最后骗股民。为什么股份制没有起作用?好多股份是不能流通的国有股和法人股。你现在百分之六七十都不能流通,不能卖,对企业不起约束作用。国外是这样:通过股票买卖,如果大家都来买股票,跌了以后,就意味着你这公司经理的经营不行了,就可以把经理给撤了。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改革国有企业的话,我们很难应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的这种竞争局面。但是加入了以后,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次机遇,也许可以通过引进外资,改造我们国内的企业。

总结上面所说的东西,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是利大于弊,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对于中国改革是起到一种促进作用。我今天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中国教育电视台供稿 邹伟、李小炜、封春英整理
未经本人审阅

余明阳 沱牌曲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华中科技大学
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 博士

名牌：中国企业的世纪难题

[2001 年 4 月在华中科技大学演讲]

很高兴与大家分享品牌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把强势品牌叫做名牌。对于名牌,同学们一定不陌生,年轻人中流行一句话,“身穿皮尔卡丹,脚踏阿迪达斯,手持摩托罗拉,坐着劳斯莱斯”,(笑)这些都是名牌。今天我就想谈谈中国企业创名牌的问题,讲三个方面。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企业为什么要创名牌。

中国企业创名牌是一种生存抉择,是被市场逼出来的。我们说:农业时代竞争土地,工业时代竞争机器,信息时代竞争品牌。名牌是 21 世纪市场的入场券。

如果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算起,中国市场竞争走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价格竞争”。刚刚开放市场的时候,我们的企业没有品牌,人们习惯于从街的一头走到另一头,看看哪个东西价格最便宜,当时老百姓收入很低,也很平均。第二个阶段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的“质量竞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以后,他们认为价格便宜买不到好的东西,不如价格高些买高质量的东西,当时叫“一步到位”。而那个时候,进口产品质量比较好,所以不管是否名牌,凡进口的都被认为是质量好的,太阳镜片上的商标都舍不得撕掉,美其名曰:崇洋不媚外。第三个阶

段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品牌竞争”。那个时候国产产品质量全面提高,无论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产品质量开始趋同,人们只能靠品牌来区别产品,所以“品牌热”兴起来了,各大中城市各种名牌专卖店风起云涌,连假名牌都受欢迎,一些人说假名牌好歹也沾“名牌”。像品牌价值高达 838 亿美元的可口可乐扬言,如果一夜之间世界上所有可口可乐厂家都被大火烧个精光,世界上第二天的媒体将登出两大消息:一是可口可乐着火了,二是世界各大财团纷纷要求向可口可乐注资,因为这是“金字招牌”。他们甚至说,不管谁,如果真的拿到了可口可乐绝密配方,生产的产品一模一样,你只要不叫做可口可乐你就卖不出去,名牌的价值可见一斑。第四个阶段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的“淘汰竞争”。产品不断丰富、市场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导致 90 年代中期开始进入名牌对杂牌的“大清剿”,最典型的是彩电全行业。1996 年,“长虹”——中国彩电业老大哥为了清理门户,开始大规模调低价格,引发了一场历时 5 年、历经“7 大战役”的中国彩电大降价,甚至去年彩电行业亏损,康佳、TCL、创维等 9 大厂家建立“价格同盟”,人们对此褒贬不一。我个人对以价格、质量、品牌综合竞争导致淘汰同行的做法持坚决支持的态度。一些企业不死掉,另一些企业就活不好。中国品牌杂、散、多、乱、小,生产要素组合不优化,缺乏国际竞争力,所以需要由群雄逐鹿走向几足鼎立,但是凭什么你来吃掉我?所以只能市场上作生死搏杀,来促使购并。我把这比喻为“大家都在水底下憋气,看谁能憋到最后,坚持不住的就淘汰出局”。(笑)这样一来压缩成本、整合营销,把管理水分挤干,最后几家大企业垄断市场,这些企业的运行质量就有望与国际跨国公司比拚一番。从彩电业来讲,原来的 200 多家厂家已经只剩下 70 多家了,而前 10 位企业几乎占 90% 的市场份额,如果不是地方保护,估计最多剩下 30 家。其他行业也一样,现有 6 000 家制药厂最后 3/4 会消失,2 500 家汽车厂家中能生存 100 家就不错了。以啤酒为例,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啤酒消费国,但我们“燕京”、“青岛”的年产

量不过百万来吨,美国百威年产量近1 500万吨,荷兰“喜力”占全国市场份额的57%。难怪有人说“80年代干什么都挣钱,90年代干什么都不挣钱”,“80年代人们见面问‘下海了’没有?90年代人们见面问‘上岸了’没有?”(笑)海不那么好下了,胆大就能挣钱的时候一去不复返了。第五个阶段是2001年开始的“个性竞争”。分化意味着深化,进入新经济时代,尤其是“十五”计划第一年,新一轮“战略热”又将中国企业推到抉择的十字路口,核心竞争力的盘点、可持续发展的前瞻、网络与数字地球意识的导入、WTO的挑战、法制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模式的选择,都将中国企业的名牌战略置于更为宏观的坐标之下,需要作更为个性化的设计与考量。

与国内竞争五个阶段层层递进同时,这20多年,中国市场还基本完成了国际竞争国内化与国内竞争国际化的过程。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两乐”水淹七军(北京北冰洋、天津山海关、沈阳八王寺、上海正广和、青岛崂山、重庆天府可乐、广州亚洲汽水);雀巢、麦氏威尔力拔三强(上海咖啡、云南小粒咖啡、海南力神咖啡);宝洁多品牌战略最后锁定柜台:“飘柔”的“又柔又顺”,“海飞丝”的“头屑去无踪,秀发更出众”,“潘婷”的“维他命原B₅,拥有健康,当然亮泽”(笑)……一种品牌打一个细分市场,最后全是他们几个“兄弟”。(笑)国产名牌“奥妮”广告变得非常悲壮“长城永不倒,国货当自强”。(大笑,掌声)一番搏杀之后,一些行业进口产品与国际品牌成功了,也有许多行业国内名牌大举收复失地:“立顿”红茶已在中国名茶面前失去还手之力;洋酒市场萎缩、价格下落;洋烟除“三五”尚有一定份额,其他产品基本退出;彩电国产品牌的份额为80%多,冰箱国产品牌的份额为90%多。因此我坚信WTO对民族工业冲击绝非灭顶之灾,像去年全球销售406亿的“海尔”等品牌与国际对话已有相当基础。(掌声)

浙江一位领导说,浙江有两件衣服一瓶水(雅戈尔、杉杉、娃哈哈),青岛靠的是五大中国驰名商标(海尔、海信、澳柯玛、双星、青岛啤酒),西雅图人动不动就自豪地说他们的波音、微软。一个名

牌的价值远远超过一万个杂牌,名牌带来的不光是税收,而且带来规范的管理,带来合格的社会公民。名牌是综合国力的象征,所以中央电视台要“生死攸关话名牌”。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企业名牌战略的四大支柱。

名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支撑它的是四大支柱。

第一大支柱:以定位为核心的发展战略。一个人没有个性是要被遗忘的,一个企业没有个性同样要被遗忘,甚至地区区域发展也有定位问题。以名城为例,我认为深圳从“试验田”到“改革开放的窗口”到“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示范市”这一系列定位的演进是成功的;大连“不求最大,但求最好”的思考也颇有见地;乐山推出“城市名片”;威海首创央视城市形象广告,都是名城战略有益的尝试。当然,目前中国沿江、沿海城市定位高度趋同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动不动就要建“国际大都市”,这种一厢情愿、不切实际的发展定位也是非常幼稚的。

企业名牌的战略定位更加具体。20世纪80年代挣钱太容易,所以,90年代盲目多元化害了不少企业。有人统计发现,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不足3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两三年”。(笑)一个企业一成功,企业家办公桌上最多的是奖状和可行性报告,一方面让企业家陶醉,另一方面让企业家盲目投资。人类难免有些“行业厌倦症”,干了几年以后总觉得缺乏刺激,而且产品总是自己的好,产业总是人家的好,加上游说投资者多半强调此项目如何如何的好,若老总你不是杰出企业家、经营大师,这么好的项目我是绝对不给。(笑)老板头脑发热,一下子进入自己完全陌生的领域,从研发、网络到人力资源都无法跟上,最后大都是“三拍主义”: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笑)我经常讲一个人拿出自己毕生精力做一件事都未必成功,想要多元化是谈何容易。所以,我提出一句话:一个人在成功前要把握机会,在成功后要放弃机会。成功前你可以浪费时间、浪费金钱,但你不能浪费机会,因为有可能浪费了一个机会就浪费了一生机会,而机会只会降临

有准备的头脑。然而,成功以后,你必须学会放弃,因为成功后到处都是机会,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胃口太大导致食而不化,最终一事无成。而事实上把握机会是很幸福的,放弃机会却是很痛苦的,因为凡机会都极具诱惑力,这就要看个人的定力了。

投资和产业跨越更是如此,你成功地决策了一万次,只要你第一万零一次的决策失误,就有可能将一万次挣的钱全部赔光。所以企业在定位的发展战略方面一定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小心谨慎,切忌飘飘然自我感觉良好。“上帝让谁灭亡,先让谁狂妄”。(掌声)

定位如何界定,最关键的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即发掘和弘扬自己的优势。优势是相比较而言的,因此不光要看自己有什么,还要看他人没什么。看到自己家里照到了太阳,就以为太阳只照到了自己家里,那么麻烦就大了。(掌声)

第二大支柱:以人力资源为核心的基础管理。这看上去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人们常提它就是目前还没有解决好。

基础管理的关键是理顺管理关系,首先是决策关系。我们国有企业“厂长”与“书记”的“中心”与“核心”之争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即“领导”与“负责”分离问题,一直是一个敏感话题,这不是谁对谁错,而是体制要顺、机制要顺。我提出“双十六字原则”,即:“贤者居上,能者居中,工者居下,智者居侧”和“高度集权,充分授权,有效监督,良性互动”。实际上企业的竞争,小胜靠技巧,中胜靠眼光,大胜靠人格魅力。有道是小企业做事,大企业做人,因此,决策者即企业家是灵魂。拿破仑说:世界上只有无用的将军,没有无用的士兵。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一头绵羊带领一群狮子打不过一头狮子带领一群绵羊。企业是企业家性格的外化,有什么样的企业家就有什么样的企业,因此,企业家要当贤者,要富有人格魅力,要成为精神领袖。企业家做的无非是决策和用人两件大事,即决定这个事情做不做和让谁去做。管理上不是分权,而是授权。授权有多大?以充分能完成责任为准。授权的同

时要予以监督,让人无法犯错误,而不是凭他的良心去做或靠道德约束,这样方能建立人人都有责任,人人都敬业工作的氛围。

人力资源无疑是企业中最宝贵的,我认为人可以分成人手、人才、人物三个层次。人手是干活的,多的是,人才就比较难得,而不可取代的人才就是人物。人物不一定去当官,像北京百货大楼的张秉贵、大庆的王进喜,都没当过什么大官,但他们都是人物,是不可或缺的企业财富。至于用人标准,我的排序是:忠诚、敬业、专业特长、亲和力、学习力。不忠诚,越能干就越有破坏力,所以忠诚是第一位的。敬业就是肯干。我认为肯干比能干重要百倍,只要肯干一定会能干起来,但如果本身很能干,就是不好好干,再能干也是空的。专业特长是个人的核心竞争力,即一技之长。人才忌讳什么都懂得又什么都不精,说起来头头是道,紧要关头就不行了。亲和力是协作的包容、共处、互补的能力。现代社会是高度分工合作化的,不合作光单干是不行的。学习力决定发展前途。在知识化、信息化的今天,停止学习就是停止进步,学习力的极限,就是发展的尽头。

要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就必须建构共同的价值观,或叫做企业理念。没有崇高的理想与价值追求,其眼光一定短浅,前途不可能远大。在陕北我见过一个十七八岁的放羊小伙子,我问他:“放羊为了什么?”“挣钱。”挣钱为了什么?”“娶媳妇。”娶媳妇为了什么?”“生娃。”生娃为了什么?”“放羊”。(大笑,掌声)再比如说一个老大爷在凿石头,你问他干吗,他回答“凿石头”、“打地基”、“盖宫殿”,是不是不同的回答就体现着不同的价值观取向呢?

当然,并不是要求企业中的所有人都有特别崇高的理想与价值观,更多情况下需要的是制约机制,制约能让人在契约之下完成共同的或各自的使命。以《西游记》为例,这4个人(如果称得上人的话)差异大了,唐僧是高僧,精神境界非常高,一心想去西天取经。孙悟空爱憎分明,但他不见得对到西天取经那么虔诚,只是碍于紧箍咒不得已而为之。猪八戒则几乎把人类的一切毛病集于一

身,好吃懒做,革命意志不坚定,生活作风还严重不检点。(大笑,掌声)但他们都能取到真经,这制约机制的力量就不言而喻了。

第三个支柱:以服务为核心的整合营销。现在可以说产品高度趋同、成本高度透明、技术高度共享、促销高度克隆,从整合营销的角度来做名牌,关键就在于服务。

我认为:服务就是努力给自己找麻烦,努力给人家提供方便的工作。人之初,性本惰,要克服惰性,就一定要强调教育与培训。麦当劳这一点做得很好,“麦当劳不出坏孩子”,是因为他们靠培训把人的勤勉、敬业、服务意识牢牢地扎根于人们的心里。他们强调与其靠墙站着,就不如打扫卫生,只要客人少些,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拖地、擦窗,服务员绝不会去扎堆聊天。同样是中国人,同样的年轻人,为什么在麦当劳和在大量的其他企业会有这么多的差异?

服务最为根本的是真正站在消费者角度想问题。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前一段时间报道中国向日本进口缝衣服的针。实际上针的科技含量并不高,不是我们不会生产,但我们的针的针眼是圆的,因为针直径不大,针眼就非常小,上了年纪的人老眼昏花,很难穿针引线;而日本人把针眼做成细长式的,穿起针来非常容易。这是什么问题?绝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意识问题,是服务意识到家不到家的问题。

以服务为核心,将各种营销要素整合起来。整合就是创造,就好比职业足球队一样,不引进球星,好的教练只要对位置、技战术作个整合,其战斗力马上可以上去。

现在我们强调“哑铃型企业”,即研发、营销力强,生产过程相对虚拟化,像耐克,人才集中在品牌研发、营销方面,生产环节以定牌监制为主。未来的企业已经是无形的控制有形的发展,过去最值钱的是厂房、机器、设备,现在最值钱的是人才、商誉、营销网络等。

第四大支柱:以个性为核心的形象系统。品牌形象是动态的,国外有品牌“保姆”专门从事品牌呵护。

品牌形象首先是品牌名称,一个好的名字对于品牌形象的作用太大了。宁波有一个衬衫厂,过去叫“青春”,一直叫不响,后来改成“北仑港”,也只有宁波人才知道,直至以青春的英文谐音改为“雅戈尔”以后,才确立了“中国第一衬衫”的地位。“春兰”作为空调来说非常好,但用于摩托车就略显娇气,使用“春兰虎”、“春兰豹”就不太理想,“武汉健民”形、意都好,但谐音就不太理想。我们创意过许多品牌,像西藏的“珠峰圣茶”就是将自然资源和宗教资源注入产品、提升形象和卖点的成功案例。

视觉形象又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过去我们习惯将拼音字母组合在一起了事,比如“望江宾馆”就变成 WJ,跟武警一样,(笑)万一叫“望城宾馆”就变成 WC,人家就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了。(大笑,掌声)

有了名称、视觉,就需要用广告来推广,而我们大量的广告投放就像河里炸鱼,炸死多少算多少,炸不死运气不好。(笑)首先,现在广告到达率越来越低。有线电视开通后,哪里都可以收到 20—30 个台的节目,调查表明,现在老百姓家中的调节器每晚至少按 260 次,这么大的选择性就大大影响广告到达率;即便到达了,目标受众也可能错位。像“金龙鱼”食用油广告在央视一套晚 7 时节目预告点最黄金时间播出,到达率很高,但主销人群家庭妇女却很少收看,她们或在做饭,吃饭,或者收拾,要等 8 点《还珠格格》开始才坐下来。(笑)该看的不看,不该看的看了。到达了、目标人群也看了,但未必记忆。我做过“形象代言人”效果调查,发现记住形象代言人的人群中,只有 6.5% 记住了该人代表的产品。也就是说,人们主要是看美女,顺便、也很少去看产品。(笑)真记住了,还牢牢记住了,也未必就购买。“秦池”第二次投“标王”时,花了 3 212118 亿,是个天文数字,但绝对失算。因为当时“秦池”知名度已近 100%,再“轰动”也轰不到哪里去,只会使人担心广告量如此大,产品成本一定很低,品质一定不行。广告词一出“永远的绿色,永远的秦池”就标志着失败。谁因为绿色去喝白酒?我们

分析“蓝领”喝白酒是为了嗜好和解乏,“白领”喝白酒是为了情感与气氛。沱牌酒的广告“悠悠岁月酒,滴滴沱牌情”,就诉求比较到位了。

形象还有一项工程就是防止品牌老化,中国最早的“十大驰名商标”已有6个老化了。“凤凰”、“永久”、“霞飞”都像是一个久远的故事了。

上述四大支柱,支撑起名牌的大厦。

第三个问题,讲一讲企业与专家一起共创名牌。

名牌的创造过程是一个强强合作的过程,是企业家与咨询策划专家共同创造的过程。

企业必须利用社会资源,许多社会资源对企业来说不求所有,但求所用。西方企业资产超过1000万美元就必须有规范的智囊机构,或独立董事,或研究院所,或咨询顾问。寻找外脑不是说自己不聪明,不是谁比谁聪明,而是谁比谁专业。我作过一个比喻:你可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理发师,但你自己的头发必须别人帮你理;你可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外科医生,但你自己绝对不能拿个卫生棉球回家把阑尾给割掉了(笑),这就是专业化的要求。

咨询人应当成为专家。专家与学者不同,学者是把简单的变复杂,专家是把复杂的变简单。做学问选题要小,研究要深入细致,旁征博引,管中窥豹,并不是把自己知道的说出来,而是努力要把别人不知道的揭示出来。做咨询则要一言中的、一剑封喉,切忌泛泛而谈,说一些永远不会错的废话,要简单而有操作性。

作为目前咨询界,最大的问题是规范差、合作少、素质低。许多知识分子下海,首先会想到做咨询,好像没有什么风险,是无本生意。但传统两句话很是害人:同行是冤家,隔行如隔山。同行也不能合作,隔行也不能合作,到时候全都单干。5个人办一家广告公司、咨询公司,到第二年就变成了5家公司。因此目前咨询机构数量多、质量低,组合力量不足,是一种严重的制约。

综上所述,名牌是中国企业的世纪难题,是一项生死抉择,创

造名牌是市场和环境下的必由之路,是新时代和国际化的入场券。但并不能把名牌理解得很简单,以为“名称+广告”就可以,名牌的背后是战略、管理、营销、形象“四大支柱”,需要企业家与专家强强合作共同创造。这就是我今天讲演的内容。(掌声)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供稿

录音整理:李元根高级记者,已经本人审阅

人文访谈

冰心百年追思

——访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老舍之子舒乙，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冰心之女吴青

金秋十月，我们来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永远的爱心——冰心百年诞辰纪念展”今天在这里举行。2000年的10月5号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冰心先生诞辰百年纪念日。冰心先生是五四时期的文学元老。她的作品，感染了几代读者。她的人品，更是为广大读者所景仰。冰心百年诞辰之际，中国现代文学馆以独特的“冰心作品朗诵音乐会”的方式来纪念她。我们也以专访形式，缅怀这位世纪老人，世纪大师。

叶宝生：舒馆长，10月5日是冰心先生的百年诞辰纪念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长，您是如何评价冰心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另外，我们今天纪念她百年诞辰，现实意义是什么？

舒乙：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冰心先生是1900年10月5日出生的，到2000年正好是100年。她活到99岁。你想一个人，整个20世纪她由头活到尾，这样的人很少。她在中国应该称是第一女作家。为什么这么讲？她走上文坛，对于中国现代女作家来讲是相当早的一个。1919年五四运动，她就走上文坛了，所以她确实是五四元老。巴金先生称她为五四最后一个元老，这句话是非常

准确的。她走上文坛的时候恰逢五四运动,她头一篇处女作是描写五四学生运动的。她在街上看到了这个运动,回去后就写了一个目睹记。所以你看,她走上文坛的第一篇文章,恰好是描写五四运动的。说她是五四运动最后一个元老,非常准确。当然,她后来的名气很大,在女作家当中她的名气是最大的一位,这是非常值得一提的。因为中国女作家很强,比如革命女作家里有丁玲,但是我们一般都管冰心先生叫做文学的祖母。为什么?因为她活的岁数最长,她在整个20世纪里头差不多有80年的时间活跃在文坛上,所以她的影响自然是非常大。我举一个例子,比如今年,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文学评选活动,叫做“百年百种优秀读物评选”。就是请很多重要的评论家、学者,很多很重要的出版社,大家共同来选,选定100年当中最重要的100部文学作品,看看哪100部能够入选。鲁迅先生当然是最棒的,他入选了四部。其次是老舍先生,他入选了三部;另外还有七个人各入选了两部,这里面头一个人就是冰心先生。冰心先生在这100部里面入选了两部,这很不容易。第一部是她最早的一部诗集,叫《繁星》;还有一部是她的一部散文集,叫《寄小读者》。这两部入选了百年百种优秀读物。可见,在中国这么多作家当中,她能够在这100年100部里头进入两部,证明她是名列前茅的一个作家。然而,她不只这些,打倒“四人帮”后她复出,这时她已经80多岁了,又写了大量的文章。这时候的文章与她年轻时的,比如说《繁星》、《寄小读者》相比,已经是判若两人了。一是文笔判若两个。她晚年的文笔写得非常简练,大白话,不用形容词;而她年轻的时候形容词用得多了,而且自撰、自适,在某种程度上很美但不是很通俗。她晚年不是这样子,把文章写得很短,就说那么几句最要说的话。文章简洁得要命,但非常通俗,非常流畅,不加形容词。她最短的一篇文章100多个字。人家千字文,她百字文,这百字文可比千字难多了。她的文风有了重大的变化。二是她所挖掘的东西有了重大的变化。比方说她年轻的时候喜欢写大海,喜欢写自然,喜欢写母亲,喜欢写家庭,喜欢写友情等这样

一些主题,后来有人把这归结为爱的哲学。我觉得她后期跟她最早的东西是相通的。她最早的东西,她刚走上文坛的时候,除《繁星》、《寄小读者》以外,非常有名的一些东西是问题小说,代表作有《超人》、《斯人独憔悴》等一些作品,也是描写五四前后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的。这证明她刚走上文坛的时候,是非常关注当时的社会的。她走上文坛就是这样子。她晚年的东西从内心来看和这是一致的。她关心社会问题,但晚年为什么更厉害,因为她站得更高。她关心整个社会、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甚至人类的命运,所以她成为一位大师。因为她老了,看的多了,比较的多了,深思熟虑了,这时候,她的很多思想变得十分犀利。在很多人的眼睛当中,包括读者,包括评论家,包括外国研究者,都觉得冰心先生是个温和的女性,是个天使般的人物,提倡爱,提倡对大自然的尊重、对妈妈的尊重、对长辈的尊重、对孩子的尊重等等,你会觉得她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柔的、可爱的女性。实际上从外表上来看,她非常平和,甚至于枯干瘦小,没有什么力气,永远是微笑;可她的内心,看问题却非常尖锐,就把她早年写问题小说的那种尖锐性捡了回来。因为她站得更高,她关注了一些更大的问题,发表了一些非常有见解的观点,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极大。我这里有很多读者给她的信,她是中国老作家当中获得读者来信最多的一位。多到什么程度呢?她发表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不长,但是能引起巨大的波澜。此话怎讲?她就可以每天获得雪片般多的读者来信,以至于要用麻袋来装。这证明她在社会上极有影响,虽然那是一篇小文章,但它的影响超过了《寄小读者》。《寄小读者》一年之内翻印了30多次。一年之内,当时对于新书籍这是顶了天了。但你看她后期的东西,仅仅一篇短文,就要引来以麻袋装的读者来信,这就证明她在整个社会当中有巨大的影响,她就等于是站在高处振臂一挥,马上就有大量的人响应。这就证明她是一个伟大的人,一个大师级的人。她能够把问题挑得很明,让大家都引起巨大的共振。举个例子,她谈教育问题,她就非常执著,她就老把你抓回来,归到她的思路上

去。我到她家乡去看了,她家乡叫长乐县,在福州旁边。回来时我就很兴奋地跟她讲,长乐的变化很大呀,有国际机场,有高速公路。她就把我截住:“教育呢?”“噢,教育长乐也不错啊!它是教育先进县,普及了九年教育啊……”然后又扯到别的地方去了。她马上给我找回来:“教育呢?”“噢!你家乡的小学又加盖了二层楼”……怎么样,怎么样,又谈到别的地方去了,她又给我抓回来:“教育呢?”当她问到第三个“教育呢”的时候,你马上明白了,她头脑里就只有这个。为什么?她认为这对整个国家生命攸关,必须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她就这么执著地去对付所有的人,包括国家领导人,包括教育界领导人,包括教师们、孩子们。她就认为,要拯救我们这个国家,要把我们这个国家从落后的状态迅速地赶上来,只有一个办法:办教育。

所以你看她那么老,但她的观点却是那么执著,那么犀利,这就和你我不一样。你我讲一讲就溜题了,但她不,不是讲第一位吗?这就叫第一位。这就是大师的价值。这就是她比我们超出去的地方,就是伟人的价值。有这样的人拿着棍子在旁边敲你,你肯定是有希望的。你不会离题了,你不必转胡同了。这就是她的价值。她走过 100 年了,她知道正反两方面的教训。那些东西告诉她,如果教育不抓好,那我们国家的发展速度肯定上不去。她虽然是个文学家,但表现出来,她晚年是个大思想家。她为什么那么有影响?她就写了一篇关于教育的文章,全国的老师,全国的家长,全国的儿童都响应:我们跟着你。政府当然很欣赏。有这样的老先生替我们呼吁呐喊,帮助我们把方向,那国家当然有希望。所以应当说,她晚期的作用比早期在某种程度上要大。综合一看呢,因为她活的时间很长,所以她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的确是出类拔萃的。所以我们今天隆重地纪念她,讲她这些故事,道颂大师的价值,跟随她前进,为什么?因为她热爱这个国家,热爱这个民族,热爱这个人民,热爱这个人类。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跟着她。这就是我们纪念她的意义。

叶宝生:吴教授,冰心先生生前最喜欢玫瑰花。一年多前,玫瑰花瓣撒满了冰心的灵床。我对这个景象还是历历在目的。这一年多,您脑海里出现的最多的最好的景象是什么呢?

吴青:我觉得……出现最多的就是妈妈在这个桌上写文章、看书的景象,还有妈妈接待各界人士的景象,有年老的,有年少的。还有就是每次我帮妈妈做了什么事后,妈妈高兴的样子。我觉得这一年多来,尽管妈妈的肉体已经不存在了,但妈妈的精神、妈妈的一切一切,时时刻刻都在我脑海里出现,也伴随着我做一切事情。尤其现在我觉得一个人的人品是最重要的。我到哪儿去以及这一年多来我多次被采访,我觉得人们最欣赏的,也是一个人的人格。所以我觉得在经济浪潮中,人们能够越来越欣赏人品的伟大,我认为,这正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有希望的地方。这是人们在更多地呼唤正义、公正、法制。妈妈特别喜欢鲜红的玫瑰。玫瑰花特别美,尤其它的花瓣、它的那种鲜艳的颜色,另外它的香味又不刺鼻,特别香。但它是带刺的。因此,妈妈说,它有风骨,有原则。这就是为什么妈妈特别喜欢玫瑰花。

最近,我和我爱人被邀请参加昆明国际花卉节。在花卉展上,由法国国际美兰得花卉公司提供了一个新品种,命名为冰心。我就觉得……一个人……她……她的人品最重要。她的人品、她的作品……妈妈……对于很多代人有所影响。我在去昆明时,还回了成都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妈妈教的许多学生都来看我们,有一位老先生都已经80岁了,还有一位70多岁了。妈妈当时是在附近一所中学当义务教师,不收钱的,教了一年多。他们都觉得从妈妈那学到了很多很多,尤其是人品。我就觉得我们这个国家需要大家都来关心我国的前途,我们国家的命运。我到那儿以后,我就觉得确实是感到非常温暖。而且确实感觉到我妈妈不属于我一个人,而是属于大家的;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这品种是法国国际美兰得公司提供的。我妈妈在法国住过100天,当时她写了两篇文章:《在巴黎的100天》、《我的房东》。妈妈经常回

忆她在巴黎的那 100 天。相信冰心玫瑰不仅会加强中法人民的友谊,也会加强全世界人民的友谊。因为我觉得鲜花其实是代表大自然,是代表一种和谐、和平、一种分享的氛围和精神。

叶宝生:吴教授,冰心先生生前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在这方面,你感触最深的事是什么?另外,你从事社会活动与你妈妈的影响有什么样的关系?

吴青:妈妈非常关心儿童的成长,因为妈妈经常说:他们是祖国的未来。她希望他们能够在一个很平和、很健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我记得从前有许多父母带着孩子来看妈妈,都说希望他的孩子成个名人,成个作家。人成为什么,尤其是成为一个作家,首先你就要有那份情,你想写出这份情,让人民承认你,你才是个作家。不是说你想成伟人就成了伟人。在妈妈看来,自己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所以有些时候妈妈就觉得一些父母太过急于让孩子出名。妈妈建议不要让这些孩子在温室里成长,要他到大自然中去成长,让他经风雨,见世面,让他逐渐成长起来。在我们三个孩子长大的过程中,妈妈特别强调作为孩子来说,你就是你。你要能够说老实话,能说实话,不欺负人;你自己作出的决定,你就要去承担。而不是说,父母会给孩子作出一切的决定,使得孩子将来永远不会作决定。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妈妈确实给我们很大的自由度,就是定了原则以后,该由你自己去摸索你自己的道路、自己前进的方向。我跟妈妈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最长,妈妈对我很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首先,当老师,我爸我妈都是老师,所以平时到我家来的都是学生。这些人谈的基本上都是怎样关心自己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所以我就觉得我妈、我爸对我们的这种教育确实是身教言教。他们的那些朋友,也都是说直话,对自己的国家民族非常关心。比如说我母亲的朋友中间,去世的有夏衍夏伯伯、赵朴初赵伯伯,另外还有健在的巴金舅舅、雷洁琼姑姑,这些人都让人觉得确实是非常正派。由于她们这种教育,身教言教,使得我觉得,我也自然而然地会交这样的朋友。同时对学生也有这份情。

一个人生活必须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实际上就是你的精神支柱。如果有一个很明确的精神目标的话,我觉得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面临挑战的时候,他都能把持住自己。我觉得这点上我也深受我父母的影响,就是人生活要有一个目标,要跟大的事业结合起来。我母亲一直活到 98 岁,她去世是在 1999 年,在她神志非常清楚的时候,我跟她讲很多事,比方说到农村去呀,我到工厂去呀,我看到的一些现象,妈妈都有极其鲜明的爱和憎。我觉得这就是妈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妈妈会喜欢玫瑰花。妈妈非常支持我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能够代表人民发言,谈他们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 1989 年初我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时,妈妈给我写了林则徐的那两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我妈妈很有意思,那时我不是人大代表吗?每个礼拜二下午 4 00—5 30 是我接待选民的时间。有时候我出去办事,妈妈总说我不是人民。你出去给人民服务了?但是妈妈还是很理解我的,所以我觉得我妈妈非常支持我。这就是为什么在 90 年代我给群众汇报的时候,最后感谢时,我说我感谢我的妈妈对我的理解……我也很感谢我的爱人。因为我每次不在的时候,他要么在家里,要么到医院去陪我的母亲。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做的这一切要感谢很多人……我要感谢我父母对我的教育,我还感谢选我的这些选民给我这个机会去做。

最后,我还是想说我妈妈的那句话: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的一切。

叶宝生:吴教授,我们觉得冰心先生晚年的文风有了一些变化,请您谈谈。

吴青:实际上,关于文风的改变,我觉得不同的人看法不一样。我记得在 1980 年时,我参加了由首钢支持举行的一次妇女研讨会,就有几个年轻的女记者走过来,她说如果人们光评论冰心只是写星星和大海的话,这是不公正的,因为她非常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当然,她的文章里并没有那些口号式的东西,字里行间都是

带着对祖国的热爱,即使她在写母亲的时候也是在写祖国。你像她那个《纸船》,母亲,这也是祖国母亲。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起,妈妈的文章就越来越尖刻,非常“辣”。我觉得这正说明了她的风骨,她敢于和一些坏的现象作斗争,敢于揭露一些坏的现象,所以不讨一些人喜欢,但她也无所谓。而她发现她的那个文章《我请求》被人家改掉了,非常生气。所以后来每一次发现如果要改稿子,那么就不发表。因为她觉得她的文章是她的想法,你不能够随便删改她的想法,你不发表没关系。

那时候,妈妈讲过她所谓的“五不怕”。她说我不怕离婚,她说我老伴已经死了;我不怕坐牢,要是这样我还能够誉满全球,坐牢你还得有人陪着我;我也不怕杀头;我也不怕你给我免职,她说我没有任何职务;我也不怕所谓的“开除党籍”,她说我什么党也不是。无私才能无畏。我觉得正因为她无私无畏,所以她能够更得到人们的喜爱。因为她没有“随风倒”,坚持了自己的原则,坚持了她自己说的。她为什么喜欢玫瑰花?我觉得这正是妈妈的独特之处,她能够坚持到底,越来越关心这个国家的命运。因此,我就觉得,妈妈从80年代以后的这些文章更能够反映妈妈后来的一种心态、一种心情。也是她从1919年以后的这种精神的继续。所以我觉得妈妈很特殊。她人老心不老,这也是她很特殊的地方。即使是潮流变了,她还是没有变。我觉得这也是她很特殊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妈妈确实是很特殊。

反过来呢?她又非常地平易近人。她不觉得自己很特殊,就觉得自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她的情感,她的生活各个方面,都是很平平常常的。我们周围有一些老邻居来看她,也挺好的。所以,她很平易近人。我最记得就是当时在四川,我们住在歌乐山,有人敲门,问“谢冰心在这儿吗?”我妈妈其实就在那儿,人家问“你们家的女主人在吗?”以为我妈妈是个仆人,因为她就穿着一件丹士林大褂在家。她一般出去才换衣服,平常在家就穿那样的衣服,人家以为她是个佣人。不只是她的穿着,她的什么都非常平易近人。

所以我觉得我妈妈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很特殊,她就是普通的一员。我觉得可能这也是一种很大的辩证:你越是觉得自己是普通人,可能在群众的心目中越高;你越认为自己要成为什么人,可能你什么都不是,尤其是在你死了以后,你什么都不是。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存在,最关键的就是像我父母那样,你坚持自己的原则,永远使自己的品格都是清白的。这样你的人格反而较高,你尽管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有,我觉得这个“有”就在于人民。

爸爸、妈妈给我的感觉:你有一个事业追求,这个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障碍,很多的挑战,但是你不用去怕它。所以我妈妈会给我写林则徐的那两句话。而且我觉得一个人在遇到“危机”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是危险与机遇并存,你克服了危险就是机遇。我觉得我妈妈这个人人品很好,很关心这个国家,到老她都在关心这个国家,因为她在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更加的民主,更加的透明,能有更多的人来关心她。所以我觉得这点确实很不容易,尤其是到最后都这样,确实是非常值得学习的。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妈妈非常坚强。她80岁的时候,先得了脑血栓,到后来又骨折了。她脑血栓、骨折以后,右手根本不能写字,走路也走不动。但就是在她80岁那一年,她写了《生命,从80岁开始》,她又重新学走路,重新学拿笔。当时我在医院陪她,我扶着她的手写字,写1个、2个到5个、10个、100个,再到更多。所以你看她后来写字手都不抖,很不容易呀。80岁学走路。那时候,阳汉笙阳伯伯也在住院。他们分别从两边走,走到中间休息一会儿,然后再走。妈妈拄着拐杖,有时候汗流浹背。所以我觉得妈妈非常地坚强,这也是她很特殊的地方。她到那么老还在关心国家,还在学习。有人就觉得,哎哟,我60岁了,老了,我不能再干了。妈妈从来没有觉得,她没有觉得自己老过。因为她心不老,她觉得自己还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不容易。我记得妈妈刚得了脑血栓,右手不能动,当然她并不知道自己的前途会怎么样,非常难过。她说如果我手不能写,我活着还有什么用

呢？就是说明她的事业心非常强。她觉得她的右手就是能够为人民服务、献出更多东西的手。所以我觉得妈妈的事业心非常强。她非常的坚强，就因为她觉得她使命没有完成。所以，我现在就觉得我必须继续完成或者说接过接力棒——妈妈他们五四要科学要民主这个接力棒要接下去。我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勇气来自于爸爸妈妈对我的教育，这种精神上的支持，精神上的粮食是取不尽用不完的，这是极大的财富。最最大的财富可能就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永远存在的这么样的一种精神！

舒乙：去年，是甲午海战 100 周年，冰心先生打秋天起就想写一篇文章来纪念它。有一次，我去看她，一见面她就说：“我要写一部大作品。”说这个话的时候她表情很严肃，绝不是在说玩笑。我着实大吃一惊，她这几年是不写长文的，她的文章一篇赛着一篇短，差不多都是千字文，最短的不过才 50 多个字。写短文是她最近的一种文学主张。她主张文章要精练，要短小，绝不说废话，没有虚词，要干巴利落脆，这次居然要写大作品，这还得了。冰心先生说她要写甲午海战，现在知道甲午海战实况的人很少了。她说她知道得相当多，是她的父亲告诉她的——是她父辈们那些海军将领们告诉她的。因为冰心先生认识萨镇冰。萨镇冰曾任中国海军司令，她跟萨镇冰非常熟——而他们都是甲午海战的参加者，连她的母亲也是甲午之战的间接的受害者。

冰心先生开始仔细而热情地准备创作这部大作品，我看见她桌上放着好多部不同的《中国海军史》，都挺厚的。她还请海军司令部派人到她家来，详细地向这些前来的海军军官询问有关海军的情况。海军们都很惊讶：怎么她会提海军有没有上将，有没有巡洋舰这样特别“海军术语”的问题。老太太笑咪咪地说：“我最爱海军，我是在水兵中长大的。”

可是，冰心先生竟没有写成。不是因为生病，而是因为哭。每次提笔她都大哭，哭得完全不能写，一边哭一边说：“气死我了，气死我了，真可恨！真可恨！”她是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真可恨！

我领略过几次冰心先生的哭,那是种真正的冰心式的哭,那是一种真正的大哭。很吓人,双手捂着脸,号啕大哭,声泪俱下,荡气回肠,毫不掩饰,不管当着什么人,来势极猛,像火山爆发,是一种最真挚的感情的流露。我从此知道了什么叫“号恸大悲。”

暑天八月,我又去看她,她的家人悄悄地告诉我:她清晨又曾大哭,只缘想写甲午海战,竟不能提笔,完全没法写下去。我愕然,深深地被她的深仇大恨所感动。以后,冰心先生病倒了,住了院,一部大作品就这么没写成,实在是可惜了。不敢说它必是杰作,但以冰心先生的态度的真诚,思想的敏锐,文笔的清晰,它肯定会是一部心血凝结而成的作品,字字都会淌出血和泪来。她有深仇,有大恨也有大气,这是能出佳作的基础。

10年前,吴文藻先生病逝的时候,来了很多吊唁的友人和学生,冰心先生当着人没有落过泪。谁都知道她和吴先生是模范恩爱夫妻,她把泪藏在心里,坦然地渡过了那段最痛苦的日子。后来写成了一个纪念长文,文字却非常活泼,还写了大量吴先生的玩笑。可见,她并不是有泪轻弹的。冰心先生的恸、号恸,全是为了可爱的朋友,为了多难的祖国,为了民族遭遇的屈辱和动乱,多少次了都是这样的。她是位真人,坦诚而透明,她落的泪就是她的诗,一种最激烈、最博大、最无私、最奔放、最抒情的诗,字字都厉害、铿锵有声。

我讲的故事使当时在座的海内外的同行大为动容,他们以前都不曾听说过。大家都为先生未能完成那部大作而惋惜,以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大损失,盼着老人能早日康复将这部世纪的故事最终搬上稿纸,了却她的最大心愿,也是大家最大的心愿。当然,这个心愿永远无法完成。

老舍先生和冰心先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两个相差一岁,一个是1899年生,一个是1900年生。

叶宝生:对,去年我们纪念了老舍先生的百年诞辰。

舒乙:嗯,嗯,嗯……他们相识得很早,我估计呢是30年代在

燕京大学,嗯,老舍先生由济南回来,到燕京大学去找他们夫妇,那个时候相识的吧?!我估计介绍人呢可能是郑振铎先生。以后一直到抗战的时候,都在大后方。一开始,冰心先生在昆明,后来也转到重庆了;老舍先生就一直在重庆嘛。在重庆的时候,有很多交往。那个时候,老舍先生非常孤独,经常到冰心先生家里去聊天啊,喝酒啊,谈心啊,跟她的孩子玩啊,所以有非常好的友谊。冰心先生的孩子管老舍先生叫舒伯伯,几乎是孩子心目当中最受欢迎的朋友。抗战结束以后,老舍先生到了美国,冰心先生到了日本,后来又都回到北京了,一起在作家协会里面工作,而且冰心先生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介绍人是老舍先生和丁玲先生,一直保持了一辈子的友谊。我觉得他们之间吧,好像有一种心灵相通的东西,就是太熟知了。我举一个例子,有一天我去看冰心先生,她就说我知道你爸是怎么死的。我说:你怎么知道呢?她说:我知道。她说第一,他一定是自杀。第二,他一定是投水。我说这个你怎么判断的呢?她说,你不信,你去看他的小说。我说他的小说怎么呢?她说,他的小说有三个特点:第一呢,好人都姓李。第二呢,好人最后的结局都是自杀。第三,自杀的方式都是投水。哎哟!我简直头一回这么来听说。回去之后,我就老老实实把《老舍文集》从头到尾再念一遍,她讲的这三条还真是那么回事。她确实熟知他的作品,也熟知他的为人。她就是能够凭她的那种“第六感”,敢下一个什么什么结论,这个结论是非常有根据的。他们的心灵是绝对地相通的。

而且,我觉得他们很多主张,虽然彼此没有商量过,大家都是“五四”的人,都是先驱,都是启蒙者。老舍先生有个很好的主张,他不对我们说,他文章里头有:我要有孩子的话,我不要他们门门都考100分,当功课的奴隶、书本的奴隶。不要,不要那个“唯有读书高”。我要有个儿子,我让他当木匠去、拉车去。我要有个女儿的话,让她跳跳舞,唱唱歌,知道一点儿历史,识几个字就行了。总而言之,他不要自己的子女通过“唯有读书高”爬上去,骑在人民头

上,干其他的事。他是这种思想,冰心先生一样。她说我们这一家,由祖辈一直到我这一辈,一直到我儿女全是老师,我们以当老师为骄傲。她也是这种思想,她不主张都去考100分,然后去当个官,怎么怎么样。她说教育最重要,教育虽然很清贫,但是教育很伟大,我们一家以当教育家为荣。然后呢,她就说,孩子要让他顺其自然地发展,要保持孩子的天真。这些东西,他们没有商量过,就是五四那种精神,就是心灵是相通的。

小画家去找冰心先生,父母带着,就介绍这个小画家如何如何好,要求冰心先生夸奖她,给她题字,给她怎么样。冰心先生马上就生气了。她说:你们停住,不要再往下说了。她说,你看这个小孩子就一小姑娘,你看她多可爱啊!她来了以后,就钻到我旁边玩我叫人用的那个电铃的按钮,她完全是个孩子。她注意这些小玩意儿,她的心很天真活泼,你们非要把她装扮成个大画家,摧残她,你给我把她带回去。不要这个样子,停止这样。她这种思想就跟老舍先生那个思想完全是一致的,他们彼此没商量过。他们虽然人很老,但是思想非常超前、非常先进,正是这批人的价值。他们的思想我们现在达不到,而且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孩子和家长都不这么看问题,可是实际上她是对的,所以我觉得这一辈人了不起。他们居高临下的那种眼光啊,那种远视啊,那种超前啊,那种前瞻啊,那种前卫啊,不得了!冰心先生去世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个散文诗,题目叫“告别世纪,告别大师——纪念冰心先生”。我朗诵给你听:

冰心先生走了。此前萧乾先生走了。走的都很平静。可是,给我们的感觉却是轰隆轰隆两声巨响。宛如擎天柱轰然倒下,响得不得了。连心都跟着震动。

冰心先生走了。走的是一个人。可是她说过:叶圣老活着时,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叶圣老走了,她就是万人之上。如今,万人之上的也走了,万人之上突然空出了一大截儿,大得没了边儿。

冰心先生走了。正如巴金先生说的:“冰心先生是五四新文学

运动的最后一位元老。”此话极准确。冰心先生是五四运动时走上文坛的,她当时是 19 岁的少女,是一个大学生,写了一篇五四学生运动的目睹记,从此,走上文坛。如今,最后一位元老也走了,五四那批巨人就没有了。

冰心先生走了。今年是她整整 100 岁。100 岁,100 岁,一个世纪走了。一个世纪是真正含义上的格式。是两个不同的时代,在冰心先生身上,表现得最明显,也最强烈不过。

任何人只要和她一接触,立刻就会发现她和你和我和我们大家一点儿一点儿都不一样,特别特别,她以一种奇特的思维模式,一种特别的生活方式在思维在生活,对任何事情她都有自己的主张。她说教育第一,就真是教育第一,不管你说什么,她都要把你追回来,轻轻地但是坚定地问你:“教育呢?”当她问第三个“教育呢?”你就恍然大悟:在她那儿,教育真是第一。她是那么的执著,这便是大师的价值。

大师走了,鞭挞我们的小棍儿没了。伤心啦,冰心先生啦!我想告诉您:我们大家都想着你,想着你的哭,想着你的笑,想着你的生气,想着你的慈祥,想着你的“教育呢”?想着你的特别,想着你对祖国、对人民、对民族的大爱。

我们会努力地跟着你。

中国教育电视台供稿 宋尧、殷炜整理

【编者絮语】这是一篇十分感人的访谈,编者在整理录音过程中,多次被舒乙先生、吴青教授的生动叙述感动得留下了眼泪。也许正是因为有了冰心这样的文化巨人,我们的世界才充满了意义,我们的人生才具有了价值。

感谢中国教育电视台的叶宝生先生作了如此精彩的访谈,使我们能够如此深切地感受到文化大师。

为了心中永远的敦煌

——访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教授

100年前的6月22号,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从那个时候起,在中国和世界的学说上,诞生了一门新的学问——敦煌学。近20年来,随着敦煌学的蓬勃发展,一个共识已经形成:敦煌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敦煌莫高窟列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目录。1984年,敦煌研究院在延续了40年之久的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建成立。经过几代敦煌人的不懈努力,敦煌研究院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敦煌学研究的专业实体。千年更迭,世纪之交,随着藏经洞发现百年,敦煌学也将走过百年历程。敦煌研究院召开了“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也在這個時候访问了樊锦诗院长。

叶宝生:樊院长,敦煌藏经洞发现了100年,敦煌学的研究也就要走过自己的百年历程。可是这100年的历史只有在近20年,敦煌学才能谈得上是辉煌。那么100年的历史应该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您如何评价这100年的历史呢?

樊:敦煌学的这100年是与咱们祖国的百年命运相连的。敦煌藏经洞被发现,恰恰是我们国家命运最不济的时候。当时,由于政治的黑暗,中国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连自己的文物也管不住,被外国人劫掠而走。这样,中国人要研究敦煌,只有到英、法等国看外国人提供的从中国劫走的敦煌的文物,又查又看又考察。据我知道,当时他还不让你抄。我们学者怎么办?就只有默记。就是脑子里背下,然后到外面再把它记下来。这就太可恶了!这

些学者都是现在我们知道的一些大师级的学者,比如陈寅恪、王重明、向达、姜亮夫、胡适等。这些先生是敦煌学的开创者,在敦煌学研究领域他们都有开创之功。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才能阻止文物的被盗。那么中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应该是 1949 年以后。所以说,敦煌学与祖国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可是后来呢,由于极“左”的思潮和不断的政治运动影响,再有,在一些人看来,佛教的文化总是有一点,有一点……

叶宝生:封建残余。

樊:嗯。他们总觉得这里面有迷信啊,封建呀,用一种极“左”的眼光来看待它,不把它看做一种文化。因此,敦煌学的研究也受到了影响。“文化大革命”时极“左”思潮达到了顶峰,当时常说的一句话——从传单里看到的,说江青说了,敦煌这些牛鬼蛇神没什么可保护的。那么我们这些研究敦煌的人,对敦煌是有感情的,当时就觉得不可理解,怎么会是牛鬼蛇神!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种极“左”的禁锢也随之解除了。这以后,敦煌研究院的学者跟国内许许多多的敦煌学者压抑在心里面的一种后顾之忧被解除了,研究的热情就迸发出来。所以说,这个 20 年可确实是不得了!外国人也就刮目相看了。有哪些具体表现呢?我想首先是我们思想的解放,提倡学术探讨,发展学术,这是个大背景。其次,省委、省政府看到,仅仅是敦煌文物研究所规模太小,研究不了这么博大的一门学术,所以它应该是像博物院性质的一个机构。它不仅仅是文物保护,还应该有自己的研究,所以把原来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再从国内来看,1983 年成立了中国敦煌图书馆协会,同时,像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杭州大学、中山大学等等这些学校也相应地成立了敦煌学研究室。这些举措,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再一个是人才辈出。老一代就不用说了,他们做了开拓的、开创性的贡献,取得了很多的成就。

叶宝生:樊院长,联合国把明年定为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年,

敦煌的研究对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正向我们走来的这个时代里。

樊：我想，敦煌在这里面应该能起到重要作用。因为敦煌实际上是古代不同文明的一种汇合、交融、交流、结晶的产物。今天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出，它是古代不同文明交流的载体。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大家都在研究敦煌学，不同的国家都在研究敦煌学。学术大师季羨林先生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影响深远的文化就是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国文明，那么这几种文明在哪儿交汇呢？就在新疆戈多（音——编者注）。所以敦煌就是这四大文明的交汇之处。今天，它似乎已经成为了过去，但我想任何优秀的文明永远都不会过时，永远会展示它的魅力，放射出文明的异彩。我想这一点从现在的敦煌可以看得很清楚。各国学者凡是要研究中国文化、研究西域文化的，他们必然要来考察敦煌莫高窟，要来这里找资料。另外，有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观众到这里来参观，有的人就是来寻根的。比如日本人，他们说，我们日本的文化、佛教到哪儿去找？有的到西域去找，有的到印度去找，但考察以后，最后发现必须要到中国去找。中国文明与西域文明汇合后又传到日本。这个例子说明，敦煌仍然是不同文明的交汇点。今天的人们也不能割裂历史，他仍然是在古老的、优秀的文明的基础上进行交流。敦煌今天仍然是不同肤色的人们、不同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它起到了纽带的作用。

叶宝生：樊院长，敦煌的文物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在眼下的人文素质并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如何利用文物传播一种文化，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请你说说这方面的感想。

樊：我们认为，敦煌作为古老的文明的反映，它在这里可以起到一部分的作用。可以起到什么一部分作用呢？如果人们看了莫高窟以后，他不得不为我们古代有这样杰出的艺术惊叹，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包括大陆的、台湾的、香港的，甚至海外华人，他不远万里，坐飞机回来，看了敦煌以后他心里非常激动。另外有些小学生

在北京看了展览以后,在为我们中国有这么好的文物被外国人掠走而感到一种耻辱的同时,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之心,震撼他们的灵魂,那么这就是一种教育。另外人的性格的陶冶也是多方面的。说到这里我觉得我们这些年来对美育是不太重视的,这是不可缺少的。我也没有什么美术细胞,但是我现在回忆起我念中学的时候,什么画我都画过。比如油画,他教你用油墨“呼呼”地画,你虽然不会画,但你可以感受一下嘛!水彩画、素描呀,还有大卫、孟德斯鸠的雕像,我们都画。小孩他有爱美的潜能。再比如音乐,我们老师是音乐学院毕业的,她教我们欣赏《田园交响曲》、《命运交响曲》。但这些年就有些偏颇,整天就知道考试、考试。小孩缺了美育,他的素质是不完全的。我们认为,莫高窟是一个遗址,但同时也是一个课堂,应该称为大中小学生的一个课堂,告诉他艺术美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古老的文物,在现代文化创造和教育当中应该能起到作用。我们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国外就很注意。

叶宝生:如果说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那么敦煌研究院可以说是戈壁滩上的一片“人文绿洲”。敦煌研究院究竟是靠一种什么精神把人才吸引住?

樊:我想首先是敦煌石窟的魅力。每一个到这里工作了一段时间的工作人员,都会被敦煌的艺术魅力所吸引,或者为它的博大精深所吸引,或者说觉得它里头有无数的谜向他提出挑战,他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我觉得大家都有一种能为敦煌做点事的荣誉感。

还有,我想不管是老一辈,还是中年的、年轻的,他们都有一种奉献的精神。

什么叫奉献的精神呢?先从我常(书鸿)先生说起。他来敦煌的时候是从法国归来的留学生,当时已经学有所成,是著名的画家。回来以后,他在大学里是著名的教授,在大城市有很好的待遇,生活很好。他来了,把家整个就搬来了,这说明他下了多大的决心。后来他的夫人跑了——我们不去评论他的夫人,在这种情

况之下,而且国民党政府还想把这个单位解散,他不顾家庭的破裂,也不顾政府的决定,他硬是奔波,最后争取把单位留了下来。因为他经常举一个例子,有幅画叫“舍身饲虎”,就是说要有一种“舍身饲虎”的精神。“饲虎”——喂老虎,就是献身喂了因饥饿而垂死的老虎。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说他需要把他的一生奉献出去,这是非常典型的。后面很多人也是这样。敦煌研究院的职工找对象不好找,他不可能像在大城市,在广阔的人群中进行寻找。还有呢,在大城市里,生活条件好,他都放弃了,他愿意在这个地方过这个艰苦清贫的日子,默默地守卫着这个石窟,去研究这个石窟。我们很多人也不为名,也不为利,我看我们的一些老先生,是只知耕耘,不问收获。你说这种精神在现在可能是很难得吧?

叶宝生:太难得了!

樊:有人可能会说这些人很傻。我看世界上的事情是傻人做的,没有点傻的精神,没有这点执著的精神,是做不成事情的。所以我想,正由于有这样一代又一代人的奉献精神,执著的追求,安于艰苦生活,敦煌石窟才改变了当时一片废墟的面貌,而且文物确实得以保存下来。当时看洞里是天书,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现在我们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敦煌研究院在敦煌学界里面也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敦煌研究院一代又一代的学者,还临摹了许许多多壁画,用这些临摹品到重庆、南京、北京,到全国各地,甚至到世界上去办展览。大家看到过外国的一些敦煌出版物吗?看到的很少很少,而且都是黑白的照片。可是我们出去办展览,大家就非常惊讶,敦煌的画原来是彩色的,而且还是这么丰富,这么灿烂!可大家想到没有,当时的这些临摹是在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没有像样的工作条件下摹出来的。这种奉献精神,我觉得是宝贵的财富。我们要用这种精神去继续做好敦煌的保护、敦煌的研究工作。

社会上现在浮躁风气太盛,不能用这种浮躁的风气来引导年轻人,这样会害了年轻人。我们应该引导年轻人认识到,不管你本

事的大小,这都不要紧,关键是要有一种坐下来踏实追求的精神,做什么事情就要把它做好。人们的智力有高下,但是他的追求并没有限制。他智力平平,但是他还是能做出大事。他为什么能做出大事?我想,他的精神、他的道德在起作用。智力上的缺乏,他可以通过学习补充。我想应该培养一种高尚的精神,不要一天到晚谈钱。没有钱是不行的,但是世界上的事情绝对不是光有钱就行的,有许许多多比钱更重要的东西。一个青年人如果有一种高尚的精神,一种正确的追求,我想他即便能力低一点,他也能做出了不起的事情。相反,他很聪明,可是他的道德不好,说不定这个聪明就用坏了,去做一些坏事。我不是教育家,我只是有所感慨。咱们敦煌研究院许多的专业人员,过去不是甘肃人,我们算了一下,大概除了西藏和个别省没有,全国各省都有。西部开发需要一种精神,你要吃得苦。就像刚才说的创建敦煌研究院,你不要说我要现成的,来了一切都给我创造好了,不然我不来。那我要你开发什么?你总要有所付出,这个事业值得我们付出一定的劳动,应该说这样的人就很幸福。

再一个应该吸引人才。我经常在我们单位说,我们的一切的一切首先是人,没有这个基础,就没有一切。我们甘肃条件是差一些,但是我们要用各种办法留人。人们也不是光为了钱,年轻人也不是光为了钱。据我和他们接触,只要有与他专业对口的事业,他觉得在这里能发挥作用,他会留下来。还有一种是感情留人,你条件差一点,你尽到心了,你给他创造了条件,你有一种诚心诚意聘请“诸葛亮”的精神,我想人家是会来的。

再一个是待遇留人,就是说你还是要给人创造一些条件。我们少浪费一点,对于那些确实是人才的人,我们能不能破例地给人家额外创造一些条件。为什么?现在人还是比较讲现实的呀!别的地方也在招聘他,有很好的待遇,你的条件太差了,光靠感情行吗?他也在现实中生活,他出门去要赶公共汽车,他打个的都不行。我跑到这儿来,我的老婆、孩子怎么办?你还是要给人家解决

这个后顾之忧,所以还是要给人家,一定得给。我们敦煌研究院比原来条件好多了。我也在设法给大家一点补贴,但跟东部比差远了。我觉得我们西北人应该胸襟宽阔些、宽广些,留住这些人才。

叶宝生:樊院长,几代敦煌人一直坚持保护为主的方针,最近,你又提出敦煌的壁画比金子还珍贵,你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提出这个口号?

樊:首要任务是保护,根本任务也是保护。如果说保护不好,一句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你还研究什么?你还弘扬什么?

这文物就像人的生命一样,就一次。敦煌这个壁画有脆弱性,它是土质文物,非常脆弱。世界上石窟很多,但像敦煌这样有这么多壁画又如此悠久、系统、灿烂、博大和独特的,只有一个。这就是资源呀!所以说它具有脆弱性、唯一性、独特性。它是世界文化遗产,对人类的精神文明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它过去发挥作用,现在发挥着作用,今后也发挥作用,不是拿金子能估量的。所以我说它比金子还珍贵,是无价宝,无法估量。你进洞参观,简直是进了金库,进了宝库。我这个金库,尽管是泥巴做的,关键它是比金子还贵重的无价宝。如果保护不当,使用不当,参观不当,都会破坏它,就是对祖国的宝藏太不负责任了。所以我们应该珍视其独特性和唯一性,一切应该慎之又慎地对待这个宝藏。我们搞保护应该是有效的保护而不是破坏性的保护。保护不当就破坏了,不可挽回的。使用也是如此呀,所以国家也有保护文物的原则: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我经常说不要误会,我们社会上不要误会,我们旅游部门也请不要误会。我可以在这里跟各位说,我们为了开放,想尽了办法用尽了心思。我首先是保护嘛,我保护不好不可能拿去给你用,就像我如果有病,我有病了你还要我工作?你肯定说你先去养病,养好了病再去工作。一样的道理,这个洞有“病”我是不让看,你谁来说我都不让看。我们现在有一半人左右都在搞开放呀,我们改革了一些办法。过去我们冬天要连续用四个月整修,现在为了便于一些远道而来的观众参观,我们三班轮换天天

开。甚至于一些坐了飞机傍晚来的,四点钟,他说明天早上就要走,我们还为他特殊开放,不叫人家扫兴。我想我们是费了心思呀。但是首先是保护,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文物工作,保护就是目的。物质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可利用的呢?不存在了,一切都不存在了。但我们全面的说法,就是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我们保护是为了利用,但绝不是竭泽而渔,杀鸡取卵,这样只能破坏资源。我想我们保护和利用不矛盾呀!保护好,资源永存,你可以持续开发。

我们现在已经在用高科技保存东方艺术的档案,把它变成数字化信息,你想看什么可以走到任何角落观看,还可以把它拉近放大。这样也有利于我们搞研究。我想这个高科技绝对可以为观众提供模拟洞窟。这不是一样的吗?你不是想看清楚?你站在洞里远远地,看不清楚也无法看清楚。那你现在看模拟洞,包你看得清楚,看得更好。

我觉得我们国家这几年有个教训,因为我们过去比较贫穷,所以有点急躁,一急躁,就要做出一些不符合规律的、违反规律的事。在洞窟开发的时候,就发生过先破坏后治理的事。我们为什么非要这样做呢?能不能不这样做呢?先破坏后治理,你去算一算经济账,不划算。所以你不能着急,做一件成一件。所以我想应该是首先搞好规划,包括外边景观的规划、保护的整体规划我都做,做了规划以后再做方案。规划也罢、方案也罢,都得论证。行了,我们按这个方案再去搞设计,搞了设计以后再搞施工。如果你匆匆忙忙瞎做,这就是一种破坏。我们应该注意这个问题。急,我可以理解;快,我也可以理解,但是处理不好,欲速则不达,把事情还弄坏了,反而慢了。我们要为长远负责,为当地人民负责,为当地的长远利益负责。不只是看到眼前的这一点,要让历史出来说你做得对。这是我个人所见。你搞建设,不能破坏它这个遗址的风貌,破坏它的文化内涵,这也是保护啊。对于莫高窟,我们非常注意这一点。它是在大漠戈壁旁边,你看看,黄沙、戈壁,一点绿洲,蓝天,

黄河、白云、石窟。这就是西北的风貌。如果你搞点洋人建筑到跟前,你说这是个什么?显然不合适,破坏了它的文化氛围。所以我们也是在保护它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的。一些大专家教育我说:“小樊呀,你可不要做加法,你要做减法呀。”一句就把我给点醒了。哦,对!敦煌洞窟跟前这么庞大的遗产,它很朴素的,很庄重啊,你现在给它加什么?加任何东西都会有损于它。我现在事业发展了,办公室发展了,宿舍也发展了,我不能在这个地方加呀,这个地方不合适的所有建筑都要减掉啊。都减掉才能把祖先的世界珍贵的宝藏给突出出来呀。现在有个陈列中心是日本政府援建,这个建筑不错。当时设计者曾经想把这个中心放在石窟前面,怎么摆都觉得不合适,最后请国家的专家来论证:推出去。日本人当然不愿意,日本人非常想在莫高窟前突出它,“你看我给你们捐了这样一个建筑”,我说不管你捐多少亿,你能比莫高窟更有价值吗?不可能的,推出去而且压在山里边。如果我们当时将这个陈列中心修在洞前,那世界上的人们都要指责我们,说我们这些人太没见识了。我觉得敦煌莫高窟是宝中宝,用任何手段去保护它都不为过。所以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看到了数字图像的技术,就是电脑可以做图像。这个石窟你再注意保护它不过是延年益寿、延缓它的衰老。它最终可能会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在变。我们现在利用高科技来把它保存下来,等到我50年后再看这一份数字档案就不一样了。这一份数字档案可不得了。它万一地震呢,我也还在;它变模糊了呢?我仍然在。

叶宝生:樊院长,为了守护自己心中的敦煌,你在敦煌工作了37年,获得了“敦煌女儿”的称号,您如何评价37年的敦煌生涯?

樊:“敦煌女儿”我不敢当,因为敦煌意味着博大精深,我怎么敢当呢?但确实国家给了我不少荣誉,但我对这个荣誉看得比较淡。也可能是跟我的职业、跟我在北大受的教育有关。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是一种奉献、一种创造,这是我觉得我们一生应该去追求的。我们到世界上来,我觉得就应该给这个世界做点有意义的事,

这是最有价值的。而且这个事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做成的,所以我不应该计较我个人成绩,大家认可你做的事,那就是你做对了,我就非常高兴,因为我为它付出了这点劳动,我没有白付出。我就是这么想的。

中国教育电视台供稿 刘爱华整理

【编者絮语】这篇访谈可以看作是对倪梁康先生描述的一类“理念人”的形象注解。

关于思想解放的回顾与思考

——访首都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 所长孙长江教授

20 年来,我们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站在历史的今天,回首 20 年的风雨历程,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20 年前,席卷神州大地的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给我们这个古老的中华民族带来了勃勃生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篇文章、一场讨论,带来了一次思想解放。我们打破了“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全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战略转移。可以这样说,没有这次讨论,就没有改革开放的今天;也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精神,我们才能进一步解决摆在我们面前更深层次的矛盾,把改革开放的大业推向前进。为了纪念真理标准讨论 20 周年,我们特意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之一孙长江同志进行了专访。孙长江同志现任首都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是中央党校原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作者之一,也是定稿人。

叶宝生:孙教授,20 年前的思想解放起源于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当时您为什么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呢?

孙:这篇文章的发表应该说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这篇文章发表在 1978 年,当时正好是粉碎“四人帮”一年多。“四人帮”粉碎后,中国怎么办?往哪里走?照着以前那条老路走,即“按既定方

针办”，就是按“四人帮”“左”的路线走，如果这样，前途不太妙。因为大家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把中国国民经济推到濒临崩溃的境地，如果不作大的改变，没有希望。那个时候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他选择的路是“照着老路走”，就是当今说的“两个凡是”。“两个凡是”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样，就使中国一切都照以前“左”的路线走下去。当时有一个老同志说过，如果照“两个凡是”走，“四人帮”等于没有粉碎。“两个凡是”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但怎么推翻呢？“四人帮”粉碎后，大家谈得最多的问题，一是1976年清明节，人民群众在天安门悼念周恩来，被“四人帮”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四五运动”，“四人帮”把邓小平说成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这件事情，“四人帮”一粉碎，就该平反。另一个是大批的老干部都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被打成叛徒、特务。这些冤假错案很多，拖的时间很长，如果冤假错案不平反的话，老百姓就不相信你。但如果平反的话，那就有一个问题，因为这些是冤假错案、大案要案有很多都是毛主席画圈的，毛主席表示同意的。如照“两个凡是”来讲，毛主席画圈的就不能动。不能平反，中国就不能前进。当时胡耀邦同志致力于推动平反冤假错案，他后来当了中央组织部长。他在平反中，有一条原则，叫“三不管”——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所以实践标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来的。当时中央交给中央党校一个任务，就是要研究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当时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就讲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指导思想，一个是要准确完整地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一个是要以实践为标准。这个思想在当时是很开明的。但有些学员理解成：路线斗争的是非的判别，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一个是要实践。这样的思想是不对的。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有一个，一旦实践检验跟毛主席的某一个指示发生了矛盾怎么办？两个标准就打架了，怎么

办？当时我们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吴江，他是一个理论家，理论研究室主任，我跟他讲，不能让学员误解，以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有两个，应该说只有一个，就是实践。吴江说，那你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就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叶宝生：关于真理标准文章还有一个作者是胡福明老师，这是怎么一个情况呢？

孙：当时党校高级干部班学习研究耀邦同志的讲话，参加者中一个叫杨西光，听完耀邦同志的讲话以后，觉得非常重要，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思想。他结业后，到《光明日报》当总编辑。他一到光明日报社，就对理论部讲，看有没有实践检验真理方面的文章。理论部讲有一篇，是南京大学胡福明同志的文章，叫做《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是他给《光明日报》哲学副刊投的稿。理论部编辑王强华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总编辑杨西光，杨认为很重要，因为是讲实践标准，所以不应该放在哲学副刊上发表，规格应更高一点。这时，他听说中央党校的孙长江也在写这篇文章，就让王强华把胡福明文章的校样送到了中央党校，希望吴江同志和我帮他们修改。后来吴江把校样给我，说写得不错，很有勇气。他要我把这篇文章和我那篇文章捏在一起。我就把两篇文章并在一起，就是后来定稿的样子。实际是两个原稿，一个是中央党校的原稿，一个是胡福明的原稿。定稿后，送给耀邦同志审阅。他决定先在中央党校办的《理论动态》上刊发。1978年5月10日，这篇文章在《理论动态》上刊了出来，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刊出来。

叶宝生：关于真理标准引起的思想解放，对当时的中国历史起到了什么样的推动作用呢？

孙：准确地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引起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2日，《人民日报》转载《光明日报》的文章。《人民日报》是党的机关报，影响大。当天晚上，就有人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的总编，说这篇文章是

砍旗,砍毛主席的旗,是丢刀了,政治上很坏,很坏,很坏,讲了三个很坏。这个帽子很大,砍旗就是说反对毛泽东思想。当时“文化大革命”“公安六条”还没取消,反对毛泽东就是现行反革命,大家压力很大。这引起了小平同志的注意,小平同志说:开始没注意,后来一看纲上得那么高,我看了后,就知道这篇文章是对的。有些人天天讲毛泽东思想,但本身对毛泽东思想实质不清楚,毛泽东思想就是“实事求是”,不能按本本出发。

我再说一下,为什么实践标准的讨论是思想解放运动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际上是针对“两个凡是”来的,只是文章没点出“两个凡是”。原稿是用两个稿子拼起来的,我是采用剪刀加糨糊的方法粘上去的,铅字是胡福明的,钢笔字是我的,旁批是吴江的字。实践标准讨论的主要是两篇文章,第一篇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篇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对是“砍旗”的质问的回答,当时是我帮吴江写的这篇文章,在讲这场讨论时,这篇文章不能忘记,当时是在《解放军报》上发表的。实践标准的实质思想是检验一切的理论,不管多么强硬,包括毛泽东思想、马列思想,都要受到实践检验。我们为什么要相信马列主义,为什么要相信毛泽东思想呢?因为他们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一些批评这篇文章的人,认为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言论是不需检验的。你们引导人们检验毛泽东思想,不是引导大家怀疑毛泽东思想吗?你们检验毛泽东思想的做法是错误的。主张“两个凡是”的这些人,认为领袖的理论不需检验,领袖的思想不需分析,领袖的观念不需创新,三个不需等于把毛主席看成是神。因为只有宗教不需检验,科学是需要检验的。科学要一分为二,要分析,要创新。不需检验,不需分析,不需创新,等于把毛泽东思想当成宗教信条。这些同志感情上是捍卫旗帜,说别人砍旗,其实他们正好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了宗教精神。如果要扣他们的帽子,他们正好亵渎了这个旗帜。

通过这个讨论以后,把大家从个人迷信盛行、只要是毛主席的

话都不能动这种精神枷锁下解放了出来。所谓思想解放就是从这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不管谁讲的我们都可以想,我们都可以解放思想,不是只有毛泽东语录中的才能讲,其他的不敢说,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来。毛主席自己也说 he 犯过错,一个人每句话都对是不可能的,要用彻底唯物主义的精神来对待毛主席也会犯错这个问题。毛主席也会犯错是很重要的理论问题。这在当时是思想大解放,以前不敢想的都敢想了。包括“天安门事件”是不是反革命事件?不是,该平反;邓小平是不是走资派?不是,该平反;包括很多人,如刘少奇是不是叛徒、特务、工贼?不是,要平反。再往下讲,中国搞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为什么还这么穷?这些以前不敢想的问题现在都敢想了。这就是思想大解放运动。

叶宝生:是不是说没有这次思想大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

孙:对,改革是改变以前旧的体制。以前旧的体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也不敢提。这以后就解放了。什么是解放,就是从实际出发,不是从条条本本出发,任何条条本本都不该成为束缚我们的框框。再比如经济改革,以前认为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谁要反对谁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现在用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如果没有这个讨论,谁也不敢想,就没有市场经济。小平同志对此评价很高:“一个民族,迷信盛行,一切从本本出发,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就会亡党亡国。”提得很高。但你想一想,这一点也不过分。你想想,当时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再这样下去,当然要完蛋。所以这场争论实际上从个人迷信这种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敢于承认毛泽东很伟大但也会犯错误,而且毛主席晚年还犯了不小的错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承认毛主席会犯错误,那“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够取消,因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点燃的。这场讨论给整个民族带来了思想解放,我们的精神上放松了。原来是捆在一起的,不敢动,不敢想。

叶宝生:20 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回顾当时的思想解放有何

现实意义？

孙：我是这么想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是永恒的，它不是说随着这场讨论就结束了。三中全会充分肯定了这场讨论，充分肯定了真理标准的讨论，为讨论作了总结。小平同志的评价很高。这场讨论结束了，但真理标准的原则没有结束。现在我们为什么讨论这个问题呢？现在我们碰到很多问题，有的同志说实践检验是建国以来第一次思想解放，1992年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是第二次。为什么有第二次思想解放呢？因为第一次解放以后又有束缚了。第一次是从对毛主席的个人迷信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但还有更深的问题，旧体制是要保留还是要改革？老百姓说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怎么越搞越穷？这个问题以前不敢想，现在要想。我们过去的经济体制改革有问题，农村人民公社生产水平怎么比以前还低，于是就有了以包产到户代替人民公社的想法与做法。这是很了不起的。因为人民公社是写在宪法上的，要改革就是违反宪法，就是违法。安徽凤阳小岗村18个农民和生产队长签契约，队长领他们把地给分了，包产到户了，队长说：“我要坐牢了。”18个农民按手印，说，队长要是因这事坐牢，你的孩子就由我们养到18岁。可见在当时这是触犯天条的事。但是还是想，一经想，再由实践证明是对的，最后还是把人民公社变掉了。计划经济过去不许动，十几年的争论讨论，最后，党的十四大决定，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要改过来。以后还有没有呢？还有。我们今天要注意，这个20周年，并不是要回顾，历史已过去了，回顾是为了将来，将来还会有。因为中国改革是非常艰难的。每一次党代表大会都会有主张争论，包括十五大，包括市场经济，十四大肯定了，十五大讲了很多精神，包括所有制问题就有很多突破。但十五大以后是不是再也没有争论，那不可能的。因为改革开放是改变旧体制，在旧体制中，很多人有既得利益，他要维护这个旧体制。再加上我们这个社会是个封建主义历史很长的社会，比较保守，自然经济观念比较多，相信旧的东西，怀疑新的东

西。我们要真正走到现代化,需要做很多努力。这就要不断更新观念。每一次更新观念,就得有一个实践检验。因为那些观念已经过时了,怎么证明过时了,就要实践检验。今天纪念 20 年前这场讨论,就是要永远保持这种精神,因为实践这个基本精神是向权威挑战。权威的话对不对呢?当然,既是权威,他一定是做了很多的事情,经实践检验证明他是对的,慢慢才成为权威的。像毛泽东,开始人家不承认他,但打仗胜利了,建立了新中国,实践证明了他是对的,他就有权威。但权威一旦形成以后,就要注意两种危险的东西。一种是任何人都有其局限性,就连十一届六中全会党的决议也讲,毛主席晚年就有错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再一个是权威旁边的人,抬轿的、吹喇叭的人,最不好的。一看是权威,就给你吹喇叭、抬轿子。所以要坚持实践精神。就是说要以科学态度维护权威,爱护权威。如果你对权威搞个人迷信,就是毁掉权威,这也是实践检验的一种精神。我们今天纪念这个讨论,就是不仅记住历史,也要记住这种精神。如果每个人都有这种精神,个人崇拜就难以搞起来。“文革”前上海有一个书记,叫柯庆施,他讲过一句很典型的话,“对毛主席的崇拜,要崇拜到迷信的程度”,号召大家必须迷信才行。他是政治局委员,对权威抬轿、吹喇叭,对造神非常积极。因为造神有功,而且立竿见影,立即可以升很大的官。相反,你若是对权威表示怀疑,或者讲大实话,就是反对权威,他就会给你扣帽子,说你是砍旗。砍旗就是反革命啊!而且“个人崇拜”有真有假,有的人是真正崇拜,有的人是假崇拜,要是一不行,就马上翻过来。所以一个民族老是有崇拜权威的现象,就说明这个民族的精神不行,总是想投机,搞这种东西很不好。另外,我们这种环境不好,那些搞个人崇拜的人,他以捍卫权威的面目出现,你要怀疑,他说你反对权威,这几乎形成一个规律:凡是造神的人,是最会打棍子的人,将来还会成为我们国家历史前进的拦路虎。所以,今天我们来纪念这场讨论,假如我们每个人都有实践检验的精神,崇拜权威搞个人迷信就比较难搞出来,因为要用实践检验一下。

必须把这种精神变成自觉的东西。但实践检验真理这种精神是很不容易培养起来的。刚才说思想解放有奉命解放的。那是有的。当时实践检验讨论时,各省都表态,转载这篇文章,省委书记说实践标准非常好,但表态很多是看形势来的。有一个省委书记把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派到北京,住在北京一个宾馆,专门看报,你给我统计,到全国各省超过一半,就赶快打电话告诉我,我们也表态。这就是典型的奉命。像这种情况一弄,就变了。

叶宝生:当前的思想解放中,我们还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孙:所谓思想解放,就是说从思想束缚就是过去小平同志说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你每做一件事,都有一种精神枷锁,思想解放,就是要从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原来讲实践标准,就是要从个人迷信中解放出来;以后讲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从社会主义这种模式,比如苏联模式中解放出来。过去讲马列主义怎么说的,比如社会主义必然是计划经济等等,这就是思想束缚,那你就没法改革。所谓思想解放,就表明不断有一种束缚的东西,历史前进一步,就有一个东西束缚。我以为老是思想解放,并不是好事,这说明老是有束缚。不要老是解放,一次、两次、三次……说明老是有思想束缚。所以思想解放最好、最根本的办法是在全国造成一种很宽松的气氛,人们可以想问题,除非犯法,我们要用法律裁制他,思想应该可以自由想问题,因为思想,谁知道你讲的对还是错,就要靠实践检验,就要允许大家讨论,大家平等地讨论,允许不同的意见存在。到那一天,中国不需要单独的思想解放,还可以想问题,这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要想问题,尤其想新问题。所谓新问题,就是旧的本本没有的,不去想,那你怎么办呢?我过去写文章,叫“学术讨论不要裁判员”,就是讨论,是对是错,用实践来检验。我们党和以前相比,总的来说好多了,就是创造一个无所畏惧的遵循真理的好的环境。经济体制改革如果再深化,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不行,就是说有一个高度的社会民主,希望有一种探讨真理、探讨问题的精神,不要太害怕、提心吊胆就不行了。

叶宝生：您提一个命题，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永恒的主题，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思索呢？

孙：因为历史不断前进，新事物不断出现。比如说，解决一个问题，再解决一个问题，每一个新问题在没有检验以前，大家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当你碰到一个新问题时，历史走到一个新阶段，就有一个对新阶段的认识。您的认识是对还是错，不是靠某一本书、某一个人，而是靠实践来检验。只要历史不停顿，检验就不停顿。我们不能希望出现一个伟人，把所有问题都讲完了，大家就按他说的去办。历史只要在前进，就会有新问题，对新问题的认识，就要有检验，像市场经济，问题很多，将来也很多，这就要靠实践来检验。当然我并不是否定所有理论、文件，理论、文件本身也要受检验。那时刚开完十一大，有人问“难道十一大的文件也要检验吗？”我们回答说：对不起，十一大文件是党的文件，我们要遵循它，但它确实要受检验。检验的结果，它确实有错误。十一大对“文革”没否定，认为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当然是不对的。但这种东西并不奇怪，在当时条件下，就是那样的，并不影响党的文件的权威性。我对文件根据历史事实来看，对的，我们就遵循；不对的，如果说你是党员，是干部，按党的原则、干部的原则，还可以提出意见，将来可以修改。宪法是这样，党章也是这样，不管是党的文件、书本、理论、伟人讲的话，都不能逃脱实践检验。检验就是说让你的理论、思想更加完善。当时他们批评说：“说实践是检验标准，那么理论怎么样呢？怎样看待理论指导实践呢？”理论当然指导实践，但理论在实践中接受检验永远不会休止。只要有历史，有认识，有主观，有客观，它就有检验，就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所以它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不会消灭的。

中国教育电视台供稿 录音整理：张璐 屈慧君

美·美育·美学家

——访著名美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阎国忠教授

罗晟：昨天晚上听完讲座，我就去上网查了您的资料，知道您当初是学中文的，但毕业之后却留在北大任教，教哲学。那么您当初怎么会选择教哲学呢？

阎国忠：我入学以后就是做团支部书记，后来做党小组长。1958年大跃进，学校决定加强学生的政治课教学，就把学生当中当党小组长、团支部书记的人调出来，实际上就给自己同学讲课。讲什么呢？讲毛泽东的几篇东西，讲《矛盾论》、《实践论》，这些都是讲哲学。然后1960年正式毕业，因为我已接触过这些哲学的东西，所以就留在哲学系了，这不是我选择的。但是一旦到哲学系去搞美学的时候，我觉得对我非常适合。

罗晟：能不能回忆一下1956年的大学生活？

阎国忠：1956年是我们这一届最好的时期。1955年入学，1957年反右派之前一段，当时有个口号叫“向科学进军”，所以对我们这届学生来讲，那一年多时间是我们真正学习、读书、收获最大的时期。一到1957年就反右派斗争了，就是政治运动了，不管你自己怎么想，反正必须得卷入。就再没有像1956年那样的充裕的时间来读书，所以那段时间对我们来说是最珍贵的。（是不是像很多人说的，大学里面甚至人的一生中肯定是要有一段时间是静下心来读书的？）对。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因为好长、好多时间是处在政治运动当中了，所以回顾那个阶段的时候，1956年是最难忘的。

罗晟：您在北大教书，能不能对比一下，在精神面貌上，现在的

大学生和您那时候的大学生有什么不一样？

阎国忠：很多不同，应该说，有很大不一样。我们那一代的老师很多都是有深厚学养的一些老师，现在说起来都是知名学者，甚至在国内外都是很有影响的学者，像哲学系的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朱光潜是西语系的，后来也到哲学系；宗白华住在北大的北边，朗润园那地方。朱光潜住在北大南面，燕南园那地方。但是这些老先生平常很少有机会见面，因为他们自己都很忙，而且老年人不愿意这样经常交谈。

朱先生和宗先生这两人感情非常好。为什么同年死呢？就是因为朱光潜先生先死了，他死了以后，对于宗白华先生心理上是很大的一种刺激。当时朱先生死了以后，我去拜访宗白华先生的时候，他觉得心里很哀伤，但是精神状态还很好。但是就在同年他突然也去了，也走了。我当时感到很意外，觉得按他当时那个状态，不应该那么快就走，但是这一年他也走了。

他们俩很不一样。朱光潜留学英国，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后来到了伦敦，又去了法国，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呆过一段，他的学术修养很大部分就是英国学术传统、学术文化，他在那里学习，根基在那里。宗白华留学于德国，在德国呆了很多年。所以他们的学术背景有点差距。德国、英国的很大差异就是，德国人善于思辨，而英国人比较讲究实证。英国是所谓经验主义，认为一切要从经验中来，从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东西才是可靠、可信的。德国人认为没有经过深层、深入地思考、思辨的东西，是不可靠的，只有经过理性充分思考、深入思考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学问。这两种民族之间的治学有很大的差异，养成两位先生的治学风格不一样。

宗先生回国以后，他用德国的这种思辨的方法，面对着中国的传统美学文化，他努力地去整理这些东西，努力用德国的思辨方法去整理它、阐释它。所以他的一些文章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气息。在中西美学融合方面，他是个开创者，而且相当成功，在今天仍有广泛的影响。朱光潜先生主要是把西方的那些美学和美学相关的

文艺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包括翻译原著。他大量地翻译,而且都是一流的翻译。像黑格尔的《美学》、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歌德的《谈话录》。莱辛的《拉奥孔》,很多的原著都是朱先生翻译的。他一边翻译,一边系统地介绍、整理西方的美学。他编的上下两卷《西方美学史》后来被教育部评为高校教材的特等奖。至今我们高校用的西方美学教材,恐怕绝大部分都是用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

他们两个人的治学方向不同。另外呢,治学的态度,像朱光潜先生直到临死,他脑子里想到的都是学术问题,都在思考着学术问题。在病重时,他仍然要经常书案写点东西。在他 80 多岁的时候,翻译了维柯那本书《新科学》。翻译过程中有很多疑难要解决,他自己亲自到北大图书馆查资料。他始终执著于学术,而且特别关注于美学的讨论。凡是当代美学界重要的讨论,朱光潜有可能的话都要参加,都要介入,都要表达自己的看法。所以要整理中国当代美学史的话,那么几乎每一段都有朱光潜的东西,都离不开他。但是宗白华就不一样。他做学问主要是在二三十年代那个时候做,他的大部分有影响的文章都是那时候写的。解放初期,他也教过一些课程,比如《中国哲学史》,也讲过中国美学。但后来好长时间,他就不再担任什么课程,而且也不再做学问。学校没有给他安排教学任务,他自己也没有再写东西、做学问。(那他后来做些什么?做什么?他就是自己感兴趣地看,看一看美术展览,和一些访问他的年轻教师、学生交谈,指导研究生。

他很热心,指导学生、对访问者他都非常热情。他还很随意,和他交谈都很随意。后来有人讲,他有点魏晋时期文人的风度,比较超然,把一切名和利都置之度外。他自己生活非常简朴,甚至他自己写了很多手稿,都积压在床底下。现在出版的四卷《宗白华全集》,大部分都是从箱子里翻出来的,生前都没有发表,宗先生死了以后才从箱子里翻出来的。翻出来,别人给他整理以后出版的。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出,宗先生对名和利是很淡漠的。他确实具有

中国文人的那种传统,比较超然物外的那种传统。这两者是他们两人很大的不一样。

罗晟:美学是由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这一些大思想家、大学问家介绍到中国来的;经过二三十年代宗白华、朱光潜等这样一批中国学人,再到五六十年代李泽厚先生等人的努力,美学在中国逐渐地发展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都是具有深厚古典文化修养的人。您也是学富五车,那么您认为搞美学的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阎国忠:美学这门学科,说起来好像是大家都摆在口头上的东西,什么美呀之类,都是大家经常谈论的东西。但正是经常谈论的东西,最难在学理上给予论证,给它一个解释,最难。所以美学这门学问属于哲学的一个部分,是很深邃的一门学科,它需要很深厚的多方面的学养。对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艺术、中国的美学哲学这部分的了解,都是必需的。同时,因为美学是从西方引进来的,所以西方的美学发展史,它的整个走向,它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它最主要的观念,我们必须得了解。这样就涉猎很多。因为美学常常是门艺术,比如康德的美学,它是整个哲学里的一个部分。你为了了解康德的美学,就必须读他的哲学著作。你为了读黑格尔的美学,你必须了解整个黑格尔的哲学,所以呢,就涉猎得非常的多、非常的广泛。而你为了了解一个时代的哲学,你就必须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艺术。文学艺术体现了这种审美观念、审美的理想、审美的追求,你必须得了解。不然的话,你只能停留在概念上。所以这也是一门比较难搞的学科。

罗晟:我看到过一些关于中国美学的评论,说中国美学在奠基的时候就处于文化转型期,或者是贺麟先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中说的“青黄不接”的过渡年代,很多人也认为中国不久将会出现文化断层现象,那您怎么看待未来中国美学的发展?

阎国忠:西方美学 20 世纪初年传到中国,遇到了比如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这样一代学人,这些人拥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学养,

当他们把西方传来的美学用他们那种学术根底去阐释的时候,美学在中国一开始就有很高的品位。看他们这几个人写的东西,我们就感到美学确实不是一个普通的经验型学科,而是有很高品位的一门学问。从他们开始,后来经过宗白华、朱光潜这一代人,二三十年代那些年,他们系统地把西方美学的东西介绍过来,给中国美学的发展奠定了很深厚的基础。解放以后,蔡仪先生、李泽厚先生等人又把 50 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美学问题,这样又为美学研究注入了一种新的视角。由于这个原因,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找到一个西方人没有找到的美学体系。西方人的美学,按照西方的传统,始终停留在一个个体的人,一个具体的人,他(她)的审美的心理、审美经验具体是怎么样产生的,内心心理是怎样一种结构,他(她)心理反应效应是怎样的,这种效应对他(她)人格的完善有什么作用,始终停留在这个层面讨论。我们中国美学呢,一旦马克思主义这个观念介入以后,就把它纳入到社会实践当中,作为整个社会实践活动的一种活动、一种形式来思考,我们的眼界一下子就开阔了,就能更充分地解释美学现象。比如作为一种审美现象,在人类生活当中是怎样起源的,是怎样伴随人类整个文明的进程向前发展的。就能更为有力地解释这些问题。所以中国美学到了五六十年代以后,特别是经过八九十年代的研究,确实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中国很多美学学者,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好像看不到自己的长处,眼睛老是瞅着西方,觉得西方层出不穷的那些花样,不断翻新的概念,特别让他们入迷,觉得这些东西才是真正的,值得我们不断去效仿的东西。实际上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美学和西方美学三者融合当中,确实形成了我们自己的特色。这是非常珍贵的。而我们很多年轻人却不太尊重。

罗晟:他们好像不是抱着谦虚的心态去学习美学,而是抱着自卑的心态去学习美学。

阎国忠:是。他们好像对一些来自于西方的,比方说来自于美

国、来自于欧洲、来自于日本的东西,觉得都比我们中国的高明。

事实上不是这样,真正把西方的东西拿来读一读,就觉得它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我刚才说的,始终局限于一个个体的人,他(她)怎样去审美,他(她)的审美经验,具体的心理经验、心理结构、心理效应,始终停留在那一块,所以它有很大的局限。但审美现象又是一种社会现象,你不能脱离社会群体来讨论,因为它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互相影响的,昨天我讲课讲到了这个。这点是我们中国学者的长处,它既能吸收西方的心理学理论来讨论审美现象,又能从社会学的角度讨论审美现象。李泽厚先生的美学叫做实践美学。到了90年代后期,有一批青年学者,对这种审美现象提出了挑战,后来学术界把它叫做后实践美学,就是和李泽厚先生进行辩论,和他进行讨论,提出了很多不同观点。这个就是使人们对李泽厚美学重新进行反思,进行审视,看看李泽厚哪些是能立得住脚的,哪些还是需要讨论的。后实践美学是有功劳的,这批年轻学者提出了很多新问题。

应该说现在实践美学的影响渐渐在减少,就是说李泽厚的影响渐渐在消失。那么现在美学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呢?去年开的一次全国美学会议,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受到西方的生态美学的影响。生态美学就是从生态学展开来,影响了神学,影响了哲学,影响了伦理学,也影响了美学。生态问题是人类面对的一个共同问题,各门学科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在这种影响下,我们中国一批学者现在注意到怎么样用美学来调节人和自然的关系,解决人的生态问题,在这个研究方面做一点贡献。现在有些人已经做了。我自己发表了三篇文章,都是围绕着人和自然的关系。在我看来,美学的最大课题不是别的,不是艺术品怎么欣赏,或是自然风光怎么欣赏,而是怎么调节业已恶化的人和自然的这种关系。

罗晟:关于什么是美学,历代大师都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比如美学之父德国的鲍姆嘉认为美学是研究感性知识的科学,而黑格尔认为美学的研究对象是美的艺术,故美学就是艺术哲学。您认

为什么是美学呢？

阎国忠：这些说法影响都很大，但是这些说法我都不是很赞成。我觉得美学作为哲学的一部分，它是解决更深层的问题，这个深层问题就是人和自然关系的问题。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当代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最大的困境。由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伴随着的就是人和自然关系的一种破裂，渐渐地，自然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的生态状况是越来越恶化，这是人类共同面对的最大问题。人通过什么途径来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融合人和自然的关系？我觉得美学最大的课题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美学研究的对象首先不是艺术品，是自然，自然界。过去我们很多学者轻视对自然美的研究，认为自然美是粗糙的、幼稚的，一种雏形的美，只有艺术的美才是最高形态的美，所以把很大的精力关注到对于艺术美的研究。实际上，自然美的研究是更重要的，自然美里面的学问很大、很多。康德的讨论比较多，后代人就忘记了康德的这一套，就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很可惜。康德在他的书里面涉猎很多东西，自然美的东西很多章节谈到了，但是这些章节，无论是我们国内的，还是国外的美学著作当中，很少涉及到这些方面。实际上现在拿来仔细推敲研究一下康德的谈论，对我们是非常有启发的。康德讲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什么？就是自然美对人来讲，更直接，而艺术美对人是间接的。什么叫间接的？就是说艺术美的鉴赏当中要进入很多社会观念，政治的、道德的、宗教的，各种各样的观念，在艺术品的鉴赏当中，它自觉不自觉地进入到鉴赏当中，所以它是间接的。自然美的鉴赏是直接的。你去逛黄山，你去游西湖，你到什么一个风景区观赏的时候，都不可能有个道德观念、有个政治观念去介入。它是直接和自然情感的交流。

罗晟：刚刚谈到美学在中国学术上的、理论上的发展，但是美学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应该是向大众普及，所谓美育。但是我们现在教育也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只是小学的时候，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且美育是个很薄弱的环节，更多的是把美当做一个概

念,一个公式来灌输。那么您怎么看待在中国发展美育?

阎国忠:我先说美育这门学科。美育非常重要,这个问题我以前谈得不是很清楚。我们的教育方针之所以要讲美育,德智体美劳,为什么要提个美育呢?美育和德育两者究竟有什么不同?我要讲讲我的想法。它们是很不同的,不是说一般的不同,而是很大的不同,它们整个给人的教育是两类教育。

美育主要是四个方面的。第一个它是感性教育。什么叫感性教育呢?就是说我们的人在长久的文明史中,我们的理智渐渐发达起来,我们思考问题的能力渐渐发达起来,但是我们的感性能力却渐渐退化。我们眼睛的视觉能力,耳朵的听觉能力,我们对很多事情的敏感程度,甚至不如原始人。原始人听若干里的一个传声,就能辨别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在发出吼声;在天气的变化当中,他们就能预知有没有洪水会发生。原始人听觉、视觉、感觉能力都是非常敏锐的。而这些在我们人类文明的发展当中,我们渐渐地不用这些东西,用不着用耳朵直接去辨别这些东西,有很多仪器、机械代替。我们不需要用眼睛去辨别这些云彩会带来风,那些云彩会带来雨,气象学完全给我们解决了。对吧?所以我们这些人,渐渐失去了这些功能。美育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感性教育。就是通过音乐、美术使你能够不断地保持,甚至是使你各种感觉发达起来,包括辨别色彩的能力、辨别音响的能力、那种和谐节奏、那种有秩序的运动,我们通过审美教育可以始终保持这种敏感。感性,人的一种很重要的能力,完全萎缩退化了,人对很多事情就会失去兴趣,因为很多兴趣是来自于感觉,很多快乐是来自于感觉。如果我们感觉能力渐渐退化了,我们人类可能很多兴趣要失去。比如现在很简单的例子,听觉,我们就不如一个音乐家,我们就不能辨别各种乐器发出的不同响声。一个乐队演奏,哪个地方出了毛病,我们听不出来,但是一个指挥家就能很轻松地辨别哪个乐器出了毛病。辨别色彩的能力,我们绝比不上画家。他能够将云彩、树木、光照等不同情况下各种色彩的变换,很快地捕捉住,而且用

他的色彩表达出来。我们一般人不具备这种能力。这就是说感觉能力是需要培养的,需要通过艺术的手段、美育去维护,使他能保持这种敏感的程度,这是任何教育取代不了的,只有美育。

第二个,美育是情感教育。审美本身是一种饱含感情的活动。所以说有人把审美叫做移情,西方有一个学派认为审美就是一种移情现象。情人眼里出西施,为什么我把一个人看做是西施?就是我把情感投入到她身上去了,看见她是一种饱含情感的活动。那么审美教育就是丰富人的情感,净化人的情感,调节人的情感,这样一种活动,除了审美教育,其他教育满足不了这方面的需要。只有到审美当中,才能深深触动人的情感,悲剧、喜剧,那些优美的、崇高的、悲壮的、惨烈的,都能够激发人的不同情感。而在这种激发过程当中,人的情感得到了净化,得到了陶冶。这是很重要的,这也是任何教育取代不了的。亚里士多德有个重要概念就是净化,他认为文学艺术对人的最大作用就是净化作用。净化指的就是净化人的情感。使人在不断地反复地去观看、欣赏的过程当中,人自己的情感得到了一种净化。性格暴烈的人可能在欣赏的过程中心情变得平和起来,情感比较冷漠的人在观赏当中可能就渐渐地恢复起正常的情感。

第三个,审美教育是一个涉及到人的整个心灵的全面教育,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教育。为什么呢?因为任何教育都只是一个方面的教育。智育,是促进理智的;德育,是促进人的意志的;体育,是促进人的肌体的;惟有美育是触及到人的整个心理的,感觉、知觉、想象力、情感、理智、人的意识和下意识,全部的心理都要投入进去。在你介入审美活动的时候,不单单是一种感觉,也不单单是个想象,整个人的心理都要投入其中,整个生命都投入其中。为什么能忘我呢?因为你整个生命都投入到对象上去了,你就能忘我了。所以美学界常常喜欢谈“物我两忘”,既忘了物,也忘了我,两者完全融合在一起了。这种感觉我们在审美当中经常会经历的。比如你真正投入到一个情景当中,比如你看《简·爱》电影,当你真正入

迷的时候,你忘了自己在观赏,而你是个观赏者;《简·爱》的男女主角都是英国人,而且是虚构的英国人,但你完全忘了,就好像处于《简·爱》当中,完全和他们融为一体了,和主人公一起悲喜、欢乐或者痛苦。就是在这个时候,你整个生命已经投入到鉴赏当中了。这就不仅仅是理智,不仅仅是情感,是整个生命,整个心理投入进去了。一个善良人恐怕首先体现在你能不能珍惜一个小的生命。如果这些你都不知道珍惜的话,我觉得人性中那种残忍的一面,在很多人心里是非常顽固的。所以攻击性——西方称为攻击性——这一面应该随着整个人类文明的进化受到遏制。但是人类文明本身带来的负面东西,人和人之间的战争,助长了攻击性的一面,始终没有消除,反而是更加加剧了。在自然界陶冶之中,可以培养,可以使人得到熏陶,意识到自己是自然的一个部分,你并不是高于自然的神,你就是自然的一分子。如果你离开自然的话,你根本不能生存。人如果真正意识到自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时候,就能正确处理自己和自然界的关系,也会养成一颗善良的心。所以审美教育是各种心理机制的调动。由于各种心理的调动,促进了各种心理平衡、和谐的发展,这是任何其他教育取代不了的。

罗晟:像我们现在却常常忽视美学教育。我们以前忽视了,现在可能也在忽视,但我们发现了这些不足,那么学校、老师、同学应该怎么样补救呢?

阎国忠:应该是从领导到学生,大家都要接受审美教育。当然,这也与我要讲的美育的第四个方面有关。我认为审美教育自我教育,主要不是靠理论,而是靠自己直接介入去欣赏作品,或是到自然界去游历,直接去感受,这是审美教育最主要的途径。不过在这之前,应该有点知识性的接受。就是说起码的东西,比如说审美教育是一种什么教育,要有一个基本的理解,这个是需要。不然的话,领导始终搞不清什么是审美教育、和其他教育有什么区别的话,他怎么能重视审美教育?根本就不知道审美教育本身有些什么特点,是什么性质,它的目的,它的效果,它的特殊效果,不

了解,你怎么能够关注审美教育?这是很自然的道理。所以必须得让大家了解审美教育的性质,它所达到的效果是任何其他教育所取代不了的。

罗晟:我感觉90年代以后,人们对于美的追求趋向于表面化,从人们在社会上的种种表现可以看得出来,相对于美的实质却淡漠了。像拜金主义、金本位主义,开始渗透到人们的观念中去了。由于这些思想的影响,对于美的追求成了“我需要美,我才要看到美”。但美是需要人去发现的。这种现象是不是值得让人担忧呢?会不会影响下一代呢?

阎国忠:这也是我们要进行美学教育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审美不能停留在经验的层面。我们现在普通的大学生,他停留在自己的经验的层面上,直接靠自己的眼睛、耳朵去判断美不美,满足于这种层面上。这就是经验层面的东西。在人生经历过程中自己会养成审美眼光,而不需要外因去引导,任何人都可以进行审美的判断。但是这种层面是非常素朴的,非常粗糙的。也就是因为大学生有很多这样地面对一个审美现象,所以要进行普遍的审美教育,让他们能提高一个层次,从更高层面来看待审美现象。不是停留在直观上、感性上。能透过一些表面上美的东西,通过自己的更深的思考,来体会到其中更深的文化内涵。因为审美现象和其他的社会现象交织在一起,它不是孤立的东西,每一种审美现象后面都包含着一定的文化内涵,会有各种各样观念和文化在里面。如果你缺乏一种辨别能力,停留在表面上,只靠自己的眼睛、耳朵去辨别的时候,你可能被它的表面所迷惑,不能加以区分,就不知道哪些是自己应该珍惜的,哪些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比如说审美教育中间,我们必须讲明对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画,我们为什么认为是文化精品,需要当作精品来看待,另外的二、三流的一幅画我们可以看看罢了,不用认真地对待它。审美教育必须要讲清楚这些道理。

为什么说古希腊的悲剧到了今天还有这么大魅力,而我们今

天自己创作的悲剧却没有这么大的魅力？今天写的悲剧是面对今天的人的，是今天的题材，相反倒不能打动今天的人。而古代的希腊人，写的是几千年前的事情、几千年前传说的故事，为什么今天仍然能打动我们？这道理在哪？美学教育就是必须讲清这些东西，使人们知道这里面的分量的轻重，把自己关注的重心放在应该关注的位置上。

罗晟：最后，请谈谈您对华中科技大学的印象。

阎国忠：在华中科技大学的三天，是我多年来所未经历的令人兴奋不已的三天，我喜爱它的优美的校园，更喜爱年轻学子们热心向学的精神。我永远怀念在这里的日子，祝它永远朝气蓬勃，充满活力。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供稿

后 记

这是新世纪的第一卷《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2000年7月,本书第四卷出版之际,著名的历史学家张岂之先生建议我们要加大本书的人文含量和知识含量。一年来,我们也在努力使本书在内容上有新的突破。因此,有必要对本卷稿件的编选情况作些说明。

面对新世纪,如何深化文化素质教育和素质教育?周远清、杨叔子、王义遒等先生的文章对此有新的深入思考。杨振宁、田长霖、樊明武、刘兆汉等先生的演讲则对新世纪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提出了新的见解。田长霖、樊明武、刘兆汉先生都是海内外著名科学家,同时又都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工作,他们的思考和经验很有参考价值。其中,特别要提请关注的是,杨振宁先生在他的演讲中再一次提到中国教育哲学和美国教育哲学的区别,并有了新的更为全面的阐释。这非常值得我们研究。

清华大学的人文讲座一贯注重对经典著作的评价。本卷收录的王太庆、张世英、何兆武三位先生的演讲就来自清华大学。他们的演讲或正本溯源,或知人论世,或驾轻驭熟,把令人望而却步的哲学巨著阐释得明了清晰,确实让人敬佩。倪梁康先生是著名的现象学专家,他关于“理念人”的演讲,在实用主义思潮盛行了一个世纪、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的今天,使人在略感沉重的同时,也多了一份沉思。

1999年是五四运动80周年。鉴古知今,以史为鉴。科学、民主是五四运动的两大口号。今天,我们在高等教育中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与科学素质,也可说是五四精神在今天的继承和弘扬。龚育之、何祚庥、金耀基、张磊、王晓秋诸先生

从不同的角度对五四的精神和意义以及在今天如何弘扬五四精神做了精辟的阐述,内容还旁及传统文化、中西文化交融、中国近代化的历史发展等问题。这些演讲对我们理解上述问题,是很有帮助的。

科学与人文,一直是本书关注的焦点之一。著名物理学家周光召、丁肇中先生的演讲通过对科学发现的典型案例分析,探索科学发现的秘密。这对我们发展科技事业,加强创新教育,培养高层次人才,具有很大的启迪意义。吴国盛先生的演讲则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了近代以来,尤其是 20 世纪的科学史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历史上的科学与人文的互动。人生问题也是人文应有的内容之一。曾宪梓、刘献君、李德顺等先生的演讲或从自己的人生体验出发,或站在理论的高度审视人生。相信他们演讲会引起青年人的关注,既崇尚科学,更弘扬人文。这里,特别提请注意的是“人文访谈”的四篇文章,其人文含量之重,相信读者会有同感。

就在本书付梓之际,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个讲话,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而且也是我们国家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并且将深深地影响我们这个世界。不久,又传来了北京申奥成功的消息。世纪奥运梦,同时也意味着一百多年来令每一个炎黄子孙魂牵梦绕的国家强大、民族独立的不懈追求。中国与世界,我们时刻关注着。本卷“中国与世界”栏目下的一组演讲稿,以及发展经济学创始人张培刚先生,还有朱善利先生的演讲分别从历史、哲学、文化、国际关系、经济学的角度阐述了中国走向世界这一问题。

文学艺术中透露出极为深切的人文关怀。在其他领域或多或少被抽象为概念的丰富具体的生命过程,在文学艺术中得以生动地再现。关注文学艺术,就是关注我们的心灵世界,它滋润着我们的心灵。本卷一如既往地推出一组文学艺术方面的演讲稿,值得一读。

从征稿到整理录音,从稿件的筛选到润色加工、审定,其中之

辛劳,自不待言。但当看到这些著名的学者专家、成功人士的精彩演讲由声音变成文字,从而可能使更多的人从中受益时,编者可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无论如何,这本书是集体的智慧和集体的劳动的成果,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世纪之交中国高等教育发生的一场深刻的变革,记载了世纪之交中国学者的思考。甚至有这样的溢美之词:它将是世纪之交留给后人的一笔精神财富,至少它在学术思想界和大众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为此,我们要特别地感谢本书的演讲者们,正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精神、他们十分卓越的研究成果、他们毫无保留的人生和学术经验,构成了本书的内核。物质财富将随时间的推移会消失,而精神财富将永存,并沉淀,加深,加厚。老子说得好:“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本卷的编辑整理工作,得到以下同志和单位的大力支持:

正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访问学者的清华大学的程钢博士,校订了王太庆先生的演讲稿,并补订了部分外文术语;华中科技大学物理系张端明教授审校了部分科技方面的专业术语;众多的高等学校向我们推荐了一批优秀的演讲稿。特别是东南大学的陈怡、陆挺先生,学校出色的人文讲座使他们有可能为本书提供了一组非常优秀的演讲稿;

中国教育电视台“学术报告厅”栏目也推荐了一组非常优秀的演讲稿;华中科技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的郭玫同志,组织了一批同学从事录音整理工作。

在此,我们向他们深表谢意!明年我们将继续推出本书第六卷,我们真诚地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使我们的事业不断前进。

编 者

2001年7月15日